

#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1991.1

## 政治迫害新高潮 昌竟如：還我丈夫劉蘇里！



王軍濤之妻向海外呼救  
張維正被“監視居住”  
潘維明被清除出黨  
錢其琛：  
人權問題我不清楚

古董倒爺  
大陸修道院探密  
我堅持一項基本原則  
鄧小平後事如何料理？  
權力黑箱中的八五計劃  
莫斯科：人們在悼念沙皇  
新移民法對留學生的影響  
公安部〈11·23行動報告〉



# 昌竟如：還我丈夫劉蘇里



我叫昌竟如，我丈夫劉蘇里因積極參加去年春天北京發生的民主運動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七日被捕入獄。兩天前，我接到由北京市檢查分院于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簽發的正式逮捕令，（由在北京友人用電話正式通知我的）。劉蘇里的罪名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對他的審判迫在眉睫。

劉蘇里，三十歲。被捕前是中國政法大學行政管理學教研室講師。在去年的民主運動中，他擔任“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聯絡部長”。被捕后被關押在北京秦城監獄，至今已逾五百天。

去年11月底我來美求學，至今以前我一直保持沉默，因為我一直抱着我丈夫可能會被釋放的希望。可萬萬沒想到，我的這種長期等待所得到的結果竟是一紙逮捕證！

我丈夫非常熱愛他的國家，在去年民主運動中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促進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他始終堅持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原則。他沒有犯任何罪行，即使用中國現有的法律來衡量的話，他也不該受到刑律的懲罰。

劉蘇里小時候頭部受過重傷，留下嚴重的后遺症。我獲知自他入獄后發病多次，頭痛難忍，經常無法入睡，而且時有暫時性喪失記憶的情況出現。我非常擔憂我丈夫的健康狀況。

我們曾經有一個非常幸福的家庭。我們三歲的兒子太年幼，無法理解他為什麼不能見到親愛的爸爸，可是他需要父親，需要父母的撫愛。

我的丈夫應該自由地生活，享受一個普通人所擁有的正常權力。

我以一個妻子和一個母親的名義向中國政府呼吁：

請立即釋放我的丈夫劉蘇里，并使他能得到基本的醫治。

我還向所有至今仍在關心去年六月四日民主運動中被捕的民運人士的人們呼吁：

請你們幫助我的丈夫劉蘇里早日獲得自由！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一日

# 濟助大陸民運人士家屬 渡過“六四”後的嚴冬

自去年六·四至今，五百多個日子過去了，當時擋在坦克車前的英雄王維林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知。王丹、王軍濤、陳子明、劉曉波、楊巍等被捕民運人士在獄中已經孤獨地渡過了兩個中秋，而魏京生、王希哲、徐文立等人則身陷囹圄十多個春秋了。被捕或逃亡的民運人士中，不乏妻離子散，父死母亡的悲慘故事，這是他們的悲劇，也是十一億中國人的悲劇。他們是在為整個中華民族的前途逃亡，坐牢與受刑。波蘭工會領袖華里沙說：“想到中國的情形，我就想哭。”我們都能感受他的心情，因為去年六·四前後我們都曾痛哭，痛哭在電視機前，痛哭在追悼會中。

在這耶誕將屆之時，美國大城小鎮都有人為貧苦無依者捐衣、捐食、捐錢，讓他們渡過一個溫暖的冬天。但是這些為中華民族背十字架的被捕民運人士，却面臨着被提審起訴，被處以重刑的命運，他們在獄中已經渡過了一個個寒冷的冬天，他們和家人還將面臨一個更為嚴寒冷酷的冬天。

當我們在海外準備歡渡聖誕佳節的時候，我們呼吁所有中國人社團聯合起來給予他們溫暖與關注，讓他們渡過一個較為溫暖的冬天。雖然去年六·四前後我們無法與北京市民學生一齊站在街頭，擋在坦克車、衝鋒槍前，現在讓我們與他們站在一起，幫他們抗拒中共政權對中國良心的迫害，我們要以長期的實際行動來為他們提供精神上、經濟上以及法律上所需要的支援。

我們要求李鵬政權立即釋放所有被捕民運人士。反特權、反官倒、爭自由、爭民主是全球中國人的願望，中國政權沒有任何法律基礎逮捕、拘押勇敢表達十一億中國人心聲的英雄。被起訴審判的應該是在北京下令開槍的民族罪人。

我們歡迎所有個人或團體的聲援或支持，捐款將做為接濟受難人家屬以及代為聘請律師之費用。

支票抬頭請寫 SCCD，并注明給民運受難人士。

聯絡處：SCCD P.O.Box 31561, Walnut Creek, CA 94598

TEL: (415)938-2289 FAX: (415) 938-6477

財務監督：程萬里，黃雨川，區錫機；法律顧問：趙霄

聯署團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民主中國陣綫，海外興中會，中國自由民主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北加州民運聯合服務中心，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中國民主研究中心，民陣美國分部，舊金山灣區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民聯舊金山分部，民陣舊金山分部，民聯洛杉磯分部，民聯南加州分部，柏克萊加大中國論壇，北加州港澳人士民運小組。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  
第一份中國海外民運刊物

# 中國之春

1991年1月號 92期

1990.12.15. 出版

1982.11.17. 創刊

## CHINA SPRING

P.O. BOX 701400  
FLUSHING NY 11370-9998  
TEL: (718) 429-6777  
FAX: (718) 476-1602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8.00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74-14 WOODSIDE AVENUE ELMHURST, NY  
11373. SECOND - 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EW YORK.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 TO CHINA SPRING,  
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11373.

COPYRIGHT ©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中國之春〉編輯委員會

胡平 丁楚 江文 徐邦泰 汪岷  
高格文 伍凡 吳志强 李兆陽

董事長：徐邦泰  
社長：胡平  
主編：丁楚  
執編：方舟  
記者：程路  
發行：薛偉



- 2 還我丈夫劉蘇里 昌竟如  
3 濟助大陸民運人士家屬呼吁書 中國民聯等
- [封面故事]
- 6 王軍濤之妻向海外呼救 紀天生  
8 張緯：我正被“監視居住” 房志遠  
10 潘維明被開除出黨 鄭之廷  
12 錢其琛：人權問題我不清楚 本刊記者  
15 美國大使禍從口出 譚夏  
——李潔明失言惹風波
- [熱點追踪]
- 17 政治黑箱中的八五計劃 何頻  
17 七中全會上人事無大變動  
19 鄧力群成了“地下總書記”？  
21 “八五計劃”的基本精神
- [民主牆]
- 24 社會主義大悲劇(下) 胡平  
29 我堅持一項基本原則 丁楚  
32 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繪制藍圖 陳雪
- [竹幕背后]
- 38 秘密鐵路 未名
- [民運]
- 40 大陸地下刊物〈復興〉創刊辭 <復興〉編輯部  
42 從批評者到參予者 安琪  
——訪民陣法國分部參選者  
46 一個以商養運的可行計劃 錢達  
49 民運組織的保密和抓特務 陳小山  
52 也談三權的分立與界定 李兆陽

# 錄

## [國際]

- 54 戈爾巴喬夫回到一九一八?  
57 莫斯科: 人們在悼念沙皇  
62 釣魚台: 日本世紀的絆腳石  
65 亞細亞民主楷模的危機  
———巴基斯坦大選評述

馬怡陽  
楊漫克  
平可夫  
曾馳遠

## [大陸]

- 68 公安部〈11.23行動報告〉  
73 黃埔江上股票潮  
75 劫機和反劫機的死結  
79 大陸修道院探秘  
84 獄中回憶: 盧瞎子

少君  
趙進  
胡楠  
程路  
楊小凱

## [生存者自白]

- 87 古董倒爺  
89 愛是不能忘記的

吳明禮  
馬奇

## [爭鳴]

- 91 理想不死, 底綫可動  
———與丁楚先生商榷  
92 政客政治和政治家政治  
———與楊小凱先生商榷

王建國  
李一原

## [移民顧問]

- 94 美國新移民法對留學生的影響

路識

## [讀史偶拾]

- 96 民主革命集大成者

陳雪

## [隨想]

- 28 片斷——摘自日常生活手記  
67 宿(詩)

貝嶺  
貝嶺

## 遷址通知

中國民聯總部已于一九九零年  
十月搬遷, 新址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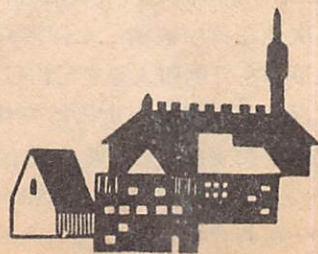
10 N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001 U.S.A.

新電話: (202) 797-2722

新電傳: (202) 797 2803

總部信箱仍然留用:

P.O. BOX 15273  
WASHINGTON D.C.  
20003-0273 U.S.A.



# 王軍濤之妻向海外呼救

紀天生



侯曉天：請幫助援救王軍濤出獄。

據合衆國際社消息，去年在六四屠殺之後被捕的大陸著名持不同政見者王軍濤之妻侯曉天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冒險向外界呼救，希望各界出于人道之心，援助其夫王軍濤出獄。

這是王軍濤第二次入獄。他第一次入獄是因一九七六年參加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的“四五運動”，那次他在獄中被關了七個多月，當時只有十八歲。王軍濤在打倒四人幫之後出獄，便成了“四五”英雄，被選為共青團團中央候補委員。在八十年代末，他活躍於民主牆前，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一本民辦刊物〈北京之春〉的副主編和對外發言人。以至那整個一個時代都以他主辦的那本雜誌“北京之春”而命名。此後，王軍濤一直是民主運動積極推動者。他於一九八零年參加了北京大學學生的競選，一九八五年在武漢主辦過行政幹部培訓，一九八七年回北京

主持一張民辦的報紙〈經濟學周報〉，八九民運爆發之後，他致力於北京學生、工人、和知識分子的溝通和聯合，是北京各界聯合會籌備會負責人。六四之後，王軍濤在向南逃亡的途中於長沙被捕。

王軍濤被捕之後，他二十七歲的妻子侯曉天被趕出原住宅，遷至一個狹窄的四合院，終日受到監視。今年四月，侯曉天被當局拘審，在獄中水泥地上睡了近四個月，出獄後患病入院。亞運會前，中共為向外界顯示開明，曾允許侯曉天和王軍濤每月通一次信。從這些信中，侯曉天預感到王軍濤的危險就要來臨，于是在醫院里寫信給外國記者求救，她說：“當我為丈夫呼救時，覺得自己渺小而又無力，四周聽不到一點回聲。我需要更多的幫助。”

果然，她在十一月二十四日收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對王軍濤的正式逮捕通知，罪名是：“反革命宣傳煽動”和“陰謀顛復政府”。按過去的慣例，這種罪名是要處予十年以上徒刑甚至極刑的。



他們(王和侯)曾經有過一個幸福的家庭。



王軍濤被捕后，侯曉天被迫遷到這個院子，全天受到監控。

與侯曉天同時收到逮捕通知書的還有陳子明的家屬。陳子明就是一九七六年天安門廣場事件中著名的“小平頭”，是當時代表群眾和公安局談判的代表之一。“四五”事件發生前他就以反革命言論罪被捕，在北京郊區清河勞改場監督勞動。他參加“四五”運動正是他的假釋期間，可見其為民運事業而“屢教不改”。陳子明也是民刊〈北京之春〉的核心人物，從那時起他一直致力於建立一支獨立于官方之外的民間力量。一九八五年起他和一批朋友在北京籌建了北京行政函授學院和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在他的周圍聚集起一大批有志于推動中國民主化的青年。

“六四”屠殺后，陳子明和妻子王之虹雙雙上了通緝名單，不得不踏上了逃亡之路，當時王之虹已身懷六甲。當年十月，陳子明夫妻在廣東湛江親戚家被捕，王之虹臨產，保外候審，陳子明被關在秦城監獄，至今已有十五個月。陳子明的罪名和王軍濤一樣，面臨生命危險。除王陳二人之外，已知同時收到逮捕通知書的還有包遵信，劉曉波，楊巍，任曉町，陳小平，劉蘇里，韓東方等十六人。

不久前，海外盛傳王陳二人將被立即審判，並內定死刑，在七十二小時之內執行。經筆者核查，消息不實。至少到本文定稿之時，王陳兩人家屬尚未接到正式起訴書，她們接到的只是逮捕通知書。按中共司法慣例，接到起訴書后將在一星期內開庭審判。從目前國內外形勢分析，對中共來說當前都不

是公審政治要犯的時機。因為最近美國政府負責人權事務的官員剛好要訪問中國，中共沒有必要趕在這個節骨眼上冒天下之大不韙，重建惡名。同時七中全會未開，中共高層對“六四”事件的看法還存在很大分歧，統一的政策尚未形成，下層官員更不敢貿然行事。

估計如果中共非要在近期内審判“六四”主要政治犯，最可能的時間會定在一九九一年的春節前後。一來七中全會閉幕，中共高層的處理意見會明朗化；二來正值學生寒假期間，反應最敏感的學校會相對平靜；三是屆時聯合國安理會給伊拉克的最后期限已到，是戰是和必有眉目，勢必吸引全球媒體的注意力；最后，按中共過去司法慣例，每逢節假日都要處理一批“反革命”或刑事犯，以起到威懾作用，保證社會平安。

另外據一些研究中共司法制度和一些坐過中共牢有切身經驗的人士分析，中共這次對王陳等要犯的起訴一般會採取低調姿態，絕不會大張旗鼓，甚至不會像審判魏京生時起點那樣高，一開始就在中級法院開庭，而會首先在區一級地區法院的低層次上淡化處理。

但無論中共如何處理王軍濤、陳子明等人，海外民主力量都宜以不變應萬變，不斷地吸引海外輿論界在這件事上的注意力，動員各種國際力量對中共施加壓力。可以說，海外動員的壓力越大，國內牢里的民運人士就相對安全。

# 張煒：我正被 “監視居住”

房志遠



在北京大學競選時的張煒

張煒，三十六歲，湖北武漢人。北大經濟系畢業，是恢復高考後北大第一任學生會長。畢業後到天津工作，曾任共青團天津市委書記，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主任。‘六四’前是天津市政府對外經貿委主任，天津市委外事辦工委書記。

‘六四’之後，張煒不滿李鵬政府的倒行逆施，在一次市政府工作會議上憤然辭職。他的辭職聲明如下：‘我抗議動用軍隊對付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群眾，我不贊成李鵬的講話，現在執行我的職務和忠於人民發生了矛盾，我只能選擇後者，因此，我請求辭去我的職務。’

辭職之後張煒受到政治迫害，失去自由，言行受到官方監控。十一月二十六日，本刊主編房志遠（丁楚）以北大同學的名義與張煒通電話問候。鑒於張煒希望海外了解他目前的處境，本刊將房張兩人的對話整理出來，作為專訪發表。

房：張煒，我是房志遠，北大的老同學，好久未聯繫了，還能記起我嗎？

張：房志遠，太記得了。咱們還競選過呢。你現在在哪？

房：我在美國紐約給你打電話，和你聊聊，不打擾您吧？

張：沒關係，遺憾的是電話有錄音監聽。

房：現在我們的電話有人錄音嗎？

張：讓他們錄吧，我不在乎。

房：你現在生活怎麼樣？身體還好吧？老婆孩子好嗎？

張：我身體還好。老婆和我離婚了，孩子得了白血病，整天要上醫院。

房：什麼，離婚了？什麼時候離的，是因為政治原因嗎？

張：有一些吧，不完全是。她是去年十月離開我的，那時我被監視居住。

房：孩子病情如何，有希望治好嗎？

張：我只能盡力而為了。他們為了方便控制，把我的汽車駕照給收走了，所以我只好抱着孩子去醫院。

房：你現在政治上的處境怎麼樣？

張：我的待遇很高啊，現在他們給我在門外加了崗，二十四小時監視，我上哪他們就有人跟着我上哪，絕對安全。（笑）他們還要求我每天寫記錄，滙報每天的行踪，我提出抗議，他們說：你現在被監控，希望你合作。我當然拒絕合作。

房：這麼說，他們的監視是公開的了？

張：是的，我一出門，就有人上來問：‘你要上哪去？’我說：‘我要去菜市場，’或者‘去上班’，他們就跟着我去。去年十月起我也受過監視居住的待遇，後來不了了之。可是不知為什麼現在又恢復了，比去年還嚴，變本加利了，而且手段極不高明。有一天還把我叫到當地派出所去談話。一個所長和我談話，每談幾句話，就假裝有事出去一下。顯然是去請示什麼人，他的背後有人操縱。

更可笑的是他們還搞一些偷雞摸狗的小動作。那天下午，按一般的情況我母親要去接我的侄女，可是那天恰巧沒走，留在家裡。她聽到門鈴響，沒有理，結果就聽到有人用鑰匙開門的聲音。進來的是兩個陌生人，他們一見我母親在家，很尷尬，忙解釋說：“張煒在我們那裡丟了鑰匙，我們給送回來。”我媽說：“為什麼不還給張煒本人？”他們說：“張煒已經不在了。”我媽



說：“那就交給我好了。”他們又不同意，講的話前後矛盾。顯然，他們是要趁我不在家搜查什麼東西的，沒想到我媽剛好在家。過了不久，他們又來了，交待我媽說：“張煒叫我們轉告您，要是有什麼人來找他，請他們等着。”我媽問：“你們不是說張煒不在你們那兒嗎？”問得那兩人無言以對，最後吱吱嗚嗚地走了。

房：其實，你一回來，不就什麼都戳穿了嗎？何必編這麼一套瞎話？

張：所以我說他們手段太不高明，蠢得很。

房：他們對你宣佈監視居住也要有個理由，什麼理由？

張：他們講不出任何理由，我唯一的罪狀就是發表了一點不同意見。他們審查我，監視我，無非是想查出我和趙紫陽有什麼聯繫，和北京的學運有什麼聯繫，結果查了半天什麼也沒有。

房：你沒有直接捲入北京的學潮吧？

張：根本沒有。我就是一次和吳嘉祥、石小敏在北大表了一個態，認為學生的行動是愛國的，不是動亂，政府應當和學生對話。還有就是在“六四”前後不同意李鵬的講話，沒有與中央保持一致的立場。這大概就是全部的罪狀了。其實，我作為一個黨員完全有權利保留自己的意見，而且我又是在黨的工作會議上公開講的，既符合程序又沒違反黨的紀律，總不能連個人的看法都不能說吧？我有什麼看法就說什麼看法，絕不昧着良心說話。

房：是不是因為你的辭職行為造成的影響？

張：我當時是天津市政府外經貿委主任，經常和外賓打交道，既然我不同意李鵬在“六四”中的說法，又不願講違心的話，所以我無法向外國人解釋我國發生的事情，只好辭職。

房：你原來是什麼級別？辭職之後做什麼工作？

張：我原來算正局級。辭職後我本想回天津開發區工作，我在那裡工作的時間比較長，熟悉情況也有感情，可是他們不准。要把我分到一家工廠，我不同意，後來他們同意我去社會科學院，我提出我搞過外經貿工作，希望能搞外貿研究，可他們不同意。

房：那你現在社會科院搞什麼工作？

張：當資料員（笑），打雜，讀書。

房：你的工資和待遇有沒有降？

張：工資降了五十塊錢。

房：相當於什麼級別的待遇？

張：大概副處級吧！其實我對錢多少並不在乎，主

要是他們搞的小動作實在是太卑劣了，連“四人幫”都不如。“四人幫”批鄧時，我也是在一個黨的會議上公開地表示不同意批判鄧小平，也不過就是說我犯了思想路線錯誤，也沒有居住監視，政治迫害，搞這麼多小動作。

房：你所說“他們”具體是指誰？是公安局嗎？

張：是市委，當然也有公安系統。

房：你受到這些政治“待遇”，有沒有向上級有關部門申訴反映。李瑞環不是和你很熟嗎？為什麼不到他那去告一狀？

張：我不想連累別人。李瑞環自己也有不少麻煩，也有人在搞他。這次對我恢復監視居住，我估計是和范曾出走有關，這次范曾出走搞得很緊張，李瑞環也受牽連。

房：他們是不是怕您也跑了。

張：他們監視我主要是為了切斷我和外界的聯繫，結果這樣一搞，很多朋友想在生活上幫助我都很难。同時他們也在調查我和誰聯繫。我家的這個電話之所以留到現在，就是為了監聽，看我和誰打電話。

房：我給你打電話沒關係吧？你希不希望我把你現在的處境向海外公佈？

張：我不在乎，我講的都是事實，怕什麼？儘管他們監控我居住，我本來都想低調處理，還給他們留點餘地，現在他們逼人太甚，我也豁出去了。（氣憤）我跟他們沒完！

房：你對你個人和國家的前景有些什麼估計？

張：我想歷史總有一天會作出公正的判決？老百姓對“六四”事件顯然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包括監視我的人，他們也不過在執行公務，誰知道他們心裡是怎麼想的。現在搞的這一套我看行不通。前些日子我看報紙宣佈說：我國的經濟已經走出了谷底，最困難的時刻已經過去了。我心裡好笑，谷底在哪？天知道。我們什麼時候跟着李鵬轉到谷底去了？（笑）

房：你說的“這一套”是指什麼？

張：現在中央要收權。其中心思想是要加強中央對宏觀經濟的控制。收權主要是收財政權，另外就是收特殊政策。中央手裡一旦有了更多可以調配的資金和物資，就可以使地方就範。但是十年改革中，地方從權力下放中得到了不少好處，對當前的政策持有很強的抵觸情緒。所以現在看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很尖銳。另外經濟效益降低，企業虧損嚴重。怎麼樣，你們對國內的情況還了解吧？

房：海外有很多報導。

張：聽說要對王軍濤判刑，你知道這事嗎？

房：知道，前天（星期六）王軍濤的妻子收到公安局的正式逮捕和起訴通知書，罪名是企圖推翻共產黨領導及散佈反革命思想。

張：還有沒有什麼咱們北大同學的消息？海外有不

少北大同學吧？

房：很多，一開學術會議，到處都是。

張：好，見到北大同學替我向他們問好。把我的情況告訴他們。

房：你需不需要幫助。

張：不用了，謝謝你。

## 潘維明被開除出黨

鄭之廷

一度在大陸青年幹部（即第三梯隊）紅極一時的潘維明，不久前被他所任職的單位上海出版局除名。一年多來，他是這個單位黨的最高領導人——黨委書記。

潘維明今年四十一歲，一九七八年從江西省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由於較強的組織能力，於一九八一年被選為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之後受到任職於北大黨委辦公室主任的胡啓立之妻郝××賞識。一九八二年畢業後，留在黨委辦公室學生工作部工作。當時，他入黨只有三個月。

一九八五年初，潘維明調到上海。他的岳父梁國斌生前曾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潘維明到上海後受到岳父生前老戰友的關照，被調到上海市委宣傳部任辦公室主任。比在北大時升了兩級。

進入宣傳部後，潘維明把一些思想活躍懷才不遇的大學生和研究生聚集到自己周圍，結成以後曾一度主導上海宣傳部門的所謂的‘潘幫’。同時，通過岳母的關係，他先後拜訪了陳丕顯、陳國棟、胡立教、汪道涵等上海政要，受到重視。一九八五年原市委宣傳部長王元化離休之後，潘維明再一次被破格提拔兩級，接任市委宣傳部長。

年屆四十的潘維明此時躊躇滿志，進入了他事業的巔峯。一上任，他就大刀闊斧地整頓了宣傳部內部和下屬十七個局級單位的領導班子，在八個月的時間內，全部換上了他周圍的年輕幹部。在整頓

過程中，他辦了一個‘強化訓練幹部學習班’，把一批三十五歲到四十五歲的上海文化系統的精英，召集在一起強化訓練了一段時期，分別調到他屬下單位任處級以上幹部。潘維明的這個強化訓練班在社會上有了‘黃埔軍校’的美稱，也有些人稱之為林立果式的‘小艦隊’。

一九八六年五月，潘維明在上海發起了轟動一時的‘文化發展討論會’。一批中共頗感頭痛的‘自由化人物’，如范長江、張顯揚、楊西光、王若水等，出席了會議，在全國掀起了一股持續一年之久的文化熱。此會的異常成功，使潘維明知名度大升。一九八六年九月，他被召到北京，列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對他的才幹大加讚賞。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胡耀邦從國外訪問歸來，途經上海，在虹橋機場會客廳同當時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芮杏文及潘維明密談三小時，連上海市委副書記江澤民也被排斥在外。這時，潘已經被認為是胡系的人馬了。一九八六年十月，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外宣局協辦的香港《鏡報》雜誌以‘中共政壇上躍起的一顆新星——潘維明’為題，專文介紹了他，同時還刊登了他的四幅大照片。

潘維明的躍升，很快引起了中共高層保守派的注意。在思想觀念上與潘維明對立的北京市委宣傳部長徐惟誠（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向中央密告了潘維明在上海的一些‘非組織活動’，接着安全部也查證了他在上海搞沙龍據點。與此同

時，上海宣傳文化系統十七名原局級老幹部，聯名給中央寫信，指責潘維明背離四項基本原則，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並列舉了大量事實。最根本的是，潘成了當時上海市委領導層中以芮杏文書記為首的一派和以江澤民市長為首的另一派尖銳派別鬥爭的犧牲品。江澤民對潘維明始終給予冷遇。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召開的上海市黨員代表大會上，身居宣傳部長要職的潘維明甚至連市委候補委員都未選上，而從前這個職位的幹部至少進入常委。這似乎預示了潘維明的前途艱險了。潘維明自己也感覺到這一點。一九八六年底，上海爆發大規模學潮，潘在一次沙龍中說：‘不能再讓學生們鬧了。再開下去，不但我要垮台，連胡耀邦和胡啓立都要垮台。’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胡耀邦被迫辭職。二月一日，潘維明緊接着被解職，調中央黨校學習。命令是宋任窮下的。

在二月到七月的五個月學習階段，潘維明在北京結識了趙紫陽智囊班子中的一大批精英人物，同時還結識了一批高幹子弟。當時胡啓立和芮杏文還掌握着中央書記處和意識形態大權，潘維明儘管落

魄一時，但是後台還是相當硬的。他於一九八七年七月回到上海，被分到一家工廠任黨委副書記，但保留正局級待遇。不久，由胡啓立出面和江澤民談妥，讓潘出任上海出版局黨委書記一職。潘維明的部下們非常興奮，到處奔走相告：咱們的潘部長又回來了。

八九民運爆發之後，潘維明同北京三所一會頻繁聯繫，靜觀事態發展。五月二十日，李鵬宣佈北京戒嚴之後，他連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孫恒志、上海市文聯黨組副書記王安國（中共統戰部長閻明復的外甥）聯名起草了《上海共產黨員告全國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書》，尖銳抨擊李鵬政府的倒行逆施，並收集了一百九十八名老、中、青黨員幹部的簽名。‘六四’之後，此事作為上海第一號‘反革命政治事件’被清查。為此，潘維明於同年十二月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停職審查。

據說，二起二落的潘維明並未氣餒，他揚言：我還年輕，比老傢伙們年輕三四十歲。歷史將由我們為鄧小平和陳雲們做結論，而不是由他們為我們做結論。

## 中國民聯總部重要啓事

中國民聯各分部，支部，聯絡站，全體盟員：

根據一九九零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國民聯四屆五次聯委會會議的決定，中國民聯第五次代表大會將于一九九一年六月舉行。為了協助“五大”的籌備工作順利進行，中國民聯總部組織組希望各基層組織及盟員做如下事情：

- 一. 各基層組織務必在一九九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之前把該基層組織的盟員名單(包括地址，電話)，繳納盟費狀況交到總部組織組。
- 二. 各基層組織或獨立的盟員應在一九九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之前把盟員訂閱〈中國之春〉雜誌和收閱〈盟員通訊〉的狀況交到總部。
- 三. 因工作調動，轉學，或其他原因和當地的基層組織中斷聯系的盟員應于一九九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之前與基層組織或總部取得聯絡并請補交盟費。

中國民聯總部組織組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十五日

# 錢其琛：人權問題我不清楚

本刊記者



## 北京：新一輪政治迫害高潮

十一月下旬，中國大陸。

‘六四’之後被捕的王軍濤、陳子明、包遵信、王丹、劉曉波、楊巍、劉蘇里、陳小平等人的家屬分別接到中共司法部門正式發出的逮捕令通知，罪名分別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和‘陰謀顛覆政府罪’。王軍濤的妻子侯曉天和陳子明的妹妹陳子華冒險向外界呼救，劉蘇里的妻子昌竟如正在美國俄亥俄州讀書，也急忙趕到紐約向輿論界求救。

國際大赦各人權組織緊急動員；劉賓雁等人立即起草了一份呼籲書徵求簽名。在華盛頓，中國民聯總部、學自聯和人權基金會馬上準備了一份關於審判王軍濤、陳子明等人的備忘錄，提交國會和國務院，希望議員們和貝克國務卿在會見錢其琛時提出中國人權問題。

## 聯合國：中國葫蘆賣什麼藥？

十一月下旬，聯合國。

安理會正在醞釀一個重大決定：對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提出最後通牒日期，並授權美國對伊拉克動武。安理會的五大常任理事國中，美蘇英法均達成共識，只有中國態度不明。

參加安理會的中國代表是中共外長錢其琛，他是與會國所有外長中唯一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後訪問過巴格達，與侯賽因密談過的人。誰也不知道錢其琛和侯賽因談了什麼，誰也不知道中國會在安理會上投什麼票，誰也不知道中共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在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中，只要有一票否決，任何議案都別想通過。

安理會投票前夕，美國國務卿貝克密訪錢其琛，之後即宣佈邀請錢到華盛頓作正式訪問。此舉打破了布什總統在‘六四’之後宣佈的‘中止中美兩國高層接觸’的諾言。

## 好奇的布什上了北京的鈎

十一月二十九日，錢其琛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投了棄權票。次日，他應邀到華盛頓訪問。上午他在國會山莊會見了一些議員。出來之後，在人們的驚訝中突然宣佈要去白宮會見布什。當他從白宮走出來時，一片得意之情溢於言表。

侯賽因成了中共手中的一張牌，貝克也被耍了一輪。錢其琛以侯賽因信使的身份非要親見布什，使總統囫圇吞下了自己的諾言。這一切早在錢其琛赴巴格達之前就蓄謀已久了。急於得知侯賽因真實態度和阻止中國投否決票的美國人早已把中共的‘六四’血債忘在了腦後，而中共正趁此機會給外界一個中美和解的印象，一方面打破西方的制裁，另一方面在國內加緊鎮壓持不同政見者，至於中東的和平，那才不是北京真正關心的事呢！項莊舞劍，意在

沛公。

這一手確實玩得漂亮。現在需要讓美國人清醒一下，將他們的注意力重新引向中國大陸。那裡的人權狀況在亞運會後急劇惡化，一場新的政治迫害高潮正在逼近。

### 如臨大敵的記者招待會

十二月一日上午十一點，錢其琛在華盛頓麥迪森飯店舉行記者招待會。會議通知是閃電式的，給各家華文報社發的請帖是根據左中右區別對待的。中立的《星島日報》有兩個名額，而右傾的《世界日報》只有一名，再往右，《中央日報》根本就没有收到通知，‘反動’刊物《中國之春》就更不用說了。

爲了在錢其琛離開美國之前讓人們重新注意大陸的人權危機和政治迫害，民聯和學自聯都作了緊急佈署。劉蘇里的妻子昌竟如提前趕到了華盛頓，持有記者證的《中春》主編丁楚也星夜趕到華盛頓。示威需提前報美國警察批准，來不及了。只有擠進錢其琛的記者會。

丁楚和民聯總幹事汪岷及學自聯主席陳興宇一進入走廊就被中共安全人員認出。一個自稱安全工作人員的男‘同志’和一個自稱司法部人員的女‘同志’分別把丁和汪從記者堆裡‘請’出來‘談話’，警告兩人不要進去，但遭到兩人拒絕。

記者會如臨大敵，記者們舉着手排成兩行依次進入大廳，每個人都要經過美國警方探測儀的全身檢查。但丁楚、汪岷和陳興宇還是成功地通過了檢查。那位男‘同志’眼見仍不死心，急走近美國警察，從口袋裡掏出一個證件小聲說：‘我是中國安全人員，’接着要求趕走了丁楚等三人。於是美方警察上前再一次請三人出示證件。丁楚笑着對美國警察說：‘你知道他們爲什麼要趕我走嗎？因爲我是持不同政見者。他們這樣做是政治歧視，這在美國是違法的。’美國警察會心一笑，說：‘我明白了。’於是讓丁楚留下了。但沒有記者證的陳興宇和汪岷二人還是被‘請’出去了。

### 阻止中國之春記者發言

錢其琛帶着兩個人趕到，匆匆宣佈開始。一個人是會議主持，另一位是翻譯。果然，記者們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中東的局勢和中美關係上，中國大陸



這位就是阻止〈中國之春〉記者進場和發言的安全部“同志”

的人權問題無人涉及。丁楚把手舉高，要求提問，會議主持點了他。可是正當丁楚站起來要提問時，前一個提問的美國記者插了句話，丁楚只好讓他先講完。然而就利用這插話時間，那位安全部的男‘同志’貓着腰，在衆目睽睽之下衝到台前，對着主持人耳語了幾句，用手指了一下丁楚，主持人點了一下頭。

美國記者插完話，丁楚繼續發言，他要說：在我進入這個飯店之前，我看見一個中國婦女站在大門口請願，希望中國政府釋放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因捲入去年的民主運動而被捕，在沒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況下被監禁了五百多天。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在亞運會之前，當西方國家正對中國進行制裁時，北京政府放逐了方勵之教授，可是亞運會之後，當西方國家開始尋求恢復關係時，那裡此刻將要審判一大批‘八九’民運中被捕的政治犯，並準備對他們處以重刑，其中包括那位婦女的丈夫劉蘇里，以及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王軍濤、陳子明等人。我們注意到另一個事實是：中國政府強加給方勵之教授和這些政治犯的罪名是一樣的，都是‘反革命宣傳煽動’和‘陰謀顛覆政府’，方教授甚至還多一項‘叛國投敵’的罪名。但是他們卻受到了不同的對待。請問外長先生，這種不同的待遇是因爲中國在人權上有雙重標準呢，還是與西方不同的態度有關？

然而，還沒等丁楚講完，主持人就故意點了另一個美國記者，強行打斷丁楚的發言。丁楚表示抗議，但主持人置之不理。由於時間有限，美國記者也不肯相讓，搶着講起來。丁楚知道他再也不會有機會發言了，就將他準備的發言紙條交給了兩個美國記



昌竟如與民聯和學自聯的成員在旅館門前抗議。

者，請他們代為提出中國的人權問題。可是主持人的腦袋堅決不肯向這邊轉。直到最後，中國的人權問題才被提到。

### 錢其琛：我對人權問題不清楚

最後一位提問者是美國廣播公司的記者，他問道：‘不久傳來消息，北京對一些參加了天安門事件的活動份子提出指控，而此時您恰恰要在聯合國投票表決美國提出的議案，接着接受了貝克國務卿的邀請訪問華盛頓。我們注意到這在時間上剛好出現了一個巧合，這會使布什總統非常尷尬。我想提出的問題是：貝克先生和您會談時有無提到中國的人權問題及北京正在進行的審判？如果有，您是怎樣回答的？’

錢其琛答道：‘貝克先生確實向我提起過中國人權問題和對北京的審判的關注。但我對他說，審判是中國司法機關的事情，其他機構不得干涉，外國就更不能干涉了。我是負責外交事務的，對內部的人權方面情況也不太清楚。連我都不了解情況，你們外國人就更不了解情況了。’

錢其琛圓滑地繞過了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匆匆結束了記者會。如果不打斷丁楚的問題，錢其琛是繞不過去的：放逐方勵之，外交部總不能說‘不清楚’吧？

### 昌竟如說：還我丈夫劉蘇里

當記者們從麥迪森飯店走出來時，昌竟如滿面淚痕站在大門口，胸前的一張白紙上寫着：還我丈夫。旁邊是一張照片，上面她的丈夫劉蘇里扛着憨實可愛的幼子正在微笑，天倫之樂，父子之情躍於畫面，和昌竟如的悲愴形成鮮明反差。旁邊，十幾位民聯和學自聯的成員在散發傳單。

對錢其琛記者會感到索然無味的記者立即將他們的鏡頭和話筒對準了這位中國人權現狀活生生的犧牲者。昌竟如對記者說：我是一個妻子，我需要我的丈夫，我們有一個三歲的兒子，他需要他的父親。我的丈夫劉蘇里入獄五百多天了，我的兒子要是問我要爸爸，我怎樣回答他呢？我需要你們的幫助，救救我的丈夫！說着她淚如雨下，泣不成聲，記者們為之慟然。

中方的官員們從大門灰溜溜地離開了，然而錢其琛一直沒有露面，不知他見到這個場面作何感想？儘管中國之春的記者沒有能在記者會上提問，但是昌竟如已經引起了美國新聞界的注意，中國的人權問題將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中。也許錢其琛可以用‘不太清楚’來繞過貝克的關注和記者的提問，可是站在大門口的昌竟如他是繞不過的，美國報界的輿論他是繞不過的。

# 美國大使 禍從口出

—— 李潔明失言惹風波

譚夏

十一月二十九日，中美經濟交流會在西雅圖貿易中心舉行。這是去年六·四以後中方最大規模的訪美經濟代表團，有三百五十人之眾。十二月一日，中心舉行。這是去年六·四以後中方最大規模的訪美經濟代表團，有三百五十人之眾。十二月一日，大會行將閉幕，門外也聚集了三百五十之眾的示威者。“勿忘天安門廣場”，“西藏是西藏人的西藏”“打倒獨裁者”的口號不絕于耳。

## 李潔明出語驚人

下午三時左右，中國駐美大使朱啓楨和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分別乘車抵達正在舉行閉幕式的中美經濟交流會。當他們正要從側門進入大廳時，碰到一群手持標語牌的示威者。示威者高呼“不忘天安門廣場！”當朱啓楨匆匆鑽進大廈時，尾隨其後的美國大使李潔明突然轉身向示威者喊：“我在天安門廣場，你在哪兒？你現在在幹什麼？”

西雅圖人口普查局的工人吉米·巴門接過話茬說他在抗議，並問大使在做什麼。李潔明大喊：“我在戰鬥……”並怒衝衝地逼近抗議者。此時，一名警察匆忙趕來，攔住了大使先生並向他指了指大門。進門之前，李潔明又轉過身來衝着一位中年西藏婦女喊：“你們這幫懦夫！你回中國去為國服務！”

一場平平常常的示威，竟無緣無故地使美國駐華大使大發雷霆，輿論為之嘩然。當晚，西雅圖KIRO電視台便在晚間的頭條播放了錄像並說“這件事可能發展成為國際新聞”。

## 駐華大使其人

李潔明大使今年62歲，生于中國。他曾任美國

中央情報局官員，前駐南韓大使，並作為外交使團成員先後駐菲律賓、台灣、柬埔寨、老撾、泰國和香港。西雅圖郵報並在十二月四日的報導中引用美國國務院的消息來源稱李可能是接替韋伯斯特出任下一屆中央情報局局長一職的主要候選人。

郵報在十二月三日的報導中，引用熟悉李潔明先生的美國駐北京記者Mike Chinoy的話形容他是位“死心塌地反對共產主義的人”。這位記者說大使先生在私下談話里從不隱諱他不喜歡共產主義，但同時他又被認為是布什總統對華懷柔政策的執行人，這種尷尬處境一定使他極為惱火，所以在碰上示威者時才一觸即發。

和李潔明相識十五年之久的華州對華關係委員會主任 Abnett 把李潔明的失態歸因于他在中國十八個月來所承受的極大精神壓力。

事後李潔明在接受郵報記者採訪時，為自己對中國人權的態度辯護。他說：“是我通過談判把方勵之弄出了中國，是我和方勵之一起住了十三個月。沒人比我對人權更關切。我用不着聽什麼人就人權問題對我說短道長。”

美方早就說這場經濟交流會時機不佳，備受爭議。這場衝突更使隨後的閉幕式光彩暗然。兩位大使都在前一天參加了布什總統和中國外長錢其琛的會談，而此刻却對中美關係的評估預測各唱各的調。朱啓楨在閉幕式講話中重談外國人不得批評中國國內事務，否則就是干涉內政的老調。李潔明則針鋒相對，強調美國希望中國政府對自己的人權記錄要有切實的改進，包括公布因民運被捕者的名單、大赦，並表示美國極不贊賞中國政府最近安排的幾起對民運領袖以反革命罪提起的公訴和審判。次日，李潔明大使赴東京。此前在接受西雅圖郵報記者的短暫採訪時，他表示悔不該情急失言，“一開始就不對頭，我不該說那些話。”

## 國務院發言人如是說

雖然李潔明已經道歉，連日以來，他的失言却受到愈來愈多的尖銳指責。達賴喇嘛辦公室已要求李公開道歉，華盛頓州共和黨參議員米勒已致信布什總統指責此事，國際大赦要求對李有所約束，國務院則力圖為這段插曲降溫。

據郵報四日報導，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Margaret Tutwiller 女士說：“李潔明大使的失言不

代表美國政府的觀點，甚至也不是他自己的真實想法。”“再沒有人比李潔明大使更珍重改進中國人權狀況這項挑戰性的工作了。李潔明大使及其工作人員在極其艱苦有時乃至危險的環境下勸說中國政府釋放因政治活動而被捕的人，並勸他們考慮那些示威者提出的問題。”

這位發言人說李潔明大使不會因失言而受到行政處分。她表示大使的失言可能是精神壓力太大所致。

### 參議員米勒仗義直言

華盛頓州共和黨參議員米勒在十二月三日致李潔明大使本人的信中说：“我知道中國目前的情形使你的工作極為困難，但這並不能作為你說出這番話的借口。示威者不過是在爭取一個合乎情理的目標，即中國和西藏的自由和人權。我相信這也是你的目標。我擔心你把示威者稱為懦夫，不但是向美國人民誤傳了信息，而且也是向中國政府誤傳了信息。”在致布什總統的內容相同的信中，參議員米勒懇請總統敦促大使公開道歉。

### 一石激起千層浪

雖然李潔明大使已經表示不應該出言孟浪，只是無端被罵的當事人大多數都認為情急吐真言，李潔明不過說出了平時不便說出的真心話而已。不少人都說李潔明的失言反應了他的工作困境、焦躁的情緒和對中國人——包括朝野兩界的厭煩。此外，各界當事人還根據自己的處境在品味大使“懦夫”“回國”兩項指責的微言大義，越品越不是滋味。下面輯錄幾起當事人對大使指責的“解讀”。

#### 一. 國際大赦

十二月一日的抗議活動是由國際大赦、西藏人權、中華會館、民陣西雅圖分部和華盛頓大學中國同學會組織發起的。國際大赦華盛頓州的負責人 Mike McClourd 說：“大使的言行真是使我們感到莫明其妙。我們滿心指望他把人權示威者視為天然盟友，以此向中國人顯示我們對中國人權處境可怕狀況的深切關懷。就最近的事實而言，中國正在準備審判幾名民運領袖，還有數百名自鎮壓以來被捕的人姓名不為人知、狀況不為人曉。我們的大使竟在這種形勢下稱示威者為懦夫，而主張要他們回中國服務，這無疑是無視最基本的事實。”

#### 二. 西藏人權

西藏人權是參加這場抗議示威人數最多的團體。李潔明失言，他們表現得最不依不饒，一再抗議。藏人的抗議多在“回國”兩個字上下功夫，強調他們的故土早被中共占領了，才不得不流亡海外。西雅圖的“西藏人權”負責人說：即使在尼克松和卡特時期，美國也沒禁止過西藏流亡人士的人權運動，不知為什麼李潔明今天要他們回中國為中共服務。

#### 三. 華裔教授

一位華裔教授致函西雅圖時報，表示時下大陸的局勢是只要你公開譴責政府鎮壓民主，就要被抓、被關、被刑訊、被迫害，已經關進去的還沒放出來，難道還要送些新的關進去嗎？此外，李潔明一看亞裔面孔的人聚眾示威，就罵他們是懦夫，那麼如果愛爾蘭人抗議，意大利人抗議，蘇聯人抗議，也都是懦夫嗎？進一步問，你李潔明的祖先、無數美國人的祖先，當年不也是因為逃避本國的政治、宗教迫害才跑到美國的嗎？難道他們也是懦夫嗎？為什麼當年他們不回去“為國服務”呢？李潔明的主張不是有點種族歧視的味道嗎？這位教授表示，這可能是她“吃心”之想，時報對此論點可能也不予刊載，但難道這不是李潔明責難的合乎邏輯的推論嗎？

#### 四. 大陸同學

在這次三百五十人的抗議示威中，大陸學生只有寥寥數人。但參加的各位的確不是懦夫：領頭的學生會主席去年就曾在天安門廣場出生入死，六·四之後才輾轉出奔到美國。據李潔明先生的朋友 William Abnett 先生說，李先生此前的確表示對留美學生利用天安門事件延長居留不滿。

李先生這次情急失言，大光其火，心里的對象其實本不是西藏人。只是因為長相相近，挨罵的西藏婦女才成為替罪羊。有鑒於中國學生的處境和李潔明已經表示對失言的反悔，中國學生會決定對李潔明的失言不再作進一步的追究。

#### 五. 美國輿論

美國輿論清一色地承認大使失言有失風度。西雅圖郵報的社論說：儘管美中關係在天安門鎮壓一年半後開始解凍，但政府官員應當支持民間的抗議，使中國政府和人民得到這樣一個明確的信號：美國沒有忘記天安門廣場。

至於國內官方和民間如何解讀李潔明大使的失言，筆者還無暇採訪，望讀者不吝賜教。



# 權力黑箱中的八五計劃

何頻

萬里取消訪英，鄧琳匆匆返京，軍隊頻頻調動，鄧小平病篤？

人事變動傳聞甚多，事實上七中全會上無大變動。朱鎔基不願現在進京，榮毅仁不會出任國家副主席。鄧力群被稱為地下“總書記”。

李鵬高唱改革，各路諸侯自行其事，姚依林起草“八五”計劃，經濟路綫到底如何？

## 七中全會上人事無大變動

“洞窺一斑，可觀全豹。”香港一家頗具影響力的報紙的編輯對筆者說。面對新聞封閉的中國大陸，又缺乏在中共官僚里的親身“感覺”，當然只能從一篇文章、一條標語、一種提法、一種安排或者一位消息人士的“閑談”中，追尋中南海的蛛絲馬迹。然而，中南海的權鬥舞台翻雲覆雨，任何意外之事都會隨時演變出來。

### 軍隊頻頻調動

原定九月召開的七中全會一再延期，終於決定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召開。延宕難決，是一黨獨大老人主政的一個特點。在外人看來，這也是內鬥未休的最明顯的跡象。

“中南海”到底在干什麼？待揭之謎。

十一月五日，范曾逃抵巴黎，隨即，中共外交部宣布原計劃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出訪英倫的萬里“因病不能成行”；十一月十七日，鄧琳未等自己在東京的畫展“閉幕”，匆匆返回北京。

與此同時，各路諸侯齊聚京華，北京附近的軍隊頻頻調動，而有些重點地區已經處於戰備狀態……

“鄧小平病篤！”“鄧小平死了！”敏感人士的猜測，迅速成了海外中文傳播媒介的重要新聞。儘管鄧小平在港台的報刊上“死”了不知多少次，但編輯都不敢不登——八十六歲的人了，馬克思早已向他發了請柬，隨時可能“赴宴”。

儘管鄧小平欽定“江核心”之后，確實極少過問具體的國務軍機，甚至去年“六·四”事件不久后又迫使自己戒了烟，但老年病時好時壞，常常口流涎液，一耳失聰，左眼近乎失明。接近高層的人說，他的病狀與毛澤東晚年時差不多。

另一方面，十一億中國人盼望着“皇上”早日“駕崩”。一位學者的話坦露了人民的心迹：“我最喜歡看報上的訃告，等着鄧小平的遺像出現在《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這是我們看得到的希望。”現在大陸的看法是，如果老鄧先死，退藏于密室的陳雲會擁有更多的權力，成為新的“太上皇”；如果陳雲先死，有人便會把李鵬拉下馬。

不過，北京這次出現“異動”，與鄧小平的健康并無直接關聯。

### 萬里無大病亦無大難

萬里出訪英國，是六·四后第一個出訪西方國家的中國最高級別的領導人。如此重要的訪問，為何如此草率取消？

北京流傳着兩種說法：一曰與范曾出走有關，萬里曾給范曾的新加坡畫展發去賀電，當范的出國申請被拒絕時，萬曾為他擔保；二曰萬里不滿出訪前替換他的部分隨從人員。不管這兩種傳聞可信度如何，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萬里并無“大病”。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榮毅仁而后在香港證實了這一點。

八九年五月下旬，萬里中止出訪，回京途中被迫降落在上海“養病”，使那些企望召開人大緊急會議

罷免李鵬的示威者深感痛惜。隨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他極少露面，依他的品性，是不可能干那些“百犬吠聲”的混帳事。一年之後，氣候有所緩和，萬里方才在一次內部會議上大言反左。但講話稿最終被扣發。萬里現今勢孤力單，委員長的烏紗帽暫時却不會丟，與老鄧多年私交甚篤是一個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手里拿的只不過是顆“橡皮圖章”。

個性嬌縱的鄧琳又為何匆匆返京？據說有三個原因。其一，鄧琳在接受日本《周刊文春》專欄作家史貝克訪問時，當史貝克以幽默的口氣諷刺他的父親鄧小平，提到愛國家和忠誠政府的區別，鄧琳一氣之下掉頭就走；其二，鄧琳發現她的畫展地點在日本并非一流。“皇帝玉女”又怎能受此冷遇受此氣？還有第三個原因，傳是鄧小平的養母夏伯根去世（九十四歲），而鄧琳亦有“孝心”，故返國奔喪。至於軍事戒備情況，消息來源說：（1）軍隊調動的規模不大。近來北京屢有外賓來訪，由印尼的蘇哈托夫婦起，到美洲數國政要，連續不斷。基於安全考慮，增加兵力保衛。（2）正式逮捕和起訴一批民運人士，防止出現騷亂。（3）籌備一次戰備演習。

各路諸侯聚齊京華，則是參加全國計劃工作會議。

### “三頭馬車”換主

北京的部級人事安排出現了一些變化。已經正式宣布的有，丁關根出任統戰部長；王兆國出任對台辦主任；魯平出任港澳辦主任。

作為鄧小平的橋牌密友，大陸政界紛傳，這是六十一歲的丁關根步步高升而且“引咎辭職”後還能升官的根本原因。事實上，他與江澤民同為江蘇同鄉，且是上海交通大學的校友。中央統戰部是中共中央三大部之一，負責管轄八個民主黨派以及負責領導工會、共青團、婦聯、學聯等“群眾組織”的工作，同時也是負責對港澳台以及海外華人的統戰工作。同情民運的前任部長閻明復，體弱多病，仍在休養中，身體近來有所好轉。在任命丁關根之前，中共已任命原國家科委副主任蔣民寬為常務副部長；曾任江西省委書記、現任副部長的萬紹芬有可能調離統戰部。

四十九歲的王兆國再一次成為引人注目的人物。數年前，他作為湖北第一汽車制造廠的黨委書記，在陪同鄧小平參觀時獲得賞識，平步青雲躍升至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八七年胡耀邦落台，他遠赴

福建省作地方官。三年默默無聞，十一月返回北京，替任丁關根和楊思德出任由原中共中央“台辦”和國務院“台辦”合并而成的新的“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從省長到台辦主任，從級別上不能說升官，但畢竟回到了中央。新的“台辦”屬於中共中央，按理說不符合事務性工作歸國務院管轄的黨政分開原則。但是，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却顯現出中共合并兩個“台辦”的最主要目的——貫徹黨對黨的談判原則。王兆國上馬之後，將在近期主持召開一次四十年來最大規模的對台工作會議，對海峽兩岸交流的最新形式進行檢討，並訂出新時期對台工作的策略和方針。

喜怒形于色，愛惡見于言行的魯平替代了八十一歲的姬鵬飛，出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六十三歲的魯平曾經擔任過《中國建設》雜誌的副總編輯，八七年即任港澳辦副主任，被一些香港草委形容有一個清晰的頭腦，了解香港的實際需要，有時比一些保守的香港草委還要開放。但魯平“忠實執行中共指示”，對香港傳媒惱怒有加。

### 朱熔基近期不會進京

北京關於人事變化的傳聞頗多。有消息說陳雲、王震、李先念分別推薦薄一波、王任重、鄧力群接班。

外交界的人士說，現在主管北美事務的“副部長”劉華秋，可能接替錢其琛出任外交部長，而能力頗獲好評的錢其琛，可能取代吳學謙的“國務院副總理”。

據貿易界人士稱，李嵐清將替代鄭拓彬出任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

曾任貴州省委書記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胡錦清，已被調回中央等候安排工作。胡錦清系胡耀邦的人馬，這次調京傳說是“遭到整肅”。

還有消息說，田紀雲已經替代了姚依林負責國務院日常行政，姚依林專作李鵬幕僚；上海市長朱熔基將上調北京；榮毅仁將出任國家副主席……

經筆者核實，所謂田紀雲替代姚依林職務并非事實，姚氏近月來負責“八五計劃”和“十年規劃”的起草，故甚少露面，田紀雲只不過是臨時分擔了他部分工作；朱熔基不會在近期內上調北京出任國務院副總理或其他職務；榮毅仁已經公開表示，他不會出任國家副主席。

至於其他人事變動傳聞，未能核實。可以肯定的是，七中全會上不會有重大人事變動。涉及到國

家和政府的人事變動，以及委任民主黨派人士為政府高級官員等，要等到九一年三月“人大”召開前的

八中全會方作出決定。

## 鄧力群成了“地下總書記”？

嚴厲的電影檢查制度，資金的缺乏和窒息的政治控制，使許多制作人無法想象在此時拍出象早幾年那樣贏得盛譽的電影。現在風靡全國的是一部台灣電影——《媽媽，再愛我一次》。一位新銳的“第五代”電影導演對記者說：“你知道嗎？今年百花獎金雞獎的最佳男主角是‘毛澤東’和‘鄧小平’（得獎者扮演的角色），最佳配角是‘蔣介石’。”另一位剛離開北京的新聞從業者則說：“現在咱們管江核心叫‘熊貓’，你看他的樣子活象個國寶！但提起鄧力群，大家肅然起敬，他是貨真價實的‘地下總書記’。”

### 西方記者在中國“嗅新聞”

“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這是早幾年人們矛盾心理的寫照。現在呢，人們上班照學文件不誤，下班關起門照罵鄧小平李鵬不誤。這一切你都無法從報刊上找到蛛絲馬迹。新聞管制愈來愈嚴，是六·四之后最明顯的特征之一。言“新聞自由”的胡績偉早被撤職，行“新聞自由”的欽本立已患絕症，而他頗得意的一個部下，《世界經濟導報》駐北京首席記者，以撰寫“北京書簡”（時事追蹤）著稱的張偉國尚身陷囹圄。《經濟學周報》副主編王軍濤則被公安機關以犯有“顛覆政府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宣布正式逮捕，如果檢查機關依此罪起訴，法院依此罪判決，王軍濤的刑期至少在十年以上。“新聞自由的刑期是多久？”沒有人再提這個問題。

“槍杆子，筆杆子”，這是中共真正的法寶。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四日，全國對外宣傳工作會議召開，除姚依林以外，政治局常委江澤民、李鵬、喬石、宋平、李瑞環傾巢出動，會見了出席會議的全體人員。這應當是中共改善和加強對外宣傳非常明顯的信號。中共原在中央宣傳部設有對外宣傳局，現在又準備設立對外宣傳部，由曾任新華社長和文化部長的朱穆之執掌，這一切還未最后定奪，但一個不是“部”的部級機構已開始進行具體的運作了。

有“中國新聞發布中心”之稱的香港已漸失昨日風光，雖然屢有上當受騙事件發生，但編輯仍將無法核實的“可靠消息”發排。“否則，我們都成了《人民

日報》的海外版。事實上新華社（中通社）的電稿已充斥了版面。”英文《南華早報》的中國新聞編輯對筆者說。不過，更難受的是西方傳媒駐中國的記者，他們在“六·四”之前的一些提供消息的朋友或失蹤（外逃）、或被關押，當然更多的是不敢再與他們接觸。“接受外國記者採訪必須有關部門批准！”官方的宣傳工具公開說。否則怎麼樣？在大陸生活過的人都不難想象其后果，帽子太多了，“泄露國家機密罪”如何？

我想，外國的記者在中國不是“採訪新聞”，而是在用鼻子去“嗅新聞”。看看他們寫的一些特稿，應該得出這個結論。

從《人民日報》理論版頭條刊出《同志頌》，到北京京劇團上演全本《紅燈記》，經過嚴格職業訓練的記者，當然可以“嗅”出其中新聞。

### 看不見候選人的人大選舉

儘管嗅覺靈敏，西方記者有時對在中國發生的事還是迷惑不解。合眾國際社的記者十一月二十一日翻閱當天出版的《法制日報》，發現刊出了一項重要的規定：北京政府禁止市民張貼非官方大字報或懸掛未經官方批准的標語。這位記者對政府採取新措施鉗制人民言論並不驚訝，因為政府一直在向這方面邁進。奇怪的是，這項新措施事實上早在九月一日便已生效，為何在實施了近百日后方公布？

美聯社的記者也迷惑不解：銅管樂隊在起勁地演奏〈社會主義好〉，中共的市委書記在主要的百貨商場與人們握手，裝有擴音器的宣傳車在街頭駛

過...官方新華社稱，爲了北京的區縣人大選舉，全市派發了一百萬冊競選小冊子。但候選人却見不到。

“這就象是一場戲，一場共產黨演出的戲。”一位街上的行人爲美聯社記者揭開了謎底。

大陸其它地方的所謂區縣人大代表選舉，已在今春舉行，唯有北京被推遲到十一月下旬才進行。當局強調要選出具有正統意識形態、堅持四項原則的人作人民代表。《中國之春》第九十一期刊出了一份關於選舉的傳單，北京朝陽區的一則通告則特別告誡“選民同志”，要警惕“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破壞此次選舉。不過從北大來的消息，這個具有民主選舉傳統的選區已經在醞釀把一些“八九民運”的活躍民運分子推上人民代表的位置了。不久前北大提候選人，校長丁石孫和搞華光軟件的王選得票最多，前者常在中央爲學生和知識分子仗義執言，后者在去年“八九民運”中曾給學生很大支持。還有不少人提名李今朝，此人就是去年五月在醫院對喬石說“官倒要從兒子開刀”的絕食團成員，“六四”曾被拘審過一段時間。由此可以看出民心所在。

### 鄧力群“咸魚翻生”

十二月三日，獲悉中國工運學院副教授呂嘉民被正式逮捕，我即致電呂的妻子，我并不認識的女作家張抗抗(注：筆者以加拿大《新聞自由導報》總編輯身份，而非《中國之春》記者名義採訪)，核實有關情況。順便問到張氏一年來有何作品，張簡單作答：無法寫作，但對於作家來說，這不是一種損失，而是積累和體驗。流亡巴黎的作家徐剛亦對筆者說，翻開大陸的文學雜誌，很難找到早幾年活躍作家的名字。

主管思想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環，依然出巡大江南北，極力鼓吹“掃黃”。李瑞環是否治國之才，現在定論爲時尚早。不過，他的確“不會整人”。外界早已說他大力“掃黃”的真正目的是爲躲開“整人的場面”。雖然有消息說，李瑞環是仍能直接接觸鄧小平的人之一，但民間似乎已覺察到他的影響力逐漸縮小。

鄧力群是否取得中共意識形態領導小組組長(一說顧問)一職，一直未獲證實。北京有人說他是“地下總書記”却是千真萬確的事情。早在他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時，就曾盛傳他兩度與胡耀邦、趙紫陽爭奪總



“地下總書記”  
鄧力群的標準  
像。

書記職務。現在又傳說，他將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的身份“轉”爲“政治局常委”。人們對此將信將疑。

鄧力群的確是個非同小可的人物。八七年十月，他“虎落平陽”，“六·四”使他“咸魚翻生”。他和胡喬木最近主持起草了一個“社會主義若干問題”的學習文件，共分十九部分。主旨是如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目前這個文件已傳達到縣團級幹部，據說從一九九一年開始，當局準備以這個文件爲教材，對黨員、幹部、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及解放軍官兵展開一場深入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另外，鄧力群還以他掛名主編的《當代中國》叢書爲基地，籌建了當代中國研究所。

從實力的角度看，鄧力群的“地下總書記”陣營初具規模。除了王忍之、賀敬之、熊復、林默涵、盧之超(全國政協發言人)得各執一方牛耳外，低一檔次的“蝦兵蟹將”還包括：孟偉哉(文聯、作協)、丁振海(《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許立群(《在理論戰綫上》主編)、李敏生(《時代思潮》主編)等。當過中宣部長的鄧力群深知宣傳工具之重要。六·四之后，他除了主持創辦《在理論戰綫上》和《時代思潮》外，已經臭名遠揚的《中流》雜誌亦是他的“得意之作”。他最強硬的力量還在于他頗獲一些政治老人的支持。稍早時，一位強硬的政治老人竟點名道姓要鄧力群接見中央各大報總編輯，向他們指示“編輯方針”。

三個月以前，七十五歲的鄧力群在《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含意深遠。那篇文章的標題叫《學習“論持久戰”》。

且看鄧力群如何持久，如何戰。

## “八五”計劃的基本精神

海外觀察家對中南海的權力鬥爭和經濟路向尚在猜測之中，事實上中共高層現階段的經濟路線鬥爭已經暫時得到一個基本總結。這個夾雜着各派勢力消長情形的總結，已在十一月二十五日開始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露出端倪，並將在一個月之後七中全會通過的“八五計劃”中完全曝光。

### 鄧小平：不改革將成爲歷史罪人

“六·四”慘案之後，海內外民衆一直爲中共能否繼續堅持改革開放政策擔憂，中共黨內廣大人士何嘗不是如此。這種擔憂不消除，中共領導層就一直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任何政策都不可能贏得人心。

自視爲“改革總設計師”的鄧小平當然明白這一點。他看了九月份全國省長會議對“八五計劃”和“十年規劃”的討論提綱之後，對“八五計劃”的草案深表不滿，認爲改革計劃講得太少。

十月七日，鄧小平在召見江澤民、李鵬等人時強調：“一定要把改革開放搞得更快、更好、更有實效。”他說，改革開放絕不是他個人想出來的，是中共總結了一九四九年至七九年間三十年的經濟建設經驗，付出巨大代價後獲得的教訓，如果不繼續推動改革開放路線，必將背負時代責任，成爲歷史罪人。

鄧小平的訓斥，既影響了“八五計劃”和“十年規劃”的草案起草工作，亦直接影響了李鵬近期的言行。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一日召開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李鵬的發言令人難以置信，他強調了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年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主流”。不管李鵬的這番話是奉鄧大人的旨意，還是受眼下經濟情形的迫使，抑或是掩人耳目之詞，這的確反映的是中共黨內的主流意見。

一年一度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主要是爲來年的經濟計劃作出安排，這次會議還討論了“八五計劃”，爲十二月二十五日召開的七中全會作準備。

### “八五計劃”的主要思路

十一月三十日，李鵬對日本訪客說，“八五計劃”的基本精神是“持續、穩定、調整”，同時將擴大市場經濟比例，並將農業列爲首位，集中財力加強國防與

基建。

中共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判斷及對當前經濟狀況形成原因的分析，是制定“八五計劃”的起點；而各派勢力的強弱，表現在計劃的具體內容上。據看過此草案的經濟學家說，“優先保證短期穩定，盡量兼顧長期發展”已成爲八五計劃的指導思想。

“八五計劃”的草案認爲，十年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偏差主要是：(1)強調放權讓利，造成權力分散，收入分配過多向個人和企業傾斜，工資增長常常超過勞動生產率增長，出現消費膨脹；(2)投資主體多元化，出現投資膨脹；(3)總需求大大超過總供給，引起通貨膨脹；(4)加工業和輕工業發展過快，基礎工業，重工業發展相對不足；(5)出現了各種形式的承包制，造成中央財政與地方相比收入嚴重不足。面對的矛盾和困難有三個：一是人口問題。數量和質量問題，落后地區人口素質問題特別突出；二是資源問題。每年增加一千五百萬人口，耕地面積每年淨減少五百至八百萬畝，水資源緊張；三是資金問題。不僅要吃飯和建設，而且有前幾年借的內債、外債。“八五”期間正好是還債高峰，內債年需要償還一百八十億元，外債年需要償還八十億元，而再借外債并非易事。

“八五”計劃的三個目標：使國民經濟走上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軌道；在本世紀內實現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在本世紀末人民生活要達到小康水平。

據此，“八五”計劃將分兩個階段：“八五”前二、三年重點在治理整頓，主要是控制通貨膨脹，控制物價，消滅財政赤字，理順關係；“八五”後期主要是深化改革，調整和扭轉體制偏差，改善產業結構，建立中央政府強有力的宏觀調控體系，解決國民經濟運作效率低下，企業效益下降，技術進步緩慢的問題。“八五”計劃就金融、工商、財政、價格、商業、物資流

通、科技、勞動、工資、社會保險、農村經濟、外貿、民族地區等方面的體制改革作了基本設想。

從具體的發展策略上，“八五計劃”出現了三大轉變：在資源配置上將由過去“地區傾斜”改為“產業傾斜”；在地區配置上，開發重點由廣東、福建、海南轉移到華東的浦東，且不會再設新的特區；為平衡地區差異，將實行“海陸同開，東西互補”的政策。

鄒家華、陳慕華、高尚全、馬洪、劉國光等是“八五計劃”起草的具體領導者，總指揮則是姚依林。而原國家體改委的智囊團——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月前被宣布正式解散，事實上這個研究所自八八年來便失去了對中共經濟決策的影響力。

### 企業承包以後怎麼辦？

經營效率低落與嚴重虧損的國營企業，造成國家財政上的嚴重負擔。現在三家國營企業中，便有一家處於虧損狀態，今年一月至七月國營企業虧損達一百五十億，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九十九。預計今年企業虧損的財政補貼占其財政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三，這迫使企業改革再度成為八五計劃的目標之一。

時下經濟學家關於企業改革主要有三條思路：一是繼續推行和完善承包制；二是由承包制過渡到股份制；第三是實行稅利分流，即在統一企業所得稅并降低其稅率的同時，改稅前還貸為稅後還貸，實行所得稅承包。

北京大學教授厲以寧仍力主擴大股份制試點，完善和增設證券市場，現在已無法得到普遍認同。企業股份制在沈陽曇花一現，為厲以寧的反對者提供了“理由”。

自八七年開始，沈陽市便大膽推行允許虧損國營企業宣布破產的改革。實行股份制售股票給工人曾是一個熱門話題，亦被看做是刺激工人積極性、提高生產效率的措施。但現在，破產的改革已不再進行，因為企業被遣散的工人，要找到新的工作非常困難。那家作為破產試點的焊接廠的一百多名工人，對企業倒閉十分不滿，而這正是去年六·四後令當局睡不着覺的原因之一。沈陽在改革上倒退，還有一個例子，便是過去給予廠長聘用和解雇工人的權力被收回。曾有“改革家”之稱的市體改委副主任關維光說：“廠長不能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解雇工人，因為廠長與工人是平等的，他們是同志關係。”

經濟學家說，在目前中共百分之九十點八的大中型企業已實行各種形式的承包經營的情況下，可以預期在“八五”計劃中將以承包制作為企業改革的中心。但人們也看到，企業承包制在“七五”期間的表現無法令人滿意，不完善的承包制度誘發企業短期行為並造成財政收入減少。承包以後怎麼辦？企業與政府的關係何年才能理得清？都是不易解決之題。

### 各路諸侯逼李鵬

去年六·四後不久，中共便開始撤換各省市的主要領導人，一直到現在，這個撤換計劃還在進行。今年十月以來，就有這麼幾個地方出現了人事變動：原湖北省委副書記趙富林取代陳輝光出任廣西自治區黨委書記，原江西省長助理程安東取代安啓元出任西安市委書記，原海南省府秘書長陳玉益與原海口市委書記林明玉對調了職務，原海口市副市長曾啓榮取代李金雲出任市長，原四川省委副書記顧金池取代李子奇出任甘肅省委書記，原福建省委副書記賈慶林接替王兆國出任省長……這也許是中央“分化瓦解”地方勢力的一項重要措施，然而，奏效不大。

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是“八五計劃”中最突出的問題。近月來中央開動宣傳機器，猛烈抨擊了地方保護主義。國務院所屬的〈經濟參考〉用大字標題引用中央政府的通告，命令地方當局清除當地貿易障礙，通告說：“保護主義已阻擾了貨物的供銷，惡化了疲軟的市場，並嚴重影響經濟改革、深化改革……和安定。”這是迄今為止中央對地方公開發出的最強硬的警告，可見這個問題已多麼嚴重。中共的中央官員似乎注意到了蘇聯陷入地區性爭鬥給共黨利益集團帶來的衝擊，但是，却苦於無有效的對策來遏阻城市和省級權力基地紛紛出現的趨勢。

北京與地方的爭執不僅是在賦稅和貿易方面，在經濟的全盤走向方面也有爭論。今年九月十三日至十九日，各省領導人奉召前往北京討論“八五計劃”。結果，並沒有達成共識，他們反而要求李鵬進行比計劃草案更大膽的改革。在會議中，地方反對中央“特權過多”，中央指責地方“不顧大局”；特區要求“落實政策”，內地省市要求“沿海地區要兼顧內地利益”；中央各行業要求“加強行業管理”，地方則要求“中央不能把地方的塊塊的利益都拿走”。山東省省長趙志浩說：有利于穩定局勢的改革措施不能隨便



葉選平被地方諸侯奉為楷模。

取消，也不應以弱化地方政府利益的方法來消滅地方主義。在改革中，應明確劃分中央與地方的經濟調控的權責，改變目前的混亂狀態。

葉選平雖然在會上沒多發言，却被其它“兄弟省市”視為反“中央”陣營的真正領袖，至少是被模仿者。“遇着綠燈趕快走，遇着黃燈繞道走”最精彩地概括了現在地方對付中央政策的“基本原則”。

繼九月份的省長會議之後，十一月份中央又在京西賓館召開各省省長和省委書記會議，在會上，江澤民的一句講話被人們認為是含蓄地批評了李鵬。江澤民說，由於黨對李鵬所領導的政府頗有信心，因此黨的領導人未密切參與經濟和財政事務。不過，地方諸侯依然“膽大妄為”，對中央大吐苦水。儘管如此，中央還是準備通過“八五”計劃限制地方勢力。“七五”計劃是大規模地向地方政權讓利，讓地方根據自己的特點改革體制，開放門戶，發展經濟。“八五”計劃則是趨向中央集權，用計劃體制、銀行、稅收、海關、投資機制、生產資料調撥等杠桿和設立“大區經濟共同體”來控制地方發展，並且要求地方在體制上不要“標新立異”。

## 百姓焦點仍是物價改革

對於布衣百姓來說，關注的焦點當首推物價改革。十一月開始，北京調高了部分物價，雖然官方事先沒有大加宣傳，但老百姓早已有了心理準備——物價這一關，是無論如何都要過的。所以市場搶購現象並沒有想象的那樣嚴重。

“七五”計劃的經濟成就欠佳，關鍵的因素在於物價改革失敗。一九八八年的搶購風潮和通貨膨脹，是八九年群眾示威運動的誘因之一。“六·四”之後，通貨膨脹和市場不穩定，又成為強硬派領導者拒絕“改革”的最主要借口。國家物價局副局長馬凱、經濟學家張卓元都認為當前乃至“八五”期間是調整價格的好時機。後者更認為，改革就應堅持市場取向，生產資料的雙軌價格并軌，就應當并入市場軌。十一月底，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舉行“雙軌制”座談會，得出的結論亦支持了張卓元的觀點。但由於價格牽一發動全身，且有前車之鑒，不少官員持審慎態度。李鵬十二月一日說：“明年必須嚴格控制零售物價指數的增長”。在“八五”計劃中，工業消費品價格市場與計劃控制的比重將大致不變，國家對一些消費品價格仍保持必要控制。

九零年全年平均通膨率將達百分之五，遠低於去年年初的百分之二十五。但中國人民銀行一位高層人員向外國記者承認，九零年的貨幣供應將至少增加百分之五。另一方面，“八五”計劃將農業問題排在計劃的第一位，準備在穩定家庭聯產承包制基礎上，抓好建立各種服務體系，確保農村的吃、穿問題。但對中國農村實況頗為了解的人說，農村真正的危機是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八九年初“百萬盲流”下廣州，筆者曾前往採訪，躺在馬路上的農村青年說：“報紙放狗屁！說我們是盲流？我們是智流！看看世界總比在山溝里憋死要好！”我想，八九年初百萬農民涌向城市僅僅是個信號，今後恐怕是千萬，萬萬……

路透社的記者引述外交人士說法，中共領袖們似乎眼下不知道該怎麼辦。

糟糕的是又有誰知道怎麼辦？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八日于加拿大多倫多)

# 社會主義大悲劇

(下)

胡平

## 9、理想與暴力的巧妙結合

共產黨政權有兩大特點：一是它標榜的理想，一是它憑借的暴力。在這裡，暴力是作為實現理想的手段，而理想被當作使用暴力的目的。兩者結合得十分巧妙。有理想作招牌，暴力手段就有了理由和借口；有暴力作後盾，理想就不愁沒有人表示信仰。六四屠殺之後，共產黨又大搞什麼社會主義理想教育，並且宣稱它的理想教育取得了偉大成功。當然囉。既然你把一切反對的聲音都壓下去了，剩下的當然只有附合的聲音了。共產黨總是以代表人民自居，它說它的一切行動都是得到了人民的擁護，然而它同時又宣佈，誰要是反對它誰就不是人民。我們知道，在東歐民主運動中，遊行者們提出過這樣一個口號——“我們才是人民！”這個口號十分簡明，它不過是說出了一個最平常不過的事實。但是就是這個最簡單的口號，一下子就把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全部摧毀了。

## 10、從理想化階段到庸俗化階段

以上，我講了共產黨的理想主義。我強調只是早期共產黨才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晚期的共產黨、今天的共產黨已經沒有當年的理想主義了。以改革為開端，標志着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在開始自我否定，也標志着共產黨從理想化階段進入庸俗化階段。

在庸俗化階段，共產黨口頭上還堅持它當年標榜的那套理想，但實際上它僅僅是用它作借口，來維護自身的統治，並不再打算去真正實行它。我們都知道，共產黨的理想主義並不是什麼好東西；那麼到了庸俗化階段，情況又是怎樣呢？

首先，由於理想主義的衰退，統治集團失去了道德自律或者說自我約束的理論基礎，這就導致了統治集團本身腐敗和貪婪的公開化和普遍化。

衆所週知，共產黨政權是個專制的政權，它一向不受其它力量的監督與制衡，因此本來就存在着腐敗的必然趨勢。但是在過去，由於不少統治者還比

較真誠地相信那套理想，因此或多或少還有一些道德上的自我約束。像什麼“延安作風”、“人民的勤務員”這套話，那時還真有人聽、有人信。現在可不行了。照說共產黨進入庸俗化階段的時間還不算長，但是它腐化的速度十分驚人。大家還記得嗎？十年前，當時的商業部長王磊在豐澤園吃了頓不給錢的飯，事情披露報端，鬧起一場軒然大波。依今天共產黨幹部的腐化標準來看，這件事算什麼呀？

其次，由於共產黨已經放棄了改造社會，改造人類的宏偉理想，這就使得它在內外政策上變得比以前要務實一些，因而對整個社會的控制也要比以前鬆動一些。十年來，老百姓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都有了明顯的改進，那倒不是共產黨實行了什麼了不起的德政，不過是因為管得不像以前那麼緊罷了。簡單一句話，在理想化階段，中共政權是嚴酷的，但並不腐敗；在庸俗化階段，它是腐敗的，但已經不那麼嚴酷。要問這兩種狀態哪一種更好，這很難說。不過你要是問這兩種狀態哪一種更壞，我想大多數人都會說頭一個階段更壞。

## 11、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性失敗

然而，庸俗化階段只是一種過渡階段。在庸俗化階段，社會主義已經名存實亡，但是它那套專制的框架，四個堅持的緊身衣還存在，這就和廣大人民要求徹底的改革開放、要求真正的自由民主的願望發生了強烈的衝突。蘇聯、東歐的共產黨政權在人民的壓力面前作了讓步，結束了一黨專政。社會主義制度算是壽終正寢了，算是得其善終了。在中國，中共搞六四屠殺，結果是變成既殘酷又腐敗。但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目起中國這種狀態是決不可能持續長久的。現在，連共產黨自己也不好意思說要讓“社會主義鐵打江山千秋萬世永不變色”了。現在他們提的口號是“穩定壓倒一切。”什麼叫“穩定壓倒一切”？說穿了，就是維持一天算一天。

過去的一年，是社會主義制度遭到歷史性失敗的一年。這一年的變化之大、之深刻，一兩年前簡直



很難想像，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都是很少見的。不錯，現在中國大陸共產黨的手段還沒有垮台。我們都很着急。有人比照東歐，說中共的專政兩三年內就會垮；有人比較悲觀，說是還要十幾二十年。但是，不管是悲觀派還是樂觀派，都相信這種制度非垮不可，他們之間的差別，從歷史老人的眼裡看來，真正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

說來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其實是個很短命的制度。就是蘇聯老大哥搞的社會主義，也只活了七十三年。如果我們考慮到歷史上有許多壞制度，破制度，動不動就延續一、二百年，那麼我們真是要為社會主義制度的短命而搖頭嘆息了！在這一點上，我倒很同情那些“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想想看，他們為了這個制度付出了那麼大的代價，誰想到僅僅四十年就變成這個樣子！我相信，這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有不少當年也是為國為民的熱血青年。那時候，他們對歷史上那些禍國殃民，殘忍腐敗的統治者也是深惡痛絕的。沒想到今天他們自己就成了這樣的人。歷史真是殘酷地捉弄了他們！當然，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可是我必須指出，歷史給他們留下的時間和機會已經非常非常之少了。

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失敗了。那麼，社會主義的終極理想、共產主義理想又是如何呢？下面我再談談這個問題。

## 12、人間天堂理想的破滅

在我看來，社會主義制度的失敗還有一層更深遠的意義。它意味着人類一個古老的理想的破滅。去年十一月前夕，我寫過一篇短文《一個破滅了的關於天堂的惡夢》。文中我引用了著名捷克流亡作家米蘭·昆德拉的話。昆德拉說：譴責古拉格群島是容易的。但極權主義不僅僅是古拉格。極權主義不僅僅是地獄，而且它也是天堂。它是千百年來植根於人類心靈深處的一個對完美社會的憧憬和夢想。人們建立極權社會，本意是為了在人間建立天堂。為了建立起這樣一個完美的天堂，人們就必須把那些不完美的人或事清除掉。於是，在天堂工地的旁邊就出現了一個小小的古拉格。隨着天堂工程的朝前推進，那個古拉格也越變越大。以至於不用多久，古拉格倒變成了天堂工地的主體，而天堂本身的營建卻被拋到了一邊。到頭來，人們也就弄不清楚：他們到底是在建造天堂呢，還是在建造古拉格？

關於在人間建立天堂，也就是建立一個十全十美的社會的想法，的確是人類一個十分古老的理

想。歷史上很多偉大的，可歌可泣的事件和變化，都常常和這種理想的驅動分不開。社會主義制度之所以能够在一段時期之內佔領半個世界、同時還贏得另一半世界中許多人的傾心景仰，當然是和它所標榜的建立完美社會的宏偉理想的道義感召力有關。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性失敗提醒我們：現在，是重新審視這一理想的時候了。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眼下，我只打算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檢討。

## 13、十全十美的社會制度 = 萬能溶液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建立起一種能够有效地克服人類一切邪惡的制度的想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不可能的。

毫無疑問，人類社會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毛病、弊端或邪惡。但是我們務必要懂得，有些毛病或邪惡是不好的社會條件，不好的社會制度所造成的；還有一些毛病或邪惡卻是人類自身的不完美造成的。社會條件的改進、社會制度的改進，只可能克服前一類毛病，不可能克服後一類毛病。

舉例說，偷東西、偷竊現象當然是個壞現象。但偷竊可以出自兩種完全不同的原因，有人偷竊是出於饑寒、迫不得已，另外有些人偷竊卻只是由於貪婪、由於好吃懶做。恩格斯宣稱偷竊現象可以徹底消除，因為到了未來社會，物質產品極大豐富，人就沒有偷竊的動機了。這話當然是錯的。一個社會經濟發達，可以使每一個人免於饑寒，但它不可能消除由於貪婪所造成的偷竊。畢竟，人的物質慾望是沒有止境的。

說到這裡，有的天堂夢患者一定會打斷說：對呀！我們知道人類的許多毛病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消除的，所以我們才寄希望於建立一種完美的制度。

不錯，良好的制度可以限制，防止某些邪惡。制度為什麼能起到這種作用呢？說到底，它無非是巧妙地利用了人性中不那麼高尚的一面發揮功能的。任何制度都離不開獎勵和懲罰，而獎勵和懲罰之所以有效，完全是建築在人的虛榮心和利害心之上的。虛榮心，尤其是利害心，並不是什麼高尚的東西。比如說禁止在會議室吸煙。如果大家都能自覺地做到，那就無需乎規定制度來強制。你規定吸煙者罰款。這個規定為什麼能有效呢？說了半天，還不是人們都貪財，都重視金錢。要是人們真是都一點不在乎錢財，罰款對他就沒任何阻止作用了。由此可見，制度就是利用人的利害之心，防止或

限制人們去從事某些他們本來願意去做的事情。

大家知道，在專制制度之下，多數人都不敢講真話。因為講真話要受懲罰。毛澤東號召大家要敢於講真話，要‘五不怕’，不怕開除離婚，不怕坐牢殺頭。但是，既然你的懲罰那麼嚴酷，一般人出於利害之心不可能不怕。這是一個典型，說明一種壞制度是怎樣利用人的弱點去壓制人的優點的。好制度呢？好制度無非是利用人的一個較小的弱點、較小的惡，去防止人的更大的弱點，更大的惡。既然一切制度都離不開對人性的弱點，對人性中惡的一面的利用，那麼，你要想設計一種制度去消除人性中一切弱點，一切惡，從邏輯上就注定是做不到的了。據說，有一位異想天開的年青人，找到愛因斯坦，說：“我想發明一種溶液，萬能溶液，一切物質都能溶解掉。”愛因斯坦當場就反問他：“那你用什麼東西去裝它呢？”同樣的，如果一個人妄想設計出一種能夠消除人性中一切惡的東西的制度，我們就要反問他一句：你這個制度靠什麼因素來啓動呢？

#### 14、完美社會是一個靜止的、僵化的社會

人類不可能建成一種完美的制度，從而使得整個社會達到盡善盡美的狀態。認識到這一點可能會令一些人感到掃興。其實倒不必。因為那種十全十美的社會也許根本就不是我們真心希望的東西。

這並不是“吃不着葡萄就說葡萄酸。”看一看古往今來人們所勾畫的完美社會的圖景吧：只要這種圖景還比較細緻、具體，我們就會發現，要不，它們就是很不完美的；要不，它們就是自相矛盾的；並且，一無例外，它們必定都是極端乏味的。

馬克思主義天天號召人們爲了人類社會的最高階段——共產主義社會——奮鬥。但是這個共產主義究竟是什麼樣子？馬克思主義者向來是含糊其詞、大而化之。馬克思本人借用過前人的八個字，叫“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然而，考慮到人類慾望無止境，人類需求無止境，我們就該懂得“各取所需”純粹是鏡花水月。除非你把這個“需”強行控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那實際上就變成了禁慾主義，起碼是變成了低消費水平的大鍋飯，並不是什麼美妙的東西。馬克思還談到過，在共產主義社會，人們勞動不再是爲了謀生。一個人可以上午推車、下午釣魚、晚間從事批判。可是我們都知道，不少發達國家早就具備了實現這些要求的客觀條件。在一些發達國家中，生存已經不再成其爲問題。光是失業求濟金就夠你維持生存的了。因此，在這些社會中，你大可以像馬

克思說的那樣，一會兒推推車、一會兒釣釣魚、一會搞搞大批判。遺憾的是，對大多數人來說，像這樣打發日子決不像馬克思想象的那麼瀟灑、那麼有趣。因為你會眼紅別人的日子過得比你。你還會有失落感，因為你發現你的活動由於做得不出類拔萃因而沒什麼人理睬你。恩格斯在年青時設想過共產主義社會的具體狀況，無非是一個個小規模的、盡可能自給自足的生產—生活單位，外加集體宿舍和公共食堂。偉大的理想主義者毛澤東生平最偉大的理想，見之於他的五七指示，那就是在全中國建成千千萬萬個完全雷同的公社，每個人都“亦工亦農亦兵”，唯一的文化生活只剩下了“批判資產階級”——幸虧還有個資產階級供我們批判！等到哪一天資產階級連同它的文化全都消滅掉了，人們也就沒有文化活動的內容或對象了。

一般來說，完美社會的理想都十分強調人際關係的和諧美好。說“四海一家”，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但是稍微想一想你就會發現，這些說法其實是當不得真的，一旦當了真反而沒意思。爲什麼我們覺得家庭是溫暖的、兄弟之情是親切的，恰恰因爲它們都是特殊的，不是普遍的。當我說張三對我親如兄弟，我的意思就是說他對我的關心超過其它人，就是說我們之間的關係與衆不同。一旦張三對其它所有人也都像對我一樣關切，既不多一點也不少一點，那麼我就不會有親如兄弟的特殊感受了。一個人的家人死了，他至少會難受幾天吃不好飯。要是這個人真的把全世界一切人都當作家人，而這個世界上每時每刻都有人在死去，那麼他還能活嗎？除非他對家人的死亡就無動於衷。你們看，本來，你是希望一個人把外人當作家人，結果卻會適得其反，他只會把家人當成外人。人的感情本來就有遠近親疏之分。硬要取消這種差別，硬是要一個人對一切人都像對待他的親友一樣充滿關愛，那好比把一杯糖水放在大海裡——非但不能使大海變甜，反倒是使原有的一點甜味都消失掉了。這個比喻，兩千五百年前的亞里士多德就舉過。亞里士多德的老師柏拉圖大概是歷史上第一個提倡共產主義的人，亞里士多德不贊成他老師的思想，他的許多批評，至今看來，仍是很切中要害的。

一個十全十美的社會必然是一個靜止的，僵化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再沒有任何變革的需要——因爲它不可能變得更好，既然它本來就已經極好；也沒有任何變革的可能——如果它不能防止自己變壞，也表明自身還並不完美，而一個完美的社會當然應該包括自身具有對任何墮落的絕對免疫力這

一條在內的。毛澤東大概是模模糊糊地感覺到一個完美的社會將是靜止、僵化的，所以他講過一段很著名的話。他說，人類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留在一個水平上。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也還存在着新與舊、正確與錯誤、先進與落后的矛盾，所以人類總會“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講得不錯。但是這些觀點怎麼能和一個完美社會的概念相調和呢？你怎麼能保證在未來社會的正確與錯誤的矛盾鬥爭中，正確的一方必是百戰百勝呢？由此看來，毛澤東講這段話，其實暗中有個假定。他假定，在未來社會中，雖然還會有不同思想的矛盾，但這裡所謂的不同思想實際上只是針對着那些枝節問題的，沒有人會對共產主義社會這種人類最完美社會的基本原則或基本構架唱反調。毛澤東的這個假定是和他關於社會主義階段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的觀點相一致的。毛澤東思想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有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所謂人民內部矛盾就是說大家都贊成社會主義制度，只是對其中的某些枝節問題有不同看法。毛澤東思想的邏輯很簡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麼好，凡是好人必定都會贊成它。你要是不贊成，肯定是壞蛋、是階級敵人。根據這個邏輯，一方面，在現階段，毛澤東理直氣壯地把一切他認為是不贊成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打成階級敵人，整得死去活來；另一方面，他又一廂情願地認定，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階級敵人都死光了，所有的人都會自然而然地、毫無例外地贊成共產主義，他們之間的矛盾都只能是在贊成共產主義這個基本前提之下的矛盾。這種心態，和大約一百年前，某些物理學家的心態很類似。那些物理學家認為，牛頓力學已經給整個物理世界作出了終極的解釋，“牛頓只會有一個，因為宇宙只有一個。”關於宇宙運動的大原則、大框架已經確立起立了，未來物理學家的工作，不過是為這幅大圖畫增加些細部的加工修飾而已。毛澤東表面上承認在完美社會中還會有沖突，有矛盾，有革新，但實際上他理解這些沖突、矛盾和革新，都只是在一個固定不變的大框架之內的東西，因此他心目中的完美社會，實質上仍然是一個靜止的、演化的、封閉的社會。

### 15、完美無缺的社會狀態和人類本性相衝突

蘇聯有位數學大師，也是個持不同政見者，寫過一本厚書專門討論古往今來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他指出：社會主義終極理想實際上是死亡，用佛家的話叫“涅槃”。這個觀點有它的道理。許多宗教

都認為人死後會進入天堂，進入極樂世界。可見他們多多少少也意識到，所謂極樂世界、所謂天堂，實際上和死亡是一回事。當然，這話也可以反過來說，死亡也可以看成永生。千百年來，許多人都追求一個十全十美的社會。同樣地，千百年來，許多人都追求長生不老、追求永生。我們都知道長生不老，永生不死根本是不可能的。但這並不是什麼遺憾的事。想想看，如果人類真的做到了永生不死，想死都死不了，那生命還有什麼價值呢？生命的可貴，人生的樂趣，難道不正在於它的有限性嗎？一旦生命成為永恆，那還有什麼意思呢？沒有死亡的生命，根本就是一個毫無內容的空洞的概念，自相矛盾的概念。古人一方面編造了很多關於長生不老的神仙的故事，表明他們希求永生的願望；另一方面，他們也朦朧地感覺到，當一個永生不死的神仙大概會是很無聊的，所以他們又編造出那麼多神仙思凡的故事——不死的神仙寧肯變成有死的人類。這一點更意味深長。所以我說，希求永生不死、希求完美社會，看起來是人類一個根深蒂固的願望，其實卻是一個虛假的願望。

聖經中的一個故事也能給我們某種啓示。聖經上講，亞當和夏娃原來生活在伊甸天堂之中，那裡充滿友愛和平，樹上有吃不盡的菓子，河裡有流不完的奶和蜜，分明是一個完美社會、極樂世界。如果亞當和夏娃服從上帝的話不去偷吃知識之果，他們本可以在天堂裡永遠舒舒服服地生活下去的。但是他們偏偏要偷吃禁果，結果被驅逐出了天堂。

在我看來，這個故事的深刻寓意在於：一個十全十美的社會狀態是和人類的本性根本沖突的。一旦把人類置於一個完美社會之中，人類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反叛。因為完美社會取消了不確定性，從而抹煞自由意志的存在，所以人類會拒絕它。

### 16、為一個開放的社會而奮鬥

我們既否定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現實，又否定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終極理想。那麼有些人就會問，我們究竟要什麼？

我要談一談醫生。大家都承認，醫生的工作很偉大、很崇高、很重要。我想，醫生、起碼是現代大部份醫生，都是現實主義者，他們知道他們並不可能消滅一切疾病，根除一切痛苦，一勞永逸地使人類身體健康、永遠健康、長生不老、萬壽無疆。但他們並不因此而沮喪。他們知道他們的努力、他們的奮鬥有着天然的極限，然而，在這個極限之內，他們確實又

有着無窮無盡的工作可做。他們並不在人類現有的疾病、痛苦面前投降，他們總是努力去克服這些病苦，延長壽命，他們總是力圖超越現實，因此，醫生也都是理想主義者。實際上，醫生正體現了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正確結合。

在我看來，醫生對人體健康的態度，正是我們應該採取的對人類社會的態度。我們並不妄想在人間建立天堂、建立十全十美的社會。但這決不意味着我們在人世間的醜惡現象面前無所作為。在坐諸位都在高度民主的國家裡生活過好幾年，我們都深知這個社會遠遠不是十全十美。但是，相對於專制獨裁的社會，它的優越性是十分明顯的。最簡單的一點就是：在民主的社會裡，我們每人都會有更多的自由發展、自由選擇的機會。一般來說，我們在為實現一種比較普遍的公正和富裕的鬥爭中，也不致於付

出過於沉重的代價。不錯，我們不可能讓全人類都親如兄弟，但是我們卻可以努力防止人類自相殘殺，努力促進人類學會彼此間的容忍和尊重。我們不可能讓每一個人的各種需要都充份地滿足，但我們可以讓所有的人都獲得溫飽。我們不可能保證每一種有益的新思想、新試驗一下子就得到大家的肯定與讚揚，但至少，我們可以保證它們不再受到殘酷的迫害與扼殺。民主社會既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因此它也就是一個不確定的社會，它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們進行頑強不懈的努力。把中國社會變成這樣一個社會，這個理想也許不那麼令人頭腦發熱，令人心醉神迷，但它確是實實在在的，是美好的，是值得我們為之奮鬥的。在這場鬥爭中，我們將振興我們的民族、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同時，也充實我們自己的生命。

貝嶺



## 片斷

——摘自日常生活手記

文字是這樣被槍擊的，再世無可挽回地被放逐的光陰槍擊了，我只能站在異體的政治中回味它的純粹性，時間內在進程中的純粹性。一種不幸的異化力量從我的自身溢出，並一瀉無遺地被大時代合流着。我那僅僅是由於恐懼而被精心遮掩起來的政治性。

在時間面前，我無數次地被誘惑，並屈從於人性中被壓抑的妄想性，我失敗了。面對血的慘痛的屍骨的午夜之火，我下陷了，並且，一次次用刺肉的譴責，讓我更義無反顧地朝那個宿命之地前行，我——有着世俗的正義感。

在我的周圍，聚滿了和時間賭博的人，他們面色灰黃，雙目中折射出未來世紀光鮮的幻影，我置身其

中，我被那活的、質感的、充滿了閃亮的人類誘惑了。被群眾般的壯觀誘惑了。

我也是誘惑者，在那些虛假的正午時刻，我穿梭於貧困的仰望之中，並在舞台上凝聚出奇詭的深刻，在一個渴望救贖的時代，布道，忘形般樂此不疲。媚俗。

在我和牆壁之間，空白像是一道屏風，我口吃般費力地喃念着先知的名字，高舉着幾塊風乾的化石碎片，沒有厚度，我從未健全的肺，更像是一件被掏空的大衣，我赤裸的軀體並不因此具備穿越整個漫漫冬夜的能力。

像太陽的反光一樣，大地上站滿了彼此取暖的人，一個，必須被另一個映襯的人，在一個充斥着英雄的時代，我，成爲了一個不可缺少的配角，爲了加強戲劇性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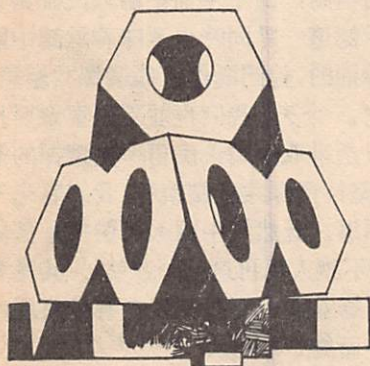
在那個我剛剛脫身的舊時代，我曾經被淺顯地埋葬過一次，我曾經不情願地渴望再被埋得深一些，在黑暗中更久一些，可恥的是，我不能忍受致命的窒息，我逃脫了，我投入了光明般淺薄的自由，儘管我對那悠久的黑暗懷有着葉公般的依戀。

那是一個恒定的黑洞，那不是一個完全自主的選擇，我那與生俱來的胎記，注定了命運，命運般被動的選擇。

時間在瘋狂地飛奔，沒有熱度，沒有視角和距離，我們遲鈍的記憶沒有滋生根芽。

我們沒有記憶，我，沒有記憶，唯一的是語言，純淨的語言。唯一的只是言語，唯一的言語。

# 我堅持 一項 基本原則



丁  
楚

## 自由選擇的基本原則

有一次在某大學講演，一位同學向我提了一個問題：共產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你們堅持什麼基本原則？我回答說：我們只堅持一項基本原則，這就是自由選擇的原則。在中國民聯為之奮鬥的民主、自由、人權、法制、多元各項目標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原則貫穿始終。

人權可以分解為三個部分：一是人生來具有和生存必須的基本權利，如溫飽的權利，就業的權利，休息的權利，受教育的權利，言論和思想的權利等等；二就是自由選擇的權利，如自由選擇政府和政治制度，自由選擇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自由選擇婚配對象，自由選擇工作職業，自由選擇宗教信仰，自由選擇國籍和居住地等等；第三是人們採取各種手段捍衛自己權利的權利，如結社、集會、罷工、示威、甚至革命的權利。

自由對於每一個具體人來說，就是選擇自由。一個人比另一個人有更多的自由，歸根結底就是他比後者擁有更寬的選擇面和更多的選擇餘地。在中國，高幹子弟比農民子弟有更多的自由表現在他們可以有更多的餘地選擇是去當兵還是上大學，是出國還是在國內找個好工作，而後者甚至連進城謀生的權利都沒有，無可選擇地在自己出生的農村過一輩子。在美國，有錢人比窮人有更多的自由表現在前者可以選擇在什麼地方投資，選擇上什麼名牌大學，選擇在哪裡度假，而窮人的選擇則很有限，必須為謀生糊口而疲於奔命。

## 自由選擇權為最基本人權

我在《中國之春》第八十九期上寫了一篇文章題為：理想死了，底綫在哪。在這篇文章裡我提出一個觀點：當我們在為某項事業奮鬥時，找出基本的底綫比找到極終的目標更重要，也就是說首先要保證可能到手的東西不會失去，再去追求最終應該到手的東西。那麼在上述人權的三個部份中，哪個是底綫呢？也許有很多自命為唯物主義者的朋友會把底綫設在人類生存的基本權利上，其實這恰恰是人權三部份中最難而不是最容易實現的事情，它應該被當作終極目標而不是底綫。爭取人權的底綫首先應是自由選擇的權利，表面上看這些權利很抽象，其實它們實行起來最簡單。要讓一個政府餵飽十億人無疑是讓它創造奇蹟，它可以找出種種藉口為自己的無能開脫；而讓一個政府給人民以選擇自由卻易如反掌，它下一分鐘就可以辦到，只要它鬆開手不要再干涉人們的選擇就行了，更重要的是它很難找到理由去開脫自己做不到這一點。共產黨可以找出一百個理由證明，讓所有的居民都分到房子是不可能辦到的，可是它很難論證，人們的言論和行為不受干涉是不可能辦到的。

既然共產黨無法證明給人們自由選擇的權利‘無可能’，於是就只能證明它‘不應該’。共產黨同樣也高舉着人權的旗幟。只不過它和上述那些唯物主義的朋友不謀而合，把人類生存的基本權利作為底綫，宣揚為了保證最基本的溫飽，人們必須首先放棄很多自由選擇的權利。不可否認，共產黨的這套說法還是頗能令不少人信服的。它的專制體制也正是建立在對這種理論的信服上。這就是為什麼我寧願繞開人權中的溫飽問題，而強調‘自由選擇’是最基本的原則。溫飽問題並不是社會制度能完全解決的，而它的不足又往往成為一些極端主義盛行的藉

口。

我曾經問過很多從第三世界來的留學生一個同樣的問題：如果一邊有工作保障，但是沒有擇業自由，分派你幹什麼就一輩子幹什麼；另一邊是有選擇職業的自由，但沒有工作保障，失業就要挨餓；兩者必居其一，你選擇哪一邊？令我驚奇的是，幾乎所有的人都異口同聲地回答寧願選擇後者。這些留學生很多來自很窮的第三世界國家，如非洲國家，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國，他們開始對中國都是很羨慕也很敬佩的，說你們國家沒有失業，大家都有飯吃，真不簡單。後來我告訴他們中國政府是怎樣解決失業的：政府給每個人分配工作，人們無可選擇，分配到哪一行，就在那裡幹一輩子。他們聽了都說不可思議，那和勞改集中營有什麼區別？集中營裡也會保證你有飯吃，可叫你幹什麼就得幹什麼。

儘管我調查的對象都是留學生，他們回國肯定要比一般人有更好的前途和更多的選擇餘地，但他們的回答也說明還是有人是把自由選擇的價值看得很重的，重於溫飽，重於安全，甚至重於生命。不是有一句口號叫作：‘不自由，毋寧死’嗎？

### 專制就是剝奪人的選擇自由

專制制度和自由選擇是不共戴天的。任何專制都是建立在對人們自由選擇權的剝奪之上的。對於一個政權，人民有三種選擇形式：一是用手投票，像當今任何一個民主國家一樣，用一套選舉程序來選擇政府；二是用錢投票，用交稅來支持一個政府，或用抗稅來反對一個政府；三是用腳投票，對一個專制政權，惹不起躲得起，干脆一走了之，不受你控制。任何專制極權都是以人們的服從為前提，如果人都走光了，沒人服從而失去了控制對象，專制就沒有任何意義。最後剩下獨裁者自己，願意怎樣專制就怎樣專制好了。有人在評價東歐革命時，列出了對各國的解放貢獻最大的社會力量，他們分別是：波蘭的工人，匈牙利的黨內改革者，捷克的學生，羅馬尼亞的士兵，和東德的難民。可以說，東德的專制政權，就是東德人民用腳投票沖垮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只要人們有自由選擇的權利，社會就不可能出現專制制度。相反，專制制度建立的地方，必定要剝奪人們自由選擇的權利。中共政權將‘共產黨的領導’作為基本原則寫進了憲法，首先就取消了人民用手投票選擇政府的權利；然後，通過社會主義公有制將財富的初次分配權集中到了

國家手裡，於是取消了人民用鈔票選擇政府的權利，最後通過限制人民的遷居自由，最終取消了人民用腳選擇‘不服從’的權利。因此，反對專制的最有效的槓桿就是爭取自由選擇的權利，這一項基本原則可敵共產黨的四項基本原則。

### 駁必然選擇論和不可替代論

共產黨的四項基本原則實際上歸根結底就是一條，堅持黨的領導。共產黨為自己政權合法性辯護的兩點根據是：一、中國人民在四十年前選擇了共產黨，這一選擇是歷史的必然；二、當今中國，除了共產黨，沒有任何政治力量有能力在中國執政。這兩點根據，一是歷史必然論，你一旦選擇了，就必須從一而終，二是不可替代論，強行造成壟斷，令人無可選擇。

也許我們不妨承認，四十年前中國人民確實曾選擇了共產黨，承認這一點同時也意味着承認中國人民曾經是有選擇權的，他們既然有權選擇共產黨，也就有權不選擇它。今天，我們也並不是蓄意要打倒共產黨，我們只是爭取中國人民再一次選擇的權利，如果人民還是堅持選擇共產黨執政，我們將毫不猶豫地承認它的領導。既然說中國人民選擇是歷史的必然，那為什麼不讓人民再選擇一次呢？共產黨在反封建時也反對婦女從一而終，現在有什麼理由要求中國人民從一而終？

角色不可替代論更是強詞奪理，且不說海峽對岸就存在着一個擁有七十年執政經驗和全套治國人才的國民黨，就算大陸內部沒有這樣的政治力量，也是共產黨蓄意造成的。共產黨一方面將所有的組織力量剿盡殺絕，另一方面卻又說沒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夠替代它的角色，這好比一個運動員不是通過比賽，而是通過謀殺其他選手的辦法來確保自己冠軍的地位不受挑戰。我相信，只要共產黨停止鎮壓，有潛力和它競爭的力量很快就會出現。我們堅持選擇自由的基本原則，不但是要爭取選擇的權利，同時也是要爭取出現更多可供選擇的對象，這就是‘多元’。

### 建立自由選擇制度的制度

我在講演中被人問得最多的問題恐怕是‘你們爭取在中國建立什麼制度’。說實話，這是一個非常

難答的問題，幾乎任何回答都會遭致非議。於是，我只好回答：我們爭取建立的制度是一個能夠讓人民自由選擇制度的制度。這個回答也許太抽象，但我相信這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答案，同時又堅持了自由選擇的‘基本原則’。

其實，這樣泛泛地討論關於‘建立什麼制度’的問題是毫無意義的。在今天的時代，像馬克思那樣全面規劃一個社會制度的人一定會被人當作瘋子。當今的社會如此複雜，以致每一個領域裡都有自己的專家，在那裡實行什麼制度專家比你更有發言權。政治家研究的是社會的選擇機制和調節機制，是各種力量和利益的平衡，而不是具體的制度。例如，對於在經濟領域裡實行什麼所有制最好，在政治領域裡實行什麼政府結構或選舉制度最優，我寧願去問陳一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專家，而不會去聽那些一心想討好選民的政治家的信口開河。

今天，也許任何領域裡的最優治國方案都可以從計算機裡產生。但這並不意味着計算機可以代替政治家，專家可以代替總統。任何決策都包含着兩個步驟：一是謀，二是斷，謀者陳之利弊，斷者權之利弊。專家的作用是‘謀’，提出可供選擇的方案，陳其利弊；總統的作用是‘斷’，權衡各種利弊，平衡各方利益，然後拍板做決定。專家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是利益，而是最優化的尺度，如效率，節約等；總統可以在專家提供的各種方案中進行選擇，但他選擇的往往不是最佳方案，而是大多數人都能滿意的方案。因為總統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更多是如何平衡和協調社會各階層的利益。也就是說，總統要代表大多數選民的利益來進行選擇，或者說，大多數人通過總統間接進行選擇。選民選總統，總統選方案，這也許就是社會的選擇機制中的一種。

一般來說，多數人做出的選擇都未必是最佳選擇。也許專家們一致認為，從效率或資源分配的角度來說，私有制是一個最優的制度，可是說不定大多數的中國人就是偏偏喜歡吃大鍋飯，他們若願意選擇公有制，誰也沒有辦法。在中國建立什麼樣的制度，我們誰也沒有權利代替大多數中國人民作出選擇，就像鄧小平沒有權利代替下一代人宣佈‘五十年不變’一樣。凡是自稱先知先覺而要代替人們做出選擇的人，八成會成為專制者，共產黨不就是以先鋒隊自命而硬要替全中國人民安排命運嗎？我們今天所有提出的主張，都只不過是供中國人民選擇的草案。而任何方案的選擇，都必須以一個‘可以選擇制度的制度’為前提，我們現在就是在為奠定這個前提而努力。如果我們把這個選擇機制比作市場規則，

而將所有的治國方案比作市場上的商品的話，那麼前者無疑要比後者重要得多。

### 我只堅持一項基本原則

在海外，很多人都在對中共的四項基本原則大加討伐，不過我對這種大批判一向不感興趣，也不想在此浪費精力。共產黨願意相信馬克思主義，宣傳社會主義，是它的自由，也是它的權利，我們無權干涉，也沒有共同的尺子去評判其是正確還是錯誤。共產黨的四項基本原則，只要不在憲法裡堅持，在黨綱裡它願意怎麼堅持都行。在我看來，共產黨最可惡的不是堅持它自己的信仰，而是不給別人以自由選擇的權利和機會，一定要強迫所有的人去相信它所信仰的主義，去實行它認為最優的制度，去服從無可選擇的領導。專制者的罪惡不在於他們要幹什麼，而在於他們怎樣幹，不在於他們的目標，而在於他們的手段。

我曾經和一位‘三民主義大同盟’的朋友辯論‘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我對這句口號持有異議的原因不是對三民主義抱有任何成見，而是反對將任何主義強加於中國人民。我個人完全贊同三民主義提出的主張，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出色的主義。我所強調的不是內容而是形式，不是目標而是手段。把三民主義強加給中國人民的行為和共產黨把社會主義強加給中國人民的行為沒有差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往往令人想起‘一定要實現共產主義’的口號，兩者雖然內容不一樣，但行為方式是一樣的。

共產黨有權宣傳它的社會主義，國民黨也有權宣傳它的三民主義，民主中國陣線有權宣傳它的聯邦制或邦聯制，自由民主黨也有權宣傳打倒共產黨的革命。總之，大家都可以在市場上展出各自的產品，供中國人民選擇。只不過誰也不要把自己的產品貼上‘唯一正確’的標籤。我是一個多元論者，對於任何原則都主張一視同仁，唯一令我厭惡的是‘堅持’這類的字眼。如果有誰堅信自己的原則，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沒有必要把‘堅持’這類的字眼掛在口頭上。顯然，凡強調‘堅持’都是針對別人的，這樣就未免失於霸道。我對共產黨耿耿於懷的並不是它的那些‘原則’，而恰恰是它強加於人的‘堅持’，憑什麼嘛！

所以，如果一定要我堅持某項原則的話，那我只堅持一項基本原則，這就是自由選擇的原則。

# 爲二十一世紀的 中國繪製藍圖



陳雪

一個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首屆學術研討會”命名的會議於九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在美國舊金山灣區斯坦福大學布朗音樂中心圓滿舉行。這個由“北加州民運服務中心”設計、組織、主辦的研討會，邀請了散布在美國各大學、研究機構、民運團體中的近五十位專家、學者、教授、民運知名人士，以“新憲法”“新政府”“新經濟”爲題，進行專題發言，專家評論和集體討論。這三個專題之後，又以“民運與二十一世紀中國”爲題着重對“八九民運”進行了反思，對民主運動未來的取向從各個層面交換了意見。到會聽衆約二百人。

這是一個極具前瞻性和建設性的會議。正如會議主席劉凱申博士（心理學專家，在加州政府衛生廳工作）在開幕詞中所說：由於中國政局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我們不可能把中國民主政治的前途寄託在某個政府短期內的垮台上，而要把着眼點放在以十年爲單位的較長時期內。放在下一個世紀。我們要爲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政經建設繪製藍圖。在這方面，海外的專家學者和民運人士責無旁貸。而會議主持人，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對此更有深刻的感受。他說：二十一世紀是個多元文化，不同價值理念興起的時期，是一個以中心價值、共同對話爲基礎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國文化與各國文化充滿着互動；經濟開放，政治民主，公民社會紛紛湧現。因此，我們一定要以寬廣的視野，把中國文化放在以中國大陸和港、台、新加坡爲實體，包括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以及國際上以各種不同語言文字來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學者在內的廣大範圍內的互動關係中來加以考察，來開發精神資源，拓展價值領域。這樣才能爲中國的民主運動的開展和未來新憲法、新政府、新經濟勾畫出富於前瞻性的藍圖。

在大會的中心發言中，嚴家其教授首先說：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是一個聯邦制的中國。爲此，需要做兩件事，一是制訂一部憲法，二是建設一個強大的反對黨。當然，它的前提是爲“八九民運”平反。而制憲運動，就是我們取得政權的途徑。因爲，憲法在人民議會中通過，就標志着民主運動的勝利。憲法中應規定的原則包括：軍隊國家化的原則；保障公民財產的原則，也即是保障基本人權的原則，有了這個原則，言論、結社等自由也就有了保障，以及國家組織分權制衡、地方自治、代表直選的原則。我們要造成五年、十年、十五年的制憲運動，先討論出基本原則，然後拿出一稿、二稿乃至一百零一稿，一百零二稿；要召開兩次制憲會議，第一次在中國大陸；第二次是在實現統一以後，有着邦聯特點。我們可以把一九一二年孫中山先生成立的民國稱爲第一共和，一九四九年以後爲第二共和，製憲成功後稱爲第三共和。

馬利蘭大學政治系教授丘宏達在寄來的書面發言中說：中共現行憲法，採人民代表大會制，立法、司法不分，立法權與司權都歸人代會，會期甚短；常委會屬於間接選舉，人民不能監督，也不對人民負責。其結果是：人權受侵害，經濟長期衰退。歷史證明，不實行憲政，無法保證經濟發展和人民福利。目前開展制訂新憲法，困難是研究“比較憲法”學的人較少，對西方憲法只看到好的一面，而未看到其缺點，往往照抄。憲政成長是個漸進過程，要略帶理想化，但在實施時要根據實際；矯枉不可過正，保障人權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視政府權力，以免影響政局安定，最後又由軍隊來收拾殘局。以土耳其爲例，一九二四年實行新憲法，針對政府無限行政權的弊病，確定由國會執行民主權。但多數獨裁與個人獨裁一樣



可怕，以致立法、司法權無限制，一黨轉多黨，多數黨長期壓制反對黨，政局長期紊亂；一九六一年重新製憲，設憲法法院限制立法權，保障少數黨的權利，但政府權力不彰，政局不穩，招致一九八〇年軍人干政；又於一九八二年製定新憲法，又保證軍人權力。這一歷史過程說明民主憲政並非易事，非短期內可實現，製訂過程中要注意具體實際情況，同時，注意吸收別國的經驗教訓，不可重蹈覆轍。

陳一諮教授在發言中說：目前這一、二十年是中國歷史上空前危機又非常輝煌的時期。說它輝煌，就是要在這一時期奠定中國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基礎。我們希望大變動，但不願大動蕩。如何實現和平轉移是個大難題。因為，中國目前所面臨的是人類的大難題：一黨專政、國有經濟、沒有效率、違背人性；拉不回去，又不願前進。而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難題是產權問題，極權政治轉為民主政治的難題是缺乏民主政治組織，因為共產黨這幾十年內消滅了中國大陸所有的獨立政治力量，這就需要社會的重新組織。中國大陸需要的是自治而不分裂，統一而不極權的政治局面。在經濟方面，要市場化、民營化、國際化，可以仿效台灣的經驗，以市場經濟為基礎，以中、小型企業為主體；在社會政策方面力求穩定，實行公平化、福利化、自治化以適應中國人的大同理想和升平思想。在這方面，與歐洲的社會民主黨的政策相似。而文化、法律方面的轉變則是更長時期的任務。希望在五至八年內，在政治、經濟方面有大的變化，三十至五十年內，使中國成為政治民主的現代化國家。

以“抵制新權威主義”為主題的阮銘教授着重指出：人類在二十世紀的進步有兩點，一是掌握了免於物質匱乏的科學技術能力，二是發現並確立了免於恐懼的民主制度。二次世界大戰後訂立的大西洋憲法有四點原則：一是言論自由遍及世界各地，二是信仰上帝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三是免於物質匱乏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四是免於恐懼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但是，新權威主義逆時勢而動，提出“中國例外論”，認為中國不適合民主制度，要建立佔人口百分之十的精英權力集團，為百分之九十的民衆做主。這種論點於一九八八年由趙紫陽向鄧小平匯報，鄧點頭說：“我就是這個主張”，於是在一九八八年秋至八九年春，全國集中宣傳新權威主義，連上海市世界經濟導報也參加了進去。但就在這時，發生了“八九民運”。在“八九民運”中，新權威主義者不敢像一九七八年那樣與民主牆結合，而在言論和行動上都表現出了猶豫和惶惑，不能取得社會民主力



阮銘主張抵制新權威主義

量的信任，因而未能實現社會民主力量與黨內民主力量的結合。即以趙紫陽當時的作為來說，若能做到這一點，軍隊至少可保持中立。因此，為未來的中國而奮鬥的知識份子當前的唯一選擇就是與民衆相結合，而不是站在民衆之上，以新的專制代替共產黨的專制。為此，就要做到四點：一是以民衆為立足點，絕不放棄民主的目標；二是保持獨立性，保持與國內的聯繫，分析黨內民主派的動向，隨時準備與他們結成聯盟；三是根據實際情況的發展，制定策略，尋找合法性的空隙，在憲法所規定的權利中尋找活動空間；四是注意民主力量自身的訓練和提高，從陰暗無聊的內鬥中掙脫出來，回歸民衆的海洋，為中國民主的新時期貢獻力量。

在對以上四位先生發言的評論中，杜維明教授說：去年八月在羅馬召開的一次“歐洲公民社會—歐洲民主經驗”的學術討論會上，專家們談到法國大革命啟蒙心態的三個目標—自由、平等、博愛，其中自由與平等是有內在矛盾、衝突的，而世界各國在實現民主的進程中也各以其具體情況而具有不同的特點：英國，傳統資源深厚，實現了光榮革命；法國，則經過了第一、二、三、五等共和；德國民主中有較濃的民族特色；美國的民主則是建立在公民社會的基礎之上，社會內有許多獨立於中央的壓力集團，如教會及各種社團組織，直接對中央政府挑戰。因此，民主的先決條件是市民即公民社會的出現。而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印度，公民卻並沒有很高的知識水平；它雖有許多問題，但民主並沒有失敗。日本也是民主國家但與以上國家又有所不同。對嚴家其教授的發言，我的印象是強調了責任倫理，即，我們的決策、行為、構想一定要讓它發揮積極作用，避免消積作用，要對整個前景負責，而不能只講動機倫理，即，只突出“為大家”的動機。丘宏達教授強調比較憲法很重要。法國憲法邏輯性嚴謹，但實行起來千瘡百孔；英美的較易實行。制憲，是文化傳統的積澱，是個漸進

過程，需要妥協，個人奮鬥和長期爭取。陳一諮教授強調了保持壓力，促使國內民間對抗力量出現，及台灣發展中、小企業的重要性。阮銘教授揭示了自由民主的實體，和精英主義的必然失敗。

接着，研討會以“新憲法”、“新政府”、“新經濟”為題，依次進行了專題討論。

徐邦泰以闡述憲法的含義開始。他說：憲法，一是指業已取得的民主的成功紀錄；二是指正在爭取的民主理想。用孫中山先生的話來說：“憲法者，國家之構成法，亦即人民權利之保障書也。”而我們今天所要的就是這樣的用墨寫的保障書，而不是血染的遮屍布。回憶中國從清末的“欽定憲法”到孫中山的“臨時約法”，到中華民國的一九四六年憲法，到中共前後頒佈的五部憲法，這是一個由“欽定”到“民定”，“各領風騷僅四年”的過程。（從一九〇八年欽定憲法到中共一九八二年憲法共七十四年，中國共出現十八部憲法。）而就其主要的內容來說則只剩下“五權憲法”（即中華民國憲法）與“四則憲法”（一九八二年以四項原則為基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比較。“五權憲法”的基本精神是把國家政治權力一分為二：即政權，包含選舉權、罷免權、創造權和複決權四個民權，人民靠這一個大權管理政府；二是治權，即立法、行政、司法、監察、考試等國家機關。而由於行政權不是對總統負責，而是對立法院負責；立法院對行政院有權實行“同意權”和“不信任權”，因而它帶有責任內閣制的架式。中共所頒佈的五部憲法，從一九五四年第一部憲法規定“不保護反動份子”這一基本原則以來，從胡風到國家主席劉少奇，不被保護因而被迫害致死的冤魂饑鬼大約有六千萬人之多。由於一九七五年“憲法”中規定“全國人民大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最高權力機關”，於是“民主”就赤裸裸地變為“黨主”；八二年憲法中，將原定的“共和國主席是國家武裝力量最高統帥”改為“黨中央軍委主席兼國家軍委主席”，就使當時的軍委主席鄧小平具備了以軍領政的地位。但這個憲法，在一些人的努力下，較前幾部憲法增加了“法律前人人平等”“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批評建議權、申訴、控告、檢舉權”“取得賠償權”以及“司法審判獨立”等條款，雖然未全面實施，甚至遭到殘踏，但就憲法本身來說不失為一種進步。根據以上制憲史的回顧和比較，徐邦泰提出了制定新憲法的五個制度。一是民主制，即國家最高的權屬於全體人民。在權利平等和政治自由兩個原則基礎上實行選擇、罷免、創制、複決四權。二是民有制，即以民管為主，國營為輔，福利為補的社會經濟。並在聯

邦制基礎上，承認地區差別，允許各省自行經濟政策，甚至可以保留吃大鍋飯的社會主義制度。三是分權制，即在“法治”的基礎上實行立法、司法、行政等權力的分治和制衡。四是多黨制。五是聯邦制。

在評議中，嚴家其教授指出：憲法是限制不受限制的權力，保障不受保障的權利；要把權力（Power）與權利（Right）區分開；憲法可包含四方面內容，一是公民的權利，二是政府怎樣組成，權力受什麼限制，及相互之間橫的關係；三是中央與地方縱的關係；四是憲法修改的條文。不必要提經濟政策和所有制，只提公民財產有受到保障的權力；不必要提多黨制，因為這也是“自由結社”權利和“選舉權”的必然結果。因此我們在海外搞民運不必要急於成立政黨。因為政黨是通過選舉取得政權過程的產物。目前海外民運兩大任務，一是為將來回大陸組成反對黨做好一切準備；二是為新憲法做準備。

傅正光先生在評議中着重指出憲法（Constitution）與憲制（Constitutionalism）的區別。他說，憲法有兩種合理性，即實質上的合理性：保障人權、民權；程序上的合理性，保障憲法本身的修改和權力，本身的分配和更替。在聯邦與邦聯的制訂上，要明確多少權力給中央，多少給地方。否則要引起內戰。雷根不久前去見戈爾巴喬夫就告訴他：不要小看這事，美國為此打過一次內戰。憲法要寫在心上。因為實施憲法，要靠每個人的政治文化。一定要把過去、現在、將來的政治文化的狀況探討清楚。有的人聽到被人指責為個人主義就羞羞答答。其實，我們就是要勇敢地站出來維護個人的權利。



余茂春對比了東西政府

第二個專題“新政府”的中心發言人是柏克萊加州大學歷史學博士研究生余茂春。他在對比東、西

方對政府職能的不同觀念時說：西方的着眼點是自由、平等、博愛，東方的着眼點是保持治安，維持現狀。他認為，組織未來中國新政府的原則應有以下四點：一是制衡的原則；二是地方自治的原則，這是關係到國家安定的基本因素；三是民選的原則，即，把臣民變為公民，把參選人由官推變為公推；四是議會制的原則，即多黨會議，上院代表各省利益，下院按人口比例產生，直接對選民負責。其中省議會權力最大，縣議會可普選或罷免縣長。在國家機構方面實行自下而上的權力結構。總統虛位，權力有限；總理負責行政機構；確保司法獨立，實行終身制和財務預算獨立；省對中央沒有直接依附關係，總統對省沒有行政權力。

陳一諮教授在評議中首先回顧了八六年秋至八七年在國內參加設計政治改革的情況。他說：“那時，在研究議會政府、中央與地方職能轉變等問題時找不到專家，因為四十年來，研究社會科學的人都成了註釋家，沒有自己的研究。同時，也流行着一種誤會，即，認為黨和國家都是代表人民的，一切都須聽黨和政府的安排。其實，合理的社會機構，應是，個人、企業、社會、市場各自決策；無法決策，才由政府協調。管事最少的政府才是最有效的政府。但中國大陸的情況則相反，是管事最多的政府；管不了，才給個人、企業、社會、市場去管。這是幾千年東方專制主義的延續，是幾十年來，戰時共產主義的繼承，是蘇聯斯大林模式的移植，是一種黨政經合一的，權力高度集中的，按行政層次組成的，帶有封建宗法特點的，直接以行政指令指揮的政治經濟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實行着最大的權能主義。它的最大特點是權能依附，即下級依附於上級，同級依附於黨委，個人依附於制度。每個單位就是社會的權能，人民只能三呼萬歲，一塊舉手，成為歡呼的機器，執行的附庸，立法機構非常薄弱，經濟部門無限擴大。國務院一百多個部、委，經濟方面的有八十多個。一個縣有七套班子（縣委、人委、人代、政協、武裝、計委、經委）八十到一百五十個部、局、委，全國二千一百個縣有一千八百個縣的財政已籌不起這麼多的國家工作人員。因此，在政治改革中，首先要擺正地方與中央的關係，應是地方給中央授權，而不是中央給地方放權。中央只管三件事：外交、國防和貨幣發行。中央只應規定什麼不能做，除此以外任何事都可做。在政治改革中，既要從各國的普遍性出發，同時也要考慮中國演變的經濟格局和政治權力格局，使多數人在不反對你剝奪他的權利和利益的情況下促成這樣一場變革，這樣才可能避免尖銳的對立和流血，才能取得

成功。否則，我們所面對的將是上億的無產大眾和五百萬紅領階層。”

陳亮月教授在評議中着重指出，如何塑造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憲法和政治制度是最重要的。中國人崇洋風很盛，過去崇德、崇日，以後又崇蘇、崇美。聯邦制是很理想的，但實行為時已晚，目前實行的可能性等於零。

原中國外交學院教授，現在柏克萊加大做訪問學者的馮聖保先生說：要普及一種思想，即，新體制不要建立在打倒舊體制的基礎上。他批評目前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說：它的不合理在於以執政黨制度代替多黨制，執政黨在人大決策不需要選民認可；議會、國務院的權力低於黨的政治局。而在國外，則是議會和內閣權力大於黨。中國目前的悲劇尤在於，議會為老人所把持，人代有時不是支持改革法案，而是否決它。



李運奇：不搞私有化，改革無希望

“新經濟”這個專題的中心發言人是李運奇。他目前是斯坦福大學和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訪問學者。由於他曾經是中國人民銀行的博士研究生，擔任過人民銀行四川省分行的行長助理，因而對中國經濟改革中的弊病知道得較透徹。他回憶說：十年企業改革開始時就沒有明確目標，不知從何開始。趙紫陽提出兩個不動：公有制不能變，按勞分配不能變。目標是改革體制，發展經濟。企業改革的重點在於使國營企業更有動力。最先是採用指標考優。即，根據經濟效益，產值指標，決定獎罰。但卻形成了為庫存而生產的現象，致使工業報喜，商業報憂；財政報收，銀行貸款吃倒帳。因為企業生產只顧產值指標，而不顧成本和賣不賣得出。以後又實行利潤指標。但卻出現了只顧短期利潤的問題，即，行為

短期化，規模小型化，過分使用機器，沒有財產責任不能反應管理人員和工人的努力。以後又實行資產經營責任制，即，利潤和資產增產雙重指標，但又發生了不顧資本增加的問題。這樣就不能不得出一個結論：不變公有制，企業改革就無法往下走；不搞私有化，經濟改革和發展就不會有大成績。

經過訪問了美國、東西歐、蘇聯、台灣、新加坡的經濟專家，查閱了大量的經濟資料以後，李運奇提出了四套將私有制轉為公有制的方案：一是特權資本化，即是把目前既得利益者手中的特權以貨幣和股票買下來使之轉化為資本；二是侵蝕國有企業。即是使目前的國營企業停止不動，逐漸萎縮；以貸款方式鼓勵私人企業使之不斷壯大，最後將國營企業吃掉；三是分掉國營企業，即是將國營企業估值，以股票形式分給當地居民或企業的工人，給以出讓和購買權利，進入市場，最後形成董事會和私有制；四是賣掉國有企業。即是鼓勵儲蓄，以儲蓄或貸款買房子、汽車，再以房屋為抵押去買企業。

同時，李運奇先生又談到建立新的協調系統和戰略取向的問題。中國經濟波動較西方國家高，主要是由於政治運動多，農業周期短，投資波動大。因為政治有壓力，有投資衝動，地方與中央有資源爭奪，容易形成投資高漲和過熱。又由於基礎工業和經濟結構是畸形的，發展到一定的臨界點，就會形成一種約束。即當財政赤字大，通脹率高，原材料價格漲得快，就不得已猛烈收縮。這樣一個高漲，一個收縮，就形成波動。這種頻繁的波動仍是因為沒有市場，沒有合理的價格體系的緣故。要形成市場，就要將貨幣政策與價格政策相配合。有四種做法：一是放開價格，放開銀根。這是南斯拉夫五十年代的做法，結果使通貨膨脹率很高，不够理想；二是放開價格，抽緊銀根，日本、西德在轉型期都是這樣。但要經過一個陣痛期，工人失業、企業主跳樓、跳海，但市場形成後就好了；三是抽緊銀根，管住價格，目前大陸就是採用這種辦法；四是管住價格，放開銀根。蘇聯就是這樣。但僅僅滿足了軍事資源的開發、利用，國民經濟卻很弱。黑市場價格比一般價格貴三至五倍。是很危險的辦法。在戰略取向方面，要陸海並舉，即既開放沿海各省，也要開放邊界各地；要建立大區，多點雙軸，把東部經濟發展的引力向內地轉移，通過鐵路線（如崇海綫、北疆綫、蘭新綫等）水路綫（如長江綫）建立起經濟發展的網絡，從而帶動全面。

香港大學經濟學教授，柏克萊加大研究員徐聰垣先生在評議中說：十年經濟改革的結束可以說破



會議主持者劉凱申博士

壞了舊體系，但沒有動搖舊體制的根基。因為體制改革就是市場運用程度大小的變化。如果市場機能增加，就表示有了體制變動。中共經改十年中體制變革僅僅是表面的，因為，從根本上支援和參加市場運作的行為的成因並未改革。但應把農村排除在外，因為農村有基本所有制的變化。中國改革的利益也來自農村。而工業、商業方面由於所有制沒有變，雖然形成了市場，但那是假象。因為企業管理人員沒有一種背後推動的因素來使他決定價格，而是根據個人喜好來決定價格。這就造成了價格混亂通貨膨脹和管理人員貪污。這也是去年“六四”的重要成因之一。而最根本的改革就是要推動市場，就要形成私有制。沒有個人應有的報酬，就沒有勞動市場；沒有可賺取的利息和利潤，就沒有資金市場和商品市場。過去的市場都是假象，而不是真正的市場。如果照趙紫陽所說兩個不變，改革就不可能徹底。但李運奇所說的四個私有制方案也很不全面。如，特權資本化，只是個人處理，整個產權變化並沒提到。台灣的方式較好。大部份企業是公有的，怎樣以合理價格轉給個人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某些企業表面上賺錢，但很可能是政府背後支持，不一定有賺錢能力。私人高價買去企業就會倒閉。就會產生動亂。可以讓農民去賺錢、投資、越大越好，逐漸擴大民營，取代公有，但是，私有化並不是萬靈丹。印度和東南亞很多產業是私有化，但也沒有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是，中國大陸要注重人力資源的開發，教育制度的改進等等。因為所有經濟，政治的改革都基於人的因素。如果人的品質不能改變，不管多妙的方案，做出來都不如人所想像的。

與李運奇在十年改革中走不同路綫的青年經濟學家朱嘉明在評議中說：新經濟與舊經濟，比新憲法與舊憲法，新政府與舊政府更富於相關性和連續

性。因此，考慮新經濟就是要考慮它的歷史前提，它是怎樣發生、發展和成熟的。即中國經濟發展的背景和中國經濟制度發展的背景。這兩個是判別我們所期望的新經濟的重要基本條件。從發展角度來講，中國現在的問題是，中國新經濟發展的條件是非常險峻和惡化的。衆所周知，中國人口早已突破十二億五，迫近十三億，（十四億的統計有水分）其中相當大一部份是六十年代以後出生的，年齡低於三十歲。不久的將來，中國將成爲世界上幾億人組成的最大的失業超級大國。這是任何政府都要面臨的最大的挑戰。再者是環境問題，資源，即土地、森林、水、工業品資源在人口壓力下的相對短缺和絕對的惡化和短缺。中國工業化遠沒有完成，對世界進出口市場依賴程度很大。因此，新經濟的歷史前提是日益險峻和惡化。中國的當權者目前最大的罪惡就是他們在拖延改革的時間，爲今後中國的變革提供越來越險惡的條件。這將被世世代代的中華兒女所譴責。

另外就是制度前提。不同意經過十年改革，制度變化僅限於表層變化或者變化沒有對制度發生根本性的沖擊和動搖。中國是否像人們以爲的那樣，四十年來確立了穩定的計劃經濟制度？不是的。一九七八年以前的中國經濟制度最大的特點像它的政治制度一樣，是一個非常動蕩，不穩定的經濟制度。十年中，中國最大的變化就是使本來不穩定的經濟制度受到了更大的全面劇烈的沖擊，從而使維繫整個社會的所謂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根基更大程度地被削弱了。判別這個過程所發生的變化很難用教科書上所說的經典市場來判別。因爲，在這十年中，控制經濟的手段遭到了實質性的破壞。原來被國家壟斷的投資和擴大再生產的資源在很大程度上被破壞

，計劃內投資的增長和發展，國家也僅能控制一小部份。貨幣體系和制度也發生了變化。一句很有名的話，說：權到哪兒去了；錢到哪兒去了？這是由於貨幣不成熟。不健全，社會對貨幣在短時期內產生了很大壓力，出現了貨幣升值局勢，和貨幣外循環。因而，原來的投資和資金運行方式基本被破壞。這事的好壞，很難定論。

在當代，人類重新實行私有制在一定程度上被當作一種革命。中國私有制過程在十年中已波瀾壯闊地展開了。這表現爲非國有化形式，即原有的國有化經濟被各種各樣非國有化方式所取代。這就構成了以後發展的前提。要充份估計這種非國有化的歷史作用。我們在考慮新經濟時必須考慮舊經濟佔的有哪些遺產，否則必將要遇到舊經濟下生活的所有人的劇烈抵抗。因爲，新舊經濟的主體是相同的人，新政府則由新人組成，新經濟卻要靠舊經濟下生活的人來推動，運行和工作。

最近從國內出來的“中國建設”雜誌編輯許耀平在補充發言中說，目前中國經濟很混亂，具體表現爲以下六個矛盾，一是通貨膨脹同緊縮政策的矛盾；二是高失業率和工業低效率的矛盾；三是基礎工業和亟待發展的輕工業的矛盾；四是社會總供應量三千八百億與社會閑散資金，銀行存款六千億的矛盾；有朝一日，就會像去年八月那樣，把商品都吞掉。五是傾斜工業結構，即基礎工業百分之一遞增，輕工業加工工業百分之十八遞增的矛盾；六是外債與赤字的矛盾。李運奇所說所有制四個改革方案，內部都在嘗試，邊界開放也在實行。目前仍是社會對改革的承受問題。應該考慮多少東西可以繼承，多少可以揚棄。私有制可能會對目前社會帶來極大沖擊，因此不一定是最好的辦法。

（上接98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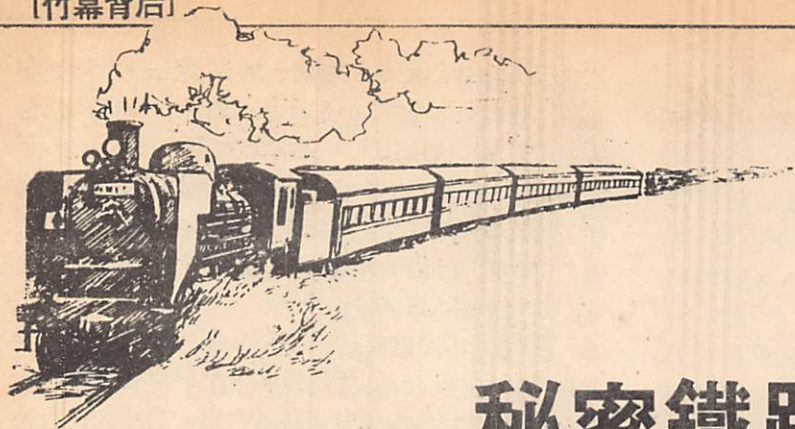
界地區的秘密起義和暗殺活動上，每次起義都以革命黨人的慘重犧牲爲代價，而產生的影響則是較爲有限的。“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這一經驗，畢竟是臨終才講的。而共和肇建之後的讓袁倒袁，二次革命，護法之役，亡命日本，以及從中央到地方無數革命黨人慘遭殺害，都說明了革命黨人的孤立無助，缺乏群衆基礎。因此，要想在中國這樣一個封建君王制的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國家裡實現民主政治，還是應當先從喚起民衆做起。

其四，孫中山以爲可以在中國的資本主義尚未發展的情況下去超越這個社會階段去實現社會主義，從而避免資本主義貧富不均的弊病，也可免除日

後社會主義革命的痛苦。在這樣一種思想的支配下，他要在看不到多少“資本”的國度裡實行“節制資本”，在缺乏物質基礎的情況下去高喊“平均地權”，在毫無政治、經濟保障的情況下去發展“國家資本主義”，而結果只能是徒勞無功。因此，要想在中國落實民主政治，仍要尊重歷史發展的行程，從建設一個現代工商社會做起。

最後，仍以七律一首，敬獻於孫先生靈前，作本文的收束：

譽滿全球謗滿朝，	元勳大寇一肩挑。
誓除封建千年弊，	何懼冥頑百口讟。
熱血常隨義旗舞，	丹心比並英魂招。
功成鑄就共和業，	萬古人歌民主豪。



未名

## 秘密鐵路

其實我很早就想向別人描繪這條神秘的鐵路綫了。因為它不是那種短短的軍用專綫，而是一條長達五百公里的鐵路綫，在世界鐵路運輸史上，還從來沒有聽說過哪一個國家能將這樣長一條鐵路專綫從建築到使用保密時間達三十多年之久。然而，這種連當年希特勒都難以做到的事竟讓中國共產黨給做到了，由此可見中共的‘專制’屬世界一流。

當你乘坐從北京開往蘭州的時候，在河西走廊的古絲綢之路途中，有一個極普通的車站座落在古長城烽火台的遺址群中，淹沒在茫茫的戈壁灘裡。幾乎所有的快慢車都不在這個小站停留，但人們還是可以清晰地看到那塊小小的木製站牌——清水。

清水火車站旁邊的小鎮是一座典型的西北小村落，規模不過百家，特殊之處是一大半建築物為鋼筋水泥的軍營，各有哨兵崗卒守衛，僅不同軍兵種的招待所就有好幾千，站外百米多長的水泥路上，走着的多半是身着草綠色制服的官兵。

據一位資深的火箭專家介紹，1958年中蘇軍事專家聯合選定這座代號××××特種工程建址時，清水這個小地方只住着三戶貧窮的農民。這些行不出百里的農民作夢也難以想到，在這塊世世代代栖生的土地上，這一年當播下的種籽還沒長到收穫時，周圍發生了堪稱人間巨大的變化：一夜之間出現了帳篷城，一座火車站飛快地落成了，陸、海、空三軍的萬馬千軍晝夜不停地來去於此地。

從此三十年來，蘭新鐵路上的任何客車都不準在清水停車。清水的巨變必然引起世界各國情報機關的注目，因為此地每一次反常的緊張氣氛之後，結果都與新聞公佈的大陸軍事科技的一項重大事件相

吻合。清水這個名字，經常出現在國外一些首腦人物辦公桌案頭的密件上。據大陸情報部門報告，不少以旅遊名義乘坐蘭新鐵路火車的外國人，途經清水時從來都沒有誰在睡覺。然而，清水在外觀上除了軍人營房多一些之外，一般人很難發現什麼非同尋常之處。也許一輛被窗簾遮住全部車窗的硬臥車廂裡，藏着一枚巨大的火箭軀體，也許那些三三兩兩的鐵路員工，就是武裝押運核武器的士兵。

這條北通內蒙額濟納旗建國營，終至賽漢桃來的軍事要道，另附有上百公里的岔綫，連接着中共核武器研製實驗重要基地——東風基地的大部份地區。這是一條大陸在編制上唯一不受鐵道部和地方鐵路系統管理的軍管鐵路，所經專列可以隨時停車，隨時開車，而控制信號則來自遙遠的北京最高決策中心。這是一條世界上罕見的鐵路綫。這條在大陸保密了三十多年的無名軍事鐵路，興建於1958年初。

1955年初，北京中南海東岸的豐澤園毛澤東官邸，中共領導人聚集於此決定自製核武器。

1956年，由周恩來，聶榮臻召集六百多位專家編製一個軍事規劃，其中一方面的內容就是決定重點發展彈道式導彈。

1957年，由聶榮臻、陳賡、宋任窮率領的中共代表團赴蘇聯莫斯科，與別個烏辛為首的蘇方代表團進行了談判，雙方最後簽訂了《由蘇聯幫助中國勘察、設計火箭導彈武器試驗靶場》的協定，即有名的‘10·15’協定。同年的最後一天，以蓋杜科夫為首的十七名蘇聯專家抵京，與陳錫聯等中國專家17人，在元旦、春節期間聯合勘察選定了酒泉以西鼎新地

區。

1958年春，毛澤東、鄧小平在中央軍委的建場報告上作了批示，十月發佈了組建綜合性試驗基地的命令。

一聲令下，九路大軍雲集西北某地，大陸的一項特種工程開始秘密地加緊實施。

在此之前幾個月裡，美國中央情報局有關部門緊緊盯着3月8日從朝鮮撤離回國的志願軍第二十兵團，他們放心地看到全軍於當月13日已先後抵達北京及其周圍地區。但是僅僅半個月時間，五角大樓和白金宮發現跟踪失誤，因為一切軍事情報都明確顯示：志願軍第二十兵團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區神秘地消失了，去向不明。

原來，該兵團在一夜之間，士兵解甲歸田，軍官進京學習核彈專業技術。中共軍委調集各軍兵種的精兵強將近十萬大軍，包括這一年大學畢業的許多高材生，奔赴西北一個命名為‘東風’的地區。

鐵道兵第九師與朝鮮戰場撤回的志願軍鐵路部門，滙合上海、蘭州、錦州鐵路局特選的工程技術人員就是在這種歷史氣候下開始進行秘密軍事鐵路施工的，鐵道兵司令員李壽軒和工程兵司令員陳士渠親自掛帥。

初期的鐵路施工異常艱苦，僅死亡的士兵達千人以上，1959年2月26日，二百四十多公里的專用鐵路通車，建設速度相當驚人。六個多月之後，中國軍隊已經開始利用這條鐵路的運輸，在試驗發射蘇聯製造的導彈了。

就在這一年，美國情報專家在衛星拍攝的一大堆照片中發現：在中國西部大沙漠邊緣的戈壁灘上，突然間冒出了一條新的無名鐵路，這條鐵路直接通往發射場工程基地；基地規模巨大，整個面積超過一個浙江省，比美國的加利福尼亞西部發射基地和亞特蘭大的兩個東部基地還要大。

筆者有幸曾於十幾年前搭乘過這條鐵路綫的專車，印象非常深刻。

鐵路的兩邊是一望無際的戈壁，荒無人烟，一片灰黃色寂靜的世界。據知，方圓幾百公里內只有一條嚴格控制的公路，基本上是沙漠、鹽鹼地構成的死亡地帶。這條鐵路除運輸外，每天初夜從基地中心東風地區發出一列客車，凌晨時分抵達清水，上午再返回東風。

當年幾十萬人口在這裡丟下青春，捨下妻兒，奮戰生存，人員物資的運輸全靠這條鐵路生命綫。而這裡的一切都處於絕對保密中，來此人員都要經過審查三代，通信要經過登記。找對象要請示報告通

過審查，大陸法定的士兵服役期為二至三年，而在這裡當卻要服役四年，通信地址統一用‘蘭州市某信箱’的代號。所以後來許多將士的家眷千里尋夫，手拿書信走遍了蘭州市也打聽不到下落，只好痛苦而歸。即使僥幸知道真正地址的親友，也必須履行一系列嚴格的手續。首先要雙方提出探親報告，保衛部門接受報告後再去函調查來人的家庭，政治面貌及其表現，認定合格後方准持有關證明踏上路途。到清水又須交驗一切有關證明手續，換領專用通行證後才可登上進入軍事禁區的火車，列車在運行途中還要多次查驗有關證件，一切程序都十分嚴密。

三十年來，在這條鐵路上進進出出的人員何止百萬千萬。然而，外界竟然極少有人知曉這裡的隻爪片鱗，足見其保密之嚴。

我記得從清水到東風需運行七個多小時，一路上軟卧包廂裡依然沙塵瀰漫，不敢打開窗戶。列車長說這裡的風沙哪裡都能鑽進去，有時吃飯都要用衣服包着頭和飯碗，以防沙土落入。

當時，在這條鐵路上運行的軟卧車廂，堪稱世界上罕見的珍貴老爺車廂，比豪華的東京快車還有意思。有的車廂是日本昭和十四年出廠的。有的是抗戰勝利時接收過來的，還有的是朝鮮戰場上的衛生車改裝的，由於保養得好，仍在良好的運行狀態中。別看這些車廂年老齡長其貌不揚。三十年裡，幾乎所有的中共黨政軍領導人都乘坐過它，周恩來先後五次來到此地，多次乘坐過這些列車。

鐵路邊豎立着排排電綫桿，貫通着有綫通訊的大動脈，電綫桿子的細長陰影也是巡道兵唯一休息遮陽處。1970年發射東方紅衛星時那幾天，每根電綫桿下都晝夜守護着一名士兵，不准人畜接近，絕對保障安全暢通。尤其是，士兵和民兵們還必須隨時轟趕飛鳥，不許它們在電綫上停留片刻以免影響通訊效果。如此高質量的戒備，古往今來，聞所未聞。

由於從小時生在核工業的神秘生活圈中，對那些諸如‘永紅’‘馬蘭’‘東風’等核試驗及製造的名字十分熟悉，日前偶見報刊介紹大陸酒泉衛星放射中心對外開放的消息，不禁想起過去三十年來。在三十年絕對秘密的發展中，由大陸這座最早最大的軍事基地發射的各種導彈的升天，導彈核武器試驗，東方紅衛星和首顆回收式衛星的發射，飛向南太平洋的遠程運載火箭。一枚火箭發射三顆衛星等中外矚目的重大軍事科學事件，統統溯源於這裡，世界軍政和科技界曾十分矚目過這裡。

而我們這些生活在大陸幾十年的人，卻可能對它一無所知，這真是大陸中國人的一種悲哀。

# 復興

創刊號  
一九九零年  
八月十日出版  
第一期  
總第一期

「復興」宗旨：  
結束一黨專政  
實行多黨民主  
建立多元經濟  
復興中華民族

創刊辭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在中國民主運動遭到血腥鎮壓暫處低潮之際  
，《復興》創刊了。

已故中共主席毛澤東說：“中國應當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我們相信此話不僅表達了他個人的願望，同時也表達了他那一代以及目前大多數共產黨人的

## 大陸地下刊物〈復興〉 創刊辭

[編者按] 去年[六四]事件以後，大批留在國內的各階層民運人士，沒有被中共的血腥鎮壓嚇倒，也沒有向專制恐怖低頭，他們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又投入了新的戰鬥。

去年十月，“在良心與責任感”的驅使下，一群來自不同地區和黨派的人士聚集一堂，組成了〈中國民主運動聯合陣綫〉（簡稱民聯陣C.D.A）。該組織的骨干成員多是參加過“八九民運”的學生、學者、幹部、工人，其中還有正被中共通緝者，以及北京之春時期的老民運戰士。之後，因“六四”事件被捕而陸續獲釋的許多人也主動參加了這個組織，使得〈中國民聯陣〉不斷成長壯大，發展為大陸跨省的民運團體，成了中共當局心腹之患。

一九九零年八月十日，該團體在國內某地創刊出版了地下民刊〈復興〉，九月二十日又出版了第二期，其宗旨是“結束一黨專政，實行多黨民主；建立多元經濟，復興中華民族”。該刊雖因條件局限，顯得簡陋，但在民間傳播影響頗大，已被中共列為重點追查對象。

不久前，國內有人冒着風險將〈復興〉帶出海外，與中國民聯取得聯繫，他們迫切希望與海外民運團體經常內外溝通，緊密配合協作。現〈中國之春〉予以轉載，希望海外各界可從這一斑窺見大陸民運之全豹。

### 創刊辭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在中國民主運動遭到血腥鎮壓暫處低潮之際，《復興》創刊了。

一、檢討中國民主運動幾度興起，屢遭鎮壓的歷史。我們感嘆在中國推進民主的艱辛的同時，也深深感到民主思想與要求在中國已深入人心。我們堅信席卷當今世界的民主運動之潮流勢不可當，中國民主運動的復興與高潮指日可待。

二、《復興》是中國民主陣營的一部份，所有信仰民主，痛恨暴政的人們都是我們的天然盟友，

追求民主理想，加速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是我們的目標。我們主張以和平與民主的方式去實現我們的目標。

三、《復興》旨在傳播民主精神，反映各派民主力量的觀點、立場。介紹中國和世界民主運動的現狀與動向。

四、《復興》的創刊勢將激怒專制暴政集團，成為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但同時也會成為痛恨專制暴政，崇尚民主與自由的人民的知音與摯友，如果人們讀到《復興》時，心中又一次燃起對民主必勝的信心之火，那麼“復興”也就真正地開始了。



已故中共主席毛澤東說：“中國應當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我們相信此話不僅表達了他個人的願望，同時也表達了他那一代以及目前大多數共產黨人的共同願望。可悲的是這一願望在他生前未能實現，即使在今天看來也相當渺茫。

過多的人口，惡劣的生態環境，低下的教育，目前的中國已落到了世界最貧窮國家之列（人均收入排世界第126位），只有向世界發達國家乞憐告貸的份，哪裡還談得上對人類作出較大貢獻？

說到我們的國家，大家都知道兩句話：地大物博（國家）、勤勞勇敢（人民）。一個具有這等優越條件的國家，居然落到了最貧國之列，其原因何在？豈能不令每一個良心未泯的中國人痛心疾首之餘而思之再三？

對此問題，中共經歷了從不認帳到認帳的痛苦過程（五、六十年代：社會主義好，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還在水深火熱之中。七十年代：落後了會挨打）。但在向人民解釋時，中共每次都將責任輕鬆地推給了歷史。直到七十年代末，中共才開始檢討自己作為唯一的執政黨在執政過程中所犯的錯誤，可惜，他們未能從僵硬的體制上去尋找錯誤的原因，而只是就事論事地將由於體制的先天的缺陷所造成的整體的錯誤簡單地推給某個人，似乎只要將個人像基督那樣朝錯誤的十字架上一釘，黨作為一個集體便能贏得永恆的正確。這種治標不治本的做法給我們國家的發展種下了不可避免的惡果。

中國向何處去？中共在自以為清算了自身全部的錯誤之後，七十年代末，提出了改革的口號，並向人民許諾，保證要在2000年達到小康水平。可嘆的是，轉眼十年過去了，人們看到經濟改革之舟終於在有着先天缺陷的僵硬體制這塊礁石上撞翻了。先前種下的惡果終於在89年瓜熟蒂落了。去年春天，中國廣大人民（首先是大學生）由於不滿中共上層的官僚主義與腐敗行爲，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官僚，反腐败，加速民主化進程的人民運動。而對聲勢浩大的人民運動，中共高層專制集團，唯恐喪失自己的既得利益，竟置國家民族的利益於不顧，逆歷史潮流而動，悍然對人民實行血腥鎮壓，從此，經濟全面不景氣，民衆生活水平下降的陰影再次籠罩了中國，中國又一次落到了萬馬齊喑的可哀局面。想必四千萬中共黨員也一定同樣深有感觸。

如今，向何處去的問題又擺在十一億中國人的面前，結論是肯定的：改革，唯有改革才是中國唯一的出路。這已經是中國人的共識，問題在於如何改？從何改起？

二十世紀末，世界已進入了現代科技、經濟高度發展的階段，地球相應更小了，每個國家無不生存在一個彼此密切相關的世界大環境中，沒有一個國家能自我關閉而不被淘汰。八十年代末，世界政治形勢形成了民主化的大潮流。經歷了長期的痛苦抉擇，越來越多的國家都選擇了政治民主化的道路。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

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批判了斯大林的錯誤，舉起了經濟改革的旗幟，他自信地宣稱：社會主義將以和平競賽的方式埋葬資本主義。可悲的是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這場競賽以蘇聯式社會主義的暫時失敗而告一段落。原因在於赫氏也是簡單地把錯誤推給個人，而沒有直面僵硬的體制，缺乏改革必須從僵硬的政治體制入手的預見性。因此蘇聯改革沒有取得實質性的勝利，以至到了勃列日涅夫時代，斯大林主義的陰魂又一點點地復活了。但今天面對世界民主大潮流的挑戰，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蘇共上層，作出了全新的反應。蘇共倡導修改憲法，放棄一黨專政，但並未因此而喪失領導權。由於二十八大的成功召開，蘇共在民主化道路上邁出了更大步伐，我們相信，蘇共走在蘇聯改革潮流前頭，將會和蘇聯其它黨派一起，把蘇聯引向人道、民主、繁榮的新社會。

中國搬來斯大林主義模式，加上中國土產的封建專制特色，顯得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中共評判毛澤東的錯誤後，舉起經濟改革的旗幟，當改革觸及僵化的政治體制時，中共高層獨裁者們退縮了，躲進了既得利益的象牙之塔，面對世界民主潮流，他們採取了抵制和鎮壓態度。

比較蘇聯和中國的現狀，我們不禁要問：難道歷史又要在我們這一代人頭上重演嗎？

我們的回答是：不！一千個不！！

蘇聯的改革歷史和中國十年改革的事實告訴我們，在中國單純的經濟改革是行不通的。必須從政治改革入手，開放黨禁，開放言論，結束一黨專政。這不是要取消共產黨，而是要建立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多黨派公平競爭、人們選擇的體制。至於共產黨能否居於領導地位，這完全取決於中共自身的作為、取決於人民的選擇，決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當然，如果中共某些領導人，繼續逆歷史潮流而動，置國家民族的利益於不顧，用武力壓制改革，而全體黨員又不能制止他們的行爲，那麼我們可以大膽地預言，結果必將是中共被人民所唾棄，徹底解體。

衆所週知，共產黨人一貫以代表人民利益為宗旨。共產黨人都知道，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

仙皇帝，更沒有權力天授的真龍天子。徹底的共產黨人應該有勇氣接受人民的評判與選擇，真正害怕民主，害怕反對派的只能是極少數頑固專橫的既得利益者。

當前，結束一黨專政，實行多黨民主，不但是廣大人民的迫切要求，也是中共黨內有識之士的共同要求。去年六月，面對民衆強烈的民主要求，中共內部以趙紫陽爲代表的改革派與有識之士，順應民心，群起響應的局面，就是證明。正是由於黨內進步力量，在關鍵上刻站到人民一邊，才使我們再次看到了中共的希望所在。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目前最大的政治力量，無論中國當前的改革還是今後的發展，都離不開共產黨員的作用。因此，我們呼籲共產黨領導層中良心未泯滅者與廣大黨員，在國家民族的危難時刻，爲了人民與國家利益，擔負起推進改革的重任，與李鵬之流作堅決鬥爭，乘世界民主化大潮流之機遇，學習蘇共的經驗，與各民主改革力量站在一起，接受人民的選擇，走徹底的改革開放之路，爲早日把中國建設成爲一個政治民主，人民自由，經濟繁榮的世界強國而奮鬥。

《復興》編輯部

## 從批評者到參與者

——訪民陣法國分部參選者

安琪

繼民陣“二大”之後，地處民陣總部的巴黎民陣法國分部的主席人選再次爲各方人士所“側目”。衆所週知，巴黎是流亡人士比較集中的地方，各種不同意見的交鋒本來就很激烈，再加上在民陣“二大”期間又有一個以巴黎二十名流亡者署名的致“二大”代表的“公開信”的小插曲，信中對萬潤南的批評措辭激烈，被某些人稱爲“反萬派”。本月中旬在巴黎召開的民陣法國分部的競選結果則是頗有意味的，在民陣“二大”上對萬潤南直接點名批評而引起反彈，以至連監事也沒有競選上的岳武和“公開信”的主要當事人之一王鴻賓，以五十三票對十九票的絕對多數擊敗了萬潤南支持的蔡崇國和夏云，而當選爲民陣法國分部的主席、副主席。且新一屆領導班子的主席、副主席、監事會主席以及執委會和監事會的主要成員都是“公開信”的簽名者。這樣一來，事情就變得更加敏感起來了。民陣法國分部將以怎樣的姿態處理與總部之間的關係？從批評到參與者，這些新領導成員經歷了怎樣的角色轉換過程？民陣內部的“內鬥”至此該告一段落了還是又有了新的契機？何以消除民陣主席萬潤南對“反萬派”的疑慮？民陣法國分部的發展若何？——人們的種種憂慮便是記

者這篇訪問的緣由。

### 並非庸俗的分歧

記者：經常聽到有一種說法，認爲大家對民陣的工作旁觀批評的多，而參與做事的少，對於新班子的大多數成員來說，原來一直是批評多於參與的。請問從批評者到參與者，各自是怎樣調整自己的角色定位的？

雷凱（原爲武漢大學法律系研究生、美國哈佛大學碩士，現爲民陣“二大”代表，民陣法國分部監事會主席）：討論這個問題，首先要談談我們爲什麼有批評意見，針對性是什麼？最近一段時間，在輿論界和傳言中有這樣一種傾向，即所有批評萬潤南的，不管你是誰，不管你自己願意不願意，都被歸結爲“反萬派”，而“反萬派”即“陳萬之爭”，“陳萬之爭”即“內鬥”。在這樣的邏輯推理下，所有的人都被捲進一個漩渦裡，直到萬潤南當選後回來，第一次和法國民運人士見面，仍然是這個調子：不存在萬派，只存在反萬派，而陳萬之爭是因爲一種偏見，沒有根本上的分歧，等等。對此，我不能同意。是不是批評萬潤南的

都叫“內鬥”，我認爲這裡要有一個界定。我了解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們對萬潤南並沒有成見，但是通過一些接觸和了解，我對萬潤南的一些主張，也就是說對民主的理解，對形勢的看法，對共產黨本質的看法，對中國民運的性質，以及操作方法我們有不同意見，我們對萬潤南有兩個最基本的擔心，第一，從他親自署名的“四通”對大陸時局的十五點聲明中，我們感到他和共產黨太近乎，有明顯的投機意識。第二，操作上的機會主義傾向，是一個小圈子的利益。基於這兩點，我們對萬潤南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我認爲這些意見是可以展開討論的，這與陳一諮沒有關係，可是，在民陣“二大”和整個爭議過程中，我們被莫名其妙地劃在陳一諮一方，我認爲這不公平，這是需要澄清的。

鄭泉(原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生，現爲民陣法國分部執委)：我們感到民陣，特別是在萬潤南的操作下，在指導方針和運作方法上存在一些問題。我們所理解的民主，是民衆的民主，而他們搞的民主，不是這個民主，而是幾個人的民主，小圈子運作，這不是我們所接受的東西，就是熱情最高的人，也會被這種東西淡化下去。我們心想，你連這些因參與民運而流亡到海外，並要更進一步參與民運的人都不能夠凝聚起來，更談不上對普通中國人的凝聚，我們覺得有責任向“二大”反應我們的一些看法，在這種心態下寫了這封公開信，而且很快就得到了大多數流亡者的認同。

岳武(原山西陽泉鋁廠分廠廠長，現爲民陣首屆監事，“民主之家”理事，民陣法國分部主席)：民陣章程上寫着派別公開化，但當真正公開化的時候，大家又感到受不了。從“二大”看，因爲時間很短，提問題必須要緊湊，所以言語方面激烈了些，同時，忽略了一些重大原則問題上的分歧，而在一些小問題上爭論不休，但我個人認爲，無論如何，總還是有一些爭論，這是民陣成熟的一種表現，我們都可以看到，民進黨在台灣掛牌四年了，在國會裡還要拍桌子，摔凳子，我們民陣再分歧，也還是在會上，而沒有形成別的，起碼說明我們這些人的素質和水平。另外，作爲一個政黨、組織，在其形成的過程中，有意見分歧，也是正常的。“二大”之後怎麼總結，我認爲去年一年總部確實存在一定問題，人員多、工資高，實事幹的少，接觸群眾少，個別人的道德形象差，一條魚害一鍋湯，使民陣聲望急驟下降，這些問題總部應該認真總結。

鄭泉：我覺得“公開信”前後所產生的一些影響，以及“二大”對一些問題的爭執，還沒有反映出我們

內心深處不平衡的東西，過去一年民陣總部的所做所爲和明裡暗裡所追求的目標，我們認爲與我們有根本上的分歧，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分歧，而非庸俗的分歧。

## 民陣“二大”的缺陷

王鴻賓(原海南民生公司總經理，現“民主之家”理事，民陣法國分部副主席)：關於“公開信”，實際上我們並不想再提，但是還是有人經常提起這件事。當時我們寫“公開信”的基點是與我們去年參與“八九”民運的出發點一樣，但由於民陣上情下達，下情上達的渠道不通，作爲一個普通流亡者，他要反映一種意見，在“二大”時以一種簽名形式表達出來，也是非常正常的。當然，“公開信”有些措辭聽起來不是那麼順耳，但這本身就是在於刺激人們的神經，讓大家警覺起來。

王曉宇：(原新華社和海南電視台記者，現爲民陣法國分部執委)：在民陣“二大”前後，大家對總部和萬潤南提了一些批評意見，這是一個好事情，不是像有的人以爲的那麼可怕，像“二大”出現的那種不正常的氣氛，證明我們搞民主的人本身就害怕民主。

雷凱：我參加了民陣“二大”，既然今天有這個機會，有幾個問題我想說明一下。我認爲“公開信”不僅僅是針對萬潤南一個人的，而是對整體的一種看法，而且這二十一名流亡者地處巴黎，參與比較深，至少他們應該有這個發言權。而我作爲一個代言人，其中很多人是我的選民，我覺得我對他們有一個責任，應該將意見完全反映出來，讓代表們作一個評價，而在大會上我一直沒有發言的機會，最後我向大會遞了一封信，對“公開信”的處理問題表示抗議。我認爲大會對“公開信”的處理程序上是不正常的，按常理，當時“公開信”應該與其它提案一樣立刻發給大家，卻一直拖到第二天，首先會務組不印下來，印下來之後只發在第三組討論(萬潤南所在的組)，直到最後大會上各小組代表發言時，實際上只有一個組討論這個問題，其他許多人根本就沒看到，而且討論問題時，當時有傾向性的人發言，這種做法是不公正的。民陣“二大”的最大缺陷就是不能展開批評，大會實質上並沒有給代表們一個公平選擇、判斷的機會，這也和前面講過的誤導有關。現在我們想盡量淡化這個問題，我們淡化的意思不是說我們承認我們錯了，或者說問題已經解決了，而是我們覺得

人們的認識需要一個過程，那我們就先等一等，既然暫時解決不了問題，那麼我們就先放一放，我們先做事，在這個過程中慢慢來理解，慢慢來解決。

### “民主不是那麼容易的”

鄭泉：民陣“二大”之後，萬潤南當選為民陣主席，有的人認為民主的選擇是主要成份。但我認為這次“二大”開得技巧性比較大，在這方面，萬潤南的工作做得很扎實。我們先接受這個選擇的結果，但是我們保留我們的批評意見，正確的還是要堅持。我認為“二大”的失誤責任在雙方，一方是以萬潤南虛構了一個“反萬派”，對大會作了誤導，另外我們自己也有責任，我們這些持不同觀點的人，自認為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卻沒有及早地站出來，沒有凝聚起來。好在民主的路還很長，現在只不過是一個開端，所以我們很快地站出來，去團結更多的人，影響更多的人。

岳武：從客觀來講，我們分部非常困難，給我們的機會不多，如果我們在這一年中辜負了同情和支持我們的人，如果我們把精力總是放在批評別人而忘記了我們要踏踏實實地做事，我們也不會成功。所以我們今年要採取低調態度，過去的事盡量不提，不管是誰對誰錯，如果你做錯了，我們往對裡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雷凱：既然我們沒有機會能夠表達我們的觀點，而且我們也意識到解決這些問題的艱巨性，為了顧全大局，我們覺得最好的一種選擇就是先做事。萬潤南經常講的三句話是：民主是個好東西，中國人能夠搞民主，我們還要學習民主。我們要再加上一句：民主不是那麼容易的，需要做長期的，艱苦的工作。這裡有一個技術性的區別，我們希望共產黨倒，我們希望用民主的東西來取代它，但並不是說共產黨一倒民主就實現了。而有的人的眼睛是盯着共產黨倒，然後我去，好像我去就是民主了，不是。

我們希望通過我們的行動，表達我們所要追求的理想和原則，創造一個能夠對民主的不同觀點，不同理解公開平等地展開討論的機會。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達到派別公開化，在雙方沒有平等的機會時，就不存在所謂派別公開化的前提。我們也希望通過我們的工作，對民主有一種實在的推動。這就是我們出來競選的主要動機。

蔡崇國（原武漢大學哲學研究生，現為民陣“二大”代表，民陣法國分部候補執委）：我個人認為“公



參加民陣法國分部主席競選的蔡崇國。

開信”有一些感情用事，這個或在“二大”小組發言時就談過了。我這次參加分部競選，使許多了解我的人感到奇怪，實際上我參加競選有這樣幾個想法。第一，多感受、多經歷是我的一個很重要的信條，我認為競選過程有一種象徵意義。成功不成功倒不重要，職業習慣使我感到從很多小事情中可以體會到許多很深的道理。第二，海外民運團體第二年需要深入思考，學會用政治手段來解決中國問題，我認為法國分部需要文人氣質和理性精神，如果一個組織的領導人是一個文人，同時又不是書呆子，那麼這個組織就比較有吸引力。我覺得自己比較合適。第三，“六四”之後，對中國知識份子來說有一個很大的難題，一方面我們比較善於思考，比較理性，但對一些實際運作卻不大瞧得上，其實也不懂，我希望自己身上的弱點能通過政治活動克服掉。這次我以比較大的懸殊敗選，也是比較正常的，一個是我書生氣太足，另外準備得也不充份，而對方是一個強大的競選班子，競選前我們雙方也有過交談，我是透明的，對方也很誠心，雙方都沒有犯規。當然，也有一些說法，認為是萬潤南推我出來競選的，這與事實不符，他支持我倒是真的，但談不上“推”我出來。失敗了我也不沮喪，目前，我和新班子的人相處得很好，我覺得現階段由他們來幹比我要好，他們有很多的精力和興趣投入，而我有許多文章要寫。

### 不吃“民主飯”，要做“民主事”

記者：從每個人的競選宣言上感到大家信心很足，都傾向於埋頭做事，也提到了工作的重點，如大陸工作、華僑工作以及難民、留學生工作等等，可是從目前大家的現狀來看，生存的困擾也很緊迫。那麼你們怎樣做事，怎樣解決“吃飯”和做事之間的矛

盾呢？

岳武：生存問題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困擾，確實很難，從分部成立到現在，晚上經常有會，花費很多精力。怎樣能解決不吃“民主飯”，又要做民主事的問題呢，我看我們要通過打半工的方式來搞民運。分部的大部份領導成員，下個月都得去打工，我也一樣。我原來是靠難民救濟金生活的，最近已經停了，靠借債度日，我們能擠出的時間並不多。原來王鴻賓有個很好的工作，一幹了這個，工作也停了，今後要去打半工，每月三千法朗，除了交付房租，恐怕連抽煙的錢也沒有了，我現在已欠外債近萬元，不能再往下頂了。鄭泉、馬千波都在打工，王曉宇也沒有工作，也要去打工。

王曉宇：我們的基本態度是自己救自己，不可能像有些人一樣去吃“民主飯”。

鄭泉：我們準備好了要“臥薪嚐膽，忍辱負重”，明知有這麼多困難，又要打工生存，又要幹民主，但是我們就是要幹，這正是我們的基本出發點，你既然有那麼多不滿意，你既然有那麼多你認為正確的觀點和想法，你既然有那麼大的熱情，那麼你不作出犧牲，誰作出犧牲呢？

蔡崇國：中國的民運需要職業革命家，需要靠民主吃飯的人，這也是很正常的。我是要靠我自己的研究能力得到飯碗。我想認真總結“六四”，而且我也提議建立一個理論政策研究小組，我也正在參與民陣總部理論研究所的籌備工作，對分部的工作，我也會參與很多的。

### 不僅僅“只有風頭”

岳武：工作方面我們都有分工，將來很好檢查。

雷凱：我個人是把民主作為一種理想，一種事業去追求的。我是有意識地競選監事的，這個職能是我們學習民主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它對監事個人品質形象的要求是第一位的，在制度還沒有健全的情況下，要靠一些人的行為慢慢形成一種習慣。我認為到現在為止，民陣內部還沒有一種正氣，所謂正氣，就是公正、客觀、坦誠，對不同意見和反對意見的包容、合作精神，而這種精神，往往有個很微妙的關係，就是原則和合作。我希望大家能從細小事上做起，在職責上從三個方面要求自己：（一）監督制衡，這種監督制衡不是通過人盯人，而是靠一種規則化，制度化下面的習慣，是在制度建設基礎上的監督制衡。（二）在監督中要看到兩邊的人，要收集不同意

見，勾通誤會，促進共識。（三）監事本身應以個人行為去參與，因為他的行為本身具有示範意義。這幾個方面結合起來，有意形成一種風氣，一種法理化、程序化的風氣，將工作列入軌道。

鄭泉：我是負責對華僑工作的。我通過打工，與僑界有接觸，認為潛力很大，僑界的愛國民主熱情超出了我想像的範圍，我們這個組織應該根植於這個土壤。這一年，僑界工作沒有做好，這也是民陣的一大失誤。當務之急，我們要扎扎實實走到華僑中去，要和他們交朋友，以自己的道德形象和所做所為，以群體的感召力和所為，去樹立民運人士的形象，同時，讓他們了解我們的主張和我們從事的事業。做這方面工作的還有副主席王鴻賓，原來的監事羅先生也願意積極參與一起做事，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初步的工作計劃。

馬千波（原在中國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工作，現為民陣法國分部執委）：我負責對大陸工作，已經有了一個大陸工作研究小組，把研究成果和大家討論的方案通過大陸傳單直接傳入大陸，重要的是讓大陸人民了解民主，知道我們在做些什麼。

王曉宇：我們的原則是做實事，宣傳工作也一樣，去年的教訓是雷聲大，雨點小，今年我們有這樣兩條原則：第一建立健全制度，和宣傳媒介建立穩定的聯繫。第二，做事情是先做後說，不是先說後做，或者只說不做。具體做法是：1、定期舉辦新聞發佈會，請記者參與我們的工作。2、辦通訊，寫文章，搞好理論研究方面的工作。3、通過“六四”之聲和BBC美國之音等電台做好對大陸的宣傳。4、通過華文刊物和英、法文刊物，宣傳我們的主張，擴大影響。

雷凱：我覺得有一點不能省略，如果省了，就變味了。既然民主一定是從下邊來的，那麼我們現在做的工作首先應該是基層的，是默默無聞的，有時甚至是很艱苦的，不是像有些人所以為的只有“風頭”，沒有風險，如果是真正的投入，就是要擔當風險的。

王鴻賓：所謂配合，即通氣和協作。至於說理解總部和分部的關係，我認為總部和分部的關係應該是金字塔而非倒金字塔，總部應該有這樣一個指導思想，即虛總部重分部。朱嘉明理事長有句話說得很對，他說分部應該向總部爭權奪利，這就是說要主動做事。

岳武：從目前狀態看，恐怕今後分部要多承擔一些工作，不然總部這兩三個人怎麼幹工作？更主要的是配合，其實我們這些人競選上來，本身對民陣的工作就有一種制衡作用。

# 一個以商養運可行計劃

錢達

## ※爲什麼以商養運一直没有落實

民運組織多年來一直體認到光靠捐款過日子，永遠是吃一頓看不見下一頓，頂多勉強維持生存，根本談不上運動的壯大和其他計劃的逐步實踐。所以幾年前民聯就已討論到‘以商養運’的必要性，並且成立了企劃小組，可是幾年來民運組織仍然是一個企業都沒作成。

目前在民運高潮過去後的一年，民聯、民陣都是在赤字中運作，靠着借貸暫時維持，因此我們不能不即刻下定決心，探討發展企業失敗的原因，並找出重新發展的方向。

民運組織作不成企業的部份原因是太窮了，一群兩袖清風的人哪來資金談投資呢？其實不然！！在現代的社會，一個大型的連絡網本身就是財富，問題是如何把這筆財富兌現。

## 、※應該以現成的連絡網發展企業

兩年前王炳章賣保險，靠着各地盟員的努力配合，王炳章以半年的業績就得到了大都會保險公司全年度的金牌獎。而賣保險本身就是一個不花錢，運用連絡網發展企業的方式。可是賣保險需要執照，必須王炳章本人到各地去跑，其潛力遠遠比不上目前正快速發展的一種銷售體系——多層次推銷（又稱直銷）。多層次推銷不需要執照，人人都可以做，甚至學生的眷屬在家打打電話都可以做。

史丹佛大學、華爾街日報以及其他權威性的研究機構都已作出預測，在九〇年代中將有50%至65%的產品或是服務是透過直銷來銷售的，所以直銷體系正快速的在消費市場上取代傳統的批發與零售方式，而發展直銷也是最大限度發揮了我們連絡網的資源。

直銷有諸多優點，尤其是合適民運組織來發展，直銷是人類新銷售型式的巨大潮流，因爲它有下例多項優點：

（一）不需要資本，風險很小，並且可以副業方式

開始。一般投資總得有一筆資金，並且若是不辭掉原來工作，專心從事，恐怕甚難成功。而直銷除了會員費以外不需資金，而且絕大多數的直銷是以副業方式開始的。

（二）不需要人事管理。作上綫的人有義務去幫助下綫發展，因爲他可以從下綫的銷售取得利潤，但是他不需要去管理下綫，更不必給他們發薪水，這一點尤其能避免民運組織內部因企業上從屬關係造成人事和財務的糾紛。

（三）不像零售商和批發商需要店面和儲藏室，並且要整理存貨清單。

（四）經銷商同業績升級後，此級別可遺傳給自己的子女或是法定受益人。這是比實物遺產還要好的，因爲業績級別是不會打遺產稅的，而且這是有長期收益的。

（五）不需要作帳，每個人的報酬經公司電腦計算並列表，經銷商收到支票後，只需核對，不必自己記帳。

（六）經銷商是獨立而自由的，參與民運的朋友們在直銷發展成功後，仍然有很大的自由度參與民運工作。不像很多大公司裏的主管，需要管理人事物資，常被業務纏身，連請假都有困難。

## ※一個具有革命性的直銷項目

最近有A公司（註一）推出新的直銷項目與一般的直銷項目截然不同：

（一）它不像一般直銷項目要會員另外花錢買東西，而是在日常生活支出中替會員省錢。

（二）相當徹底的保險。當會員簽約時，在合約上有明文規定，如果一年沒有替會員省下\$250元以上，會員可要求退款（退回會費加上第一年註冊費共\$190元，但要扣除已替會員省下的費用），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

（三）革命性的觀念。工業革命以後，資本家剝削了勞工，所以勞工要組織成工會與資本家在勞力市場上抗衡。現在A公司提出的計劃就是把消費者組織起來，在消費市場上形成強大的誤判實力，而直

接與大批發商或是廠家作大幅度殺價。

(四)不花錢也可以作。A公司提出的計劃是把會員與經銷商身份分開的。會員是繳交會費享受各種優惠的，經銷商是不花錢，但是替公司推銷會員證而取得獎金的。當然最好是擔任經銷商者自己也作會員，但是如果學生家庭一年開支甚少，他仍然可以不花分文，作經銷商向教授、親朋推薦會員證，而獲得獎金。

(五)這個項目很年輕卻有一定的公信力。在直銷體系中如果一個項目太老則沒有發展潛力，但是太新恐怕會有風險。目前A公司推出的項目才上市一個月，但是已有相當公信力，因為公司總裁是在美國享有長期良好聲譽的財經專家，他寫過一本指導美國家庭如何經理財務的書銷售了三百萬份，該書曾經連續兩年獲選為最暢銷書。

(六)在經濟蕭條時期，反而有更大潛力，美國已經明顯地進入經濟衰退中，但是A公司的項目，不要會員花錢，反而是替會員省錢，尤其在經濟蕭條，市場冷清時，A公司面對廠家時，反而有更大的殺價能力。

### ※A公司的計劃涵蓋面之廣是空前的

過去已有許多公司以單項的服務或優待，就已經作起直銷的，像電話費之優待還有房屋貸款加速還款計劃。但是A公司提出的計劃綜合了十多種優惠，而且以單項來比較，都是超越其他許多公司的。以下只列舉數種大的優惠項目：

(一)國內長途電話費：享受20%以上的優待。

(二)機票費和旅社費：機票費保證是正常航班(scheduled flights)中最廉價票，外加5%的回扣款(rebate)。旅社費是公司特價(corporate比一般價格便宜30% - 50%)外，再給10% - 45%折扣(discount)。

(三)郵購商品：有25萬項名牌產品供您挑選，保證包括運費仍比市價便宜，並且在購得產品後30天內，若發現當地廣告有更便宜的，可索賠差額。

(四)日用品和食品：可以1比10的比例選購逾千種產品的折扣券(coupon)。比方花十元可購得價值百元的折扣券，而且產品項目是由您選擇的。

(五)高級渡假別墅：在美國國內外的觀光勝地，有一千五百多幢別墅，一般價格是\$1200一星期，會員則享受\$350一星期還有20%的回扣，如果會員能臨時等空房，一星期\$99。

(六)加速償還房屋貸款：將每月付款額減半後，

每兩星期付款一次，所以等於一年多付一個月，如此可將30年貸款在大約20年內還清手續費\$100(有30%回扣)加上每次付款手續費\$5元(可安排銀行自動轉帳)。

### ※報酬豐厚的市場計劃

請參看全文末所附之A公司市場計劃。

### ※記取教訓，重新上馬

每一次一位民運領袖的形象破壞，或信用破產，都是對整個民運的傷害，尤其這些年確有不肖份子借民運斂財。至今任何一位民運人士出來號召為民運籌款，都得擔着很大的風險。可是現今民運財源枯竭，情況迫在眉睫，這實在是我們記取教訓，重新上馬的時刻了。

當年王炳章賣得保險雖然成績可觀，但是因為一開始沒有建立徵信制度，以致一朝被質疑，公信力一夕瓦解，整個計劃便失敗了。所以徵信與監察實在是我們籌款工作最重要的基石。本人在這次提出計劃之前，首先下定決心，即使企業發展不成，絕對不讓信用破產，好在直銷的投資不大，而本人也是有執照的工程師，沒有太大的後顧之憂。

本人先請一位親戚與A公司簽約成為經銷商，然後本人在這位親戚下簽約成為其下綫，將來本人帳號內之收入除了業務開支與報稅以外全數捐給民運。而我親戚因為是本人的上綫，他會從我的業績中獲得一部份獎金(大約是本人帳號收入的20% - 30%)然後這位親戚將補償我日常生活的開支。

我決定將帳號內收支每一季公佈一次，並同時公佈捐款的分配。除了借中春公佈以外，本人將主動向民陣、民聯、學自聯三方面監委會提出報告，並接受三方面監委會的質詢，我相信我能證明自己是真為民運籌款，不是假借民運賺錢。

關於捐款的分配，在本人帳號收入到達每月一萬美金以前(以我們的連網去發展，預計在半年內能達到此目標)，由本人分配，當收入超過每月一萬元時，將成立委員會來分配。分配時將以下列各因素作綜合考慮(1)各組織之規模與成效(2)各組織之需要(3)在本人下綫中對各組織支持的意向。本人會給每一位直接下綫寄一份調查表以統計大家對各個組織支持的意向，作為分配捐款之參考。

## ※要創造一批自給自足 並能支援別人的革命家

在民族命運的關鍵時刻，有抱負的青年每天八個小時鎖在別人的公司裏，只有下班後才能勻出少許時間貢獻給民運，這實在是整個民運的損失。我們期望靠着成功的直銷企業，不但能為民運組織提供相當經費，更能創造一批自給自足還能支援別人的革命家。

註一：一般直銷企業都是不作廣告的，A公司對經銷商自行刊登的廣告也有些規定，其中就明訂不可公佈公司名稱和總裁姓名。這是因為個人刊出的廣告有時內容失之準確而可能使公司承擔法律責任。在此本人也得說明，以上介紹之內容皆為本人所瞭解範圍，一切依據應以公司所印行的正式文件為準。

凡為有心參與這項計劃的朋友們，請來電或來函：

錢達：DAVID. T. CHIEN, (415) 795-7317  
34442 SEA MIST TERRACE,  
FREMONT, CA. 94555

A公司計劃，目前只有在美國境內才能參加，而且下列九個州還未註冊，(在不久之將來必會進入該州) South Dakota, Nevada, Wisconsin, Minnesota, Iowa, North Carolina, Georgia, Kentucky, Illinois. 不過仍有其他直銷項目在全美甚至歐亞都有發售的。有興趣者，可以來電相詢，不過如果任何人有意以直銷為民運籌款，都盼望能建立徵信制度，因為民運工作實在經不起信用破產的打擊了。

### A公司的市場計劃

級別	升級和保持級別的條件	回扣和獎金(Commission & Bonus)
業務代表	沒有任何條件。	1、本人銷售一個會員證，可得\$20佣金。
市場代理	你和你的小組共銷售了5個會員證(沒有時間的限制)。	1、本人銷售一個會員證，可得\$30佣金。 2、你直接發展的業務代表，他銷售的每一個會員證，你可得\$10佣金。
市場經理	你和你的小組共銷售了10個會員證(沒有時間的限制)。 ..	1、本人銷售一個會員證，可得\$40佣金。 2、a) 你直接發展的市場代理，他及他的小組每賣一個會員證，你可拿到\$10佣金。 b) 你直接發展的業務代表，他及他的小組每賣一個會員證，你可拿到\$20佣金。
執行主管	在90天內，你和你的小組售出20個會員證，其中至少有5個是由你本人賣出的。  要保持這一級的待遇，必須每個月親自發展兩個會員，或是你的整個小組發展5名以上的會員。	1、本人銷售一個會員證，可得\$60佣金。 2、a) 你直接發展的市場經理和他的小組每賣一個會員證，你可拿到\$20佣金。 b) 你直接發展的市場代理和他的小組每賣一個會員證，你可拿到\$30佣金。 c) 你直接發展的業務代表和他的小組每賣一個會員證，你可拿到\$40佣金。 3、在你發展的各代下綫中，若有人成為執行主管，你可以抽三層執行主管，這些執行主管和他們小組每賣一個會員證，你可以拿到\$7佣金。 4、你下面所有人使用會員證的獎金，你可拿到三層執行主管及其小組每個人。 5、三層執行主管及其小組內每個人在每年談新約時，你都可以拿到\$10佣金。
最高主管	在你頭三層的下綫中必須有7個執行主管，而其中至少有3個是你親自發展的。 要保持這一級的待遇，必須每個月親自發展兩個會員，或是你整個小組發展5名以上。	所有的佣金和獎金都與執行主管相似，但是你可以拿到第四層。
總裁級主管	在你頭四層的下綫中必須有15個執行主管，其中至少有6個是你親自發展的。 要保持這一級的待遇，必須每個月親自發展一個會員，或是你整個小組發展5名以上。	所有的佣金和獎金都與執行主管相似，但是你可以拿到第五層。
終身主管	在頭五層的執行主管和他們的小組共賣出一萬個會員證。無條件終身享有回扣和獎金。	所有的佣金和獎金都與執行主管相似，但是你可拿到第六層。



# 民運組織的保密和抓特務

陳小山

世界上的政治或商業組織，幾乎都有自己的機密。民運組織由於面對中共這一強大的政治對手，更需要注意保密。同時，現有的民運組織又大都崇尚內部民主運作程序和權力制衡。民運組織的保密制度，因而需兼顧保密和維護自身的民主性質這兩方面的要求。

本文中，我們先討論民聯的現行保密制度，再討論如何劃定保密範圍，最後談一談‘抓特務’問題。

## 一、民聯的現行保密制度及其由來

在保密問題上，民聯是跌過跤的。在早期，民聯曾過份強調了保密的重要性，把許多不需要保密的事情也說成了機密。有些捐款，交來的是現金，其來源和數目只有一個人（一般是主席）知道。這個人如果貪污，誰也發現不了。

這個人即使不貪污，人們也難以確信他的清白。民聯在中國大陸的活動，往往靠單綫聯繫。這條綫上的人如果作假，其他人是很難發現的。這條綫上的人即使不作假，其他人也無法確信其誠實。

這樣的運作方式造成了盟員之間的相互猜疑，也給民聯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使盟外的人對民聯感到不摸底。一九八九年上半年內民聯發生嚴重糾紛，就與這一背景有很大關係。

有鑒於保密問題的重要性，在“四大”結束後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民聯聯委會就討論通過了《民聯暫行保密條例》。這一《保密條例》，從理論上兼顧了保密與民主原則。

民聯的《總章程》規定盟員有“保守本盟機密”的責任，對什麼是機密則未作界定。《保密條例》的第一條，將盟員的檔案材料，重要消息來源，捐款來源和民聯在中國大陸的活動列為民聯的機密。這就是說，在沒有其他依據時，以上信息材料應被假定為民聯機密。因工作或其他關係了解到這些信息材料的

盟員不需要任何人特別叮囑，便有責任避免向盟內外其他人傳佈這些情況。不盡保密責任的盟員，可受紀律處分，也可承擔法律責任。

除了第一條外，《保密條例》的其他幾條都是為沖淡民聯的神秘色彩而定的。《保密條例》第二條規定，捐款人的限制性條件，主席必須向聯盟委員會加以說明。許多捐款人提出的唯一條件，是錢必須用在中國的民主事業上。民聯是專門搞民主的，這個條件，因而是沒有限制性的。但也有些捐款人，提出的條件涉及捐款的具體用途，甚至涉及民聯內部的人事安排。帶有這類條件的捐款，按照《保密條例》第二條，主席必須經過聯盟委員會同意才能接受。這一條是為保證組織內部的和睦而設。民聯近來沒有接受限制性的捐款，《保密條例》的這一條，因而也沒有用上。

《保密條例》的第三條將盟員總數和民聯的基本財務狀況明定為非機密。在民聯早期，有人為了吸引別人入盟，故意誇大了民聯的盟員總數。這樣做，雖然短期內有些用處，從長遠看，卻是有損民聯信譽，從而對民聯有害的。公佈民聯的盟員總數，便避免了這種情況再次發生。

為了公佈財務狀況，民聯需要對自己的財務數據逐項進行核對。所以，《保密條例》的第三條在沖淡民聯秘密色彩的同時，實際上還向主席提出了搞清帳目的要求。此外，這一條也表明聯盟委員會是不認可非法逃稅的，因為公佈真實的財務狀況與在稅務上做手脚是不相容的。

《保密條例》最有意思的是第四條。這一條的條文是：‘有聯盟委員要求了解民聯機密時，主席可要求只向聯盟委員會指定的委員詳細介紹，再由指定的委員向其他聯盟委員作適當介紹。’

這一條是參照美國以及其他民主國家政府的保密制度制定的。按照《總章程》，民聯採用三權分立制。聯盟委員會作為立法機關，因而可以對主席加以制約，就像美國國會對總統加以制約那樣。

作為一個軍事大國，美國政府當然有許多機密。有些機密，如國防預算的細節，議員知道，老百姓不知道。有些機密，如對不友好國家的應急作戰計劃，國會的議長，兩黨領袖和情報委員會，國防委員會的成員知道，其他議員不知道。也有些機密，如使用核武器的密碼，國會裡只有人知道其存在，沒有人知道其細節。這樣的安排，是國會以立法確定的。有了這種立法，保密便不再與民主原則發生矛盾。

就民聯而言，原則上說，聯盟委員會可以通過議案要求主席公開一切機密。實際運作中，聯盟委員會如果對民聯負責的話，是不會這樣做的。

但聯盟委員會可以要求主席將敏感的情況向聯盟委員會指定的委員作詳細的介紹。假定指定的委員主持公正。主席如果沒做反章法的事，指定的委員可以作旁證。主席如果做了違反章法的事，指定的委員可以向聯盟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反映。這樣一來，主席不用蒙不白之冤了，但也難干違反章法的事了。再假定指定的委員能嚴守機密，則這種安排也不會導致洩密。當然，多一個人知道，洩密的可能性就多一分。但世界上有價值的東西，哪有沒有成本的呢？而且，如果一個民運組織的立法機構中連一兩個大家信得過的人都找不出來，那麼這個民運組織大約是應該散伙了。

## 二、民運組織應如何劃定保密範圍

民聯《保密條例》規定的機密，有盟員身份，消息來源，財務狀況和大陸工作。本節中，我們將進一步對盟員身份和財務狀況這兩種機密加以說明。

對盟員身份加以保密，主要是為了保護盟員及其親友，以及便利盟員發揮作用。民聯的盟員大部份在海外，但他們當中許多人有親友在中國大陸，也有人願回大陸探訪，還有人需要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在海外或大陸從事民運活動。

但隱蔽盟員身份也有其困擾。最明顯的例子是召開代表大會時代表的選舉。在一個基層選區裡，隱瞞身份的盟員只有通過民聯的基層負責人投票，而其他的盟員只有接受這些負責人介紹的情況。這樣一來，就難免出現民聯負責人在選舉中作假的問題了。

一個民運組織排除這一困擾的辦法，以筆者之見，在於明確區分兩類成員。民運組織的一般成員不允許在內部只與個別負責人聯絡。他們在行使其權利時，必須和基層組織或所屬民運組織的某些機

構直接打交道。他們對外可以隱姓埋名，但他們的正式身份組織內要有相當多的人知道。他們在從事民運活動時，應假設其身份是為外人所了解的。當然，民運組織還是應在組織內部和外部盡量隱蔽其一般成員的身份。這樣，想了解這些成員身份的外人，要費大力氣，付成本，並要承擔被揭露的風險。而且，這些成員的隱私權也是應得到尊重的。

除一般成員外，一個民運組織還可設立通訊成員。這類成員只與少數負責人或成員聯絡，身份對內對外都不公開，不交會費，在組織內也沒有任何法定的權利，包括選舉權。不給通訊成員法定的權利，是因為權利的行使與隱藏身份有沖突，而不是對這類通訊成員的判斷力或獻身精神有懷疑。由於沒有法定的權利，嚴格的講，通訊成員並不是成員。通訊成員雖然沒有法定的權利，卻可在組織的指導下從事民運活動，包括到大陸秘密探訪。一個民運組織在大陸常住的成員，應都是通訊成員。

在1990年9月召開的民陣“二大”上，曾有人提出關於通訊成員的類似設想。但是，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民運組織正式建立通訊成員制度。

財務狀況方面，現在需要絕對保密的東西已經幾乎不存在了。民聯在早期曾注意到按捐款人的意願隱蔽其身份。在民聯得以用組織的名義開帳戶以後，這個問題便自然解決了。不願暴露身份的捐款人，可以經由銀行將捐款分一筆或幾筆電匯到民聯的帳戶裡，也可買一張或幾張銀行滙票寄給民聯。

在支出方面，不宜直接由民聯出款的有《中國之春》雜誌某些不願公開身份的作者的稿費，某些敏感活動的報銷，以及給大陸活動的撥款。這幾種出款，都可以由指定的人轉帳。負責轉帳的人，須是可靠的，身份公開的，且不是控制民運支票帳的人。對轉帳的人的可靠性，民運內部可以公開討論。民運目前基本是這樣作的，但較不正式。遇到不能用支票付帳，但沒有必要保密的情況，有關負責人可以先墊上錢，再由民聯實報實銷。

這樣處理了入款和出款後，一個民運組織的帳目，包括所有的支票和銀行的報告，便可在內部的小範圍內公開了。將這東西限制在小範圍裡，同樣也只是為了增加外人了解情況的成本，而不是因為這些東西一曝光組織便要蒙受重大損失。

另一種主張財務保密的真實理由，是一個組織由於管理不善，財務混亂，有許多說不清之處，公開出來怕人笑話，更怕人追究。這個理由，同樣站不住腳。我們大家都在學習民主，難免在工作中出問題，犯錯誤。只要我們勇於改正，善於在工作過程中不

斷提高自己的水平和素質，我們的事業就有希望。

### 三、‘抓特務’問題

民聯自成立以來，屢屢出現“抓特務”的風波。在罷免王炳章在民聯的職務時，便有人提出，罷王乃是中共“擁胡(平)倒王”策略的實現。較近的一次抓特務，是自稱全美學自聯安全工作組負責人的王暉，指控民運聯委余叢和《中國之春》雜誌主編丁楚是中共特務。抓特務風波中的一些傳言，荒誕離奇得像是童話故事，但我們又不能由此證明所有的傳言都是捕風捉影。雖然民運組織迄今還沒有抓出一個特務，抓特務的風波卻損害了民運組織內部的團結與和諧，並佔去了人們大量的寶貴時間。

筆者對特務沒有特別的研究，在此只能按照常理作一些簡單分析。

一位民運人士說得好：“中共特務不是我們最大的敵人，我們最大的敵人是我們自己”。抓特務能夠引起廣泛的興趣，是因為民運的力量還不够強大，無法直接地與中共交手。抓特務可使一些民運人士感受到與中共交鋒的滿足，雖然這種交鋒也許並不存在。由這種子虛烏有中中得到滿足，當然是很沒出息的。

同樣的需求導致了對中共特務系統本領的誇大。比如說，“擁胡倒王”即使是中共的特務系統中某些人的意見，也還不一定是中共特務系統的一致意見。把中共的特務系統說成是鐵板一樣，那是太抬舉中共了。又比如有人說余叢，丁楚在罷王中如何按中共的意志積極活動。實際上，特務活動首先是情報的搜集。能夠積極影響敵對組織中事態演變的特務，在全世界都沒有幾個例子。

為了避免抓特務造成消極影響，民運組織首先要養出不為所動的習慣。對可信度很低的傳言，民運人士應能作到不予理睬。對於所涉及的具體人，民運組織應實行“無罪推定”的原則，不草率地將他們調離職務或給他們紀律處分。

同時，民運組織也不應去出據證明，說某某不是特務。“無罪推定”(Presumed innocence)不是“無罪判定”(Proven innocence)。證明一個人無罪，往往是很困難的，也往往是不必要的。此外，對“無罪推定”的原則，也不能無限延伸。一個殺人犯在被判罪前應是被推定為無罪的，但這並不妨礙司法機關將其拘留。

對可信度稍高的傳言，以及可信度很低，但實際

上造成了廣泛影響的傳言，民運組織可以指定專人進行調查。民運組織目前沒有能力成立專門的反間諜機構，進行調查的能力也很有限。所以，民運組織需要充份利用所在國的司法系統。在美國，聯邦調查局對中共特務的活動就很有興趣。民陣“二大”期間，聯邦調查局曾在《世界日報》上刊出廣告，公開徵求有關中共國家安全全部人員的信息。對於對余叢，丁楚的指控，民聯也曾與聯邦調查局取了聯繫。另一方面，被誣為中共特務的人和受到損害的組織還可以向所在國的法院控告誣陷者，要求賠償名譽損失。

概括說來，民運組織在出現特務傳言時，要判斷自己是否能查證，以及這些傳言是否能引起所在國的情報系統和法院的興趣。如果不能，民運組織便應採取“無動於衷”的態度，不再耗費自己的人力物力資源。

民運組織任重道遠，不應把大量精力消耗在特務傳言之上。為此，民運組織可考慮訂立一個規則，就是即使在抓特務的高潮中，除個別專人外，民運人士也不要再在抓特務問題上花三分之一以上的時間。開會或打電話時，大家在花一個小時討論特務問題之前，先要花上兩個小時討論大陸政局和組織運作。

事實上，民運組織即使真抓出中共特務，也不值得加額相賀，因為被抓出的特務已經造成了損失。防範中共特務更重要的原則，是防患於未然。現在，民運組織在組織方式上都是過於開放了。以民聯為例，新盟員只要有一位盟員介紹，便一定可以入盟，民聯並不對其背景加以調查。民聯的《盟員通訊》理論上說是內部刊物，但由於《盟員通訊》是發給所有盟員的，而盟員入盟時不須經過審查，《盟員通訊》的內容是任何有心人都能了解的。更嚴重的問題出在幹部任何用方面。民聯中一些接觸敏感材料的工作人員，其背景並沒有得到認真審查。否則的話，大約就不會出現某些貪污案了。

中國人往往做事好面子，有話不講在當面，有疑問也留在心裡。結果，很多事就做壞了。正確的做法是“先小人後君子”，先把來人的背景摸清楚，然後再大膽使用。要來民運組織工作的人，須把自己的身世，經歷和心路歷程一一講來，然後就每一階段的經歷提出一個旁證人，並出示自己的身份證明(護照，簽證表，畢業證書，成績單和工作證等)以及自己的作品和有關自己的新聞報導。這種公事公辦的作法需要一個習慣的過程，對民運組織的健康卻是大有好處的。

# 也談三權的分立與界定

李兆陽

當初美國人設計政府體制時，基於六大原則：(1)人民主權；(2)限制政府；(3)三權分立；(4)彼此制衡；(5)司法監督；(6)聯邦主義；而這六大原則又基於五大觀念：(1)對每個人的基本價值和尊嚴的承認；(2)人人得到平等尊重；(3)服從多數，尊重少數；(4)妥協的必要；(5)最大限度地保障個人自由。

民聯為了效法美國的民主政治，‘四大’時通過了三權分立的組織架構。自此，民聯內部的運作常常以美國政體的運作為參考。由於大家有了一個共同的參照物，在實際運作中會減少很多的分歧，但這並不意味着毫無分歧。有些分歧不僅是來自大家對某一事情的看法不同。而且也由於對美國或西方民主政治運作理解上的差別。例如，讀了民聯聯委陳小山第九十期中國之春上所發表的一篇文章，現願把自己一些不同的看法表達出來，供大家討論，批評與指教。

## 有關權力的界定

美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部門的權力基本上都在憲法中明文界定了，因此，可以說憲法是最權威的，儘管這並不一定說憲法是永遠絕對正確的。事實上美國的憲法也一直在不斷地修訂。除了一些憲法明文規定的權力外，也有一些未明文規定的權力或彈性權力。如美國憲法第一章第八節第十八條規定：國會‘為了行使所有憲法賦與的權力，有權制定所有需要和適當的法律……’但這一條的註釋中卻解釋：‘本條例亦被稱為彈性條例(Elastic Clause)，本條所謂的“需要”不是“絕對需要”的意思，而是“適當”的意思……’這就使國會在行使這一彈性權力的時候不得不顧及行政和司法部門的態度和權力了。例如，如果國會以多數而非三分之二議員通過一個總統認為不妥的法案，總統可以否決。最高法院有解釋憲法的權力，若認為行政或國會的某一行為違憲，可廢除這一違憲的行政命令或法

案。由此可見，界定一些彈性權力的最終權力乃屬司法部門。

憲法的這種安排是很技巧的，這為三權分立的彼此制衡提供了發揮的契機。如果說作為立法部門的國會不僅有立法權而且還有解釋憲法的權力的話，那麼國會就有可能把這一彈性權力無限擴張，其結果是值得憂慮的。同時，憲法的這種安排也出於歷史發展的需要，因為當初的立憲者不可能預見未來所有的事情，那麼就只有把未來新出現的事情留給後代了，但後代又不得不按着已設立的憲法為基礎去處理新事情。

現在來談民聯內部的權力界定。翻開民聯總章程，除了章程規定‘三機構成員不得互兼’和最後一句講本盟總章程‘解釋權歸監察委員會’以及三章第十二、十五及十六條外，幾乎沒有對民聯行政、聯委會和監委會等作出多麼具體的權力界定。如果按前面所談美國人解釋憲法的觀點的話，那麼民聯三個部門沒有在章程中明文規定的權力都應歸納為‘彈性權力’。這些彈性權力的界定，則因不同的部門和不同的人而不同。如果認真地要求每個部門，總章說了的才能做，那麼民聯的三個部門幾乎沒多少事可做了；如果說是總章未禁止的都可做，那麼民聯的三個部門就有可能因權力的衝突而碰得頭破血流。民聯所以至今仍能運作正常，乃因大家並未嚴格地按上面的兩個教條運作，而是各自按着別人運作的常識而運作，按着美國三權分立的精神去運作。

不過民聯的三權分立架構畢竟不可能與美國政府的三權分立一一對號，因為二者各自的功能與權力範圍差別太大了。民聯實行三權分立的體制，絕非機械地照搬美國政府三權分立的架構，而是藉類似的體制學其制衡的精神。這應是我們的初衷。由於我們是學習別人體制的精神，那麼對這種精神的不同理解就有可能導致民聯內部運作上的分歧。近日來民聯監委會與聯委會之間就有涉及行政之權限

的分歧。事實這也是民聯內部權力界定不明所造成的。權限既然未明文界定，應屬彈性權力，監委會行使總章所賦與的權力，參考美國三權分立的精神，可作出多數監委會認為最合常理的界定。

### 立法權廣泛性的界定

陳小山委員在其‘民運組織內部的權力界定’一文開始的摘要中談到：‘立法機構只受章程和主席否決權的制衡，除此之外，再也沒有什麼可以限制它的行爲了。只要章程沒有明文禁止的，它都可以去管。’對此，筆者有不同看法。

所謂的立法機構若是指美國的國會，那麼這個立法機構不僅受憲法和總統否決權的制衡，而且還受司法部門憲法解釋權的制衡，司法部門藉着這一權力，必要時可以宣佈國會或行政部的某項法令違憲因而無效。這是衆人皆知的一個事實，因此，上面的第一句立論是站不住腳的。而第二句只對一部份，因為它還受司法部門制衡。

至於英國國會，其權力雖在理論上是幾乎無限的，‘國會可做任何事，除了造男造女外’，但在實際運作中，英國內閣與國會（一般是指下議院）幾乎是完全合併的。由於多數內閣大員來自下議院的多數黨，所以事實上是內閣下轄下議院這個主要立法機構，而絕大部份議案都是內閣提出並且能在下議院順利通過。因此，從實權的角度講，英國內閣的行政權幾乎是無限的，而下議院立法機構幾乎全由內閣控制，如同內閣的一個工具。

至於民聯的聯委會，總章幾乎未對其權力作多少明文界定，而只是規定聯委會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為最高立法機構，注意這‘最高’一詞是形容詞的最高級形式，是與其它的立法機構（若存在的話）相比較的，而不是與行政或監委會比較，因為三者的功能不同，也不能比較。如果這樣分析的話，聯委會甚至不受章程的制衡。更何況章程連主席的否決權也沒有明文界定。然而，聯委會卻承認主席有否決權。總章明文禁止三機構成員互兼及主席任職超過兩屆，除此之外，再無什麼明文禁止的條例。如果說：‘只要章程沒有明文禁止的，它（指立法機構）都可以去管’，而這一原則也適於總部和監委會的話，那麼三個部門在按這一原則運作時就會發生許多的權力碰撞。因為每個部門都可以此原則去擴張自己的權力範圍。昔日筆者曾聽王炳章多次強調這一原則，當時無人提出異議，但現在我卻不敢苟同。現在我發現這一原則是一些有心擴權和企圖鑽章程洞子

的人或部門的最好理論根據。因此，這一原則應當加以修正。單對民聯來講，‘只要章程沒有明文禁止和監委會沒宣佈違章，它都可以去管’，這樣似乎比較恰當。這也適用於總部。事實上，‘四大’以來的民聯各部門基本上都是在大家對總章精神理解的共識上進行運作的。雖然總章沒很具體地明文界定各部門的權限，但大家基本上都能根據西方民主政治運作的常理來判斷各個部門是幹什麼的。當大家對總章程未明文界定的彈性權力有分歧時，那麼只有找監委會藉着總章賦與的解釋權威來界定有爭議的權力範圍，確保組織繼續正常運作。

美國當初的立憲者之所以把憲法的解釋權賦與司法部門，除了司法部門執法的需要外，大概是因司法部門在三個部門中是最為獨立的，其權力幾乎不可能涉及到行政和立法機構的日常事務運作，故與後兩者極少發生磨擦。反觀行政與立法機構之間，其權力互相涉及就相當廣泛，故二者間的磨擦也多。如果憲法的解釋權歸立法機構，那麼美國國會的權力才真有可能是無限的了，其結果可能是國會的專權。根據上面的論述，雖然美國立法機構的權力是廣泛的，但廣泛到多大範圍？總要有個界限啊？誰能拿出一個絕對正確的標準範圍而令大家都接受呢？大概沒有一個人能夠。那麼我們沒有一個共同的權力範圍標準，是不是我們就無法運作了呢？不是。我認為大概可以這樣界定：由於廣泛性的權力往往是指一些彈性權力，那麼彈性權力的廣泛性（即範圍）也應是彈性的，而不是固定的；在一個民主政體裡，任何一個部門大概可把自己的彈性權力範圍擴展到不招致司法部門的干涉為止。如同有人界定一個人應有的自由範圍一樣，‘一個人大概可任意揮舞自己的拳頭到不打到別人的鼻梁為止’。

事實上，民聯聯委會的權力已是很廣泛的了。‘四大’以來，聯委會已通過了幾十條法案，其中許多都是涉及行政權的，並沒人認真提出異議。前些時候，聯委會通過了一項完全屬於行政權範圍的法案，監委會接到上訴後多數委員認為此案有違三權分立之體制精神，並提出異議。儘管監委會的決議的正確與否有時只在一票之間，但我們服從多數人的表決。從上面的事實來看，監委會並沒有認為也沒有裁決所有聯委會通過有關涉及行政權的議案都是違背三權分立之精神的，更沒有把法學理解得那麼窄。因此，這裡監委會的立場不是在乎立法議案對行政權涉及與否的問題，而是在乎涉及多深多廣多大範圍多大程度的問題，這是關鍵問題。因為無界限無制衡的廣泛則會變成無窮大。

# 戈爾巴喬夫回到一九一八？



馬怡陽

隨着政權癱瘓、社會解體和大饑荒將臨，戈爾巴喬夫正在推出鐵腕政策，下令組織工人治安委員會和糾察隊，重施列寧在十月革命時的作法。

## 大饑荒為革命催生

十一月二十八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向記者們講了一個笑話，以描述他和國家所面臨的難處。他說：‘密特朗總統的一百個女友中，有一個愛滋病患者，但不知是誰？布什總統的一百名保鏢中，有一個恐怖份子，但不知是誰？戈爾巴喬夫的一百名經濟顧問中，有一個是濟世奇才，但不知是誰？’

戈爾巴喬夫八五年上台以來，所從事的世紀性的政治改革成功地結束了蘇聯和東歐共產專制時代。然而當改革的步履從政治轉向經濟，欲使用革命和專政建立起來的公有制和平過渡為市場經濟和私有制時，他的‘新思維’正遭遇着數不清的難題。入冬以來，整個蘇聯經濟已處在崩潰的邊緣，莫斯科、列寧格勒等數十個城市，已陷入戰爭圍困般的饑餓大恐慌之中。革命暴亂甚至戰爭的陰影，正籠罩着俄羅斯大地，籠罩着這個一年前尚聲威顯赫的世界超級大國。

俄國皇后亞歷山德拉曾說：‘俄國沒有革命，那只是一群姑娘和小伙子在街上亂跑，喊着沒有麵包了。’而今，麵包與革命的問題又一次困擾着後共產時代的蘇聯。

一個總產值僅次於美國的、擁有近千枚人造衛星和萬多枚核彈的現代化超級大國，一個土地面積佔地表七分之一，農業土地使用面積達六百萬平方公里（約為中國面積的三分之二）的文明國度，在風調雨順的農產豐收年裡，突然出現了一場罕見的大

饑荒，就好像是天方夜譚，令人難於理解。然而，熟悉蘇俄歷史者便會知道，這是一次人為的大饑荒，一次由政治變動造成的政治饑荒。

在蘇維埃俄國七十三年歷史上的，人為的政治性饑荒舉其大者，計有兩次。

## 饑荒造成革命政權的殘酷性

第一次發生在十月革命後的第二個冬天——一九一八年。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開始按共產主義教條實施國有化政策。同時由列寧制定了著名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即在城市裡強迫工人每週增加一天的無償勞動；在農村，無償強行征用農民的糧食。

由於長期的戰亂和政權的更迭，自一九一五年五月起，莫斯科等大城市已出現糧食短缺。布爾什維克革命是一次城市暴動，在佔人口比例百分之八十的農村，革命政權的影響力尚未觸及。於是，列寧發動了一場‘農村階級鬥爭’，派工人下鄉組織農民鬥爭‘富農’，而凡有餘糧可以被征收者皆為富農。這導致富裕些的農民大批逃亡，投入白衛武裝。

一九一八年冬，饑荒日益嚴重。布爾什維克遂決定施行‘糧食專政’，組織了一支五萬餘人的‘征糧軍’，配備車皮和來福槍，下鄉征糧（搶糧）。在城市，被稱為‘契卡’的便衣武裝也被組織起來，打擊倒賣糧食的商人。契卡後來發展成著名的克格勃。

然而，征糧軍、契卡加上按人頭配糧雖然保住了紅色政權，卻使整個農村的經濟遭到嚴重破壞。逃荒的農民充滿了城市，成群結隊的兒童四處流浪乞討，餓殍遍野。一九一九年，蘇維埃政權頒佈農業集體化法律，要求農民將私人財產充公，終於引起一九

二〇年的伏爾加河農民大暴動，到了一九二一年春，饑荒發展到頂點，數百萬城鄉人民因饑餓而死，整個國家的人口總數下降。

此時，蘇維埃政權卻已獲得鞏固。列寧當即宣佈結束‘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施行比較寬鬆的新經濟政策，鼓勵生產，鼓勵人口生育。經濟與社會秩序都因而有所好轉。可是到了一九二八年，斯大林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時，農村的經濟又因為強制合作化而再次崩潰，引起另一次人為的大饑荒。

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和新經濟政策時期中建立的集體農莊，在蘇維埃政策略為放鬆時由二二〇〇〇多個下降到一四〇〇〇左右。而第一個五年計劃卻要求農村擴大合作化程度。在斯大林的要求下，共產黨迅速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莊。一九二九年，集體農莊農民人口迅速由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八，躍升到百分之五十八。然而，與此同時，糧食產量卻因為農民的抵抗而大幅下降，終於引起大饑荒。

面對農民對公有制的抵抗，斯大林採取了鐵腕打擊的政策，凡拒絕加入集體農莊者均被視為‘反動的富農’，被強迫遷往邊遠地區。受到這項政策打擊最重的地方是烏克蘭和里海南端的格魯基亞等共和國。五百多萬農民被強行遷往烏拉爾。因此，到了一九三七年，蘇聯終於完成了徹底的農業合作化（百分之九十三），並由於工業化的成功，在集體農莊的大平原上，廣泛使用拖拉機，康拜因等農業機械化生產。

### 歷史大輪迴：戈比師法列寧

七十三年後，列寧所締造的紅色帝國在即將崩解時，正在驚人地重復着沙皇俄國覆滅時出現的種種現象。俄國的歷史，好像又回到一九一八年。而試圖瓦解紅色帝國的戈爾巴喬夫，當面對相同的歷史危機時，正不知不覺地拾起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當年的遺鉢。

十二月一日，一向以改革拒絕暴力著稱，試圖在俄國建立民主憲政的戈爾巴喬夫總統，突然宣佈一項群眾專政式的緊急法令：下令成立‘工人治安委員會’，組織‘工人糾察隊’，檢查監督食品業和農產品的運輸，嚴厲打擊投機倒把和盜竊糧食的不法社會集團，以此對付日益嚴重的饑荒。

按照總統的法令，蘇聯將在全國範圍內組織‘工人治安委員會’，委員由工礦企業的工人選擇產生。政府授予該會非常的權力，可以決定關閉不法企業和公司，更換有問題的負責人，解散不法機構。

戈爾巴喬夫的這項‘鐵腕政策’的直接構思，來自於莫斯科一些社區工人的自發行動。就在戈爾巴喬夫頒佈這項法令前一週，《共青团真理報》刊登了一封‘群眾來信’。莫斯科某社區的居民和工人，已經組織了‘街道糾察隊’，在區內的商店巡邏，檢查商店的冰庫，處罰囤集食物者和黑市倒賣商人。目前，大城市裡的食物倒賣和黑市十分猖獗，一些國營食品店的經理們，將國家統配的食品，轉售給黑市，以牟取暴利。

### 軍方與克格勃鷹派崛起

與此同時，蘇聯克格勃方面也同時宣佈成立‘特別單位’協助市民對付嚴重的經濟混亂和不法份子的破壞。十二月二日，為加強對付經濟混亂和打擊犯罪，戈爾巴喬夫迅速作出兩項人事更迭決定。（一）由前克格勃負責人甫格替換巴卡丁出任內政部長；（二）任命軍方實力人物葛羅莫夫將軍為第一副總理。

戈爾巴喬夫三日內的一系列緊急措施，強烈表明這位溫和的改革領導人準備以鐵腕對付蘇聯的危機。一年來保持低姿態的軍方和克格勃鷹派正在崛起，集結在戈爾巴喬夫的周圍。葛羅莫夫是阿富汗戰爭時的蘇軍少壯派指揮官，現年四十六歲，在結束阿國戰爭的過程中，贏得公眾的尊敬。他在接受任命前是基輔軍區司令。盛傳他主張強力對付分離主義，並最有實力和可能策動軍事政變。

克格勃鷹派甫格一年來一直擔任黨中央反腐化委員會負責人，在打擊黑市，清理警方腐化中頗有能力。他是波羅地海拉脫維亞人，八五年前是那裡的共產黨主管。

自今年夏季蘇共二十八大會後，一方面戈爾巴喬夫徹底削弱了黨的傳統控制力，擊敗里加喬夫為首的強大保守派，將權力核心由政治局轉移到總統內閣；但另一方面，由於葉立欽為首的民主派和各加盟國議會不斷逼迫，戈氏的新的權力體制根本無法確立。

蘇聯在權力混亂中風雨飄搖。政治經濟危機四起。結果，形勢迫使戈爾巴喬夫不得不趨於保守，回頭依靠軍方和克格勃的支持。

即使最激進的俄羅斯共和國總統葉立欽，也無法否認戈爾巴喬夫在推動改革，只是改革的速度不及社會的要求。戈爾巴喬夫十月底提出了經濟改革方案，接受了激進的五百日方案的原則，即變計劃經濟為私有制市場經濟，但沒有接受五百日的時間期

限。

十一月十七日，戈爾巴喬夫又提出了最新政府建制改革案，改國名為‘主權蘇維埃共和國聯盟’，去掉‘社會主義’，給予各加盟共和國最大的自治權，中央政府僅保留了國防，外交權以及對銀行，能源等經濟命脈的調協。但仍然被葉立欽代表的激進派拒絕。後者要求組織包括非共產黨人士在內的中央政府。

在蘇聯保守與激進勢力圍繞戈爾巴喬夫製造兩難局面，在集權與分權，急進與緩進中僵持不下的近半年時間裡，蘇聯社會則迅速陷入動蕩和解體，國家的權威正在崩潰。而在社會大崩潰中，食品的匱乏正在造成大饑荒的恐怖。

在這樣的時局下，突然間一切爭論都戛然而止了。秩序和麵包成了超越一切的首要問題。對戈爾巴喬夫而言，他所能採取的應急措施只有兩條，一是動用軍隊和警察全國軍管；二是拾起布爾什維克的發家法寶——群眾專政。

### 人為饑荒社會處在動亂邊緣

蘇聯的糧荒如前述並非由糧食本身所引起。今年亞洲大陸風調雨順，中國、蘇聯、印度的農業都獲得多年難得的豐收。此番蘇聯人為的糧荒，概述之，由下述各方面因素引起。

——社會秩序崩潰，黑市猖獗，商人倒買倒賣。儘管國營食品店貨架空空，自由市場上的各類食品卻出現七十年來從未見過的富足。只是價格比國營的高出五至十倍。

——各加盟共和國拒絕中共統籌計劃，烏克蘭與中亞產糧區不向俄羅斯大城市供應糧食和肉類。各加盟國互相之間也設立關稅，派地方警察在鐵路，公路運輸中檢查。各地分離主義者希望藉此方式壓迫中共政府以獲得獨立。

——官僚系統不滿改革，有意製造混亂，出現中國大陸式的‘官倒’現象，使全國糧食分配體系幾乎停止運行。國營商店的食品都從後門賣給了黑市集團和中間商，以牟取暴利。

上述情況與一九一八年列寧建立布爾什維克政權時的情形大同小異。蘇聯在今年冬天很可能出現饑荒，軍事政變，政府功能解體，建立群眾專政等災難性後果。屆時整個世界的局勢均將受到不穩定的波及。

十一月二十八日，美國白宮發言人根據多方面獲得的情報指出，蘇聯目前根本不存在糧食短缺，問

題在於糧食分配系統的癱瘓，黑市集團的倒賣和官僚機制的無效率。儘管如此，為了換取蘇聯對美國伊拉克軍事行動的支持，華盛頓還是採取緊急措施向蘇聯空運食品。德國為答謝戈爾巴喬夫對兩德統一的促進，更是義不容辭，早在十一月中旬便從漢堡向列寧格勒運送了糧食。捷克、波蘭等東歐國家也向蘇聯運送大批小麥。

### 人民自治武裝將野火燎原

儘管如此，戈爾巴喬夫似乎正在利用這一機會擴大總統權力，建立新的權威主義政治，以保障向市場經濟過渡和結束共產主義的社會轉型。十一月二十九日，戈爾巴喬夫授與國防部長雅佐夫‘緊急自衛權’。雅氏當晚電視中宣佈，軍隊已進入自衛戒備狀態。任何企圖對軍隊進行攻擊的行動，都將受到軍方的武力還擊。

然而，最危險的一步棋是‘工人治安委員會’的建立。按照總統法令，工人委員會將在十天之內迅速建立。戈爾巴喬夫並命令警方和克格勃協助這一臨時群眾權力機構。顯然，這一機構的權限範圍，將大過國家正規的、正常的治安機構。

戈爾巴喬夫採取此項行動說明，目前蘇聯現存的治安系統已喪失對社會的控制力。據蘇聯報紙報導，一方面，警方和克格勃由於過去曾作為專政監督人民的工具，在人民間已無公信力；另一方面，警方官僚系統已喪失能力，並且廣泛地捲入社會不法行為，收取賄賂、勾結黑社會集團分贓枉法。這迫使戈爾巴喬夫退回到列寧時代，試圖建立群眾專政，渡過眼前的危機。

群眾專政是共產主義革命以至一切革命的特徵。歷史證明，群眾專政的方式具有不受控制性和暴力傾向兩大要害。如果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走上這一歧途，蘇聯的未來將可能陷入流血革命和軍事統治。一九一七年列寧的十月革命，一八九三年法國大革命，七十年代中國的‘文革’，都給各自的民族，以至整個人類留下最血腥，最野蠻的紀錄。

目前蘇聯全國各類群眾自治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四處滋生。罷工的礦工組織糾察隊；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則組織武裝民兵投入種族紛爭。莫爾達維亞的俄羅斯人組織自衛隊與羅馬尼亞裔分離主義者對抗，而列寧格勒市民則組織街道自衛隊對抗搶劫、偷竊等犯罪集團。蘇聯正在陷入一場新的人民自治，群眾專政。戈爾巴喬夫會成為九十年代的列寧嗎？那將是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最大的悲劇。



# 莫斯科：人們在悼念沙皇

楊漫克



革命不需要歷史學家。

—列寧

## 人民樹起十字架追悼沙皇

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推動的社會大變革，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方面，便是重新解釋歷史，重新認識俄國。在對革命歷史的大懺悔中，一個與共產黨政權等身的歷史之謎，便是俄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之死。

七十二年後的今天，他的靈魂正在向世人鳴冤控訴，在當代人的心靈中造成新的震撼，使整個俄國重新思考自己的過去，自己的民族性與文化價值。誇張地說，尼古拉二世之被處死，對日後的布爾什維克政權以及風靡世界的共產運動，有着不可割裂的內在聯繫和影響。它是共產主義由‘人類最美好的理想’走向殘酷與滅絕人性的第一個祭壇。

尼古拉二世，全名尼古拉·阿列克山德濟維奇·羅曼諾夫，生於一八六八年，一八九四年繼承俄國皇位，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六日，被列寧建立的布爾什維克政權秘密處決。與他一道被處死的還有皇后、四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家庭醫生、以及三個僕人。

今年蘇聯十月革命七十二週年紀念日後，蘇聯報紙在反省歷史的一系列文章中，第一次公開證實，處死沙皇的決定，是當時的黨和政權的領袖列寧親自做出的。

儘管西方史家一直有這種猜測，在過去七十二年中，蘇聯的所有歷史書籍都否認處死沙皇是革命導師的命令，而是因為暴動的白衛軍迫近沙皇的流放地——葉卡捷琳堡，當地蘇維埃遂決定處死沙皇。

儘管尼古拉二世被革命的布爾什維克斥之為‘吸血鬼’，‘暴君’，但他的死，多年來一直是蘇聯官方內心的一大隱痛。筆者今年二月在莫斯科通往布達佩斯的火車上，與一群蘇聯學生談及此事時，驚奇地發現，蘇聯青年對此事件幾乎一無所知。他們不知道沙皇是怎樣被處死的，在什麼地方被處死的。當我談到沙皇全家皆被處死時，他們驚訝地不能言語，因為學校的歷史教科書上，從來沒提過這些事。

在蘇聯官方的歷史鐵幕面前，蘇聯人的確無法了解這一段不光彩的歷史。不像列寧死後建造碩大的殿堂，沙皇尼古拉全家的遺體被‘契卡’（秘密警察）滅迹，連沙皇死亡的地點——葉卡捷琳堡（以女皇葉卡捷琳命名）也被革命政權更名為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斯維爾德洛夫為俄共領袖之一，曾任蘇維埃中央執委會主席，一九一九年逝世後，以其命名該城）。

不久之前，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尼古拉被處死的地方，當地人民和教皇為沙皇樹起了一塊樺木十字架。又過了幾天，一群工人將木十字架換成鐵十字架。這座烏拉爾山麓下的流放城市，與首都莫斯科遙距九百英哩，一夜之間名聲大起。尼古拉的十字架前，也成為人民節日祈禱和政治集會的場所。

今年夏天，斯市市議會做出決定，在尼古拉二世遇難現場興建一座教堂，同時設有一座展覽廳和大會堂，以供朝聖者和遊客使用。

該市的大主教日前對慕名而來的外國記者稱，‘尼古拉二世早晚要被人民視為殉難的聖人，這只是時間問題。’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 ‘嗜血尼古拉’——改革皇帝

被布爾什維克稱為‘血腥的尼古拉’的沙皇，事實上是一個優柔寡斷、充滿人情味、有心改革而又對帝國沒落無力回天的悲劇式末代皇帝。

他二十六歲繼承王位（一八九四年），娶德國公主，英女皇維多利亞的孫女為皇后，生有四女一子。沙皇和皇后情意甚篤，對子女進行斯巴達式教育，從小讓他們睡木板床，不許用枕，不許偏食，以求再振皇室。

但沙皇本人卻寡斷無能，他早期統治完全受制於德皇威廉二世，比他長九歲的表兄。沙皇向亞洲，尤其是中國滿洲的擴張，完全是威廉的指使，後者希望俄國把精力放到亞洲，而德國便可稱霸歐洲。結果沙皇在西亞與土耳其衝突，在南亞與英國衝突，在東亞與日本衝突，國力大衰，特別是滿洲一役敗於日本，導發了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至此，尼古拉二世終於認識到威廉二世這位表兄代表的德國利益與俄國利益的不相吻合，開始怨恨威廉，日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遂對德宣戰。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流血星期日’，是俄國近代史的轉折點。當時十二萬工人在神父蓋邦帶領下在彼德堡冬宮前向沙皇請願。結果軍隊開槍鎮壓，死一千餘人，傷兩千餘人。群眾把全部的憤怒發泄在沙皇身上，卻不知沙皇不僅沒有下令開槍，而且當時本人根本不在彼得堡。但整個國內外輿論都一概指責尼古拉的殘暴。

事後沙皇的謀士維基建議沙皇公開真像，告訴

人民他並沒有下令讓士兵開槍，調軍隊進城也是大臣梅爾斯基的安排，這樣便可重建沙皇的威信，平息政局。但老實的沙皇不願意讓忠於自己的軍隊和大臣代他受過，決定召見請願的工人代表。但已不能平息民憤。

在尼古拉絕望無助時，他的母親費德羅夫娜向他推薦老臣維基。‘我確信目前唯一可以助你渡過難關的人是維基。’在沙皇的重用下，維基指出有兩條路可供選擇：一是軍管獨裁，二是制憲召開杜馬（議會）。維基本人和彼得堡軍總司令大公爵尼古拉耶維奇均贊同制憲。

一九〇五年十月三十日沙皇下詔‘帝國宣言’，使俄國從絕對的專制君主制轉變為君主立憲制，召開國民議會。然而革命又在莫斯科如火如荼地展開了。儘管一九〇六年俄國歷史上第一屆杜馬誕生，但並沒能緩解革命危機。

第一屆杜馬不到一年便夭折了。沙皇看到維基這個天才根本不濟事，終於讓他辭職了事。一九〇七年六月，沙皇下令解散國家杜馬，逮捕社會民主工黨的杜馬黨團，開始了他自做主張的統治時期。俄國的議會民主道路終於沒有能夠走通。

另一件反映沙皇性格的事情是所謂沙皇在西歐大批存款一說。世界大戰前，沙皇確在倫敦和柏林有一筆存款。但戰爭時期尼古拉將幾乎全部的國外存款提出，給了醫院。皇后本人也多次去醫院看護傷員。到戰爭結束後，柏林銀行的沙皇存款只有一千五百美金。此事說明沙皇的性格和故事確有許多予人誤解之處。

### 德皇引發布爾什維克的殺機

沙皇尼古拉二世遇難時，正是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和內戰的時刻。不像法國大革命時的路易十六，是由國民大會公審定罪後送上斷頭台，沙皇是由列寧秘令，由秘密警察處死，秘密滅屍，秘密埋葬。顯然，布爾什維克與雅各賓黨人相比，缺少自信而且虛偽。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期，一九一七年俄歷二月，俄國戰爭失利，民生困若，爆發二月革命。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克倫斯基組成資產階級議會政府，將沙皇全家秘密送往西伯利亞的托波爾斯克，為安全的理由，派遣了一支三百人的衛隊保護退位的沙皇。沙皇全家在那裡生活了八個月。

根據克倫斯基在《謀殺》一書中的回憶，當時打算在一九一八年春，將沙皇全家送往國外，首先的目

的地是日本，然後再轉往美洲或歐洲。保皇黨人也曾試圖營救沙皇，但苦於沒有經費。尼古拉二世還堅持全家同行，以及兩名貼身男僕、六名女僕、七名廚師、一名管家、一名調酒師、一名護士、一名理髮師、一名賬房、十名差役和兩隻宮庭狗。

然而，克倫斯基政府很快便垮台了。布爾什維克接管政權。起初，列寧等人並沒有對身在西伯利亞的退位沙皇產生什麼興趣。一個意外的事件終於使布爾什維克懂得沙皇的重要性。

為鞏固奪取的政權，列寧提出‘結束帝國主義戰爭’的口號，不惜割讓波蘭、烏克蘭、克里米亞和波羅地海沿岸，以求德國停戰。不料德皇威廉二世看不起布爾什維克，提出要求說‘布列斯特和約’要沙皇尼古拉二世簽字，才吻合德皇的身份。這樣，布爾什維克立刻懂得了，退位的沙皇只要活着，就對他們構成潛在的威脅。

於是，蘇維埃執行主席斯維爾德洛夫立刻派遣人民委員（相當於國會議員）霍可夫列夫前往托波爾斯克，接管克倫斯基政府的衛隊。

雅可夫列夫於一九一八年四月，身携電報收發機和一百五十名騎兵前往。當時全國叛亂，托波爾斯克並不是忠於蘇維埃的地區。於是，斯維爾德洛夫命令雅可夫列夫將沙皇全家轉移到葉卡捷琳堡。那裡是他過去經營的地方，布爾什維克政權很穩固。

沙皇的生命存在具有不可替代的象徵意義，這從德國對沙皇的態度即可證實。布列斯特和約簽定後，德國一直想重新扶植沙皇復辟取代布爾什維克政權。列寧公然宣稱世界革命論，威脅到德皇的統治。

當年德國駐俄大使梅爾巴赫要求布爾什維克將沙皇押回莫斯科，以免不測。斯維爾德洛夫只好一口答應，派雅可夫列夫辦理此事。但另一方面，又偷樑換柱地暗中指使烏拉爾的紅軍截持沙皇的火車。結果雅可夫列夫押送沙皇繞路返回莫斯科時，烏拉爾蘇維埃便做戲地指稱他私通白衛軍，企圖協助沙皇逃跑。雅可夫列夫莫名其妙地成了叛徒。沙皇終於被押往葉卡捷琳堡。斯維爾德洛夫對德使梅爾巴赫稱，他的中央蘇維埃沒有權威命令烏拉爾蘇維埃將沙皇送回莫斯科。梅爾巴赫對此亦無計可施。

### 滅絕人性野蠻至極的處決

沙皇被押往葉卡捷琳堡，惡運便已注定，兩個多月後便被秘密處決。有關沙皇遇難的細節有各種不

同版本的說法。較為可靠的當是美國學者羅伯特·馬竭在‘尼古拉與亞歷山德拉’一書中根據衛兵等目擊者回憶錄、斯大林女兒回憶錄以及沙皇小兒子阿列克謝的家庭教師、瑞士人吉拉爾德的回憶錄所做的綜述。

六月十六日零晨，守衛沙皇的契卡頭子尤洛夫斯基叫醒沙皇全家，謊稱白衛軍已迫近此地，必須連夜轉移至安全地帶。他命令沙皇全家在地下室集合。準備就緒後，尤洛夫斯基帶領十幾名槍手衝進地下室，迅速向宣佈：‘你的部下正在逼近要營救你，所以我們現在受命槍決你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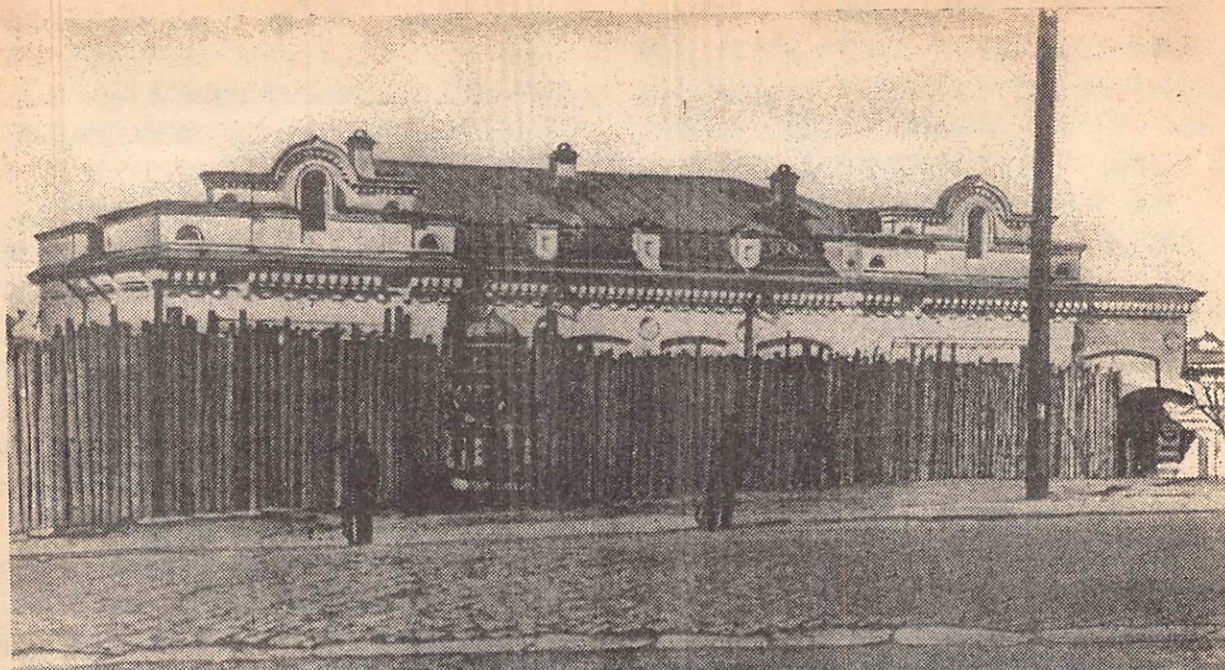
尼古拉二世當時坐在椅子上，一手扶着患病的兒子阿列克謝。他見狀一邊問‘什麼？’一邊站起來試圖用身體保護兒子和皇后，但他的話沒出口，尤洛夫斯基的手槍便響了，準確擊中沙皇的頭部。隨後，其它契卡也一起向沙皇的家屬開槍。皇后在尼古拉倒下之後，剛剛用右手劃了個十字，也中彈倒下。沙皇的女兒奧爾佳，塔蒂婭娜，馬麗婭站在母親身後，在亂槍之下也先後倒下。

一陣槍聲後，地下室內突然安靜下來，硝煙中，阿列克謝仍然沒有死，他伸手去抓父親的大衣，一名契卡發現，上前用馬靴亂踢阿列克謝的頭部，尤洛夫斯基並對準阿列克謝的耳部，補射兩彈。據回憶，沙皇的小女兒安娜斯塔西婭由於突然暈厥，起初並未中彈，當一個契卡踩到她的身體時，她恢復知覺，發出一聲尖叫。於是所有的契卡圍了上來，用刺刀將她刺死。

另據一名自衛軍將領的回憶錄描述，尤洛夫斯基在處決沙皇之前，曾殘酷折磨他，用滾水燙尼古拉二世的雙手，然後像脫手套那樣，將沙皇雙手的皮膚剝落。但根據家庭教師吉拉爾德的回憶，尤洛夫斯基是一個很有教養的人，一直在表面很尊重沙皇，在事發前不久被派往葉卡捷琳堡，接替當地的工人守衛。

吉拉爾德回憶，開始的守衛均為當地的工人，每日酗酒並粗暴地稱沙皇為‘吸血鬼’。但六月四日，來了一隊訓練有素的契卡，共十人，其中五人是匈牙利裔，以前為奧匈帝國戰俘，受契卡僱傭執行俄國人不可靠的任務。為首者尤洛夫斯基是修錶匠出身，教養良好，彬彬有禮，還稱沙皇為‘陛下’。但尼古拉開始意識到，他的生命已經不久了。尤洛夫斯基是地道的俄羅斯人，但後來廣為流傳他是一名猶太人，因為沙皇的排猶政策一直懷恨圖報，終於革命爆發，他參加契卡，並要求執行處死沙皇的任務。

沙皇被處死後，契卡們用麻布包裹了所有屍體，



沙皇一家被殺的地方——葉卡捷琳堡。

趁黎明之前用卡車運往一座廢礦井，那裡長着四棵大松樹，當地人稱‘四兄弟’。尤洛夫斯基和手下用斧頭和鋸將屍體大卸八塊，再用硫酸腐蝕。然後，他們將屍塊澆上汽油焚燒後，再把遺骸丟進廢礦井的積水中。

滅屍工作延續了三天。據參與者，烏拉爾蘇維埃代表沃依柯夫回憶，他親自去鎮上買的汽油和硫酸，‘滅屍工作進行得十分徹底，全世界將無法知道沙皇的遺體到哪裡去了。’沃依柯夫後來任蘇聯駐波蘭大使，曾私下向友人透露了這段往事。

沙皇被處死後第八天，白衛軍便佔領了葉卡捷琳堡。一群軍官沖進關押沙皇的樓房，除了沙皇的一條愛犬‘喬伊’外，什麼也沒找見。但地下室的牆壁雖被處理過，仍然可見許多彈痕殘留。那裡顯然發生過一場屠殺。

尋找沙皇遺體的工作一直沒有頭緒。直到半年後，一九一九年一月，西伯利亞白衛軍領袖科爾恰克將軍派遣了一名受過專業訓練的調查員索科洛夫，在沙皇家庭教師吉拉爾德的陪同下，終於發現了‘四兄弟’滅屍現場。綫索是草地裡的鑽石首飾。沙皇全家被流放時，沒有什麼財產，只有皇后和她的女兒們把大批手飾帶在身上，據估計價值五十萬美元。由於尤洛夫斯基的人員用斧頭分屍，女屍身上的鑽石手飾被砸碎，彈到附近的草叢中。硫酸和汽油燃燒都沒能將金屬和鑽石首飾消滅。

在礦井裡，沙皇全家的遺骨也被發現，上面還有

斧頭和鋸痕，為硫酸腐蝕後依然可見。此外，還有彈頭，沙皇的皮帶扣子，御醫波特金的金屬眼鏡和金屬假牙等。

### 列寧親自下令種下暴政

處死沙皇是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最慘絕人寰的一頁。儘管蘇聯官方一直將沙皇稱為‘血腥的尼古拉’，辯稱這一行為是‘保衛紅色政權的革命需要’，但當事的蘇維埃中央和烏拉爾蘇維埃都不願意承擔劊子手的惡名。特別是蘇聯官方數十年來一直否認處死沙皇是革命導師列寧的決定。

蘇聯馬列主義研究院副院長米切得洛夫前不久辯稱，‘列寧根本不知道這碼子事。根據蘇共記述的列寧活動日誌，沒有證據說明列寧與沙皇之死有任何關係。這份日誌記下列寧每小時甚至每分鐘的活動。’根據官方說法，是烏拉爾當地蘇維埃因為自衛軍的進攻迫在眉睫，遂自行決定處決了沙皇全家。

然而，蘇聯著名劇作家拉金斯基，在多年警犬般地追蹤此一歷史問題後，終於在今年十月革命七十二週年之際，發表了他的發現。拉金斯基的主要綫索，是列寧生前的貼身衛士阿列克謝·阿西莫夫的回憶。

據阿西莫夫回憶，他當年曾親自將列寧簽字的處決令，送往發報室，發給看守沙皇的契卡，然後將電文帶回。他被告知嚴守秘密。這份電文除列寧

外，還有斯維爾德洛夫的簽字。這些材料的披露，終於證實托洛斯基回憶錄的記述，是列寧親自下令處決的沙皇。

根據許多當事人的憶述，處決沙皇的確不是一個長期預謀，而是一個臨時的，迫不得已的決定。根據托洛茨基的回憶，布爾什維克在奪取政權之後和自衛軍進攻蘇區之前這段時間裡，對如何處置退位的沙皇一直存在兩種不同的意見，以斯維爾德洛夫為代表的一派主張從快處決沙皇，因為他在與德皇威廉二世和德使梅爾巴赫的交涉中，清楚地明白德國有意重新扶植沙皇復位。列寧本身傾向於斯維爾德洛夫的意見。

以托洛茨基為代表的另一派則主張開設‘人民法庭’公審沙皇，從而也就等於而保全了沙皇的身家性命。托洛茨基並將公審日期訂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底，而由他本人做為起訴者。在十月革命前列寧逃往國外，托洛茨基在國內堅持鬥爭，曾被尼古拉二世逮捕入獄。

此外，烏拉爾蘇維埃將沙皇操在他們手中，也傾向於就地處決，但他們尚不像斯維爾德洛夫對德使梅爾巴赫所言，膽敢擅自決定沙皇的命運，而是每日通過電報，直接向中央詳細報告沙皇的情況。

為了如何處置沙皇，烏拉爾蘇維埃還專門派遣了一名代表果洛什奇金到莫斯科去，了解中央意圖。果氏在流亡國外時曾與列寧在一起，與斯維爾德洛夫也私交甚篤。但托洛茨基告訴他，不能私自處決沙皇，而要公開審判。

最終決定沙皇噩運的因素，是白衛軍和捷克叛亂軍團的進攻。四萬五千人的捷克軍團原系戰俘，由克倫斯基政府重新武裝，鎮守西伯利亞邊區。十月革命後捷軍叛亂，開始由西伯利亞向西挺進回國。葉卡捷琳堡是他們的必經之地。當果洛什奇金返回烏拉爾時，白衛軍的槍聲已依稀可聞。

莫斯科電詢烏拉爾，葉卡捷琳堡還能守衛幾天？得到回答是最多三天。這時已是六月十二日。於是莫斯科同意了烏拉爾蘇維埃的意見，以最快的速度處決沙皇全家，而且要不留痕迹。

### 廢黜帝制對歷史的惡性影響

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處死，標誌着一場更大規模屠殺的開始。一年以後，布爾什維克為洗刷罪責，逮捕了二十八個政敵——社會革命黨人，並將他們送上法庭公審，其中五人被槍決。他們的罪名是‘謀殺沙皇以圖給布爾什維克抹黑和製造困境’。

在沙皇被處決後，一大批皇族成員也先後被處決。其中包括：沙皇的弟弟大公爵麥可爾，皇后的妹妹女大公爵伊麗莎白，大公爵康斯坦丁的三個公子，大公爵保爾之子。一九一九年，包括大公爵保爾（沙皇的叔叔）和沙俄時代最著名的歷史學家米克海洛維奇在內的四位大公爵最後一批被處死。

這裡有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蘇聯紅色文學家高爾基，與米克海洛維奇是朋友，他曾前去向列寧求情，放過米克海洛維奇，因為他是大歷史學家。結果列寧的回答是：‘革命不需要歷史學家。’

在蘇聯官方欽定的影片‘列寧在一九一八年’中，高爾基要求列寧放過知識份子時，列寧曾有一段著名論述。他對高爾基稱：‘當兩個人打架的時候，你怎麼知道哪一拳必要，哪一拳不必要。’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策略正是這樣，寧可矯枉過正，而無視人道和生命的價值。

托洛茨基在回憶錄中對處死沙皇有一段真確的描述：‘處死沙皇全家不僅要戰勝、瓦解敵人和讓敵人恐怖，而且是為着重新塑造我們的立場，（俄國）不能再有復辟的機會。擺在前面的是徹底的勝利或徹底的毀滅，列寧對此最有心悟。’殺皇死后不久，皇黨的人便刺殺列寧，使之幾乎喪命。

殘酷的鬥爭方式使布爾什維克們染上了恐怖症，終於自相殘殺起來。列寧在去世前受到嚴重打擊已經離開權利核心。托洛茨基，布哈林皆被斯大林整肅。基洛夫，日丹諾夫先後不明不白地死亡。推翻沙皇專制的革命，導致了比‘恐怖伊凡’更恐怖的紅色專制。

處死沙皇開了布爾什維克日後殘暴與專制的先例。除此之外，我們從沙皇與王室的廢止，也可以感到現代社會的民主革命的結局，受到君主存廢的決定性影響。無論在歐洲還是亞洲，君主制是資本主義時代前的社會基本結構。二百年來，保存君主制的國家有英國和日本，那裡的社會轉型相對十分平穩。德國在保存君主制階段（一八七〇年至戰前）也頗為平穩，廢了君主制後便產生了希特勒。

而在法國、俄國和中國，廢黜君主制後無不經歷激烈的內戰，殘酷的暴力，復辟和新的專制。法國產生了拿破崙，俄國和中國陷入共產主義專制。

法國大革命時代雅各賓黨人領袖羅伯斯庇爾有句名言：‘我們要打倒君主專制，非建立共和的專制不可。’如果從肉體上消滅了暴君，便能一拳建立共和或民主的話，那麼‘沒有一個君主是不該被絞死的。’（拿破崙語）。然而，歷史的經驗卻恰好相反。這正是本文要表明的一項歷史律。

# 釣魚台： 日本世紀的 絆腳石

平可夫

公元1990年10月22日，日本‘朝日’、‘讀賣’、‘每日’三大報紙同時報導了21日在釣魚島海域所發生的日本侵犯中華民國領土主權之行徑。值得注意的是，三大報系均以‘偶發事件’為題，並強調‘進入’我國（指日本）海域之台灣漁船，在海上保安廳巡邏艇之‘勸導’下，已‘退離’釣魚島附近海域。顯然，日本人力圖淡化此事。她使人回想起半個世紀以前的‘張作霖事件’及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它們均被日本人稱作所謂的‘偶發事件’。然而熟知日本國情之士對日本人辦事的精細程度均留有深刻的印象。戰爭結束迄今已四十多年了。在此次釣魚島‘偶發事件’之背後，還伴隨有一系列發人深省的事：對歷史教科書的竄改、軍事預算突破GNP的1%、眾議院議員石原慎太郎的‘自省發言’、出兵波斯灣的計劃……均表明冷戰結束後的日本正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不同角度修正自己在亞洲及世界上所處的位置。

## 一、冷戰結束後日本 外交的‘新思維’

一國外交的地位取決於其政治的、經濟的、技術的、軍事的綜合國力的強弱。在冷戰時代，一國強大的象徵為，擁有遼闊的土地，衆多的人口，豐富的自然資源，更重要的是所持有的核彈頭的多少。然而，這樣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國家的霸權一度曾取決於軍事力量的強弱。然而，今日卻換之以經濟力為決定因素。進而言之，決定經濟能力強弱的又基於技術開發能力的大小，從這一意義上來衡量日本今日之繁榮的話，日本可



謂已成為十分強大的國家’——（牧野昇三菱綜合研究所會長）

的確，經過戰後四十多年的休養生息，日本已經成為GNP名列第二位的世界經濟超級大國，而且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家。同時，幾乎在所有新技術領域向世界頭號技術大國——美國提出公然的挑戰（a）日本大大領先的技術——尖端材料、超導電、生態遙測器、數控圖像；（b）日本略領先的技術——尖端半導體素子、高精度數字記憶裝置、高性能電子計算機、傳感器、光電子學；（c）日美相當——人工智能、軟體CIM。時代發生了巨變，日本學者開始對日本現存的社會學、政治學理論進行‘反省’。諸如：建立在抗衡‘蘇聯威脅’基礎上的日美‘安保’體制在冷戰結束後的今天，是否需要修正？一個在經濟上已經給世界帶來巨大影響的國家，是否應該在政治、文化等其他領域‘承擔一定的國際責任’？經濟上的巨大成功是否應對原有的文化意識形態（西方的文明勝過東方）重新評價？‘反省’上述問題的首要條件是‘讓國民克服戰敗國的非合理心態’。那麼是否應對‘戰爭責任’問題作出新的認識？基於這一點，是否應該重新考慮與亞洲各國的新的‘親善’關係？

顯然，日本正作着‘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準備。10月19日，‘朝日新聞’公佈了外務省發表的1990年外交白皮書，這樣寫道：‘我國過去的外交方針是以“先進民主國家的一員”及“亞洲太平洋區域的一國”這一雙重身份展開運作的。我國基於自己的判斷，（今後）肩負國際使命的時代已經到來。在憲法允許的範圍內，對世界作出人力（物力）的貢獻將是一個大的（新的）課題。’不言而喻，日本的政治、外交方針即將發生劃時代的轉變。

## 二、控制亞洲

1986年7月戈爾巴喬夫的烏拉爾斯圖克演說是蘇聯表明願意結束亞洲地區冷戰狀態的重要標誌之一。對於日本而言，‘北方威脅’似乎快寫入歷史了。日本人開始轉移其注意力，六·四事件的發生，使其‘轉移’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戰後四十多年來日本國防的視點始終注意在北方，現在看來應該好好研究一下中國(共)了’，日本的蘇聯問題專家、防衛廳中國問題研究者均向作者表達過上述觀點。另一方面，反美情緒大大升級，“會說No的日本人”一書(石原慎太郎)在日本成為best seller。‘日美安保條約’這一長期被日本人視之為‘內政問題’的所謂日美關係的‘基石’被政客、學者們一再以‘新的政治學’加以‘檢討’。整個局勢酷似二次大戰前的亞洲，即，對日本的‘威脅’不是北方(蘇聯)，而是西部與南邊(中國(共)、美國)。這便是日本外交‘新思維’所得出的結論。“欲征服世界，必須先征服亞洲，欲征服亞洲，必須先征服支那”。日本在戰略上，仍以前輩為榜樣，只是戰術上的所為有所不同而已。新的‘大東亞聖戰’終於爆發了。這一次日本以‘虛、實結合’為指導思想，務實一八千億日圓的貸款，從經濟上徹底擊潰(控制)中共，務虛一以強大的軍備為其後盾，威懾整個亞洲。技術的高度發達，早已使日本成為了亞洲頭號的軍事強國。1987年，國防預算正式突破GNP的1%，高達四兆日圓，名列世界第六。(中國為第十八位。)日本擁有十八萬兵力，及包括類似美國宙盾級導彈巡洋艦(排水量7200噸)在內的各類水面艦艇58艘，裝備新型探測聲納的國產潛艇14艘，各種作戰飛機(以F-15, F4EJ型最現代化機種為主力)850架。新的擴軍還在加速進行，今年6月19日、27日的《朝日新聞》分別登載了外務省佐藤情報調查局長及防衛廳所發表的關於‘國際情勢之認識’的發言。二者均強調國際形勢的‘不穩定性’，及通過新的龐大國防預算之必要。除北方四島問題之外，中國(共)首次與這種‘不穩定性’聯繫起來。為配合以上兩大‘虛實攻勢’，日本在其文化領域也開闢了新的‘戰線’。為了讓國民克服戰敗國的‘非正常心態’，文化人開始對四十多年前所發動的那場戰爭的實質作‘新的反省’。

日本與德國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悲劇製造者，然而，戰後兩國對‘戰爭責任’的認識卻迥然不同。西德首屆阿登納政府多次在各種場合就納粹德國的戰爭罪行向全體受害國人民道歉，並履行了賠款義務。剛統一後的新德國總理科爾在其就任宣言

中，也再次提醒德國人民牢記德國過去所犯下的錯誤，決不要重蹈舊轍。然而，日本人卻從未向深受其害的亞洲各國人民作過類似的反省。僅僅是就“不愉快的過去”“深表遺憾”，偶爾再發表兩句“希望不要再有那樣的不幸”之類的昭和天皇御言。文化人從另一種意義上卻從未停止過所謂的‘反省’。歸納起來，其‘反省’大致可分為四類：(1)‘結果有益’論，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亞洲戰場有別於歐洲，是一場亞洲人民反抗白種人侵略的戰爭。戰後，東南亞各國相繼能獨立，是日本間接支援的結果。(2)‘罪大功小’論，是第一種認識論的派生產物，認為雖有罪，但也有功。(3)‘雙方有責’論，傳統的日本武士道精神信奉‘勝者為王，敗者為賊’的弱肉強食邏輯，認為勝利者之所以能勝，是因為失敗者太弱，所以勝利者的功勞(或曰責任)不只是取決於自身，敗者也有其功(過)。(4)‘戰爭時效’論，認為戰爭具有時間效應，45年過去了，戰爭已失‘時效’，應該消失於人們記憶之中。另一方面，對於在同一次世界大戰中加害於日本人民的長崎、廣島原子彈慘案，日本人卻異口同聲地加以譴責，似乎用不着什麼‘罪大功小’之類的反省，而且每年都紀念其死難者，來不失‘時效’。

## 三、抗衡美國

今日‘大東亞聖戰’的大敵之一仍然是美國。日美經濟摩擦的逐年升級，使日美對抗已經擴大到文化領域。‘文化摩擦’已成為日、美兩國政府交涉的又一大難題。問題的實質是：日美關係的‘再構築’，不過是日本向美國爭奪自由世界領導權的‘宣戰書’罷了。在這方面，眾議院議員石原慎太郎毫不掩飾自己的觀點。他在《關於民族主義》一文中這樣寫道：“不可否認的是，今日世界只提一個南北問題就够畸型的了，校正她的這一偉大工程，歷史性地賦與了日本人，日本人以其卓越的高效率當然地享有這樣的資格”。為了享有未來自由世界領袖的資格，日美政治、經濟、文化關係的‘總決算’首先從文化領域開始。“日本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程度的經濟成就，一大原因取決於單一民族—日本人的教育水平比美國黑人，哥斯達尼加少數民族的受教育程度高得多”(1987年，中曾根首相)。以索尼公司會長為首的日本財政、經濟界頭面人物相繼發言，攻擊美國、歐洲共同體各國針對日本的市場保護政策為人種偏見的具體表現；另一方面，卻把戰後中華民國、韓國取得的經濟成就視為日本人長期統治的結果。東京外語

大學教授中鳴嶺雄在其所著《21世紀·日本·台灣·韓國的世界》一書中這樣認為：日本、中華民國、韓國的經濟成就乃相同的儒教文化背景之作用。而未來世界新文明將更離不開其深遠的影響。持類似觀點的文化人還認為，英國的沒落原因在於把人劃分成等級，而美國的衰亡在於階級、人種之差別。只有在日本，單一的民族，有秩序的社會結構（年功序列制度和終身雇佣制的有效運用）使日本人永遠持有進取的精神。更有人認為：本世紀出現於白種人社會的獨裁體制和極端的個人主義思潮來源於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河合隼雄等人所著《我們這樣解釋‘日本’》這樣寫道“舊約神話認定以神為中心的至高至善的存在，能支配萬物，‘惡’不可能產生。而日本《古事記》神話卻認為善惡的判斷並非重要，（舊約神話的解釋）其缺點在於極其容易與‘一黨獨裁’相混淆”。諸如此類的觀點，許多是戰前日本右翼文化人所言之翻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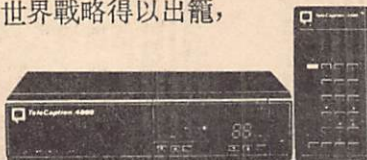
與美國人爭奪自由世界政治領袖的觸角，首先伸向亞洲。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以其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為後盾，在全球範圍內毫無顧慮地推行其世界戰略，然而，韓戰、越戰的失敗及經濟狀況的每況愈下，到了七十年代便不得不再修正自己的全球戰略，由打‘兩個半戰爭’的理論（即同時與兩個共產國家作戰的同時，還可以應付一場區域性的低烈度衝突）到應付‘一個半戰爭’的戰略性轉變，即是美中（共）關係修好的前提。九十年代美蘇關係的根本性緩和，使布什政府的新世界戰略得以出籠，

這便是‘低烈度戰爭論’的提出，即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已徹底消失，但美國也必須對付諸如在阿拉伯、亞洲等地發生的區域性衝突。然而，美國早已今非昔比，為削減龐大的財政預算赤字，從海外撤軍的呼聲日漸升高，亞洲已快成為力量的‘真空’地帶。在美國的要求下，日、韓兩國將分擔更多的防務費用。中曾根前內閣提出‘一千海里海上防衛線’計劃，及日本防衛廳對‘北西太平洋以外的亞太地區安全保障政策的再檢討’便是日本力圖取代美國，填補亞洲‘力量真空’的具體步驟。

日本在亞洲經濟領域的動向更值得注意，繼中曾根提出‘亞洲經濟協力圈’構想受到亞洲四小龍的冷遇之後，最近，通產省正在考慮提出所謂‘環日本海經濟發展戰略’新構想，計劃以新瀉為日本第二首都，修建大型國際空港（修建中），擴大發行日、韓、蘇三國合資企業的股票，聯合開發西伯利亞，把日本海變成‘古代愛琴海文明之再現’。實際運作雖困難，但日本正把經濟注意力轉向北方（蘇聯），整個亞洲經濟體系已被西方世界視為‘日圓區’，是不可忽視的事實。

綜合上述，日本的目標是明確的，即力圖從政治、經濟等領域控制亞洲，並以之為本錢與美國、歐洲抗衡。為達到此目的，在不同領域與亞洲各國及美國發生‘摩擦’，早在日本人預料之中。釣魚島事件不過是日本邁向二十一世紀世界大國之路所必然碰到的一小塊絆腳石而已。

TV READERS



英文電視字幕機4000型

看電視讀英文！您可知道很多電視節目和錄影帶有台詞和解說詞的隱形字幕？美國國家字幕研究所(NCI)研制的電視字幕解碼機能使您在每天看電視的同時練習快速閱讀英文的能力，非常有利于您在北美的生存，學習和就業競爭。美周400多小時電視節目兼播字幕。2000余種加制字幕的錄影帶已上市。本字幕機遙控全部電視功能，可將廉價的手動電視變為全自動遙控。

原價179美元，學生優惠170-20(rebate)=150美元，買兩台以上每台165-20(rebate)=145美元。免稅！美國大陸各州免費郵寄。六點后電話(612)-649-0256，或請寄支票至：

20  
REBATE

TV READERS, P.O. BOX 13562 MPLS, MN 55414



# 亞細亞民主楷模的危機

—— 巴基斯坦大選述評

曾馳遼

## 世界三大女強人之一——布托的悲劇

今年八月，借助中東伊拉克危機的‘新聞屏障’，巴基斯坦總統古拉姆·伊薩克動用憲法緊急權，在軍方支持下，廢黜了民選總理貝娜齊爾·布托，並指控她濫權、腐化，開庭審判以便使布托女士不得參加大選。

十月底，儘管布托在法律的支持下終於參與大選，但在新聞媒體受到控制的情況下，未能及時挽回名譽，不幸敗北。然而，這一事件卻被世界輿論稱之為‘憲法外衣下的軍事政變’。巴基斯坦的民主憲政和法治的尊嚴，正面臨着嚴峻的挑戰。貝娜齊爾·布托，這位當今世界三大女性政治強人之一（另為英國的撒切爾首相和菲律賓的科拉桑·艾奎諾總統），似乎正面對她父親十多年前所遭遇的悲劇。

貝娜齊爾的父親左爾菲卡·阿里·布托是巴基斯坦民主化的重要建樹者。他於一九六七年組建‘人民黨’。一九七一年當選為總統，一九七三年當選為總理。在東西巴分裂戰爭時，布托曾做為駐聯合國代表，其政治表現享譽國際。一九七七年第一次全民大選中，布托的人民黨大獲全勝，然而，代表穆斯林部落貴族勢力的軍方首領齊亞·哈克兩月後發動政變，在全國施行軍管。

七九年，齊亞控告布托於七四年謀殺一位反對派領袖，宣佈判處布托死刑，受到國際社會的一致譴責。八八年齊亞因軍機失事而亡，貝娜齊爾·布托繼承父業，領導人民黨贏得第二次全民大選，就任總理。

## 第三世界民主楷模面對危機

做為英國的百年殖民地，同印度一樣，巴基斯坦是第三世界國家中，最先實行議會政治的國家，堪稱‘第三世界民主楷模’。早在一九〇六年，著名伊斯蘭政治家真納便組建了東亞次大陸第一個現代政黨

‘穆斯林團’。一九四六年，穆斯林團在獨立之際，與印度分裂，建立‘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

由於伊斯蘭宗教政治化的影響，巴基斯坦的民主化四十多年來歷經坎坷，風雨飄搖。此次布托被黜，便是一次明顯的歷史大倒退。無獨有偶，鄰邦印度的總理辛格，也幾乎是在同時下野。辛格因挑戰傳統等級制度和保護少數宗教的激進改革，而遭致議會的不信任投票。東亞次大陸兩國的殖民地民主，在九〇年代世界民主大潮下暗流激湧，傳統與現代化猛烈衝突，向全世界提供了一個值得注意的歷史文化範例。

對於一個極度蔑視女權的穆斯林國家而言，布托做為總理，本身便已具有革命性意義。在二十個月的執政過程中，她已經顯示了同其父親齊名的政治智慧，去年秋天，她成功地克服了議會的不信任投票。但軍方的政治宿敵卻一直強有力地擠壓着她的政治空間。

巴基斯坦是一個民族、宗教衝突不斷的國度，克什米爾危機多年難解，導致印巴邊界衝突，外交危機不斷。人民黨政治基地辛德邦的種族衝突也方興未艾，使布托面對嚴峻的選擇。加之阿富汗在巴境內的游擊基地和難民營的救濟問題，一年多來，布托處理得皆十分妥當，贏得國內外的好評。

結果，總統古拉姆卻以貪污和濫權控告總理布托。總統古拉姆在齊亞哈克時代，是軍方的傀儡議長，哈克墮機身亡後，在軍方支持下成為總統接替者。因此，這一行動似乎是復歸軍人當政的先兆。在獨立後的四十三年間，軍人專權佔了一半以上的歷史。

巴基斯坦政治氣候的變遷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惡評。過去為遏止蘇聯勢力在阿富汗的擴張，美國與中國一直是該國的軍事與財政支持者。華盛頓每年向巴國提供六億美元的軍事援助，亦容忍齊亞·哈克的反民主政府。

中國與巴基斯坦的近密關係，一方面由於遏止

蘇俄勢力的需要，另一方面則因為與印度的長期邊界衝突，借巴基斯坦以為地緣政治的箝制。國際輿論推測巴基斯坦發展核武器研制，乃是從中國購買的原料與技術。印度與巴基斯坦在八十年代相競研制核武器，使該地區的穩定受到嚴重威脅。

### 英國的獨立法系，東方式的政治干預

古拉姆總統動用憲法權力罷黜總理，受到軍方支持的少數黨‘伊斯蘭民主聯盟’組織看守政府，宣佈緊急狀態，開設特別法庭審查布托的控罪。這些‘憲法政變’的根據，則源於齊亞·哈克時代對憲法的更動。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整政敵的特別法庭，卻是左爾菲卡·布托的首先發明，由齊亞青出於藍的。

巴基斯坦的法院系統源起於英國法系。包括四大高等法院，即全國四省各設一處。特別政治法庭為老布托所創，結果軍事強人齊亞利用特別法庭絞死他的發明者。八八年布托女士上台後，極力反對特別法庭，要為其父親翻案，但卻沒有意思撤消特別法庭，結果再一次輪到自己頭上。

在審理布托總理的過程中，法官下令不許記者出席布托律師的答辯，明顯地傾向於控方。同時屬於政府的報紙和電視廣播，也一邊倒地報導布托的‘貪污’罪狀，是為造成布托十月底大選失敗的主要原因。然而，軍方動用法律程序禁止布托七年不得參與選舉的企圖，卻未能得逞。

獨立後四十多年間，由於傳統勢力的強大和軍人不斷干政，巴基斯坦的民主政治結構一直沒有機會獲得發展或成熟，法律系統尤其如此。各政黨特別是布托的人民黨不斷抗爭，卻無力戰勝傳統勢力和軍方。人們說巴基斯坦有兩個真假政府，在中央，軍方是背後的真政府，在地方，大土地所有者是真政府，他們的規矩就是地方的法律。

### 磅澤普對辛德資本家取代貴族勢力

十月二十五日全國大選結果，伊斯蘭民主聯盟躍居議會第一大黨，獲得總數二一七席的一〇五席，其同盟各黨共得五十席。布托的人民黨敗得很慘，只獲得四十五席，尚不及八八年贏得大選時的一半。在人口最多的磅澤普省，人民黨敗得最慘。

伊斯蘭民主聯盟的領袖沙利夫，是磅澤普的著

名實業家和政治領袖，長期在省內經營，使人民基本生活獲得大幅改善。這次大選，他成為最大的獲勝者，成為巴基斯坦的第一位來自磅澤普的總理。

歷史上，巴基斯坦的貴族和政客多集中在北部的辛德省，貴族世家很多。布托和齊亞哈克即出身辛德省。布托被黜後看守總理賈托伊亦來自辛德，他力圖挑戰沙利夫的總理職位，卻未得要領。

研究東亞次大陸的學者認為，沙利夫的成功是



布托女士投票時沒想到會敗給沙利夫。

傳統勢力無意間的一次失敗。沙利夫是一位現代工業家，代表着新興大資產階級利益。而辛德省的貴族世家過去一直把持着中央政府的局面被打破，是一次重要的歷史進步。

做為人口最多的省份磅澤普，近十年來在全國日益佔居主導地位，是為這項政治改變的主要原因。巴基斯坦的報紙評論稱，沙利夫有錢，卻沒有辛德省政客的那種領袖魅力。他顯得更加平民化，現代化。他的政府官僚氣也許少一些，至少不是傳統勢力型的官僚大樹。

現年四十二歲的沙利夫在磅澤普大學獲得法學位，父親是巴基斯坦最富有的資本家，擁有鋼鐵廠、糖廠、紡織廠和醫院，年收入四億五千多萬美元。沙利夫本人做過律師，企業家，軍隊下級軍官和省長，政治才幹不惡。

在十月大選中，沙利夫領導伊斯蘭民主聯盟面對布托的‘同情攻勢’，嚴密籌劃，制定了成功的大選策略，以二比一優勢擊敗人民黨，沙利夫的策略是：迅速兌現中央政府的承諾。布托政府上台後答應地方政府一筆建設基金，但二十個月仍未兌現。沙利夫利用看守政府的機會，迅速把錢撥給各省，大獲信譽。

另外，沙利夫利用巴基斯坦人的民族情緒，將布托的長處變成短處，指布托不忠於國人，與美國國會

議員和印度政治領袖有着過往甚密的個人友誼。在八九年，沙利夫便就磅澤普省的中央基金分配一事向布托政府挑戰，迅速從一個地方官員變成全國級的政治人物。

### 家族政治日益趨於末落

布托的失敗，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布托父女在巴基斯坦推行現代化時，仍然依賴傳統社會結構的運轉。老布托在巴基斯坦施行的，實際上是權威主義統治，他也曾依賴軍方加強自己的權力基礎。

而布托女士繼承了父親的政治遺產後，沒有進行絲毫的政治結構的改變，而是繼續家族化的政治經營。她仍然依靠着自己家族在保守的辛德省的世襲政治基礎，而不是擴大這一基礎。她與磅澤普省省長沙利夫的對立，反映了貴族傳統勢力與大資本勢力競爭政治空間。

家族化政黨在東南亞國家至今仍為主要的政治傳統方式。北韓、台灣、新加坡、菲律賓、印度、巴基斯坦，家族政治發揮着巨大的政治穩定作用，同時也

造成與現代議會政治不可避免的沖突。

參加此次大選的齊亞·哈克之子烏爾·哈克稱，在印度次大陸，家族政治塑形了幾乎所有國家的現實，而只有在掃盲率達到百分之五十的時候，家族政治才有可能被徹底改變。哈克將軍生前亦說，在巴基斯坦，沉默的大多數沒有自己的政治代表，只能接受政客們的選舉，任其擺佈。小哈克今次正式出面從政。他的職業是銀行家。

今年秋天發生在巴基斯坦和印度（辛格政府也在十月垮台）的政治危機，錯綜複雜，新舊勢力相持不下。但基本上，表現為傳統勢力的回潮，與九十年代整個世界的民主潮流很不諧調。

巴基斯坦與印度，由於英國的百多年殖民地統治，戰後獨立以來，一直延襲了英國的社會，法律制度，堪稱第三世界的民主楷模。但是，印、巴的特別實驗讓世人看到，即使有百多年英國的統治，西式民主制度，仍然無法在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國家裡正常運轉。‘殖民地民主’（劉曉波語）的脆弱性，在印巴今秋的政治危機中充份顯現，值得有心人士給予特別的注意和研究。



貝嶺

所有的都被籠罩着  
我們出生的不幸  
已烙在種族的臉上  
像陽光一樣垂落的  
是無比單調而又重複的  
乞憐於語言，而又喪失了語言的日子

我們從未受洗  
卻寄身於一個蒙主偏愛的國度  
從美命名的頹麗國度  
僅僅是由於敵意的存在  
而被供養着

就像年輪一樣  
不斷地、不倦地與記憶作戰  
與我們降生的籍貫作戰  
展示在浩大的光陽裡  
死亡和不朽、生和息  
展示在龐大的帝國裡  
那片屬於我們的  
孤獨的意識形態保留地





## 公安部

# 〈11·23行動報告〉

少君

引子

一九八九年十月，中共的政治局開會，在對趙紫陽問題處理上爭論了四個多小時無結果後，由李瑞環提出整頓社會治安，掃黃、掃毒、挽回民心的提議。這一為掩飾六四大屠殺的血雨腥風，同時乘機抓捕異己份子的‘高招’很快形成政治局決議。

1989年11月13日，以北京為中心，電波傳向全國，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王芳在中共國務院召開的電話會議上下達命令：在全大陸範圍內迅速行動，掃除‘六害’！

這一代號為‘11·13緊急行動’的大規模抓捕，實際上也是為‘六四’之後搜捕被通緝的天安門廣場學運領袖製造機會。果不其然，大批民運人士在這個期間紛紛被捕，王丹、王軍濤、陳子明、劉剛……僅半個月內，各地上逮捕人數為：

北京：10964名，

天津：2675名，

廣東：16000多名，

河北：6500多名，

湖南：39900多名，

在大批民運人士被捕的同時，中共也乘機掃蕩了各地黃色、賭博和吸毒的隊伍。90年1月，公安部政治部編出《11·13行動報告》的內參材料發給中共各部委省市、自治區及各大軍區，以示功績。但由於其中問題多令人心悸，有損社會主義的形象，故該材料列為‘秘密’級，僅供局以上幹部參閱，並限期交回。本文即根據這一材料寫成，它能使我們在海外的中國人對今天大陸的諸多問題有一個比較客觀的認識。

自王芳發佈命令後一個月內，共查處‘六害’案件14萬多起；查處違法犯法犯罪人員35萬多人，其中依法逮捕2500多人，處決了一批罪大惡極者；送勞動教養2200多人；給予治安處罰25.8萬多人；正在審查7.4萬餘人。

近些年來，人們驚異地發現，在中國大陸諸種社會醜惡現象又迅速蔓延開來，賣淫、嫖娼泛濫，淫穢物品在廣泛傳播，賭博，封建迷信活動瀰漫着城市、鄉村的各個角落，吸毒、販毒又死灰復燃，拐賣婦女兒童的犯罪活動頻頻發生。

### 一、黃流滾滾

書是益智冶性的良友。然而，一個時期內，人們竟相借閱的書籍無一不是帶色的，一部《查太集夫人的情人》，曾全國風行，個體書販竟把它賣到40多元一本。

近幾年來，大陸出版業在改革中實行，自負盈虧，推出了以書養書的模式。而淫穢書刊正是賺大錢的出版物，於是乎，上至中央級、省級出版社，下至地方小報個體書販，印刷廠，都在爭相出版淫穢書刊。在國外曾因色情太過被禁的《情場賭徒》、《玫瑰夢》、《老船長的情婦》、《風流偵探》等等，不知真假地被翻譯出版，而國內的‘土特產’也被一些文人騷客花樣翻新，《性交姿勢100種》、《性交大全》等紛紛出

籠。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金瓶梅》的清本(刪節本),以供研究參閱,但某出版社卻出了一本《潘金蓮與西門慶》,把人民文學出版社刪掉的淫穢情節,統統搜集在一起,美其名曰:‘拾遺補缺。’據某權威部門統計,大陸已發現嚴重色情的淫穢書籍達六十多種。

出版界爲了錢,哪管它庸俗低級,只要賣得出去,就敢出版,美其名曰市場導向。在人們擁有了錄相機之後,淫穢錄相帶則又繼淫穢書籍成了熱門貨。人們熱誠推出的‘石獅模式’,‘溫州模式’,曾激動着無數人的心弦。但是,權威部門的統計報告又指出:石獅、溫州是中國淫穢物品最主要的集散黑市和黃色錄像帶的主要複製傳播源。據有關人士估算,石獅市有1/10的人口在從事着複製、販賣淫穢物品的活動,而溫州也有5%的人在從事這一行當。從1988年6月以來,石獅市複製的非法錄像帶每日流散於全國各地的達1萬多盒,在全國收繳的淫穢物品中,從石獅流出的佔1/3,從溫州流出的佔1/10。

石獅市個體戶蔡某,開始做服裝生意,賺了一筆錢。後來看到複製錄像帶賺錢更多,便果斷地購進12台錄像設備,從事淫穢錄像帶的複製行當。最高時,他一天即錄製了1700多盤錄像帶。他手下有一個複製組,共有6人,有一個叫賣組,共有18人。叫賣組的成員大都是不滿18歲的未成年人,用蔡某的話說:‘未成年人販賣淫穢像帶被抓獲後,法律可以從寬處理。’更爲惡劣的是,蔡某在沒有淫穢錄像帶可供翻製的時候,他還專門僱用了暗娼來表演,進行錄製。據蔡某稱,僅其僱用的暗娼表演的錄像帶,就達80餘盤,複製後獲利18萬餘元。他每次付給暗娼5000元勞務費,使得許多暗娼樂意爲他服務。

在溫州,複製淫穢錄像帶者不像石獅那樣公開;它大多來自於地下‘文化市場’。個體戶王某,在商場租了櫃台,做鞋帽生意,然而,做鞋帽生意他不在行,接連虧了4萬多元。經朋友串綫,他得到了一批淫穢錄像帶,先是私下販賣,不久即開始複製。有老婆的幫忙,從1987年8月開始,到1989年8月,共非法複製錄像帶1.1萬多盤,其中淫穢錄像帶3200多盤。他售出的錄像帶,一般的和武打功夫類的,一盤20元左右,而淫穢錄像帶,他最高的賣到65元,低者也不下30元。

石獅、溫州的不少複製錄像帶的賣主都配備了BB機,對講機,摩托車,備有長期包租的出租汽車,還有保鏢、偵探(專門防備公安機關、工商幹部的突襲檢查)。他們手段狡猾,設備先進,即使被發現錢索,往往難以抓住賣主。

## 二、淫慾橫流

賣淫、嫖娼,這一早在50年代就被大陸政府掃蕩殆盡的社會公害,在30年後卻死灰復燃。由點到面,日益蔓延。

廣州中國大酒店,中國最豪華的酒店之一。這裡每層樓的三號客房,都住有娼妓,來這裡投宿的男客,不時可以接到一個個做‘生意’的電話。成交之後,3號客房便熱鬧起來。這些暗娼的最低價碼是100元人民幣,有時搭上境外人員,其價碼倍增。在此安身的暗娼王某,身材苗條,看上去是典型的東方溫柔型女子,而她僅通過賣淫向境外人員索得金項鍊就達240條。

廣東省東莞市虎門鎮某賓館,擁有南北兩幢樓和酒店一處,長期住在這裡的暗娼多達30餘人。這些暗娼來自湖南、廣西、四川、上海、瀋陽、黑龍江、湖北省、貴州等地,年齡大都在20歲左右,她們有的由‘皮條客’帶來,有的在本地請了保鏢,包房長住,每賣淫一次收100元,陪宿一夜收費500元。

掃‘六害’開始後的一天,兩位前來摸底調查的公安人員A君和B君,着便裝以個體戶的手法住進了這家賓館。他們剛進房間尚未放下行李,就有兩名暗娼尾隨而入,一個拉着A君的手,一個摟着B君的腰,直接了當地問他們要不要。當兩位婉言謝絕,這兩個暗娼即開導說:‘不用怕,這裡很安全。’這兩個暗娼走後,又陸續有暗娼到他們房間招徠生意。據這兩位公安人員稱,第一天到他們房間招嫖的暗娼達30人次,電話約20餘次。當A君向這裡的保安人員詢問爲何沒有人管時,一位保安人員回答說:‘現在,虎門鎮的賓館,旅店都這樣,誰來管?酒店爲賺錢,對這些人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啦。’據了解,這裡的暗娼都徵得了賓館負責人的同意,同時還要接受賓館經理、保安人員及服務員的嫖宿。賓館的這些‘主人’們不但嫖娼不給錢,而且還要向這些暗娼索取‘保護費’‘小費’或‘好處費’。

虎門鎮的另一賓館,其暗娼的活動同樣十分猖獗。這個賓館被收審的保安隊副隊長供認:在1989年初,這家賓館的香港老板召集部份員工開會說,某旅店都住了‘女仔’(暗娼),我們這裡也要住‘女仔’,這樣生意才興旺。他還指示保安隊要管好這班‘女仔’,不要讓她們到處亂跑,以免惹出麻煩。3層至6層樓都要安排一些房間給‘女仔’住。‘女仔’住進要經賓館經理批准。這個保安隊副隊長還說,當公安人員前來查房時,保安人員便及時爲暗娼、嫖客通風報信,讓他們躲避起來。

賣淫、嫖娼泛濫甚廣，不但大城市有，偏僻的小縣城也有。湖南省岳陽縣境內長達40公里的107國道線上，開有216家個體旅店，餐館，其中一大批旅店、餐館雇用了年輕姑娘，專門從事賣淫勾當，以招徠過往的出差人員和司機。個體汽車司機張某，與某一個體餐館老板相勾結，這個老板長期為他提供婦女陪睡，張某則把旅客拉到這個餐館就餐、住宿。岳陽縣公安局一次行動，就從這條公路上抓獲賣淫婦女112人。

據有關部門介紹，從目前已抓獲的嫖客看，不但有腰纏萬貫的個體戶、集體企業的廠長、經理，供銷人員，也有國營企業的大廠長、大經理；既有普通拿工資吃飯的工人，也有吃‘皇糧’的國家幹部和軍人。有的嫖客還把嫖娼費用以各種方式拿到財務部門報銷，使得‘公費嫖娼’一時成為茶餘飯後的笑談。

從暗娼方面看，不但有農村婦女，城市待業女青年，而且還有女職工，女幹部，女大學生，以至於女知識份子、影視歌壇的女明星等等，不一而足。據有關人士分析，不能否認，最初一些賣淫的暗娼，為生活計才幹此勾當。然而，近些年來在‘笑貧不笑娼’的風氣中，賣淫的婦女大部份已把賣淫當作追求奢侈生活的手段，成為其生活中難以擺脫的‘金箍咒’。

王某，29歲，北京一家文藝團體的演員。她本來有着一個和睦的小家庭，夫妻倆的月收入300多元。然而，看到這些年來那些先富起來的人們，吃肥甘，穿輕裘，出門有出租車，時常進出於大飯店，王某眼紅了，1986年10初，一個偶然的機遇使她結識了個體老板張某，為她改變自己的生活提供了機會。張某白天請她去各飯店吃山珍海味，晚上請她去舞場跳舞。她忘卻了丈夫、孩子，成了張某的情婦。據王某供稱，張某花在她身上的錢達3萬多元。1987年3月，她毅然與丈夫離婚，整天混迹於舞場，張某為她提供的房子，成了她與嫖客進行肉體和金錢交換的場所。1989年11月30日，王某被抓獲，面對公安人員的詢問，她自己說不清楚接待過多少嫖客，但是，她記得這些嫖客中既有個體老板，又有廠礦的廠長、經理和供銷員。

過去的妓院，專門有開店的老板、老鴇。而在30年後又再度湧起的賣淫、嫖娼暗流中，也出現了一些專操皮肉生意的‘皮條客’。武漢市第二起重機廠停薪留職人員林方忠等7人，與珠海澳門等地的不法份子相勾結，從1988年3月到1989年9月，先後拐騙20多批，70多名婦女到珠海、澳門賣淫。

賣淫嫖娼的日益泛濫，使六十年代大陸就宣佈

已絕迹的性病，又席捲而來。衛生部門的人士介紹說，全國性病患者到底有多少，很難有一個確切的統計，但從每年到醫療、公安部門登記的情況看，逐年呈上升趨勢。性病的蔓延，已引起了人們的不安。漫步廣州街頭，隨處可見張貼的專治梅毒、性病的廣告。在廣州市一個治療性病的私人診所裡，一位張醫師接受質詢時說，從1985年開業到1987年7月，他共治療性病者1.25萬餘人。最近衛生部的統計表明，截止1989年底，大陸累計報告愛滋病病毒感染者194例。其中，國內居民153例，北京市共檢出愛滋病病毒感染者15人，其中1例為國內首次從性病中發現。

### ‘萬里長城’永不倒！

賭博這一社會陋習，有着悠久的歷史，廣泛的土壤。在大陸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賭博的浪潮一陣高似一陣，大有‘男女老少齊上陣，“萬里長城\*(指麻將)永不倒’之勢。

在農村，低矮的農舍裡，有幾角、幾元、幾十元乃至上百元的小賭。而山西省民間也有‘四五百元小玩玩，二千元可玩玩，一萬以上真玩玩’的大賭。

在城市，豪華賓館的客房外掛着一塊‘請勿打擾’的牌子，而房間裡卻有一批包房的豪賭，動輒成千上萬。溫州市查獲一個賭博團伙，在數次豪賭中，累計輸贏高達270多萬元。

在家庭中，有娛樂性的小賭；在街頭，有行騙的在設賭。

賭風，在瘋狂地蔓延。在1989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的一個月的時間裡，大陸共查處聚眾賭博案件8萬多起，大小賭徒竟有24萬之眾。貴州省有關部門調查後發現，該省參賭人員佔全省總人口的1/5，有的機關單位參與賭博者高達100%。這些數字的背後，除了說明賭博蔓延的嚴重程度之外，還包含着一個個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劇。

杜志國，安徽省某鄉供銷社幹部。他不會忘記1987年11月8日這一天，這是他倒霉日子的開端。這一天，他懷揣着在農村的妻子種山芋賣得的110元錢，被人拉上了賭場。初試鋒芒的杜志國，不知是財運亨通，還是賭徒們故意放下的鈎餌，竟贏了450元錢。懷揣這意外之財，杜志國喜洋洋，但他並沒有告訴妻子。夜裡躺在床上，做起了發財的美夢。不料，第二天上場後幾圈下來就輸掉了100多元，第三天，把贏來錢加上110元輸個精光。此時的杜志國，並未意識到嗜賭的厲害，而是認為這兩天運氣不

好。他一心想撈回來。於是妻子辛辛苦苦積攢的400元被他拿去輸掉了，供銷社的1000元公款又輸掉了。兩個姐姐不忍弟弟毀掉了前程，湊齊了1000元，要他補上公款，他又拿到賭場輸掉了，老父親盼望兒子改邪歸正，拿出一生積攢的1220元錢，讓他還上公款和賭債，他又拿到賭場輸掉了。他整天陷在賭場，創造了5天5夜不下場的紀錄，把家裡的電視機、縫紉機和一些值錢的東西都輸進了賭場。妻子的規勸，老父的痛斥，他充耳不聞；妻子提出離婚，老父氣病臥床，也未能使他臨淵止步。沒有錢，他想到了偷，在偷取供銷社的錢款時，被值班人員發現，他將值班人員殺害。然而，就是這時，他那沾滿鮮血的雙手，又伸到了賭場。最終，他被送上斷頭台。

據江蘇省有關部門統計，1988年，在江蘇省的刑事案件中，因賭博引起的刑事案件佔20%。1988年，無錫市因賭博引起的家庭破裂、夫妻反目，鄰里不和以及財產損失，自殺等案件，共500餘起。福建荆溪軋鋼廠的承包廠長林朝月，自1989年3月染上賭癮以來，先後輸掉公款60餘萬元。9月18日晚，他事先邀來一幫打手，約定如果贏了則罷，如果輸了則硬搶。結果，當晚輸掉6萬餘元，他便與打手用刀棒打傷贏家，搶走了全部賭資。

賭博造成的悲劇以及帶來的嚴重危害，常見諸報端。北京崇文區飲食個體戶趙德聰，因賭博輸掉了10萬多元的辛苦錢和所有家產，自殺未成。被救活後，他在北京電視台現身說法，教育人們認識到賭博的危害性。但北京市另一個體戶余某卻滿不在乎；他說：‘我原擁有70萬元資產，在與人一賭輸贏時，一下輸掉了40萬元。我並不後悔，我辛苦掙的錢，就是爲了自己活得痛快，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余某的話雖然顯得荒謬，但不少賭徒，確實有這種玩弄人生的心理。

更令人憂慮的是，賭博的蔓延已危害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長，不少青少年染上了賭博的惡習，小賭徒日益增多。在江蘇省1988年查處的涉賭人員中，青少年佔31.3%，而1989年1月至9月查處的涉賭人員中，青少年的比重上升到34.6%，年齡最小者僅有12歲。賭博的低齡化更應引進家長及全國社會的關注。

#### 四、人口販子

70年代初期在大陸重新出現的拐賣婦女兒童的犯罪活動，進入80年代以後，愈加囂張起來，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區均已發現了這一犯罪活動，其中

四川、湖南、河南、安徽、山東、河北最爲嚴重。

據安徽省宿縣地區統計，1980年以來，外地流入宿縣地區婦女達35172人，其中約有1/3是被拐騙賣來的。

四川省17個地、市、州的統計表明，1989年上半年共發生拐賣人口案件2478件，被拐賣婦女，兒童達4194人。

山東省從1989年11月到12月20日，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先後挖出拐賣人口窩點134個，解救受害婦女2000多人。

陝西省西安市，出現了一個自發的組織——‘難友協會’，成員60人左右，他們都是被拐賣兒童的父母。

現在，拐賣婦女兒童的犯罪份子使用的手段多種多樣，或以介紹對象爲名，或以出外旅行觀光爲名，或以招工招幹爲名，或以合伙做生意爲名，利用人們想擺脫貧困、吃皇糧、貪逸樂、賺大錢的心理，騙得信任。不但使農村婦女，城市待業者受騙上當，而且一些工人，幹部乃至大學生、研究生也被拐騙。

1987年12月，年僅15歲的任某，在哈爾濱火車站附近的飯館當臨時工時，結識了一個自稱是廣州老板叫劉麗的婦女。劉麗以廣州能掙大錢爲名，騙得了任某的信任，任某隨劉麗登上南下的列車。劉麗在濟南市將任某以1500元的價格賣給了人販子，這個人販子隨即以2200元的價格，將任某賣給了山東鄆城縣城關鄉張侯村34歲的農民張慶功爲妻。劉麗被抓獲後供認。她先後以同樣手段，拐騙哈爾濱待業女青年5人，農村青年6人。

1989年7月，江蘇省海門縣無業人員黃建華伙同毛偉斌，以招收演員爲名，將江蘇海門縣東風村農民張某(17歲)騙至上海，不但供其姦宿，還逼迫張某賣淫賺錢，後又將張某帶至山東巨野縣賣給人販子。1989年2月，他們又以同樣的手段，騙取了江蘇省寶應縣女青年胡某和陳某的信任，先姦後賣。

目前，已出現了以暴力脅迫手段拐賣婦女兒童的現象，具有嚴重的危害性。1989年11月13日，福建省莆田市公安破獲了一個由16名成員組成的販賣兒童嬰兒的重大團伙，該團伙是人販子轉手倒賣兒童的中轉站，並爲人販子劫持兒童提供便利，其中僅主犯黃淑蘭一人，從1989年4月至11月，就先後轉手倒賣兒童嬰兒18名。

山東省棗莊市峰城區左庄鄉香屯村農民孫中強自1988年以來，衣冠楚楚，先後冒充大學生，研究生，僞稱其父是滕州市勞動局局長，祖父是華僑等，在黑龍江和山東臨沂等地，先後拐騙青年婦女6名，都是

先姦後賣，得贓款1.4萬餘元。更為惡劣的是，他將其中兩名姿色較好的婦女長期關在家中供其姦淫，其中一名婦女生了男孩之後，孫犯又將其母子同時賣掉。

河南的人販子張國振，伙同張國學於1987年7月至1989年2月，在河南漯河、周口，駐馬店等地火車站，以‘能給您找個吃飯的地方’為名，先後拐騙婦女15人，得贓款15760元。1989年3月15日，張國振騙得一位12歲的幼女，關在家中10多天，多次進行姦污。

## 五、癮君子

毒品，當今世界的一大社會公害，近幾年來又在大陸的西南、西北一些省市區重新發現。一些在解放前就從事販毒、私種毒品和吸毒的‘癮君子’，又重操舊業。吸毒者既有企業的職工、個體戶、也有機關幹部、中共黨員。毒品在侵蝕着一個個健康的靈魂。

雲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一名年輕的少女，因未考上高中，在父母的斥責下苦悶煩惱異常，幾位伙伴勸她吸兩口‘白烟’（內裝海洛因的香烟），解除煩惱，她便由此上癮。

28歲的寸某，因夫妻感情不好，經常生悶氣。一個朋友說抽白烟可以產生忘卻痛苦，想要什麼都會有什麼的感覺。寸某想忘記痛苦，他需要那種傳說中飄飄欲仙的境界，於是開始吸毒，一發而不可收拾，使得夫妻感情裂痕愈深。

據有關人士介紹，現在不少吸食海洛因者，開始大都不是自願吸毒的。第一次吸食海洛因的滋味並不好受，胃里翻騰想嘔、肌肉酸痛、關節發麻、四肢無力。但只要吸上兩三次之後就會上癮，只要毒癮一發，不但會出現這些症狀，而且還會鼻涕眼淚口水直流，內心煩燥不安，如果不抽，痛苦得人想一死了之。這些‘癮君子’們，染毒之後再也離不開。

方某，三十多歲，雙臂上密密麻麻全是注射毒品的針疤。他由吸毒發展到注射毒品，毒癮越來越大，後來就離不開注射了。幾年來，他花費了數萬元購買毒品。

老毒客吳某，多年來一直用針注射毒品，全身上下的針疤幾乎同汗毛孔一樣密，有一次毒癮發作後，竟找不到下針的地方，無奈，吳某抗不住毒癮的折騰，只好往自己的生殖器上注射。

西安市碑林區個體戶楊某，因吸毒成癮，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將10多萬元家產變賣一空，把房屋、冰

箱及所有值錢的東西全賠進去了。1989年上半年，西安市4名青年因毒癮發作，又找不到毒品，遂自縊身亡。號稱西安市第一桿烟槍的郭某，吸毒五年，不但把錢吸光，而且把戶口、房子、親生兒子也都賣掉。

吸毒、販毒日趨嚴重。1982年，雲南省德宏州僅發現10多人吸毒，而現在僅登記在冊的吸毒者，就達1.5萬人，佔全州總人口的1.1%，在德宏州，戒毒康復醫療所接收了66名戒毒者，平均年齡僅有23歲。德宏州最小的吸毒者年僅10歲。陝西省西安市目前在公安機關登記在冊的吸毒、販毒人員，達5400多人。

1984年德宏州緝獲的海洛因僅1000多克，1987年即達到6.8萬克，1989年達24萬多克。1989年9月和10月的兩個月裡，西安市公安部門查獲吸毒案件524起，繳獲大烟、海洛因24900克。

德宏州成立了禁種、禁販、禁吸的三禁辦公室，近來已開辦戒毒站，戒毒班90多個（次）。西安市目前有26個戒烟所，開辦了14所戒毒醫院，舉行了30期戒烟學習班。

但至今為止，西安市仍以每月3000名‘患者’入院的速度發展着‘癮君子’的隊伍。沉渣的再度泛起，引起了國人深深的思索；50年代基本掃蕩絕迹的諸種社會醜惡現象，為什麼在80年代又泛濫成災？文明應與富裕相伴，為什麼在人民逐步富裕之後，反而滋生了諸多的愚昧、落後、醜惡？

這矛盾思索起來也許是痛苦的，大陸改革開放帶來了經濟發展和人們生活的改善。然而，物質的富足並不能自發地改變精神的落後與貧乏。許多人有了錢不能用之於正道，而在吃喝嫖賭吸毒迷信活動間大肆揮霍。而且當種種社會醜惡現象在悄悄產生進而瘋狂蔓延之時，大陸政府往往不願面對這一現象，同時也抱着‘家醜不可外揚’的信條，對這些社會毒瘤的存在緘默不言，新聞媒介對這一切也諱莫如深。猶如整個社會已默許了它們的存在。是錯誤？是失誤？還是縱容！

‘11·13’緊急行動，轟轟烈烈地‘掃’過去了，但是，仿佛一切都依然如故，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君不見今天的大陸‘黃街’依舊，‘鬼集’復活，‘人市’‘繁榮’……。





# 黃浦江上股票潮



趙進

## 證券交易的復興

上海，曾經是顯赫一時的遠東金融中心，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證券業務相當發達，全市當時有二三百家經營證券的企業和一家規模可觀的證券交易所。可是到了五十年代，所有的證券交易被共產黨當作投機倒把一掃而光。

然而，一九八五年一月，在絕迹三十多年後，證券交易又在上海死灰復燃，股票重新上市。今天初到上海的外地客稍一留意，便不難發現隨處可見的證券交易的踪跡，和潛流湧動的炒股暗潮。

從上海東區到西區，無論海通證券公司、靜安證券業務部，還是萬國證券公司，門前經常是人頭攢動，天天業務繁忙。甚至一些流動出售烟卷的小販也以此作為副業，在攤位前掛着一個廣告紙板，上面寫着：收購國庫券及債券。

打開上海的《解放日報》，上面特別開闢了專欄介紹證券市場的行情，以及炒股的基本知識，並有專文分析證券市場的走勢。打開電視機，上海電視經濟二台的商情節目，還專門向觀眾介紹幾個不同的證券機構的行情。從今年七月五日起，上海還出現了第一部證券行情信息電話。通過這一電話，客戶只要報出預約的報價密碼，就可以知道當天證券買賣的開盤價格。一般市民也可以撥電話詢問各種股票債券的行情，價格走勢，證券股票已在上海人的經濟生活中重新找回了它失落的位置。

## 股票進入千家萬戶

一九八五年，當股票出現在上海市時，居民只是

着眼於一年一度的股息和紅利，購股者實際上還是把它當作一種儲蓄的方式，因此，當時股票發行的規模和購買者的熱情都是很有限的。上海證券的二級市場是於一九八六年九月從上海靜安證券業務部開始起家的，當時上市的股票只有‘飛天’和‘延中’兩家，由於持股者還抱着儲蓄心態，無意轉手買賣，股市曾一度陷於有行無市的窘境。可是隨着經濟自由化的發展，市民們逐漸悟出了道理：資金的生命在於運動，運動可以使證券增值。股票開始進入千家萬戶的日常生活。

發行延中股票的延中實業有限公司原來只是一家街道企業，上市股票共十萬股，票面價值為每股五十元，其中個人認股九點四萬股，股東一萬多人。發行股票後，該公司聲譽大振，又向銀行貸款五百萬元，先後辦起了三家中外合資企業、三家聯營企業、一個獨資工廠、兩個商業服務部，還建成一幢五千六百平方米的工業大樓。一九八八年，公司產值為一千一百萬元，發放股息紅利共三百餘萬元。三家合資企業之一的延中漢堡有限公司製作的漢堡包、意大利通心粉和咖喱牛肉在上海快餐市場上享有盛譽，深受市民歡迎。

‘延中’股票上市的那天，竟有數千人排隊競相認購。一些年輕人在隊伍中戲言道：‘阿拉(我)也要嘗嘗當老板的味道。’的確，從理論上來說，既然股票代表財產的所有權，那麼持股的股東似乎就成了企業的老板，無奈上海居民的財力有限，延中的股票分散在一萬多個股東手中，最大的持股者也不過兩萬元，佔股票總額的百分之零點四，對企業的經營決策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影響力。

一九八九年初，國營上海真空電子器械股份有

限公司的股票上市，共發行面值一百元的股票二百萬股，其中政府擁有一百四十九萬股，佔四分之三，法人（企業）佔十二萬股。個人股只佔三十九萬股，分散在一萬兩千名股東手裡。這個股份制的試點看來並未改變公有制的實質。據統計，這家企業在全國一百家大型電子企業中排名第十二，稅收額排第二，實力雄厚，經營良好，因而股值看漲。現在這家企業的股票交易量佔全市交易總量的一半左右，是上海最大的股票商品。

### 道瓊、恆生和靜安指數

目前，上海上市的股票共有七種，五萬名股東約擁有股票兩萬六千二百萬股。最先代理發行股票的是工商業銀行上海信托投資公司屬下的靜安和虹口兩個業務部。現在兩個業務部的股票交易額約佔全市總交易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自一九八八年起，上海信托投資公司開始編制《股票年報》，分析行情，指導投資決策，同時也讓更多的人了解股票知識。為了反映股票行情的漲落，靜安業務部以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上市的六種股票的平均價格為基數，編製了一套靜安股票指數。如同美國有道瓊指數，香港有恆生指數，上海也有了靜安指數。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九日公佈的靜安指數為90.60，而進入六月之後，竟突破100點，達100.90點，看來上海人炒股的勁頭正方興未艾。

### 上海的‘黑色星期一’

一九八九年六月，上海新生的股票市場經歷了它有史以來第一次‘黑色的星期一’。六四大屠殺後，各種小道消息四處傳播，北京政權似乎朝不保夕，人們對政府的信心一落千丈，紛紛拋售手中的國庫券和股票，引起股市大瀉。一些證券交易公司紛紛關門停業，唯有萬國證券交易公司鋌而走險，趁各類證券價格大跌之際，大量廉價收購，一下吃進數百萬。所有人當時都為萬國捏了一把汗，認為它這次必破產無疑了。可是結果這一票果然被它賭贏，隨着政局的逐漸穩定，股市的價格也漸漸回升，萬國因此大發其財，名聲大振。

### 從零起步的經紀商

‘萬國’是上海第一家民營的證券交易公司，它誕生於一九八八年七月。此後兩個月內，又接連有



上海人在銀行門前搶購股票

兩家分別由人民銀行和交通銀行出資的官辦證券公司申銀公司和海通公司開業。發展至今，上海現已有各種專營、兼營或代理證券交易業務的中介機構四十餘家，還有專門做企業資信評估的機構。

證券交易的風險極大，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行情，必須有高度發達的通訊設備，才能開展業務。可是上海的證券交易公司都是在非常簡陋的條件下起步的。尤其是民營的‘萬國’，不要說證券業務必須的電腦信息終端機，就連電傳也沒有，電話已經算是最先進的設備了，可就連裝幾門電話也頗費了一番周折。在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中國的證券交易甚至還不得不採用最原始的信息傳遞方式，如通過公司職員的親朋好友來傳遞消息。

沒有電腦電傳，交易只能靠電話口頭協議，而在普遍不講信譽的中國大陸，口頭協議的風險極大。‘萬國公司’就曾在這上翻過船。一九八九年十月，萬國通過電話和廣州一家證券公司達成一項口頭協議：向後者購買一批八五年和八六年發行的國庫券，每百元的單價分別是127.20元和104.00元。協議達成後，萬國馬上匯出了款。可是，當萬國的職員趕到廣州取貨時，國庫券價格大幅上漲，廣州方面竟單方面毀約，拒絕按原訂價格成交。雙方經反復討價還價，最後達成妥協，分別按128.00元和107.50元的調整價格成交，由於收購價大幅上漲，萬國幾乎無利可圖，差點走了麥城。

## 證券供求大幅增加

上海的證券交易是從股票開始的。可是自從一九八八年四月國庫券上市之後，由於其社會覆蓋面廣而逐漸成爲證券流通的主角，使證券交易量總額迅速上升。據統計，國庫券上市前的證券交易總額僅四千萬元，而國庫券進入流通之後，到九〇年上半年止，上海證券交易總額已突破二十五億元。

如今炒賣股票在上海已不再是投機行爲了，現在加入炒股大軍的上海市民已達百萬之衆，他們中間有銀行職員，個體戶，還有靠薪金收入的工人、幹部、教授、工程師、廠長經理以及離退休人員等。人們投資的技巧日益嫻熟高超，不少人已學會利用市內不同地區的差價取得收益，或靠低進高拋的時間差獲利。

進入一九九〇年以來，上海的證券交易日趨活躍。其原因一方面是一九八七年、八八年和八九年發行的國庫券陸續上市，證券市場上的品種供應有較大幅度的增加；另一方面，由於全國宏觀經濟大滑坡，生產不景氣，銀行存款三年期保值貼現率相對通貨膨脹率幾乎等於零，四月以來，政府爲了刺激生產放鬆銀根，銀行存款利率又下降了1.26個百分點，相比之下，證券的收益率要明顯高於銀行利率，對於市民們產生吸引力，對證券交易的需求量也有大幅增加。

加之今年以來，各種債券到期，國庫券陸續還本付息，市民手頭有了相對充裕的資金。據專家分析，九〇年七月一日到期的六億元國庫券兌付總額中，將會有九成再投資在證券市場。

## 阿拉需要刺激

六四之後，精明的上海人深知在共產黨統治下涉足政治的危險性，干脆乘大亂之機重操舊業，玩起了上一輩人早已得心應手的股票生意，以求刺激。因此，證券交易額直線上升。九〇年上半年證券交易量爲十二億八千萬，是去年同期的一點六倍，也相當於全國同期交易量的一半以上。六月份，全市證券交易額達三點一億元，創上海恢復證券交易之後的最高紀錄。

儘管國際上有些金融專家對中國的這種證券交易是否真正的‘市場交易’表示懷疑，但上海人則自得其樂。對於生活在黃浦江邊的上海人來說，他們太累了，上班要幹活，聽政治報告；下班要擠車、買菜、帶孩子、換煤氣。更有許多人爲升職、找工作、出國而疲於奔命，確實不易，太累了。只有拿到手的股票，才會使他們感到手中的價值。看到熒光屏變動的數字，才會讓他們感到生活中還有一點點希望。正如上海人所言：‘阿拉需要刺激，否則怎麼活下去？’

# 劫機和反劫機的死結



胡楠

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已成爲國際間第三個劫機‘熱點’。無論是北京政府、台北政府、南韓政府，抑或民運人士，都有值得檢討之處。

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實》(原名《紅旗》)所屬北京求實出版社，今年三月出版了一本《建國後二十樁重大反革命案紀實》，書中收錄了三件劫機與反劫機個案。其中一件發生在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日，當上海—北京空軍專機(載有某國軍事代表團)正駕駛員張景海發現飛機被劫持後，書中這樣描述他的內心活動：‘死，算了什麼，因爲共產黨員畢竟需要保持

氣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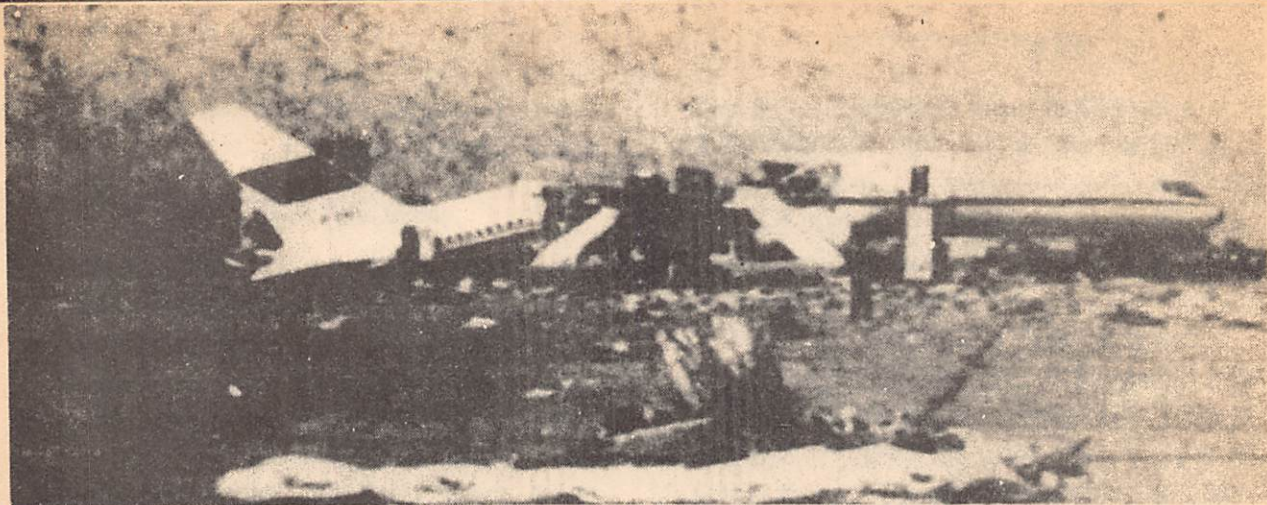
該書還引用了被劫持後機組與北京的電報：

機組：‘請黨放心，我們一定會處置好。’

北京：‘向北飛，向西飛，保證專機安全，粉碎劫機陰謀。’

在此五天以前，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西安—上海二五〇五班機被劫持，飛機在上海上空盤旋了近三個小時，在激烈搏鬥中，還發生了炸彈爆炸。

這兩宗劫機案，都因爲機組人員憑借‘大無畏不要命’的‘革命精神’最終以劫機犯被制服或被殺而



被劫墜毀的廈門航空公司8031航班波音七三七客機，127人死于非難。

‘勝利結束’。乘客原以為必死無疑。沒有死，是偶然。

一九九〇年十月二日發生在廣州白雲機場的大慘案，劫機者的‘陰謀’和飛機一同被‘粉碎’。‘死，算得了什麼？’不知該機的駕駛員是否如此想，但他以事實證明了他的確是個‘寧死不屈的共產黨人。’一百二十八人的死，便成了必然的結果。

### 中國：國際間第三個劫機‘熱點’

從劫機的歷史來看，劫機事件一般是以政治為誘因。

第一個劫機熱點是北美。在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間，只要有人劫持‘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飛機降落到古巴，劫持者除了獲得庇護逍遙法外，還會受到官方英雄式的歡迎。後來，古巴遭到國際間愈來愈嚴厲的輿論譴責，國際間又增訂了防止劫機的法律條文，迫使古巴不再為劫機者提供方便，使北美的劫機事件日漸減少。

第二個劫機熱點是中東。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間，中東恐怖組織利用劫機來要脅以色列及其盟友（如美國），要求釋放被困在以色列手中的政治犯，或以劫機提取以色列或美國人作人質以達成其目的。為何在中東劫機往往能得逞？主要是中東不少回教徒同情這些恐怖主義者，給予政治庇護。由於整個中東危機未緩和下來，所以這個熱點暫時仍未完全冷卻。

第三個劫機熱點是中國。自八十年代開始，一方面是人民的手腳逐漸被鬆綁，從門縫裡看世界，發現自己才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自然嚮往自由富足的空間；另一方面，新的社會秩序在舊的沉積物和僵化的體制牽制下難以建立，人民與執政者的

矛盾愈演愈烈，迫使政府和老百姓往往走向極端。（官方的極端表現在六四大屠殺，民間的極端表現在暴力事件頻繁。）還有一個原因，是台海兩岸對立情緒尚未緩解，無論是台灣抑或大陸，都有庇護對方劫機者的案例，使劫機者有路可遁。

中國大陸劫機事件累累發生，但通常都不報導，除非機上有外籍人士，無法封鎖消息，官方輕描淡寫報導。就像這次廣州大慘案，連國務院總理都親赴現場，《人民日報》的報導也不醒目。所以要了解近年來到底發生了多少宗劫機案，實非易事。筆者注意到，廣州空難之後，香港《明報》、《星島日報》和美國《世界日報》都只泛泛介紹了其背景資料，且連同非劫機空難案一同列出，可見海外對發生在大陸的劫機實況了解甚少。筆者八九年初曾在一偶然機會與中國國際航空公司高級官員交談，談及劫機的次數，對方說：‘不下十五宗。八六年反擊“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時，僅年底就發生了四宗。’

根據中共已公佈的資料看，自八十年代以來發生的主要劫機案有：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西安—上海二五〇五班機被劫持。劫機者被制服。

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日，上海—北京空軍專機被持。劫機者被殺死。

一九八三年五月五日，瀋陽—上海班機被劫持，飛往南韓春川。民航局局長沈圖前往漢城交涉，機組、乘客返回大陸，劫機犯卓長仁等五人卻被送往台灣，台北視其為‘反共義士’。

（以上三宗劫機案被列入《建國以來二十樁重大反革命案記實》）。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二日，廈門—廣州班機被劫持。飛機飛往台灣，機組和乘客返回大陸，劫機犯龍

貴雲、張慶國獲台灣庇護，但被判入囚三年。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北京經上海飛往美國的七四七飛機被劫持。

飛機飛經南韓上空時，據說南韓當局拒絕其降落，遂飛往日本，飛機降落後，劫機犯張振海被機組人員推下飛機。自稱‘民運人士’的張振海最終被送回大陸，被判刑八年。

一九九〇年十月二日，廈門至廣州七三七客機被劫持，發生大慘案。

### 北京·台北·漢城·民運人士

廣州‘一〇二’大慘案發生後，北京及其在香港的喉舌《文匯報》指責台灣是‘劫機者的天堂’。十月三日《文匯報》社論說：‘回顧大陸近年所發生的劫機事件，劫機者劫機的目的地都是台灣，劫機者則是大陸一些被迫緝的犯罪份子，這個現象值得兩岸正視。這些亡命份子為什麼會視台灣為逃避刑罪的天堂，為什麼劫機成為逍遙法外的捷徑？這是否與台灣對大陸劫機者另眼相看，予以寬容甚或當成英雄人物有關？很值得台北當局檢討。’

不難看出其中的強盜邏輯：越南投奔怒海逃到香港，很值得香港當局檢討；東德人逃到西德，很值得西德當局檢討……當然，越南人和東德人不能等同劫機犯。依筆者看來，既然國際法視劫機為刑事犯罪，值得檢討的就不僅包括北京、台北政府，還有南韓政府和民運人士。

劫機的恐怖主義行徑，舉世均嚴厲譴責。十月二日，廣州，空難發生當天，筆者即在《星島日報》上撰文指出，不管是誰，即使他是遭中共通緝或面臨死亡威脅的民運人士、反共義士，都沒有權利以他人的生命作為換取自由的擔保。任何政府，任何人（包括民運人士）都有保護乘客安全和協助依法處理劫機者的義務。

北京、台北市、南韓政府和部份民運人士的表現又如何呢？

衆所周知，中共總是慣於宣傳反劫機的‘英勇’事例，導致機師往往不顧乘客生命安全，抱着僥倖心理與劫機者搏鬥，這就難免發生慘劇。要知道，在第一個劫機熱點北美，雖經歷不少劫機事件，但卻沒有機師與劫機者搏鬥而引發出的‘空難’事件；在第二個劫機熱點中東，機師與劫機者都能冷靜地避開‘搏鬥’，把飛機開到‘安全’國家，讓劫機者自由‘行去’，而且得逞所願。這不是慫恿劫機行爲，而是當時保護乘客安全壓倒一切。爲此，以色列政府會把辛辛苦苦捉來的政治犯，依了劫機者的要求，一次就放了

百多人。中共雖無要求機師與劫機犯‘搏鬥’的規定，卻又給予與劫機犯‘搏鬥’者以獎勵，客觀上起到了刺激機師‘搏鬥’的作用。今後應明文規定，不准機組人員與劫機者‘搏鬥’，否則予以嚴厲處置。

北京指出台灣是‘劫機者的天堂’，其實自身又如何呢？一九八六年台灣機師王錫爵（傳聞係中共潛伏間諜，因身份暴露，被迫回大陸）劫機至大陸，北京亦是優厚待之。幸虧台灣比大陸自由和富足，沒有大陸那麼多劫機者，否則大陸也早成了‘劫機者的天堂’。

毫無疑問，台北政府也有其責任。一九八三年劫機犯卓長仁等五人被台北當局視爲‘反共義士’，竟將其從南韓接到台北；一九八八年劫機犯張慶國、龍貴雲劫持飛機到台北，雖被台北判刑三年，不僅大陸人民懷疑其審判的公正性，對於企圖劫機者而言，判決如此之輕起不到阻嚇作用。值得高興的是，十月四日，國府內政部境管局長劉蓬春表示，今後自中國大陸劫機來台者不論是否以‘反共’爲名，均將予以強制遣返。

今後，台海兩岸的民航機被劫持到對方境內，對方如果立即交還人機，並將劫機犯遣返回原地審訊，就會大大減少民航機遭劫持的事件。因爲對於劫機者而言，即使劫機成功，也逃不了法律的嚴懲，‘鋌而走險’便失去了意義。

說南韓政府當檢討，一是指一九八三年不該將劫機犯卓長仁交予台北政府；二是指一九八九年不該拒絕被張振海劫持的飛機降落在南韓境內的要求。這兩件事都有其政治背景，前者是南韓當局考慮到與台灣有外交關係，而北京又是自己敵手（北韓）的盟友而作出的決定；而後者的表現，恐怕是基於自己正處於欲與中共建交，而又未與台灣斷交的敏感時期，無論怎樣處置，飛機降落在南韓都會成爲一隻‘燙手山芋’，顧此失彼。政治利益固然要考慮，但違背了法律和入道原則，亦難免爲人所詬病。

在對待張振海劫機事件上，個別‘民運人士’的所作所爲令人吃驚。有人爲張振海奔走呼叫，發表聲明，還企圖將其移民到加拿大。據日本一名民運人士透露，有‘民運人士’竟在日本法庭上爲張振海作偽證，遭到斥責。我不懷疑其善良願望，但對其‘凡是共產黨反對的，我們就要支持’的心態，實在不敢苟同。

### 空軍也搞民航

中國大陸現有二百多架民航客機，三百二十七條內陸線，四十條國際航綫。近年來，‘全民皆商’，空軍也不例外，利用退役飛機和軍用機場輸送乘客，

機票比民航票便宜得多，但只載國內乘客。在廣東惠州軍用機場，開闢了往北京、上海幾條航綫，乘這類航機危險程度更大，空難事件頻仍，由於機上無外籍人士，故鮮為人知。

中國大陸的民航安全系統漏洞百出。這幾年發生的劫機事故，劫機者大多未通過規定的安檢通道上飛機，而是通過機場側門或通過私人關係，直接到達飛機降落處登機。例如，一九八五年卓長仁等劫機犯，就是通過機場內綫攜帶‘五四’手槍乘坐紅旗牌轎車未經安全檢查，直接駛機場上機；一九八八年，廈門至廣州發生劫機，劫機犯龍貴雲、張慶國身藏炸藥、匕首，也未經安全檢查，從機場側門的非乘客入口混入上機。

有時候，大陸民航的安全檢查亦極為嚴厲，甚至鬧到草木皆兵的地步。卓長仁劫機事件後，北京竟下令，只有相當於處級以上的幹部方能乘機，結果營業額大受影響，一趟航機有時僅售出三五張票。當時我在鄭州準備乘機前往嵩山，憑記者證買了一張票，結果整架飛機（直升機）上只有我一個乘客。不久，民航當局又被迫取消這項禁令，民航全民開放，又‘鬆’得可怕，大陸人員只要憑所在單位介紹信和個人工作證，就能買到飛機票。八七年底，我在北京不小心丟失工作證，接待我的國務院某部委直屬機構，幫我辦了一張‘工作證’，開了封‘介紹信’，使我順利買到回廣州的機票。那年頭，機構、公司多如牛毛，開介紹信不費吹灰之力，隨便找一個街上的行人，說不定他袋裡就有一疊介紹信。‘六四’之後，民航新規定，只憑公民證和單位介紹信購票，其他證件無效。事實上又無法實行，一是公民證尚未全部發放，另公民證丟失後補辦時期長，所以航空公司憑一張介紹信也給機票。不知這次廣州空難中的劫機犯蔣小峰是如何購得機票，按官方的說法，蔣是三省通緝的罪犯，怎能憑公民證購票？

### 廣州空難疑點仍多

廣州‘一〇二’大慘案發生後，港澳台報刊紛紛派記者前往現場採訪，從所見報導來看，無一記者獲得空難的全部真相。自劫機案發生後，中共當局便刻意描述劫機犯蔣小峰是一名‘歹徒’，但對於劫機者以外的責任歸屬，卻避重就輕，化去不談。十月九日，‘一〇二’空難處理小組召開記者會，介紹‘空難真相’，新華社和中新社發了約一千字左右的電稿，似是‘最後版本’。沒想到此材料一出，備受海外人士質疑。當局見實在無法搪塞，便由中國民航對港澳台辦公室副主任馬曉文出來說話，指十月九日不

是正式的調查報告會，只是情況介紹會。何時正式公佈空難真相？馬氏未說明。以往，北京從未公佈過空難客機的黑盒。不知這次是否例外？可以說，中共一日不公佈客機飛行時間紀錄和與塔台的對話，便無法杜悠悠之口。

據筆者自廣州獲悉，中共當局對這次空難亦感‘震驚’。十月二日，除李鵬趕赴廣州外，實際上隨機的還有國務院秘書長羅幹，公安部副部長陶駟駒以及民航總局負責人。李鵬指示，此事對內宣傳上一定要低調處理，對港澳台死難者家屬的要求可適當滿足，賠款不能等同於外國人，但可找個藉口比國內人多給一些。爾後北京高層召開了專門會議，有人提出把民航重新納入軍事化編制。會議決定在民航系統進行全國性整頓，並擬對廈門航空公司和廣州白雲航空公司負責人嚴厲處分。民航總局局長胡逸州已向國務院提出檢討報告，要求辭職。一九八五年接任沈圖的胡逸州曾在去年重慶空難事件後提出辭呈，但未獲批准。

事實上，這次劫機案發生在飛機自廈門起飛不久，早晨六時五十七分起飛，到九時四分爆炸起火，歷時兩小時又七分，不難算出其‘油料’。當局所說，駕駛員考慮‘油料不够’很明顯是站不住腳的。如果這個考慮發生在飛機被劫持不久，就是當局編造謊言；如果這個考慮發生在飛機降落前不久，那麼機師為何要施延這麼長時間？香港民航已經否認了大陸民航方面有過要到香港加油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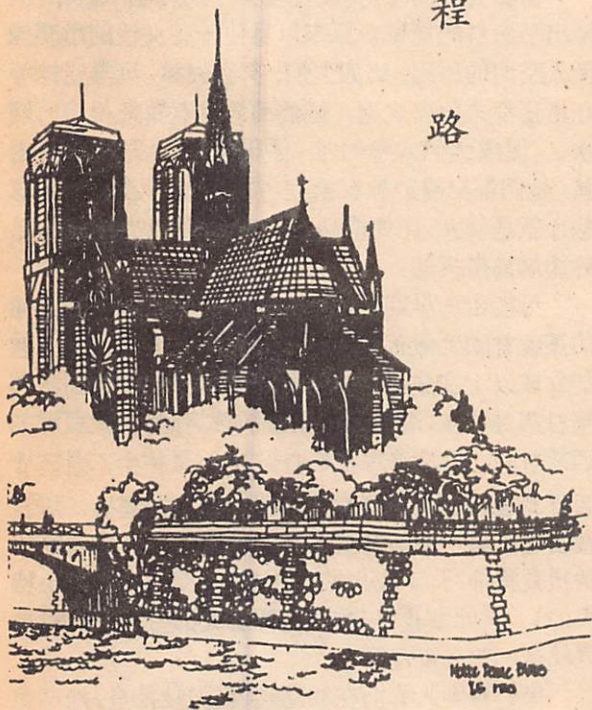
大陸民航當局曾說，民航區控制室暗示機組可以將飛機飛往台灣，後又說民航當局指示駕駛員‘去台灣可以，在哪個城市降落都可以’。那麼駕駛員為何不聽‘指令’？這些‘指令’在何時發出？

飛機在白雲機場滑行時，為何又發生了撞機事件？機場上的其它停機及乘客為何未疏散？據悉，當廣州民航局獲知有飛機被劫持後，即報告北京和廣州有關部門。廣州當局迅速組織了大批公安、特警、武警人員包圍了機場，架起攝影機，希望一旦飛機降落，便可成功制服歹徒。這就是為何飛機起火後，兩分鐘內即有大批公安、武警人員趕赴現場，十二分鐘撲滅大火的原因。

不管中共當局最終對人們的疑問是否逐一解釋，可以肯定的是一批民航系統的人員將遭到撤換。問題是，這並未解決劫機事件頻仍的真正癥結——人民與政府的矛盾仍然沒能消弭。也許，由於嚴加防範，劫機案有所減少，但人民的怨氣將會在其它地方宣泄出來，例如列車上的暴力事便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 大陸修道院探秘

程  
路



1979年12月12日，一位平凡的修女，特雷薩女士，獲得了該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金。她在40多年前，以5個盧比創立了‘傳教士慈善救濟會’以後，每天清晨4時便起床忙開了，派出人員乘卡車巡迴於加爾各答城200,000個爛棚草屋之間，收拾晚上斷了氣的窮人屍體，把氣息奄奄但未斷氣的病人送到救濟會內救治，把窮人遺棄於街頭巷尾的新生嬰兒帶回

來撫養……40多年堅持下來，把聖愛帶到每一位窮人的心上，這使人們對修女的感覺，馬上親切了許多，許多。

翻開宗教詞典，在‘修女’這個欄目裡寫着：‘Sister。天主教和東正教中離家進修會的女教徒，通常須發三絕大願：即絕財（不置財產）、絕色（不嫁）、和絕意（唯教會之命是從），從事祈禱或傳教等工作，在中國，有時被稱為“嬷嬷”。

據考，天主教自明代由歐洲神父傳入中國。不過北京有關這個西方宗教傳人的遺迹似乎把這個時間推移更早一些，在遠離京城的門頭溝山區後桑峪有一座雖然簡陋卻很完備的耶穌聖心天主堂，如果尚存的資料準確無誤的話，那麼它創建於元末，是北京地區最早出現的一座天主教堂。難以想像的是，當初這個‘洋教’如何翻山過嶺地傳佈到如此偏僻的鄉野。

時下大陸天主教徒已有340萬之眾。在經歷了10年浩劫，宗教備受摧殘之後，終於春風化雨，迎來了教會的黃金時期。自1980年以來各地已先後有2000多處天主教堂和教徒祈禱公所恢復了教事活動。多年來無暇也無力顧及的神職人員繼承問題也提上了日程，恢復和新建了11所天主教神學院，備修院，還有近20個地區開辦了修女初修院，1000多名立志獻身天主教的修生、修女在這些院校裡學習。

## 一、北京市若瑟修女院

今天，北京的天主教修女終於有了接班人。儘管她們比上一輩的‘嬷嬷’年輕了50多歲，在年齡帶上出現了半個世紀的斷裂，但當這7位女孩子身披雪白的會袍、頭戴花環舉行隆重的發願儀式時，她們畢竟成爲一九四九年底以來北京地區的第一批修女。

這第一批修女是從北京的一所初修院裡學成結業的，這所學校的名字叫做若瑟初學修女院。

今年夏天，我曾帶着一種複雜的情感走訪了這家只有七位修女的修道院。

7位修女最大的28歲，最小的23歲，都在青春妙齡。保德修女是她們之中的年長者，她個子不高，舉止莊重，雖然在休息日裡未穿修女服，但依然上白下黑：一件白襯衫，一條黑裙子，一雙黑皮鞋。從進修女院的那天起，這些女孩子就告別了絢麗多彩的時裝，開始與‘黑白世界’爲伍。兩種反差最強烈的色彩，一個代表着純潔，一個代表着肅穆，久而久之，熏

陶出她們在氣質上的莊重脫俗。

她向我講起她們是怎樣考進若瑟修女院的：‘我們都是1986年9月開始入初學的，報名做修女還要經過文化考試，有近30個人應試，考的是中專試卷，當然也有一部份教會知識。考試及格，再進行體檢和面試，最後錄取了十二個人。但一年多以後到發願的時候只剩下我們7個人了，中途離開的有人因為身體不好，適應不了修院清苦的生活，也有人耐不住寂寞還俗了。聖經說過：“召者多，選者寡”，這也是天主意料中的事情。’

其實即使這7位已發願的修女能否最終成為天主的女兒也還有漫長的一段路要走。她們所發的還是暫願，即一年願，要連續發了三個暫願，再發三個三年願，最後再發一個五年願，加起來總計十七年之後才能發終生願。

這7位修女所發的願與宗教詞典上講的三絕大賢，意同字不同，那是神貧願、貞節願和聽命願。

坐在她們的教室裡，我傾聽保德修女繼續她的講述。初看這個十幾平方米的房間與普通學校的教室沒有什麼不同：四、五排課桌椅，四、五個帶玻璃門的書櫃、黑板、講台，屋角放着一架20英寸的彩色電視機。只有黑板架上方高懸着的聖母瑪利亞像，書櫃上擺着的十字架，書櫃裡排列很整齊的新舊約全書、宗教要理講義等勾勒出這裡的神學色彩。在教室窗外一、二百米處，就是有着尖頭的教堂。

‘在初學院時學習很緊張，我們過的基本上是修女的生活。’保德修女端正地坐在椅子上，腰板挺得筆直，兩隻手自然交叉放在膝上，眉宇間自有一種恬靜：‘早上5：00起床，5：30進教堂作默想，6：00望彌撒，7：00出堂，7：15吃早餐，8：00上課。11：30再進教堂做私省察，念三種經，12：00吃中飯，然後有一段散心的時間，可以隨心所欲地玩玩，1：30讀聖書，2：00開始上課，5：00下課。5：30進堂做晚課，念三種經，6：00吃晚飯。7：00—7：30看電視，我們只看新聞聯播。7：30—8：30晚自習，8：30進堂做公省察，念第二天的默想題目，9：00出堂熄燈休息。’

早起早睡，完全與世隔絕的學習，活動的空間囿於課堂與教堂‘兩點一線’，她們感到單調與枯燥嗎？幾位修女都搖頭否認，她們說：‘課堂上，我們學到了好多知識，而在教堂裡所做的神功業使我們的靈魂淨化，心裡越來越安靜。現在我們已經結束了這樣的學習生活，大家都留戀過去的日子呢！’

她們主要學的功課有天主教要理課、聖經課、英文課、國語課，還有時事政治課，刺繡和體育。有一位女老師在體育課上教她們練劍、做韻律操，有時還

打羽毛球、乒乓球或者托排球，遇到陰天下雨不適宜戶外活動時，她們就在教室裡下象棋和跳棋。

刺繡歷來是修女們必修的功課之一，因為神父、主教穿的教袍、佈置聖堂的各式枱布、舉行各種教事活動時所用的裝飾物等種種極精美的刺繡品歷來都由修女完成，按照西方的傳統還應該是雅致十字綉。‘有一位老修女教我們綉花，現在會十字綉的人不多了，為了應急，我們先學手綉和機綉。’保德修女告訴我。

我注意到在她們的書櫃裡放着不少心理學書籍，有《社會心理學》、《青年心理學》、《心理學淺談》等等。保德修女說：‘我們上過心理學課，我很喜歡看這類書籍，因為它對我們今後向各種人傳教很有益處，也培養我們的愛人之心。’

在來之前，湧到我腦子裡的一個問題是：她們究竟有着什麼樣的生活經歷？為什麼皈依宗教？不少聽說過這座修女院的朋友，也對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女性選擇了做修女這條人生之路頗感興趣。

當我要離開時，我發現答案一點兒也不複雜，甚至出乎意料的簡單。原來以為使一些女性割斷塵緣循入空門的原因：比如失戀、家庭失和、事業受挫等在這裡都未曾發生過，她們的經歷竟單純得像一滴水。促成她們入會的唯一動機是出自對天主的虔誠，她們都出身於教友家庭，從小受洗，親屬之中有些人就是修女，比如博訥修女，望樞修女都是以自己的姨媽為楷模的。

可能由於早期的傳教士不辭辛苦，為拯救人類的靈魂甘願到最苦的地方佈道，使得北京的天主教徒六成以上在農村，近郊與遠郊都有一些大的村落整村都是教友，著名的如通縣的賈后疇村、大興縣的西胡林村、門頭溝的后桑峪等等。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為趕城裡宣武門教堂那場午夜聖誕彌撒，農村教友趕上幾十公里甚至幾百公里的山路，帶着簡單的被蓋提前一、兩天進城露宿等待，那種情景是很感人的。因此當我得知這7位修女大部份來自農村也就絲毫不感到奇怪了。

保德修女入會前在303服裝廠做技術員，她不苟言笑，寡言少語。博訥修女曾是一個農村電話總機的接綫生，工作之餘她從來也不加入女孩們的嘻笑打鬧，喜歡一個人靜靜地獨處。7個人中最活潑的要數望樞修女，她愛哭也愛笑。每逢散心的時候，總是在鼓動大家玩撲克，打升級，捉黑尖。但望樞修女也有她天生不喜歡艷麗的獨特之處，當年她在北海公園和景山公園小賣部裡站櫃台，偏偏讓她賣化粧品，雖然整天與脂粉口紅打交道，她卻不喜歡這些女



人的寵物，她說：‘還是天然的最美好！’

她們過着集體生活，實行‘供給制’。由於北京修會的經濟基礎尚不雄厚，每月只能發給她們每人40元的生活費。爲了體現神貧願，從這少得可憐的零用錢中還要拿出一部份做修會的基金。平時她們都穿一樣的衣服，白襯衣黑裙子，還有教會發的同樣的灰西服，黑西服以及修女會服，至於內衣、襪子、零星小日用品就需要自己添置了。

走進她們的宿舍，我感到異樣的清爽，又有一種異樣的冷清。一色蒙着白被單的床，簡樸得不能再簡樸，床頭小櫃上絕沒有女孩子們喜歡的美麗的小娃、玲瓏的小玩意兒或花草草，牆上懸掛的幾副宗教圖畫就是唯有的裝飾了。她們離開了自己溫暖的家，在這裡過着清教徒的生活，是否感到寂寞？望樞修女在她們之中年紀最小，稚氣似乎尚未退去，她悄悄告訴我：‘一到陰天，我就特別想家，因爲在家上學的時候，每逢陰天下雨，我就撒嬌躺在媽媽的腿上睡覺。’

但是她們已經逐漸學會了如何按照天主的意志友愛和諧地生活在一起，開始建立了一個新的家庭。女孩子相處，各自都有小脾氣，難免有口角甚至傷和氣。但她們之間發生了小磨擦，大家總歸會在教堂裡找到解脫，在作私省察或默想時，遵循聖經檢討自己，然後主動向姐妹們道歉，於是一切又重歸於好。

她們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好院長。汪博仁院長今年已經73歲了。她21歲在北京發願，以後一直在武漢修女院傳教。1986年北京教區特地把她請回來，由她主持若瑟修女院。她身體力行，不顧年邁，與年輕的修女們白手起家，整理建設起這座修女院。

現在7位修女結束初學後又開始接受職業訓練，這也是爲了今後傳教與謀生的需要。她們之中有3個人進了友誼醫院和協和醫院護校學習護理專業；一個在培黎大學學習英文；一個學習烹飪；一個學習縫紉，以後她們的服裝都要自己縫製了；還有一個協助院長做些事務性工作，同時在學習彈奏宗教樂曲，莊嚴輝煌的宗教音樂在天主教中也是不可缺的組成環節。

她們告訴我：‘在中國一千個人裡只有3個天主教徒，傳教的任務很重。我們能够做修女，這是天主的召選和恩寵，比世俗的人有更多的福氣，所以我們更要把天主的恩澤和愛心傳給人。’她們除了定期給教友‘要理班’講課外，還經常參加各種聖事活動，如大瞻禮、大彌撒，爲致命聖人做的紅彌撒，爲亡靈而做的黑彌撒，爲婚禮，誕辰日做的白彌撒等。現

在教友們做彌撒、辦神功、領聖體的越來越多了，僅宣武門教堂去年就有一百多對青年在這裡舉行婚禮。雖然這7位修女根據自己的誓願，將終身難以體驗到婚禮的幸福，但她們卻爲世俗的婚禮獻上自己由衷的祝福。

## 廣州石室聖心女修道院

在廣州石室聖心大教堂內，也有一間修道院和一群修女。在進入她們那個神秘的世界之前，應先了解一下這個女修院的前身。

據記載，1902年12月8日，廣州天主教會創建了一個‘中華無原罪女修會’，會友最初有46人，後發展到50餘人，年齡多是14到17、18之間。經過一年的見習階段之後，由會長、議員和老一輩的修女按照女修生的表現，分別轉爲‘初學’或退會。除院方決定外，也尊重個人的志願，即雖經院方決定留會的仍須本人自願才轉爲‘初學’。

‘初學’是一個轉折階段，即由一個普通學員轉爲修女入門的階段。按教會的說法，這是天主的聖召。凡志願轉爲‘初學’的修生，仍須主教批准，一經批准後的女修生，就要穿起女修會發給的‘會衣’，成爲‘初學班’的成員。每班有5至6人，由一位稱爲‘初學師’的在班內作指導，這位初學師實際就是對女修生進行具體的傳、幫、帶的神修指導員，無論在要理學習還是在生活上都與修女同在一起，日夜不離，並對她們嚴格管理，首先要求她們鑽研聖經、熟讀會規，其次是學女紅、做祭衣、學傳教和打蠟燭等修女該掌握的基本功。在這個進修階段，修生絕對不准回家探望父母和親人，也不准與外界接觸。思想、行動、生活和學習全部按教會的規定去做。這是能否成爲修女的一次嚴格考驗，稱‘初學階段’。

通過‘初學’一年時間的嚴格訓練和考驗以後，由院方鑒定誰够條件當修女，鑒定的標準是看她爲教會服務終生的志願是否堅定；對放棄世俗的榮華富貴和擺脫世俗的一切引誘是否堅決；是否誠心誠意把自己的一切無條件獻給天主。誰能在上述這些方面被證實是經得起考驗的，就作爲學成。這時，還必須由主教祝聖，在祝聖禮儀上發‘貞潔、神貧、聽命’三願。貞潔願就是終守童貞，不婚配。神貧願就是不貪圖富貴榮華，甘心過着貧窮、樸素的生活。修女的衣、食、住、用全由修院供給，有病由修院醫理，自己身無分文，出外傳教的費用也是實報實銷。聽命願就是無條件服從教會的命令。修女發了三願

後，就正式成為修女，以後按各人所長分派工作，其中有擔任中小學教師的，也有當傳教工作的，有的派去慈善機關如醫院、貧民教養所等。由於修女的生活全部由修會供給，因此修女在外邊工作的勞動報酬，也全部上繳給修會。

十年動亂期間，修女們離開了修會，各自尋找生活，‘中華無原罪女修會’也因而停辦。

石室聖心大教堂重新開放之後，為了使教會事業後繼有人，廣州教區決定重新興辦女修院，並由原‘廣州教區無原罪女修會’第三任會長陳志道任修院院長。

進入一德路舊部前的石室聖心堂後，沿着東邊一條花草蔥籠夾道的走道，一直走到深處再往東拐，眼前出現一棟不高，但經過精心修葺的舊平房，這就是現在的‘廣州教區女修院’。這裡原是天主教聖方濟各男修院校園的空地，文革期間，被交運醫院佔用了一座平房作為職工膳堂，文革後落實宗教政策，該房退回教會。教會利用它修建了教堂、宿舍、接待室、琴室、廚房及膳堂，並添置了必要的教學設備。走進去，只見七、八個女修生正坐在簡陋的教室裡，或在學習聖經，或在做作業。我驚訝她們都那麼相似：略矮、略胖的身材，剪着齊耳的短髮，穿着瓦藍色的衣褲，顯得樸素而又端莊，圓圓的臉上，露出女性特有的腼腆和虔誠的笑容。

院長嫵嫵告訴我，她們大都是來自陸河、揭西等地的姑娘，共有14人，年齡均在20歲開外，對天主懷有虔誠的熱情。如班中有一姓王的女修生，今年29歲了，自小嚮往獨身，信仰天主。十多年來不斷有人找她或去找她父母提親，她總是拒絕說：‘不要再來找我，我已決定終身奉獻給主。’一有機會，她便來當女修生了。我問院長：‘大城市有女青年來考女修生嗎？’院長說：‘因大城市的物質引誘多，所以城市的女青年做修女的就少。’‘她們為何聖召少一些？’我問。嫵嫵怕我聽不明白，便避開了深奧的神學問題，簡單地說：‘主要是大城市的女性習慣了繁華，習慣了紅塵，不易守獨身，不適合為教會工作。從當前的情況來說，有一些女孩子崇拜獨身主義，要求來石室聖心堂當修女的光報名就有幾十人。但我們對女修生的要求很嚴格，一、要身體健康，要愛國愛教；二、要本人自願，父母同意；三、要辦好一切手續，還須考慮她們將來的出路問題。我們女修院的規定是：先讀二年初，然後再讀三年或四年，便可發初願成為修女，發了初願後的修女，仍可選擇自己的將來，如果改變獨身主意，需經教區正權主教和院長批准後才可離開修院，每個修女一般都經過二次或

三次發願後最後才發終身願，終身願即表示自己終生獨身侍主。完全應該根據她本人的意願決定，只要求發願後的修女誠心信仰禮神。人對人是要講信用；人對神更要講信用。我們都向女修生們鄭重地講清楚，說你們對我們，可以欺騙一千次，一萬次，但欺騙神，一次都不成……’。

‘請問您是什麼時候開始信教的呢？’我冒昧地問，陳院長緩緩引我至天井旁那間簡陋的會客室坐下，垂首低眉，用低緩，卻異常清晰的聲音，向我講了下面一番話：

我是順德馬齊人，幾代人信天主。我一出世就受洗了。18歲來到廣州進女修院，一直為教會服務。現在這批女修生在這裡學東西，她們已經早有志向。我們是根據她們有意思守得住，人品好，身體也好，有奉獻天主的意向，才收來這裡，學社會科學、學宗教聖書。一年後，雙方認為都可以，就再學兩年規矩，然後入我們會為教會工作。一方面打理教會、聖堂，另一方面要教人道理，對孤苦老人要去巡視。過去修女做許多善事，如開孤兒院，麻瘋病院和辦學校等。這些現在已由政府接管打理，不用我們操心了，但我們還常常組織小小的對孤寡老人的救濟，組織下鄉巡視教友，等等。現在這班女修生還未發初願。我們要在兩年內認真訓練考察她們，認為滿意，才讓她們發願。我們這個女修院，不是一下子想來就收留，因為這是個終身問題。她們已經考慮得很清楚，還要有她們所在地的本堂神父認真考察過，認為可以，向我們推薦，我們才收。當初，我們沒有發招生通知。只向各地神父及修生打了個招呼。如發招生通知，便有很多人要來。現在就有許多人來問還收不收人？湖北省也有二個大城市的姑娘，寫信來要求進女修院，表示不願意結婚，不願意一輩子在世俗叢中，而願意一輩子侍奉天主。其中一個是在賓館做的女子，另一個是師範學院的教師。但考慮到她們對我們還不甚了解。加上年紀一年年大了，思想也會變，所以我們讓她們再三考慮，前途的事情不能強求。如到再招生時，他們仍然不願意再做世俗中人，就寫信來吧。我們做修女，要終身聽話，要考慮每個人行不行，不行就走，給她們幾年機會。我對她們的言行品格要嚴格鑒別。我們要離開繁華社會不看。至於我本人，對於世上的東西已經遠離好久，好久，無眼看。日後，我死了，肉身爛了，靈魂卻永遠存在。我們教會的宗旨是救贖靈魂。我們的工作也主要是為了人的靈魂……

陳院長講到這裡，眼皮更低得耷拉着，聲音也更低緩了，使我感到她很累。我有點不忍心再打攪她，

便問了一句：‘你的女修生們都好吧？’

陳院長抬抬眼皮說：‘我叫兩個姑娘來跟你聊一聊吧。’

虔誠地送走了陳院長後，不一會兒，兩個充滿青春氣息卻又樸素無華的姑娘，出現在我眼前。

‘我叫黃曲蕉，’其中那個身高適中、略胖、眉清目秀，有張白裡透紅的臉，長着幾顆青春豆，一頭黑髮像烏雲般的姑娘，略帶着幾分腼腆，自我介紹說：‘我是陸河縣人，家庭世世代代都信奉天主。現家中有父母，有一個姐姐和弟弟。但我們村沒有教堂，隔鄰村有一間。因為交通不便，我只在瞻禮日才去上教堂，一年大概去五六次。我自從信奉天主，年紀越來越大之後，看到世俗的世界就感到厭煩。在我們村，我有不少同鄉姐妹，讀書畢業回鄉後，不外乎就是種田、嫁人、生兒育女，圍着鍋台團團轉，一輩子就為自己的吃、喝、住操勞，對人生社會沒有什麼大的貢獻，也沒有什麼思想，我從18歲開始便產生了做修女的願望。但常擔心自己沒有決心。到20歲上，我終於決定下來了，才告訴爸爸媽媽。爸媽聽後，並沒有驚奇，只對我說：這是你自己的終身大事。你已長大成人了，應該有自己的選擇。於是，我便將自己的願望告訴了本堂神父。去年我21歲時，神父知道廣州要招女修生，便首先考慮我。我們鄉，就來了我一個人。’

對我決心終身侍奉天主，教友們知道後都很贊賞羨慕。但不是教會裡的朋友，卻很不理解，問我：曲蕉，你這麼年輕，今天社會到處有生意做，到處有錢賺，你為什麼偏偏走上這條路呢？她們不理解我奉獻天主的意義，我便回答她們說：我自己決定了這樣做，我覺得有意思，你們不要干涉我。

至於說到男朋友什麼的，我從來未結識過一個。未曾產生做修女願望的時候也沒有往這方面想過。學習到結業，經過各方面鑒定認為我合格，我便要發願成為修女，實現自己的理想……。

‘你呢？叫什麼名字？’我朝那個看上去年紀比曲蕉稍大一點的女子問。她長得小巧玲瓏，白皙的臉上，長着小小的眼睛，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嘴吧，整個人透出一股機伶勁兒。但沒想到她比黃曲蕉更腼腆，催問了兩聲，她才紅着臉，嘴角漾着笑意說：‘我叫余瓊花，也是陸河縣人。其實，我哥哥早幾年便到武漢神學院修神了。’

‘你家也幾代信教嗎？’我問。

‘是的，’瓊花說，‘我爺爺，奶奶，爸爸，媽媽都信教。我出世幾個月便受過洗了。’

‘你今年多大了？念過幾年書？’

‘我24歲了。小學畢業。’說到這，瓊花又紅着臉。

‘你是什麼時候產生當修女的願望的？’

‘18歲，我哥哥到神學院後，我便對他說：什麼時候得知女修院招生，通知我。’

‘為什麼呢？’我追問她。

她又紅着臉一笑：‘不為什麼呀。當時自己想有許多姑娘為了天主而獻身，自己對她們非常仰慕和崇拜。父母都很贊成我的想法。’

‘你和你哥都走了，誰照顧你們父母親？’我有點擔心地問。

‘我有六兄弟姐妹呀！’瓊花變得有點爽朗起來。

‘你們現在學習，考慮發願的事嗎？’

‘當然考慮，’瓊花變得嚴肅起來。‘去年八月十五日舉行初學儀式，我們所有女修生在教堂裡站在天主面前，葉蔭芸大主教向我們每一個人發問：‘你還願不願意學習下去？’我們每一個人都莊嚴地發願說：‘願意’。這樣，便留下來繼續學習。’

‘跟在農村時比，你覺得自己有變化嗎？’

‘有時早晨默想時，我也會想這個問題。我覺得進女修院後，學到了許多東西，明白了好多道理。以前我心胸狹窄、思想單純。經過陳院長的教導和姐妹們的幫助，我逐漸知道了許多人生的道理，我覺得自己已長大了。’

‘你們大概什麼時候發終身願？’

‘可能在明年吧。’瓊花答。

這時，女修院內自辦的食堂開飯了。黃曲蕉與余瓊花兩個姑娘微笑着非常有禮貌地辭別了我。

從時間表看，她們每天早上五時半起床，六時整進聖心堂默想，念早課、望彌撒，然後吃早餐，進行文化課學習。下午三時二十分至五時三十分自修和朝拜聖體，晚上七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念晚課和內心省察。每天學習的課程有教理、政治、地理、聖經、歷史、語文、作文、音樂、打字、拉丁文、英語、醫學、刺繡、車衣等。女修院旨在把她們培養成為具有多方面才能的、能虔誠地為教會服務的修女。她們不大在乎同齡女性的青春應有的歡樂，但卻享受着天主教贖的聖愛。現在，她們雖還未畢業發終身願成為修女，但已負責着大教堂全部的環境衛生，刺繡各種神職制服。聖堂的歌班也主要由她們組成，在每天舉行的彌撒中，琴聲響處，她們虔敬地齊聲唱起對天主悠揚的頌歌，增添了教堂肅穆與祥和的氣氛……



獄中回憶：

## 盧瞎子

楊小凱

盧瞎子原名叫什麼，大家都不記得。所有的人都稱他盧瞎子，連劉所長也如此稱呼他。他戴一付深度近視眼鏡，鏡片後的眼睛眯成一條縫，看去就像瞎子一般。他的綽號大概就是由此而來。盧瞎子個子瘦小，穿一件醬色的高級毛料服，外面罩一件粗布中山裝。光看他那件罩衣，他是個窮光蛋，但實際上他在長沙繁華的商業區八角亭有地皮，有一幢三層樓的大房子，家裡藏有很多金條，是有若干台製造鞋子的機器的‘資本家’。據羅鋼說盧瞎子是看守所的常客，已經被關押過很多次，所以把看守所當成臨時旅館的扒手不少都認識他。

盧瞎子表面非常隨和，與一切人都能談很久；他關心一切，喜歡打聽一切事情的細節，從衣服的裁剪，牙刷的功效，大便的成分，直到當前的政治。和他處久了，人們會發現這根本不是他的個性引起的，而是他做生意養成的一種習慣。他有次告訴羅鋼，任何事都有相互的影響，對這些相互影響知道得越多，就會有更多做生意的機會。

盧瞎子雖然是九號監房中最富有的人，卻也是最小氣的人。他雖對牙膏的功能很有研究，卻從不用牙刷牙膏。他身邊保留着一根小竹絲，他每天用它刮自己的舌頭，然後用水清理牙齒。羅鋼嘲笑他爲了省幾個錢連衛生都不要了。文少甫替盧瞎子辯護道：‘他可能是自幼養成習慣，改不了啦，你怕他真的捨不得那幾個牙刷牙膏錢喲！他年輕時要是沒有這個習慣，怎麼能從一文不名積累起今天這麼多的財富呢？’

盧瞎子是我有私人關係的第一位‘資產階級份子’。以前我只從書本上得到資本家的概念。我很想了解他的經歷，了解他是怎樣發財的。但是盧瞎子不太看得起我這種沒有社會經驗的青年學生，對我提的問題總是表示不耐煩。然而當他從羅鋼口裡知道我就是‘中國向何處去？’的作者時（盧瞎子比我遲進九號，他沒趕上我進九號時人們探尋我的背景的局面），對我有了一些興趣。他告訴我‘我也經常想“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我問他：‘你看過

這篇文章嗎？’‘沒有！’我心中暗暗好笑，他對巴黎公社的民主絕對不會有興趣，他的興趣當然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上。也許他想當然地以爲我的文章一定是討論中國應該搞資本主義還是應該搞社會主義這類問題。我不想給他潑冷水，希望他保持着這種誤解。

盧瞎子終於跟我談起他的事業。這應該歸功於羅鋼和其他喜歡捉弄他的扒手。扒手與盧瞎子惡作劇時，我常加以制止，這自然使我與盧瞎子有了份親近。羅鋼喜歡講綠林義氣，‘有福同享，有禍同當’，他看不慣盧瞎子的‘小氣’以及他‘獨善其身，不求於人’的處世態度。更不幸的是盧瞎子有些非常奇怪的習慣。例如他從來不洗腳，也不換襪子，但隔幾天要脫掉他的臭襪子，把他腳上的髒東西抓到鼻子邊聞來聞去。他大概就愛聞那股刺激人的臭味。有幾次羅鋼看到他聞臭腳味，就走過去搶掉他的眼鏡，揚言‘你是哪根腸子快活，一定要當衆聞臭腳丫子？你不保證不再當衆脫臭襪子，我就再不還給你眼鏡。’盧瞎子大聲抗議，沒有人理睬他。最後我提議將條件改爲盧瞎子保證不讓羅鋼看見他脫臭襪子。

羅鋼馬上表示接受，盧瞎子也只好屈服，發誓不再讓羅鋼看見他脫臭襪子。盧瞎子另一個壞習慣是打鼾。他打起鼾來驚天動地，全身起伏，簡直叫人難以相信他是睡着了。每當他打鼾，幾位扒手就喜歡用小紙棍去撥弄他的鼻毛，每次都要把他弄得大發脾氣才罷休。

盧瞎子告訴我，一九五〇年他十八歲從高中畢業就開始做各種小生意。最早是賣‘扯蔗糖’，這是種摻有芝麻的粘糖。小孩買這種糖時，由盧瞎子從一大堆粘糖中扯出一個頭交給小孩，小孩用力一扯，扯得多少就得多少，價錢是固定的。很多小孩被這種有遊戲和賭博味道的生意所吸引，使他賺了一些錢。他還賣過一種小吃拼盤。顧客全是小學生。他用一個分爲十幾個格子的大木盆裝着十幾種小吃，有糖姜、果脯，甜紫菜，山楂片等等，五分錢可以買一小包，其中每種食品都有一點。他還做過一種叫做

‘西洋鏡’的生意。那是一種簡單的幻燈片，他從上海買來的。其中有世界各地名勝的照片，也有半裸的西洋女人照片。他的西洋鏡是一個手推車上裝的方盒子，盒子上有供一人觀看的鏡片，從鏡片可以看到盒子內的幻燈片。盒子用黑布蓋着，盒子上是廣告，寫着‘世界名勝，西洋美女，五分錢遊遍世界名城，欣賞摩登女郎。’

盧瞎子還做過其他十幾種小生意。他經常去上海，學習一些新的經商之道，買些新設備。一九五〇年上海新建一座私人味精工廠，要向全國各地打開銷路。盧瞎子承攬了在湖南推銷這家工廠的味精的業務。他雇了一位秘書（他的一位表妹），買了一台打字機，油印了很多介紹味精的材料，然後寄給全省各城市的商店，請有興趣的商店與長沙的代銷處聯繫。代銷處辦公室的地址就是盧瞎子家的地址，電話號碼就是離他家最近的一處公用電話號碼。各地的商店經營人看到打印得漂漂亮亮（以一九五〇年代初的水平為準）、印有辦公室電話號碼的材料，絕對以為這是一家像模像樣的商號。

當時正是內戰後的繁榮時期，外國的商業競爭被美國的封鎖消滅了，共產黨當時還鼓勵私人資本的發展，所以那時是中國商人做生意的黃金時代。味精很快打開了銷路，二十歲的盧瞎子馬上成了新的暴發戶。他的工作就是把訂購單寄給上海的工廠，商品托運到長沙後，盧瞎子去郵局將這些貨轉寄給全省各地的商店，連倉庫都不需要。工廠為擴大業務，給了他一次大甜頭，在一次產品大減價前，讓他以新價格買進味精，在公開減價前讓他按原價銷售。盧瞎子從這次工廠折價賺了一大筆後，在長沙的商業寶地一八角亭買下一塊臨街的地皮，修起一座三層的洋樓。從此他有了一個正式的鋪面，他的業務也從味精擴大到機器買賣和製鞋。

好景不長，一九五六年公私合營運動來了。所有資本家在共產黨一九五三年發動的‘三反五反’運動中早已大傷元氣，共產黨在公私合營運動中稍施壓力，大多數資本家就把自己的企業自動交給了共產黨。可是盧瞎子堅決抗拒公私合營。他一直拒不把他的營業大樓交給國家，並一口咬定‘共產黨的政策是自願互利，我就是不自願，也不要你的利！’

上海味精廠已經公私合營，共產黨接管了工廠，應允給原來的老板象徵性的固定股息。合營過程中，原來的老板給盧瞎子留了個月薪四十元的職位，讓他去上海味精廠。盧瞎子一口拒絕。他買了幾台製鞋機器，就在自己的營業所內生產鞋子，一樓的店面仍用作買賣。共產黨對盧瞎子極為惱火，動員他

僱用的工人與他鬥爭。要求縮短工時，增加工資和勞保福利，並指責他剝削工人。盧瞎子決定解雇工人，自己和妻子親戚來掌管機器。共產黨馬上通過工商聯出面干涉，不允許解雇工人。盧瞎子決定向法院告狀。他以五十年代他能找到的所有共產黨的法律文件為根據，為自己的解雇權辯護。共產黨的法院自然偏袒工人，盧瞎子被法院罰款，並被指責為抗拒社會主義改造的反動資本家。盧瞎子還不甘心，他把所有雇工的業務都停掉，只留下兩台機器讓他太太照管。他自己又到湖南省高級法院上訴，法院根本不理睬他。他又找省人民政府，結果反而被接待他的官僚教訓了一頓，叫他不要抗拒社會主義改造。他根本不聽這一套政治宣傳，總是重複他那幾句話：‘政府司法機關以法律為準繩以事實為根據，這不是你們共產黨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的嗎？’最後盧瞎子乾脆被機關傳達室拒於門外，根本見不到法院和省政府的官員了。

在多次找官員的過程中，盧瞎子受盡了氣，逐漸發現像他這種平民百姓，如果穿着呢料衣服，政府機關的傳達對他就採取歧視的態度。因為在當時的社會中，穿着筆挺是共產黨高幹的特權，平民百姓穿得太闊綽，馬上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和剝削者。而共產黨的高幹穿得闊綽卻會引來尊敬和羨慕。盧瞎子悟出這個道理後，就總是在他的呢料衣服外罩一件舊粗布衣服。這果然大大增加了接近高幹的方便。他那些日子到處打聽市長，市委書記之類大人物的去向，一聽說他們去了某公共場所，他馬上跟去，試圖將他的申訴書遞給他們。看他穿着樸素，市長對他態度還不錯，接下了他的申訴，說回去好好研究。

不久研究的結果就回來了。盧瞎子在一九五八年反右派運動的後期被劃為‘反社會主義改造的壞份子’，成了專政對象。街道派出所對他監督改造，他連完全的人身自由都沒有了。政府人員強行佔據了他的營業大樓，宣佈徵用一二樓。

一九六四年，共產黨推出城市私房改造政策，要求把城市裡的所有私人房屋改造為國家所有。在這個運動中，盧瞎子的商業樓房和他的私人住宅被正式充公。他反過來要向政府交房租住他自己的房子。盧瞎子上北京告狀，結果被公安局押回長沙，作為不服管的壞份子在看守所關了一年，一九六五年被釋放。文化革命中盧瞎子被抄了家，家裡的金條被紅衛兵抄走，人也被趕到大街上，他又去告狀，結果又進了左家塘看守所。

他相信自己沒犯法，不時背誦一九五八年憲法中關於保護公民財產的條款。他是九號中最心安理

地等着被釋放的人。盧瞎子對共產黨有很多批評，一講起共產黨對資產階級的歧視和共產黨在商業和經濟活動中的壟斷和搶劫，他就一肚子氣。‘他們剝削工人是好的，叫作做貢獻，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要是私人雇了工人，即使給的工資高得多，也是資產階級的，反動的。三杆槍比着我，我也不會承認這種共產黨邏輯是真理。同樣的生意，你做叫做投機倒把，不法奸商，他做就叫做社會主義，天經地義！’盧瞎子舉外貿和糧食做例子：‘你看政府做外貿低價進，高價出，買空賣空，一轉手賺一倍甚至十幾倍，既合法又合理，還是社會主義。’

有次盧瞎子與我講起公私合營後的工廠裡的管理，憤憤地說：‘共產黨在工廠裡一年四季是運動，年初是開門紅運動，年中是月月紅運動，年底是大戰四季度紅到底運動，所有運動都是要工人多做事少拿錢，這可是比資本家厲害得多的剝削。如果私人資本家這麼做，早就被打成不法資本家了！’

盧瞎子對技術和知識的鑽研勁頭使我讚佩不已。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任何人像盧瞎子那樣對技術和知識如此敏感。他對各種機器的原理，結構和技術細節有極大的興趣，他與懂各種技術的不同人可以討論技術細節連續幾小時。對法律和各種工藝他

都有極大興趣，喜歡刨根問底。他甚至對馬克思的資本論也有興趣。我弄到馬克思資本論的一至三卷，他翻了翻，挑出第三卷一口氣讀完，因為這一卷中有很多勞資法律糾紛的案例。從盧瞎子身上我發現私人企業家原來是社會上最勤奮、最聰明，靠技術和知識為社會作出貢獻的人。盧瞎子這個活生生的資產階級份子使我懂得了共產黨詞典中資產階級概念的虛偽性。

直到我判刑時，盧瞎子還在九號，我離開九號時忍不住對他的那種心安理得地等待被釋放的處境產生了一絲嫉妬，離開九號時，我每次回想到他都使我體會到，是他的命運告訴我共產黨人對私人企業家的迫害和歧視及對財產的侵犯是何等殘暴無理。在盧瞎子看來，他自己對自己財產的權利是如此自然、合法而合理，而共產黨的理想和整個意識形態卻與如此自然合理的事不相容。原來在我心目中神聖的共產主義理念被盧瞎子的故事變成與基本人性和正義不相容的東西。好多年後，我還會想起盧瞎子那握有公理和正義的自信心，我變得越來越喜愛他這份自信，雖然我後來再沒見過他，也不知道他後來的命運。

##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論文〉發行啓事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正式出版發行〈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論文〉，并向廣大讀者和作者征求訂戶和稿件。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是在美國註冊的非政治性、非盈利的學術和政策研究機構。其宗旨為：集中海外專家學者的智慧，本着“自由、科學、創新”之精神，着力研究當代中國基本問題。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力圖隨時局的變化，研究和制定出可供選擇的治國方略，為推進中國的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作出切實的努力。中心董事會成員為：丘宏達、余英時、沈君山、谷梅(Merle Goldman)、陳一咨、許卓雲、費景漢、黎安友(Andrew Nathan)、蘇紹智。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論文〉的宗旨是為公眾提供對當代中國的研究成果。研究範圍包括與當代中國有關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歷史、及國際關係等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領域。研究成果既可以是純學術、理論性的，也可以是具有實踐意義、政策性的。在選擇論文時，〈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強調文章的學術質量和對促進中國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貢獻。所有來稿均經同仁審閱，并由編輯進行適當編輯。對於過長不適宜在刊物上發表的論文，以及內容針對中國讀者，不宜在海外學術刊物發表的論文，我們鼓勵作者向〈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論文〉投稿。稿件形式為中文全文加英文摘要，或英文全文加中文摘要。稿件一經採用，即付稿酬。第一期已于一九九零年十一月出版。刊登了程曉農的〈“六四”之後的中國經濟與經濟政策〉和楊小凱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教訓〉。〈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論文〉計劃每年出版十五到二十期。單位訂戶每年四十美元，個人訂戶每年三十二美元，學生訂戶每年二十八美元(美國以外的訂戶每份另加十五美元的郵費)。支票請開：CENTER FOR MODERN CHINA 投稿及訂單請寄：P.O. BOX 894, NEW YORK, NY 10025



吳明禮

## 古董倒爺

在北京西直門外高梁橋一帶，有一處古董市場，我在那裡結識了一位青年，初次見面，並沒多談。幾句寒暄過後，他就忙他的事去了。

他身材不高，臉上棱角分明，留着新潮髮型，穿着那種‘花花公子’牌的深色肥褲子，褲兜上掛着一隻BB機。和我一起逛古董市場的朋友告訴我，這家伙今年二十七歲，前些日子剛發了一筆財。

再次碰見他，是在夏天的一個黃昏。那是在地安門十字路口，他主動向我打招呼。他身旁站着一位姑娘，兩人正大嚼着羊肉串。那位姑娘身材很好，穿着時髦，懷裡抱着一隻據說價值一千七百元的哈叭狗。見我走過來，她掏出手帕，擦着嘴角上的紅辣椒末兒。他讓姑娘先回家去，然後把我拉進了路旁一家飯館。他說他想喝幾杯，跟我聊聊。

哥們兒看你面挺善的，所以才想跟你聊聊。真的，我會相面，一般人蒙不了我的眼。上次跟你在一起的那位是哪兒的？那小子眼够賊的。他是個買主，但你很難在他那裡賺到錢。他太精了！在攤上我親眼看見過他把一個開價兩千塊的玉石四面人、楞砍下來1995。那東西竟讓他花五塊錢給買走了。他對賣主說：‘這玩意兒要是真的，你開價兩萬都不算胡要，可惜它是個假的。我給你五塊就是個辛苦錢兒，這玩意兒作舊作壞了，你還不如新着賣，沒準兒還能賣個10塊，20塊的。’你說，這話有多損！旁邊大家伙兒都聽着，叫人家的買賣怎麼做？可不五塊錢趕緊出手走人吧！我上次沒跟你多說，也就是怕他這一手。他太識貨了。

干我們這一行的，可不就是蒙對蒙，坑對坑！你把我蒙了、坑了，我不嫉恨你，也不去找後帳。看哪天我再把你蒙了，那才叫本事。道行大的人帶眼來，傻帽兒帶着錢來。就是這地方，要不您就別來！

這地方淨是這主兒，趁着天不亮或天快黑的時候，拿着件東西半露不露地跟你這兒晃，說什麼他這東西是從一個宮女或太監家裡弄出來的；說是他們家小輩兒們不成材料，好賭，實在沒錢了才賣了這東西。要不就雇個農民給他看攤，說他這些東西都是村裡挖水渠時挖出來的，好不容易才弄出來，差點兒讓人逮着之類的瞎話，而他在一旁幫腔、哄價兒。其實，他們一屁三謊，全他媽是假的。當然，這市面上也時不常地露些真貨，而且有時連賣主自己也並不知道他這貨的真正價值。這時就看你的了。

一次下鄉去收東西，我在河北省白溝河大集上，就買過一件便宜貨。那是件青花釉裡紅，中國瓷器中的珍品，當時就被那個老農放在地下，緊挨着一堆土豆旁邊。我一下子就被那件東西吸引了。此類瓷器中的所有特點，那件東西都具備：胎質、造型、釉色、紋飾、款式，我翻來覆去地看了好幾遍，認定了這是件真東西。這是個脛瓶，脖兒上短了點兒，估計是上面被磕碎過或有過傷，被鋸掉了。行話管這兒叫‘抹脖兒’。這件東西要是沒有這點傷，恐怕是說不准它到底能值多少錢了。我對那個老農說，他這件東西能值100，他卻開口要我給1000，我說這東西被抹了脖兒，是要命傷，他猶豫了，自動降價要800。又經過一番討價之後，以500元成交。拿到了這件東西，我決定哪兒也不去了，徑直回了北京。

說實話，這件東西到底能值多少，我心裡也沒有個譜兒，但這並不影響做成買賣。這裡面有個學問，就是你光聽人家說，看他給開個什麼價兒。我把這東西拿到市面上，先不忙着賣掉。當我覺得大概摸準了這東西到底能值多少之後，再開價兩萬。不到半個月，以9000元出手了。當時，我覺得自己賺大發了。但沒想到人家轉手就把那件東西以5萬的價兒賣了出去。後來我聽說，南邊來的人以17萬的價兒給買走了。我還聽說，一件跟我那件東西基本一樣，就是沒給抹脖兒的青花釉裡紅瓶，在香港拍賣市場，以兩百萬美元的價格成交。學問呀，真他媽的學問！當我聽到這些之後，差點兒沒背過去。可幹這行就是沒有後悔藥可吃，你有什麼轍？！

我們家有三個孩子，按別人看來，我哥我姐都比我有出息，都有份正經八百的工作，可我比他們有錢，在錢上他們不如我，他們瞧不起我，有時還發慈悲似地想把我往他們那條道兒上引。可我不幹。我覺得每天早晨起來就忙，到廠裡幹一天活兒，晚上回家接着忙，太沒勁！一個月還拿不到幾個錢，哪兒比得上我，一年不開張，開張吃一年。我吃着、喝着、坐着、玩兒着，就把錢給掙了。

我爸、媽都是老實人，都是工人，退休後，好像一輩子的活兒還沒有幹够，又都幹起了臨時工。上次我掙了那一筆之後，回到家一人甩給1000塊，沒想到，這錢怎麼用過去又怎麼甩了回來。他們嫌這錢髒，不願沾。我急了！說：‘好心沒好報，這他媽不是髒錢，不是偷來的、搶來的，這是我靠眼力、學問掙來的。’我哥說，‘你有屁學問？’要不是我媽拉着，我們倆非得打起來不可。我媽、爸管不了我，嘮叨煩了，我就搬出去住。我在外面租了一間房。

我是個燒包。有錢留不住，不給它花乾淨了，總像是沒辦完事兒似的。你剛才看見的那個小妞，是我新掛上的，在她身上我就花了幾千了，本來挺好的一個姑娘，當‘空姐’的料兒，讓我給糟蹋了，想起來也够造孽的，她原先在民航一個專門培訓空姐的學校裡上學，和我好上之後，三天兩頭地曠課，讓人家給開除了。這不，現在跟我一樣，整天沒事兒可幹，溜溜逛逛就是一天，有時候也挺煩的。看得出來，她現在有點三心二意了。她老跟我念叨要上個夜校，補習班之類的，說不能把英語給丟了。我沒二話，咱不能把人家的前程給就誤了，她上夜校，咱掏錢出學費還管接送。這事已經談定了，下月就開始。說實在的，我心裡全明白，在不少人眼裡，我這樣的人算個什麼東西。她能跟我過上幾個月，已經是太够意思了。要問我，我們倆人之間有沒有愛情，肯定沒有！我們倆都不懂什麼愛情，有的只是需要，彼此都需要，所以就弄到一塊兒了。

她能跟我在一塊兒，確實使我感動了好一陣子，我大把大把地往她身上花錢。那會兒她還上學的時候，住在學校裡，我總是車接車送。我還給她買了不少衣服，只要是她喜歡的，我總是沒二話。也許用不了多久，她就會離開我。走就走，沒關係，我絕不纏着她不放。她今後有事求到我，我還會照樣幫忙。要說感情，沒準兒這就是，我也說不清楚。（停頓）對待女人我的經驗是，別那麼死纏着，那樣反而會招人討厭，招人看不起。

這行當，我已經幹了五年。在圈子裡，我屬於進去較早的小輩兒。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當時到我爸他們那個工廠去做臨時工。原來是有戲轉正的，自己因為出了點事被局子拘了10天，廠裡把我給辭了。

事情是這樣：在廠裡幹活兒的時候，同班組有一位大姐待我很好。說是大姐，其實只比我大三歲。我覺得，她處處都照顧我，替我說好話，人特好，和她在一起，我總有一種特別踏實的感覺，可就是這麼一

個好人，卻總挨丈夫的欺負，總挨打。一天，她沒來上班，我猜想準是又出事了。趕到她家一看，果然如此，她正躺在床上，胳膊上纏着綑帶。原來是昨天夜裡，她丈夫在外賭錢又輸了，回來沖她撒氣，把一個剛灌滿了的熱水瓶，砸在她的胳膊上。結果，熱水瓶碎了，胳膊傷了。她邊說邊抱着我哭了起來。我當時的心情簡直沒法兒說，我也哭了，心裡像刀扎似的，看她還沒吃飯，我給她做了碗麵條，又出去給她買了些水果，然後就走了。其實，我並沒有走遠，出了門就在離她家不遠的地方坐了下來，一邊抽煙，一邊耐心地等着她丈夫回來。我也說不清，當時自己是怎麼想的。我撿了幾塊半頭磚放在身旁，腦子裡不斷地盤算着到時候怎麼下手最好，根本沒有想過後果。

他回來得很晚，大概是晚上10點多鐘了。我看見他騎車過來，就站起身喊了他一聲。他停下來，轉過身，大概還沒弄明白怎麼回事，我這一磚頭就直沖腦袋拍了上去。他當時就花了，滿臉淌着血。我跟着就用磚頭狠砸他的左胳膊，因為她傷的就是左胳膊，也得讓他嘗嘗這滋味。我也忘了到底拍了多少下，反正一直到他牽拉着膀子，低着腦袋捂着臉靠在牆上不再動彈時，我才住手，整個過程，我一句話沒說，估計到完了他也沒鬧明白我是誰。不巧的是，就在我拔腿要撤的時候，正撞上了巡邏隊，他們不由分說，把我給帶走了。這樣，我被拘留10天，事情也都讓人家弄清楚了，廠子裡也就把我給開除了。

這事兒，我至今也不後悔，那小子別讓我碰上，碰上了我還得揍他。四年多過去了，我這位大姐至今還這麼對付着，並沒有離婚。我勸她，她總說我選小，不懂得這些事兒，婚哪兒是說離就離的，眼前擺着這麼個例子，使我對結婚這事兒，也不那麼上心了，光棍一條挺好。

我不是個好人，但我覺得我也不壞，和別人比起來，只不過是活法不同罷了。去年春天，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遊行募捐的時候，我一下子捐出二千塊，當時我看到抱着捐款盒子，頭帶標條的女學生感激的目光時，頓時覺得自己是個有良心的人。

我要生活，而我的謀生手段就是這個，別的我不会。也沒準兒將來人家上頭政策變了，不讓這麼幹了，那也沒關係，車到山前必有路，落不下我。這麼多年了，我覺得自己不是個幹大事業的坯子，小賺着，隨大流兒走，沒錯！就在這一帶，街坊四鄰的差不多都知道有我這一號；小館子裡吃頓飯，也不用拿錢，都是賒帳。這就行了。還怎麼着？





# 愛是不能忘記的

馬奇

我和她認識很久了，一直認為她十分幸運。大學畢業不久就公費出國留學了。我第一次見到她是在大陸報社的我們部主任的辦公室裡，那時大家都羨慕她和她男朋友——我們部的青年主任，是郎才女貌的一對。她那時從美國回北京探親，幾個月新鮮的異國生活使她帶給我們許多新鮮的故事，使我對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幾天前在華盛頓開一個學術討論會，我們意外地相逢。走在國會大廈前的甬路上，她滿面憔悴，眼窩深深地陷下去，原來挺得很高的胸脯也開始含起來。我們坐在國會大廈前高高的台階上時，遠望着綠色如瓊的草坪，感嘆天地之小，她淚水奪眶而出，一種久久壓抑着的情感從心底一下子湧出來。

我一直就有一種預感，預感到有一天有一個熟悉他的人會出現在我面前。我們學校的人，無論是美國人還是中國人，都說我是在等一個永遠不會出現的人，因為他們不相信我會如此執着地等一個遠隔千山萬水的男朋友。四年了，我在美國等了他四年，而我們談戀愛在國內就已經四年了，我們總共date了八年。六個月前，我突然接到了他的電話，我興奮極了，但一分鐘後，他告訴我他已結婚了，他們是一起到美國來的。聽了這話我立刻就暈了過去。(哭)你知道我為他幾乎付出了全部精力。當一個女人全身心地愛一個人時，你們男人無法理解這種犧牲的價值。男人都是豬、自私鬼。

我和他認識是在哈工大的一次舞會上，那時他是機械系學生，校學生會的副主席。也許我那天晚上太惹人注意了，幾乎所有長得像點樣的男生都找我跳舞。他說他那天請我跳舞時，就下決心一定要把我搞到手。我那時太單純，才十九歲，穿戴又十分時髦，幾乎全校的人都知道我爸爸是駐聯合國的×××，想出國進修的老師和想把兒子送到美國的當地官員，都經常找我，請我吃飯，請我幫忙。我的家庭背景和我自身的條件，使我成為七八、七九屆的公認校花。在追求我的隊伍中，土里土氣的他從來沒被我注意過。但畢竟他是在社會中混過多年的人，上哈工大之前他在江蘇某市的一家工廠裡當車間主

任，什麼樣的事都經歷過。一個學期後，他幾乎打敗了所有的競爭對手，進入我的視線之內。你該知道，在大學裡，學生會幹部找同學幹社會工作是最普通的事，他就是利用我的虛榮心，讓我出面組織舞會，講演等各種活動來表現自己，同時也讓我發現他與那些乳毛未淨的小男孩的不同之處。我比他低一年級，在他快畢業的那年夏天，他帶我去太陽島玩，我們喝了許多啤酒，然後他就開始跪着向我求愛，海誓山盟加上不斷的眼淚。我便把曾發誓不輕易給外地人的愛給了老於世故的他。他畢業分配到北京一家報社後，千方百計地討得了正回國休假的我父母的歡心，於是儼然成了我們家的一員。等我畢業回北京後，父母留給我們的三居室成了他在別人面前炫耀的資本之一，我們也就理所當然地同居了。一年時間我為他做過三次流產手術。我出國時，便把家裡的一切都留給了他。到美國第一年，我拿的是公費，比較輕鬆地適應了學習環境，但第二年教委突然通知我獎學金終止，要我立即回國。這時我正在設法辦他出來，而且似乎有了眉目。於是我沒有再理教委，繼續我的學業。沒有錢，一切都要從頭開始。我做過保姆，侍候一個癱老頭子拉屎尿，也幹過waitress, delivery和超級市場的搬運工，那種失落的感覺簡直無法形容。就是這樣，我除了交學費，每月還八十、一百地往國內給他寄錢，幫他交托福、GRE的考試費，讓他買電視機、錄相機給他父母安享晚年。我性格看起來很開放，內心則十分保守，你知道，在美國兩性生活要比大陸開放得多。在海外的留學生又女少男多，我們學校中國留學生有兩百多人，女生只有十幾個，而且除了我之外，都長得不怎麼樣(笑)，真的，所以我便成了許多人追逐的對象。還有些美國男孩就更直接露骨地提出性要求。想起來好怕。女孩子如果沒有過性經驗還好說，有過性生活叫她像寡婦一樣熬上三、四年，無論從心理還是生理上都是很殘忍的。有一次，一個同系的美國同學約我喝咖啡，喝到一半時他開始撫摸我，我沖動極了，但一想到還在國內的他，我推開了對方的手，那個比我小三、四歲的男孩很生氣，說他怎麼也不理解中國女孩為什麼這麼不會享受，他說青春對

於人生只有一次，浪費了實在太可惜，他不懂一個人在饑渴的時候，有人送上一頓美餐卻不去吃，送到嘴邊的水卻不喝，stupid！我哭了，哭着跑回宿舍，後來那個小男孩打電話來道歉，我告訴他不必要了，因為我是中國女孩子，中國女孩子大都在性問題上很stupid。其實很多大陸來的留學生並不stupid，我們學校的女孩子大概除了我之外都和男的share一間房子。而我做不到，我覺得我應該對我所愛的人負責，這是做人的一種準則。後來我感覺到他的來信越來越少，內容也越來越沒味，但我都歸結到他在國內的工作越來越忙，而實際上他也確實有所發展。大約第三年的時候，我父親把我叫到紐約深談了一次，他希望我面對現實，不要空等。他從一個男人的角度說這種馬拉松式的戀愛對雙方都不合適。那次我還碰到了我小時候的玩伴，我爸老戰友的兒子，他現在在IBM工作，是康奈爾大學的博士。從他的眼睛裡和父母的語氣中，我知道他們希望的是什麼，但我裝做沒有看懂而匆匆趕回了學校。我把情況都寫信告訴了他。他用快遞寄過來一封二十幾頁紙的長信，歷述我們之間的感情發展過程，再一次懇求我不要丟下他，說他是為我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女孩子看到這些東西，比什麼都令人感動。我再一次花了大筆錢給他買了有關托福、GRE的複習資料寄去，並四處聯繫大學和研究機構，同時要求我父親也找人幫忙。那一段時間我身體幾乎累垮了，在中餐館扛大tray時，幾乎是用腰支撐的。有一次來‘例假’，一抬起Tray來，下面就感到在流血，兩眼直冒金星，砸過兩次盤子，最後還是讓老板給fire了。一個自費留學生本身已經很慘了，要上課、打工，還要了解這個陌生的社會，而我除了這些，還要為另一個人去奔忙，那種心力交瘁的心態我再也不想經歷了。

去年六四大屠殺後，我對中國政府完全失望了，不顧我父母還是外交官這一現實情況，積極參加了抗議者的隊伍，在華盛頓地區的每次集會我幾乎都參加了。因此有人告訴我使館已經把我列入黑名單。為了安全起見，也為了對他負責，我有一段時間不再給他寫信，只希望他常來信告訴我一些情況。也許這是我一生中做出的錯誤決定之一，當我再次得到他的音訊時就是那個從加州打來的電話。（哭）

我暈倒之後，被樓下的房東發現，將我送進醫院，我又連續吐了兩次血，被老美列為特護。這時沒有中國同學來看我，他們不理解我為什麼會這樣，只有那個被我拒絕過的美國小伙子送來一束鮮花，說他馬上就要到佛羅里達去度蜜月去了。為了省錢，

第三天我就掙扎着回到宿舍，一躺就是兩個星期。那一段時間我什麼死法都考慮過了。你不知道這件事對我打擊有多大。直到這時我才發現愛錯一個人有多慘。我沒有敢告訴我父母，但房東卻從我桌子上發現了我小時候的玩伴，那個在IBM做工程師的電話號碼，並打給了他。他第二天就從波士頓飛了過來，守護了我整整一個星期。有一天我上廁所從鏡子裡看到我的臉時，發現自己好老好難看，一臉鐵灰色。我真後悔我認識了他，也後悔我到美國來，如果我們在國內該是永遠被別人羨慕的一對，也許我們該很幸福，但這一切都失去了。我很感謝來照顧我的那位朋友，我們小時候曾兩小無猜，他費了很多口舌來開導我，講他剛來美國的困窘，騎自行車送外賣時的失落和工作之中所遇到的種種困難。他每天晚上都住到旅館裡去，白天再回到我身邊，最後一天，他突然對我說他一直在愛我，希望我能考慮。他甚至說我們小時候曾玩過‘辦家家’，我答應過要嫁給他等等。我看着顯得十分疲倦的他說，小時候的事對我太遙遠了，我已不記得我說過什麼，而人生中第一次歷時八年的愛，使我很難再會考慮別的。這個打擊實在太大太大了，我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去撫平傷口。我不可能答應你什麼，不管你是出於真心還是同情。因為我曾把愛全部給了別人，即使跟你結婚了，我也忘不了他，他會成為我們之間的陰影。即使我恨他也好，想殺他也好，但我畢竟忘不了他，因為愛是不可能忘記的。

他帶着失望走了，而我則帶着傷口回到了課堂上。這時我突然發現我有一種很強烈的回國意識，我不想再在美國這塊我曾流過血，流過汗，流過淚的地方呆下去。我平靜後和許多中國同學談過這個感覺，卻發現他們每個人似乎都有這種意識，而且又大都有過相似的經歷，這也就是為什麼留學生對六·四大屠殺的反應特別強烈。為什麼當他們看到電視上槍殺學生的鏡頭會失聲痛哭？因為他們同時也在哭自己。我們到美國幹什麼來了？為什麼吃這麼多苦，放着國內輕鬆自在的大鍋飯不吃？還不是為了更好地回去，去創造一種新生活，去改造自己所鍾愛的土地。不久前的一天我去教堂，一個神父講到：每個人都應該愛上帝，因為只有上帝才能解救你。我忽然感到心間若有所悟。我終於明白了我們這些海外遊子內心深處藏着一個上帝。一種情緒，就是對中國土地和文化的深深的眷戀。雖然我回去要冒一些風險，但是我還是決定下學期一畢業就回去。我不再恨他，因為我愛過他。我之所以要回去，是因為我一直忘不了大陸，還是那句話，愛是不能忘記的。

# 理想不死 底線可動

——與丁楚先生商榷

王建國

我喜歡讀楊小凱的文章，也開始喜歡讀丁楚的文章。他們的分析清楚、深入，見解常有獨到之處，示人以不見之處。他們的理性分析，幾乎不帶感性成份，我稱之為‘Cool Rationality’（冷理性）。

可人偏偏是一種帶感情的理性動物。對人的分析，尤其是對人的追求的分析，撇開人的感情成份，把人當着政治人或經濟人去作科學分析，其結果、結論就會失之偏頗。對人的分析，應該藝術與科學合而用之，這就有了我的‘Warm Rationality’（熱理性）。

## 一、理想不死，底線可動

建立一種底線制度，如民主制度，是爲了防止最壞的，並不一定可得到最好的。但也可能得到最好的。另一種制度，可能得到最好的，但不能保證不得到最壞的。兩種制度比較，那種理想？當然是前種。這種比較的結論雖然來自經驗，但一旦結論確定，理想也就確定了。人們把從經驗中比較而來的最好的作爲理想的東西。因此，理想來自經驗。不同經驗的人，會有不同的理想，經驗主義是理想主義的溫床，經驗不死，理想也就不死，理想死了，人就失去了追求。理想的東西，只是比現實更好的東西而已，人若不追求比現實好的東西，現實就永遠不會更好起來。現在的現實，是過去的理想。未來的現實，是現在的理想。理想一死，追求一死，人就失去了改善現實的動因。理想死不得也。

民主制度，雖然是底線制度，但對於中國人民而言，是比她現存制度更好的制度。這是經驗的結論。從經驗中結論而來的比現實更好的東西，就是

理想的東西。故現代民主制度，就是中國人的理想制度。若理想死了，中國人還追求什麼？不如就忍受這現實好了。

民主制度對於現代西方國家的人民，已是現實生活的一部份，因而不是理想的制度。他們的理想制度是什麼？一定是一種比現存民主制度更好的制度。如果他們沒有這種追求和理想，現存的民主制度就永遠不會改善。人不能只承認經驗的東西。因此，底線是可變的，並且一定會變。

比方，西方制度對人的約束，是假設人人都是個人主義者，都是自私自利的人。但事實上，並不是人人都一定自私，即使自私，其程度也不一樣。如果西方人普遍的個人主義，自私程度都改變了，普遍不那麼自私了，制度對自私的約束就不必那麼嚴格了（不然就浪費了制度成本）。可見底線是可變的。底線到底在哪裏？對不同質量的人民有不同的要求。

## 二、理想與理性

人在構建他理想的時候，倫理的，價值的，感性的，想象的成份大，人在爲達到理想目標選擇手段時，理性佔了主要成份。有多條道路，可供選擇，哪一條最有可能達至目標，成本最小？

理想，是一種價值目標，是屬於價值理性的東西，需要‘Warm Rationality’，需要帶情感、想象等。達到理想之手段的選擇，是對工具理性的追求，需要不帶感性的冷靜分析，需要‘Cool Rationality’。達到理想社會，是用民主還是階級鬥爭？是用公有制還是私有制？這是手段選擇的問題，而不是作爲目標的理想之死活問題。

如果我們的理想已經死了，追求手段還有什麼意義？丁楚先生如果這樣說：不理性的手段死了，理性的手段在哪？那麼，我的觀點就與丁楚的一樣了。

## 三、帶着火熱的理想， 去尋冰冷的手段

所有的我們，不能讓理想死去，我們的理想，是要讓我們中國人過上平等、自由、博愛、有人權和富裕的幸福生活。但怎樣才能達到這一理想之目標？西方人以民主制度爲手段和道路，我們過去的中國人選擇了共產黨，共產黨代替我們過去的中國人選擇了一黨專政，公有制的社會主義。過去的中國人生了我們。我們從經驗中看到了我國現有的制度與

西方民主制度比較，後者達至理想的目標要有效得多，要理性得多，因此我們要讓不理性的手段死去，用理性的手段去達至我們的理想。

民主制度是假設每一個人都是自利的個人主義者，因此權利、權力需要制度約束。在這種約束下，即使人人一半是魔鬼，只要還有一半是人，社會仍壞不到哪裡去。但要建立一套基於底綫人之上的民主制度去達至理想，奮鬥以圖其建立者不能把自己有意培養成底綫人。底綫人就是經濟人、政治人。如果民陣、民聯、學自聯的成員，尤其是他的領導成員都以底綫人自處，這限制、約束底綫人，防止底綫人在台上作惡的制度就永遠建立不起來。若華盛頓是底綫人，美國的民主制度在那時建立不起來。中

國早期的中共黨員可不是底綫人。沒有他們那些超經濟人、超政治人的獻身精神，現在舞台上的那些底綫共產黨人就不會有今天為所欲為的幸福生活。同樣，如果沒有我們一代的獻身精神，熱的理想去驅動我們為公共財性質的民主制度獻身，這制度便不能建立起來。

不當底綫人，帶着火熱的價值理想與冰冷的工具理性去為民主中國獻身，民主中國的實現才有希望。

我希望我們海外的十萬留學生，個個都是火熱的價值理想主義者，同時是冰冷的工具理性人。以此想着中國那塊土地，掛記那土地上的人民。價值理想不死，希望常在！工具理性不死，勝利在握！

## 政客政治和政治家政治

——與楊小凱先生商榷

李一原

我不是學政治學的。或如楊小凱先生所說，“是政治的門外漢”。不過讀了刊登在“中春”八十八期上楊先生的大作“免費搭車及在野政治”後，卻讓我頓悟了一條政治學的大道理：原來政治學有“政治家政治學”和“政客政治學”之分。而且這兩種政治學是截然不同的。

關於什麼是政治，我最能接受的是孫中山先生所給的定義：“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眾人的事，所以政治家就是願意為眾人管事的人。在民主國家，政治家是民衆的代表，代表着一定階層的民衆的利益而被選出來管理眾人的事，在專制國家，真正的政治家正是楊先生所謂的“在野政治家”。他們雖然在國家和政府的機構中沒有一席之地（或曾有過一席之地但被剝奪了），但他們對民衆的疾苦有敏銳的感受；對社會的弊病有深刻的思考；尤為可貴的是，他們有為民請命，代表人民發言的勇氣，而不顧忌這種“為民請命”可能帶給他們的嚴重後果。以這個標準看，我們都會同意說，捷克的哈維爾是政治家，波蘭的瓦文薩是政治家，中國的劉賓雁和方勵之是當之無愧的政治家。不管他們個人的意願如何，他們所作的已經把他們放在這樣的位置上。他們對中國社會的社會職能已遠遠不再是文學家或科學家了。找劉賓雁告狀的人，肯定不是為了成為他下一部文學作品中的主人公，而是懇請他“管管這種不公正的現象。”也正是因為他們

這種大無畏的精神，使他們受到人民的崇敬，成為民主運動的旗幟。

我不知該怎麼給政客下一個定義，但從楊先生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政客的大略輪廓：他們是把從政當作生意來做的。他們把民衆的疾苦和社會的弊端當作籌碼，一邊盤算着在哪兒“投資”（說些什麼或做些什麼），一邊盤算着“有效需求”，“風險”和將要“撈到的鉅大的物質和名譽上的收益”。當然，要具備豐富的“政治經驗”，能準確地判斷“有效需求”也不是容易的事。多看楊先生的文章可能有點幫助。

常聽人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卻不知怎麼個“度”法，這次讀了楊先生的文章才恍然大悟，原來就是用自己齷齪的動機去忖度別人的崇高的動機。譬如說，自己不斷地盤算怎樣從“在野政治”這個“公共財”中攫取好處，據此推度人人都盯着“公共財”這塊肥肉（膽固醇的因素暫不考慮）垂涎三尺；自己算計在哪裡“投資”可以“風險”小而獲得“可能的高報酬”，甚至連一旦投資失敗的補償方法都已考慮周到（共三條措施，見楊文），據此推度人人都是由此而刺激出“從事在野政治的野心”；自己痛感錯失了“一夜之間成為世界知名人士”的良機，據此推度別人也在尋覓這樣的機會，而且“他們的眼光的确不錯”，“一夜之間成了世界級政治明星”，自己認為“免費搭車和吃人血饅頭”因為“中國在野政治的國際

化”而變得天經地義，理所當然，據此推度人人都在等着從人血筵席上分一杯羹。行文至此，不禁有點納悶。楊先生政治經驗老道，這次何至於如此失算，狠觸靈魂，把這些見不得人的想法大白於世呢？

另一方面，楊先生有什麼證據說明劉賓雁、方勵之先生和其他“運動的領袖人物”從參加民運中“撈到了巨大的物質和名譽上的收益”？更有什麼證據說明這樣的收益是他們以及以他們為代表的千千萬萬的知識份子和學生參加民運的目的所在？倘若沒有，我們不能聽任楊先生這樣詆毀中國的民主運動。不過，讀了楊先生的“內心獨白”，我也多長了一個心眼。說不定楊先生這樣做是因為他這次“眼光不錯”，看到某種“有效需求”而作的又一“投資”。將從哪一方面“獲得收益”，我們拭目以待。

從文章看，楊先生自視甚高。“劉賓雁是個政治上幼稚得像孩子對經濟學一竅不通的人”，“淺薄得可笑”，“素質不高”；柴玲和吾爾開希“沒有政治經驗”，“信口開河說些美國人認為毫無內容的口號”；方勵之先生雖未被論及，但常與劉賓雁先生相提並論，想來也不高明，總而言之，“三流的政治家或政治的門外漢”而已。相比之下，如楊先生這樣能隨口謔出一連串政治學術語，對“投資”，“需求”，“收益”又爛熟於心的人，自然屬於他所謂的“真正一流的反對派政治人材”了。真是“天下英雄，捨我其誰”！不過，為中國的民主事業計，為中國的前途計，我們寧可要劉賓雁先生那樣對政客政治學“幼稚得像孩子”，對用政治來謀利的經濟學“一竅不通”的民主戰

士，也不要那種把政治當作生意來做的“一流政治人材”。這樣的人材多了，或是如楊先生所希望的，這樣的人“成功了”，那才是中國最大的悲劇。

楊先生很喜歡寫文章，“中國之春”也很願意刊登他的文章。老實說，我曾幾次想拜讀楊先生的大作，終因其邏輯混亂，文理不通而作罷。信手拈來兩例：

——“我所認識的很多右派分子都說文革初老百姓可以造當權派反的氣氛比五〇年代的馴服工具論氣氛要好，而真正有政治理解力的人絕不會認為中共五十年代的政績能與國民黨三十年代以來在立法、司法上的深厚基礎相比。”這就好像一個人說：“這家餐館的菜比以前做得好，但真正的美食家絕不會認為那時這家餐館的規模比隔壁的Supermarket大。”什麼邏輯？

——“劉賓雁是個政治上幼稚得像小孩，對經濟學一竅不通的人，看看他對共產黨五十年代政績的固執的贊成就知道他的犬儒主義性格。”不懂楊先生何以根據一個人的性格來判斷他的學問。

話說回來，即使是“一流政治人材”如楊先生，我們也不能要求他完美無缺。這次也是機緣所在，因便秘在廁所裡多待了一陣，一時手頭無書可讀，硬著頭皮看完了楊先生的大作，不料倒看出了學問來，真該謝謝便秘，當然，還有楊先生。

註：中文加引號部份大都引自楊先生大作，不敢掠美，特此聲明。

## 美國專利版權

為您帶來家庭愉快

# 學鋼琴電子琴和推銷琴的好消息

音符在線上就彈相應的黑鍵，音符在兩線間就彈相應的白鍵，訂購本書不學五線譜也可以馬上彈琴。〈世界名曲精選〉每本30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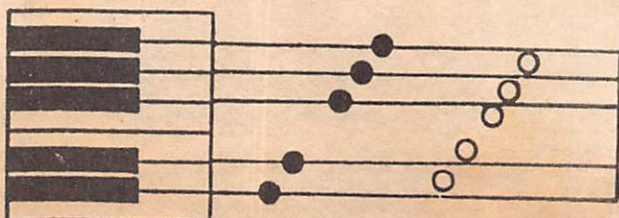
支票請寄：

American Everard Inc

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11373

Tel: (718)-507-4739



# 新移民法對留學生的影響

## 路識

“中國留美學人所應知道的移民法”至上期已全部連載完畢。就在此時，美國國會通過了新移民法。新移民法比起現行的移民法來說，改動很大，對大陸學人有不少影響。此法案將於一九九一年十月一日起開始執行。

由於新移民法長達兩百七十七頁，我們無法在此詳細介紹，何況很多章節與中國留學人員毫無關係。我們在此將對中國學人影響最大的地方簡述一下。

從表面上，應聘移民（即過去的表A移民，第三優先、第六優先等等）增多了。在應聘移民的每年十四萬人的配額中，相當於過去表A移民的人數為四萬，第三優先者四萬（過去是二萬七千），第六優先者四萬（過去是二萬七千）。移民局過去對表A移民無人數限制，新移民法限定為四萬人。從點數上，這十二萬人比之過去的五萬四千人似乎增加了很多，但中國留學人員真正受惠於此的卻要大大折扣，為了分析這個影響，先將新移民法重大的改動之處列舉如下：

新移民法在移民人數上及方式上大大不同於現行移民法，它將移民分為三大類：親屬移民（行政之一、二、四、五優先）應聘移民及多樣化移民。親屬移民每年四十八萬人；應聘移民每年十四萬人；多樣化移民每年五萬五千人。

大部份中國學人將受惠於應聘移民。在應聘移民中又分五類優先。第一優先是傑出人才。若中國學人在國內是副教授，或副研以上，論文被國際上或美方學術界公認；或者人在美國，科研成果為美國學術界公認，申請這類移民。一般說來，這類移民相當於現行表A移民。

第二優先簡單地說是具有碩士以上學位的高科技人才。大部份中國留學人員符合這一條件。

第三優先是技術勞工、專業人員。工作必須是永久性的，學歷要在學士以上，所以目前的第六優先和過去表B中的部份移民就歸結到這一項中了。

第四優先是特殊移民，每年一萬人，基本上是過

去表B移民加上部份表A移民，如宗教人士等。

第五優先是投資移民，最低要求投資五十萬美元以上，一般要一百萬美元。每年一萬人。

中國學人能夠應用的基本上是前三類優先。在申請這些優先前，或是轉成H-1（或H-2），或保持現有身份。

若能轉成H-1的話，則將來申請優先時要容易得多，因為今後申請H-1要比目前困難的多，所以將來你若得到了H-1簽證，申請上述優先就沒有什麼困難了。將來，申請H-1的第一大困難是增加了上限，每年只批六萬五千人轉為H-1。因為每年都有十五萬左右的外國學生申請讀研究生院，換言之，畢業求職的碩士以上的外國學生也不下於十五萬。那麼有些中國學人可能因為配額有限而無法得到H-1，在每年十月至三月即聯邦政府財政年的上半年度申請獲H-1的機會要大於下半年申請的機會。第二個困難是，今後申請H-1要先向勞工部申請。申請過程很類似現在辦勞工卡的過程。請記住，在美國和聯邦政府機構打交道的話，多一道手續，就多一道麻煩，也就增大被否決的機會。勞工部將要審查被僱者的工資以及該工資及工作條件對美國其他同等勞工有無不利影響。所申請的公司在僱用H-1簽證申請人時不能處於罷工狀態。僱主須將僱用外國勞工的情況通知本單位工會；所有的申請書及有關文件須在該公司有件可查，並將僱用書張貼於公司醒目之處。

這些從理論上並無困難，但從實踐的角度來看，則有不少問題，現行的移民法申請H-1很容易，只要移民局獨家批准即可。批准後就可以至少有五年的工作機會。但新移民法公佈後，將來你在申請H-1時就要小心一些了。若公司在僱用你時就願意幫你H-1，那還比較好辦。但由於好多公司不懂這有多麻煩，你在剛被僱用前也不願意告訴公司其難度，你會採用勤奮工作半年再辦的做法。這一般是可行的。但也許在你申請時，當年的名額已用盡，或勞工部對你的申請有疑議。那你的時間就不一定够

用了。

中國學人千萬不要看聘用移民的名額增多了，就認為是一件好事，自己的機會大了。關鍵應看審核手續及規定條件。因為名額完全可以用不完。剩下了讓其作廢。新移民法增加了公司的負擔（要多一次申請），增加了勞工部的權利（他們對僱用外國勞工一直不支持），因此我個人認為對中國學生們並不怎麼有利。

目前尚在學校未畢業的中國學人應看清這個形勢，若能在明年夏天前畢業並找到工作的話，應盡力爭取，並在工作後及早辦H-1，以爭取在明年十月一日前辦成H-1，進而辦勞工卡。若這樣做是不可能的，則不必着急。在找到工作後，除非僱主主動提出為你辦H-1，否則不要先辦。要在公司幹至少半年，站住脚跟後，再辦H-1。工作合法性問題，可用實習期（一年或一年半）來解決。當然，也可應用布什的行政保護法令合法工作至九四年一月一日。不過可以較有把握地說，在新移民法下辦成H-1後，再辦勞工卡就會容易得多了。

其它與中國學人有關係的新移民法是：今後F-1學生可在校外從事與學習領域無關的全職或半職工作。申請人須持F-1簽證一年以上；學習成績優良；僱主還要向學習及勞工部證明，僱主曾公開招美國勞工達六十天以上；該生的工資不低於該行業的平均工資，也不低於公司內從事同樣職業的其它僱員。這個表面上看起來不錯的規定，實質上幫不了中國學人什麼忙。公開招工六十天是最大的問題。一般公司在失去現有僱員後，需要有人馬上補充。六十天實在太長，公司決不會為了幫助一個外國學生而將一份工作空閑六十天之久。同時這個工資要求也有些不大合理。因為學生本身缺乏經驗，付低一些的工資是合理的。這種規定將使一些公司不願意僱F簽證學生，反而幫不了F簽證學生們的忙。

一九九一年十月一日後，已獲得勞工卡的中國學人要按新移民法申請優先。具體的方法和目前I-140表的申請過程相仿。

當前，美國的經濟在衰退，申請工作十分不易，希望讀者們抓緊時機，不要過於計較工資及工作地點，只要公司喜歡你，十分想要你，就應該當機立斷，早日拿到工作，學位及論文答辯可在今後完成。

另外根據國內的最新消息，中共已給各單位下了文件，是關於辦出生證明的新規定。在前幾期中，我談到了辦出生證明的事情，因為這是辦綠卡時必不可少的一個文件。

按照中共的新規定，各單位及公證處不得給留美人員開出生證明。留美人員要開出生證明的話，要去領館辦，每人要交五張二寸彩色相片，並寫明為什麼辦出生證明的理由。這實際上是中共試圖控制留學人員的又一手手段，要五張相片，也無非是在包括公安部或國安部在內的一些部門存檔留底用。

請留學人員不必害怕。沒有國內公證文，或單位的信，出生證明還是可以辦。按美國移民局的規定，洗禮神父的證明，父母的證明或鄰居的證明均可做為出生證明。因此讀者可請父母寫證明（具體一些，如什麼醫院，哪位大夫接），由你本人將此譯成英文。附上一紙說明，申明無法獲得官方的出生證明的原因。美國移民局是會承認這份出生證明的。不過想去澳大利亞移民就不可以了，因為澳大利亞對此要求很嚴。

感謝讀者的支持。中春因篇幅有限，將我的表格樣本刪去。如需要的話，全文及表格可裝訂成冊，以幫助讀者。

## 合法移民加拿大

政治難民 CR/ DC3 專案名額有限

### 條件

- (1) 返回原居地將遭受政治迫害。
- (2) 無法在現居地永久居留。
- (3) 具備基本財力，能够自行妥善安排抵達加拿大之後的生活，居住和工作，保證不致造成加拿大政府或擔保機構的負擔。
- (4) 健康狀況良好。
- (5) 非退休年齡。
- (6) 稍諳英語或法語
- (7) 無犯罪紀錄。

### 北帝諮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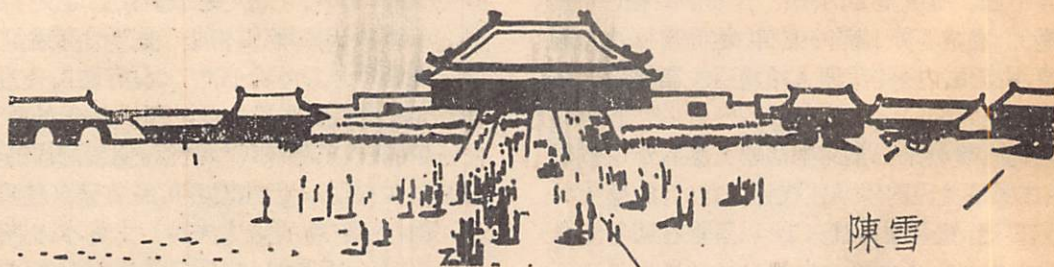
會審核您的資格，並且迅速與您聯絡。

### 來信簡附

- (1) 本人、配偶和所有未婚子女（不限年齡）的，英文姓名、關係、出生日期、出生地點、教育、職業和計劃在加拿大從事的行業。
- (2) 現居地英文地址和電話（或傳真）號碼。
- (3) 返回原居地將遭受政治迫害的原因。
- (4) 無法在現居地永久居留的原因。
- (5) 本人護照影印本。
- (6) 銀行存款證明。

NORTHERN EMPIRE ENTERPRISES INC.  
CONSULTING DEPARTMENT  
545 E. BROADWAY SUITE 519  
VANCOUVER, B.C. CANADA V5T 1X4  
TEL. (604) 431-7547  
FAX. (604) 431-7577

# 民主革命集大成者



## 一、歷史背景

在孫中山所處的時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地位，同時暴露出了它的許多社會弊病：周期性的經濟恐慌、失業、大規模的罷工和破壞、財富的畸形集中和廣大群眾的貧困、發達國家對殖民地的掠奪和爭奪等等。這時候，馬克思主義企圖以社會主義來否定資本主義，孫中山則企圖在中國的資本主義尚未成形的情况下超前防止資本主義的弊病，提出了將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同時並舉，“畢其功於一役”的主張。

在同一時期，中國的民族問題和民生問題也極其尖銳。民族問題分為兩個層次，即：佔人口百分之九十的漢族與佔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的滿族之間統治與被統治的矛盾。以及中國人民與外國入侵者的矛盾。而由於清政府的喪權辱國，割地賠款，屢屢以對外妥協來換取洋人的支持，並與外國聯手來鎮壓人民的革命運動，使清政府變為“洋人的朝廷”，這樣就加劇了漢族人民與滿洲統治者的矛盾，從而使民族問題的解決成為當時的主要歷史問題。

此外則有民生問題。清政府一味加重人民負擔，加之多年來兵連禍結，生靈塗炭，農村凋敝，民不聊生。因此，當時民族和民生問題極其突出，民主問題倒在其次。這就為革命綱領的制訂造成了一定的歧異，並在組織和行動上留下了隨時可能產生的裂痕。

綜上所述，孫中山是在一個極其複雜和艱難的歷史條件下登上歷史舞台的：上有以那拉氏為首的封建頑固派的鎮壓和洋務派官僚的打擊，旁有以康有為為代表的保皇派的反對，下有同一營壘中抱着狹隘反滿思想和復仇情緒的同志時以過激的言論和行動來降低革命運動的品質和水準，模糊對民主這一政治目標的認同。因此，在這一艱難條件下領導

革命航船成功地到達勝利的彼岸，需要的不僅是“敢把皇帝拉下馬”的革命造反勇氣，而且需要驚人的智慧和不拔的毅力。孫中山就正是應這一歷史之命運而誕生的大智大勇者。

## 二、開闢之功，肇建共和

孫中山先生生長於廣東香山縣農村的一個自耕農家庭，自幼就了解廣大農民的疾苦，並吸收了洪楊革命的薰陶。青少年時期又遠渡重洋到檀香山上中學，在商店裡做事，以後又在香港學醫，成為一名合格的西醫師。因此，他既了解中國社會的基本狀況，又接受了西洋現代科學和民主社會的教育。這樣，青年時期孫中山就認為封閉的宗法的自給自足的社會必須予以改造。因而，一八九四年他二十八歲時就上書李鴻章要求改革。

在“改良”的嘗試未能奏效之後，孫中山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來開展推翻帝制，肇建共和的偉業：

首先是建立組織。一八九四年十一月，經過孫中山的積極活動，在他哥哥孫眉的幫助下，中國民主革命派的第一個組織——興中會在檀香山正式成立。最初會員二十餘人，以後發展到早期的一百二十六人。其中屬於資產者的有八十人，計：商人七十四人，農場主四人，畜牧場主一人，銀行家一人；屬於其他僱員和勞動者有四十六人。第一月募得資金一千三百八十八元美金，以後積累到六千餘元。為了建立起一個在國內採取實際革命行動的指揮部，遂於一八九五年二月，在孫中山的親自主持下成立了香港興中會總會。其成員包括兩部份，一部份是有愛國思想，並有初步民主政治思想觀念的知識份子，如陳少白、陸皓東、楊衢雲等；另一部份是具有中國傳統的民族思想的人，以三合會會員為多，著名的有鄭士良、鄧蔭南、謝纘泰、黃咏商等。這兩部份，前一



部份人為主導，後一部份人有實力。革命的動機有區別，但反清的目的則一致，只是較擅香山與中會的人更激進。

孫中山在組織工作方面的功績，不僅在於首先建立了興中會，而更重要的是在一九〇五年把分散的各種組織，組成了一個統一的革命組織——同盟會。當時，由於國內外客觀形勢的發展，群眾組織不斷湧現，如：一九〇〇年以後在留日學生中先後成立的勵志會，廣東獨立會，青年會，一九〇三年在日本留學生中成立的拒俄義勇隊，在上海成立的愛國學社。尤其重要的是在一九〇四年，具有鮮明的革命色彩的組織也相繼成立了，它們主要是湖南的華興會，組成人員是以歸國留學生為主要的教育界、學界和湘贛邊界的會黨、軍隊。它下屬兩個小團體，一個是同仇會，專門聯絡哥老會，策動會黨起義；一個是黃漢會，專門運動軍隊起義。另一個組織是湖北的科學補習所，它的成員主要是駐紮在武漢的新軍中以工、兵為主的知識份子。當時，主要是由於清政府廢科舉，農村子弟既不能進私塾，又無力入學堂，更無地可耕，遂以當兵為路，而湖廣總督張之洞又在編練新式軍隊，成立武備學堂，因之，湖北新軍多知識份子，遂成為革命組織首先發展的對象。第三個較大的革命組織就是浙江的光復會，它以浙籍的留日學生為主，以散布在我國東南部的會黨為主要發展對象。它的民族主義色彩較濃，地區觀念較重，組織較嚴密。此外，還有秋瑾等留日學生組織的共愛會，福建的文明社，江西的易知社，南京的強國會，安徽的岳王會（取岳飛抗金之名以寄託排滿之意），四川的公強會，陝西的勵學齋等。

由於孫中山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由日本到歐美遊歷全球一週，到處鼓吹民主、民族革命，聲譽日隆；而留日學生中傾向革命的人與日俱增，團體日多，將散漫的力量組成統一的革命團體以突破地域性的隔閡的要求也日漸迫切。於是，留日學生即以迎孫文來日本的名義表達了建立統一組織的願望。孫文到達後，首先是華興會以“個人自由”加入的方式解決了入盟問題上的三點歧異（團體聯合；團體形式加入，精神不加入；絕不加入）。由於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華興會大多數成員相率加入了同盟會，其他團體也陸續跟進。於是，在一千三百人盛會歡迎孫中山，孫作了富有政治遠見和強烈鼓動性的重要演說之後，遂於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正式宣告中國同盟會成立。

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曾經說過：“綱領是寫在運動前面的旗幟。”孫中山對於中國民主革命的第二個

巨大貢獻就是為這一運動制訂了簡明扼要，鼓舞人心，適合潮流的十六字政治綱領：“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它的優點是：（一）全面性：它的內容包括了民族、民主、民生三個方面的鬥爭目標；（二）代表性：既代表了多數盟員反清反滿的要求，也體現了海外華僑希望祖國走向民主化的理念，更反映了廣大農民對土地的渴望；（三）理論性：它涵蓋了加入同盟會的三個主要團體原來所提出的一些較原始的、粗糙的低級的綱領，使之上升到理性的層面。華興會根本就沒有綱領，只有強烈的反滿意識，和一個長沙起義的暗語：“同心撲滿，當面算清”。光復會的綱領則是“光復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而孫中山所揭櫫的綱領，則是將這些朦朧的狹隘的民族意識周延到民族、民權、民生三個方面，上升到法國革命以來所提倡的自由（對民族而言）平等（民權）博愛（民生）的理論高度。（四）明確性：綱領的特點就是言簡意賅，朗朗上口，切中時弊，鼓動人心。這個綱領，在辛亥革命中所發揮的發動、鼓舞、組織、引導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孫中山先生是肇建共和所作出的第三個貢獻就是，發動和組織了以海外為基地，以大陸為目標，以武裝起義為主要形式的民主革命運動。在從一八九五年興中會成立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勝利這十六個年頭裡，孫中山足跡遍全球，不知疲倦地在華僑中宣傳民族、民主革命的道理，駁斥保皇派的謬言，爭取各國政府和友好人士的支持，在華僑中募集大量款項做為購買槍械、支援起義之用。在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二日的鎮南關起義中，他曾親自率黃興、胡漢民等自越南越過國境，參戰督戰，為傷員包扎傷口，並親自發炮轟敵。而對於在起義過程中英勇捐軀的烈士，他也曾賦詩抒懷，寄寓了真摯的哀思。如：七律“挽劉道一”：

半壁東南三楚雄，劉郎死去霸圖空。  
尚餘遺孽艱難甚，誰與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風嘶戰馬，神州落日泣哀鴻。  
幾時痛飲黃龍酒，橫攬江流一莫公。

孫中山先生對於民主革命，第四個貢獻就是為我們制定了第一部真正的民主憲法——“臨時約法”，建立了第一個共和國政府，從而宣告了垂二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的結束，和民主共和新紀元的開始。在“臨時約法”中，他依照美國和法國的憲法模式，肯定了“主權在民”的民主最高原則，制定了“五權分立”的政權組織架構，宣佈了人民所應享受的民主權利。這部“約法”，在當時是鞏固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限制了極力膨脹中的袁世凱的獨裁勢力，

而它所標榜的民主原則，“天賦人權”的理念和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則完全超越了在它以後所制定的一些“憲法”。而它的誕生，說是辛亥革命的成果，也是與其他兩派政治力量妥協的結果：舊官僚、地主和民族工商業上層的立憲派用它來平息人民的革命情緒，獨夫袁世凱則以它來換取革命派對他的妥協和退讓。

### 三、白圭之玷

與一切偉人一樣，孫中山先生也同樣有一些頗受人指責的瑕疵。有以下數端：

其一，告洋狀而禍本國。在台灣著名評論家李敖先生“論孫中山”一書中收有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孫中山給香港英國總督的一封信，標題是“致香港總督歷數滿清政府罪狀並擬訂平治章程請轉商各國贊成書”，向各國揭露清政府獨裁專制、踐踏民主、戕害人權的罪行，以贏得各國政府和人民對中國民主事業的支持和同情。本無可厚非，但文中卻有多處在立意和用詞方面欠妥，有媚洋以取寵，勾洋以禍國之嫌。如：開頭就說：“深知貴國素敦友誼，保中為心……故呈請助力，以襄願成，願借殊勳，改造中國……受其利者，又不特華人也。……否則恐各省華人，望治心切，過為失望，勢將自謀，禍變之來，殆難逆料……時不可失，合則有成。”其中心意思，無非是請求與洋人合作來防止各省的變亂，確保洋人在華的“利益”。因為“滿政庸懦失政，殘害本國，延及友邦。”接着，他陳述了清政府的十八條積弊，屬於內政的有八條；屬於外交的有十條，多數是說政府對外國政府、洋商、洋教士不忠實，對本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所釀成的動亂鎮壓不力，或政府直接與外人對抗，對外人保護不周。如，說對洋人“面從心違”，“交新忘舊”，“屢思報復”，“移炮環攻”，“囚禁外臣”等等。而這封信的後半部份提出的六條“平治章程”，則有：中央和各省自治政府……“以目前各國之總領事為暫時顧問局員”的規定，並把各國在華利益特別訂為第三條，美其名曰“公權利於天下。”內容是，“如關稅等類，如有增改，必先與列國妥議而行。又如鐵路、礦產、船政、工商各業，均宜分沾利權；教士、教堂、旅店，一律保護。”

其二，乞日援而讓主權。在與英美等國攀關係之後，孫中山曾着重與日本政要搭線，企圖以割讓滿蒙及享受其他政、經特權來換取日本的援助，以達到推翻滿清和打倒袁世凱的目的。具體材料如下：

1、在日本黑龍會所輯的“東亞先賢志士傳記”

中，曾有這樣的記載：孫文以前（按：指一九〇七年）只願要求援助，曾經表示：“如果對革命給予援助，則支那可以放棄滿蒙，割讓給日本。”

2、日本人宮崎龍介曾在日本雜誌透露：在一九一三年春，孫中山和日本軍人政治家，任首相時間最長的桂太郎曾有密商，“孫中山答應如果日本人援助推倒袁世凱，國民黨當政後，願意割讓滿洲給日本。”

3、陳固亭的“國父與日本友人”一書中記載，一九一四年五月，孫中山曾致書日本首相大隈，“詳述東亞危局及中日合作，相需至殷，相成至大，並勸大隈高瞻遠矚以助民黨。”在吳相湘的“孫逸仙傳”中，更詳細披露：“而中國之報酬，則開放市場，以惠日本工商。當與日本為關稅同盟。日本之製造品銷入中國者免稅，中國原料輸入日本者亦免稅。”

此事被亡命於美國費城的黃興知悉後曾寫信給馮自由說：“請轉告孫中山先生慎勿驅虎進狼。”

4、二次大戰後，美軍官員在日本外務省所保存的極機密文卷中找出了一封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四日孫中山致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的親筆信。內容是孫提出的“日、支提携”盟約本案十一條。具體條款有：“凡有關他國對東亞重要外交事件，先行互相照會協商”、“中華陸海軍使用之武器、彈藥、裝備，均採用與日本同一型式”、“聘用外國軍人時以日本軍人為主”、“中央政府及地方官署在聘用外國人時，以採用日本人為主”、“在中華方面為經營礦業、鐵路、及沿海航綫等，而需要他國資本或合營時，應先與日本協議”、“日本協助中華改良內政，整頓軍備……”、“有效期十年，並得依兩國之期望予以延期。”在附記中還特別提醒：“務請勿予公開，特此奉懇。”

以上材料，有的出自孫中山先生的手筆，有的徵諸同時代人的見證，應是確鑿無誤。而每一證件，在在都說明了一個不爭的事實，即，為了達到推翻滿清政府和打倒袁世凱的目的，孫先生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和以後，曾經採用了一些不該採用的包括出賣國家領土、主權在內的手段。當然，由於事變的發展，這些密謀當時還都處於幕後密商階段，沒有來得及實現。但是，這種“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思想方式和處世方法都是絕對不可以苟同和效尤的。

其三，由於孫中山認為歷史是由先知先覺的少數聖賢、豪傑創造的，而大多數“庸眾”的職責僅限於跟着這少數人去實行，因而，在領導革命的進程中，他一直把革命勝利的希望寄托在少數革命黨人在邊

（下轉37頁）

# 下里巴人中文软件

下里巴人中文软件系统是在广泛流传的BYX1.1和CH-SERIES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特点如下：

1. 独创整句拼音连续输入，能以句、词组、单字输入。声调可有可无。
2. 具有最广泛的硬件适应性，可用于M/C/E/VGA图像卡，HP和POST SCRIPT激光及点阵打印机。
3. 具有最快的速度，最丰富的编辑功能，有最高版面使用率。有临场帮助（HELP）。
4. 不需要特殊硬件，中文操作系统，不留内存驻程序。
5. 中文码采用广为接受的国标码。英文码采用标准码，可用来编写程序。可简体与繁体互换。
6. 可改动键盘定义，建立组合指令和缩写。

下里巴人中文系统用于IBM/PC及兼容机，DOS版本2.0以上。下里巴人中文系统分两个版本发行：基本系统和增强系统。

**基本系统：**基本编辑系统（BYX/2.0）—有整体取代，选择取代，割补，重复操作，字串统计，拼音转中文等功能。基本打印系统（LSP/2.0）用于HP激光及与EPSON兼容点阵打印机。有分栏，字体变换，自动排页，左右对齐等功能。字库为宋体字简体16，24，40点和繁体24点。价格：\$69+S&H（\$5对360K软盘，其它\$3）。加州另加\$5（税）。

**增强系统：**增强编辑系统（BYX/2.0A）—除包括基本系统所有功能外，还具有改动键盘定义，建立缩写和组合指令（MACRO）功能。增强编排打印系统：（1）LSP/2.0A—除实现基本系统功能外，还具其它增强编排功能。（2）CHROFF/2.0—用于POST SCRIPT激光打印。字体可任意放大缩小。能编排较为复杂的刊物。字库为简体宋体/仿宋体字16（仅宋体），24，40，48，56，64点和繁体宋体字24点。价格：\$159+S&H（\$8对360K软盘，其它\$5）。加州另加\$11.53（税）。

支票请寄：P.O.BOX 1462 BROOKLANE MA 02146

支票抬头：YONGXIN & SANS SOFTWARE

注：订购时请注明软盘尺寸。电话：（617）-424-1592

# 中國之春讀者買電腦享受優惠

憑此廣告在本公司訂購打25%折扣

\*\*\*\*\* Abest International, Inc. \*\*\*\*\*

## AB-386DX-25 System

**Functional Features:**  
 - Microprocessor: Intel 80386DX-25  
 - Clock Speed: 25/20/8 Mhz  
 - RAM: 1MB installed and expandable to 8MB on board  
 - Page-Interleaved memory control  
 - Math Coprocessor: Weitek 3167 or Intel 80387 & 80287 (option)  
 - BIOS: AMI  
 - Expansion Slots: One 32-bit, five 16-bit and two 8-bit  
 - I/O Ports: 2-S, 1-P and 1-G  
 - Floppy Drive: One 1.2MB 5 1/4" and one 1.44MB 3 1/2"  
 - HD/FD Controller: 1:1 interleave  
 - 101-key enhanced keyboard  
 - Power Supply: 200 Watt  
 - MS-DOS 3.3 or 4.01 /w. manual  
 - Case: Desktop style

## AB-386DX-20 System

**Functional Features:**  
 - Microprocessor: Intel 80386DX-20  
 - Clock Speed: 20/16/8 Mhz  
 - RAM: 1MB installed and expandable to 8MB on board  
 - Page-Interleaved memory control  
 - Math Coprocessor: Weitek 3167 or Intel 80387 & 80287 (option)  
 - BIOS: AMI  
 - Expansion Slots: One 32-bit, five 16-bit and two 8-bit  
 - I/O Ports: 2-S, 1-P and 1-G  
 - Floppy Drive: One 1.2MB 5 1/4" and one 1.44MB 3 1/2"  
 - HD/FD Controller: 1:1 interleave  
 - 101-key enhanced keyboard  
 - Power Supply: 200 Watt  
 - MS-DOS 3.3 or 4.01 /w. manual  
 - Case: Desktop style

## AB-386SX-16 System

**Functional Features:**  
 - Microprocessor: Intel 30386SX-16  
 - Clock Speed: 16 Mhz  
 - RAM: 1MB installed and expandable to 8MB on board  
 - Page-Interleaved memory control  
 - Math Coprocessor: Intel 80387SX (option)  
 - BIOS: Phoenix or AMI  
 - Expansion Slots: Six 16-bit and two 8-bit  
 - I/O Ports: 2-S, 1-P and 1-G  
 - Floppy Drive: One 1.2MB 5 1/4" and one 1.44MB 3 1/2"  
 - HD/FD Controller: 1:1 interleave  
 - 101-key enhanced keyboard  
 - Power Supply: 200 Watt  
 - MS-DOS 3.3 or 4.01 /w. manual  
 - Case: Desktop style

## AB-286-12 System

**Functional Features:**  
 - Microprocessor: Intel 80286-12  
 - Clock Speed: 12.5/6 Mhz  
 - RAM: 1MB installed and expandable to 4MB on board  
 - Clock/Calendar  
 - Math Coprocessor: Intel 80287 (option)  
 - BIOS: AMI or Award or Phoenix  
 - Expansion Slots: Six 16-bit and two 8-bit  
 - I/O Ports: 2-S, 1-P and 1-G  
 - Floppy Drive: One 1.2MB 5 1/4" and one 1.44MB 3 1/2"  
 - HD/FD Controller: 1:1 interleave  
 - 101-key enhanced keyboard  
 - Power Supply: 200 Watt  
 - MS-DOS 3.3 or 4.01 /w. manual  
 - Case: Desktop style

## AB-XT-10 System

**Functional Features:**  
 - Microprocessor: Intel 8088-1 or -2  
 - Clock Speed: 10/4.77 Mhz  
 - RAM: 640KB installed on board  
 - Clock/Calendar  
 - Math Coprocessor: Intel 8087-1 (option)  
 - BIOS: Phoenix  
 - Expansion Slots: Eight 8-bit  
 - I/O Ports: 2-S, 1-P and 1-G  
 - Floppy Drive: One 360KB 5 1/4"  
 - Disk Controller: 2:1 interleave  
 - 84-key keyboard /w. keypad  
 - Power Supply: 150 Watt  
 - MS-DOS 3.3 or 4.01 /w. manual  
 - Case: Desktop style

Combinational Chart of the Hard Drive, Monitor and Video Card

AB-386DX-25 System				AB-386DX-20 System				AB-386SX-16 System				AB-286-12 System				AB-XT-10 System		
Video H.D.	MONO 720x348	VGA 640x480	S-VGA 1024x768	Video H.D.	MONO 720x348	VGA 640x480	S-VGA 1024x768	Video H.D.	MONO 720x348	VGA 640x480	S-VGA 1024x768	Video H.D.	MONO 720x348	VGA 640x480	S-VGA 1024x768	Video H.D.	MONO 720x348	CGA 640x200
40MB 28ms	\$2,100.00	\$2,520.00	\$2,580.00	40MB 28ms	\$1,980.00	\$2,400.00	\$2,460.00	40MB 28ms	\$1,620.00	\$2,040.00	\$2,100.00	20MB 65ms	\$1,260.00	\$1,680.00	\$1,740.00	20MB 65ms	\$1,060.00	\$1,200.00
80MB 28ms	\$2,400.00	\$2,820.00	\$2,880.00	80MB 28ms	\$2,280.00	\$2,700.00	\$2,760.00	60MB 28ms	\$1,740.00	\$2,160.00	\$2,220.00	40MB 28ms	\$1,380.00	\$1,800.00	\$1,860.00	30MB 65ms	\$1,098.00	\$1,230.00
150MB 18ms	\$3,060.00	\$3,360.00	\$3,540.00	150MB 18ms	\$2,940.00	\$3,240.00	\$3,300.00	80MB 28ms	\$1,920.00	\$2,340.00	\$2,400.00	60MB 28ms	\$1,500.00	\$1,920.00	\$1,980.00	40MB 28ms	\$1,200.00	1,320.00

**NOTES:**

- 1). NOT responsible for types, misprints and compatibility problems.
- 2). One-year full warranty on parts & labor with professional technical services.
- 3). Cache Mother Board, Please Add \$200.00.

- 4). Prices, specifications and availability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 5). 7-day money-back guarantee.

6). Please call for products not listed.

Abest International, Inc.

83-09 Northern Blvd., Jackson Heights, NY 11372

Tel: (718)507-8485 / 507-0411 Fax: (718)507-7795

發行: 中國之春出版社

美國: P.O. BOX 701400 FLUSHING, NY 11370-9998

香港: 香港, 九龍, 廣東道501號2樓4室 TEL: 7826772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TEL: 3-8496348

澳洲: P.O. BOX 3272, ASHFIELD, NSW 2131 AUSTRALIA

G.P.O. BOX 4881 VV MELBOVRNE VIC 3001 AUSTRALIA

歐洲: PARISER STR.52 5300 BONN 1, W.GERMANY TEL: 228-679902

東歐: 1072 BUDAPEST, MAJAKOVSKIJ U41 BUDAPEST, HUNGARY

加拿大: P.O. BOX 94052 RICHMOND BC CANADA V6Y 2X2

零售價: (美) 2.50美元; (加) 3.00 加元; (港) 12.00 港幣。

T.P.Lee  
 Parkview Tower 1109  
 701 W.Gate Ave.  
 St. Louis, MO 63130

93

5

\* SECOND CLASS \*  
 \* POSTAGE PAID \*  
 \* FLUSHING N.Y. \*  
 \* ISSN 35-8237 \*

J.S.A